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拿破仑传

〔苏联〕叶·维·塔尔列著

商务印书馆

K835.655.2
1
81842
200256720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拿破仑传

〔苏联〕叶·维·塔尔列 著
任田升 陈国雄 译
胡 平 校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但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今年出版丛书第一批，计20种，以后将逐年增补，以期在若干年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完整系列。由于现系采用原纸型印行，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今后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2年5月

出 版 说 明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曾经把他同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英雄人物并列。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他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②

在新兴资本主义同没落封建主义在欧洲进行决定性较量的社会大变动时代，他站在当时先进力量一边，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维护法国的独立与统一，巩固由法国大革命初步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击国内外复辟势力的疯狂反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拿破仑对内镇压民主派和工人，对外进行扩张，他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是有罪的。在客观地评说他的全部功过时，应该承认拿破仑为确立和巩固新制度的努力和业绩是他一生中的主流。"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③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封建王朝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复辟，但是它们想要完全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不可能了。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拿破仑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奠立的坚实基石。

这部《拿破仑传》是苏联历史学家叶·维·塔尔列(1875—1955年)几十年前的著作。原书第一版印行于1933年，后经作者两次修订，1957年印行第三版，即本译文根据的版本。塔尔列在帝俄时期已从事法国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经济问题。十月革命后，他逐渐转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0页。

③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页。

向马克思主义，1927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关于拿破仑时期，他还著有《大陆封锁》、《拿破仑入侵俄国》和《塔列朗传》等书。

在迄今出版的各种拿破仑传记中，本书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还算是一部较好的著作。作者较为客观地对拿破仑一生作出了评价。塔尔列用力揭示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阶级本质，说明他的上台完全是适应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需要，他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措施是为法国整个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他揭露拿破仑迫害雅各宾民主派，打击工人，指出拿破仑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错误地同奥地利王族结亲，不敢发动群众来抗击入侵的欧洲反革命复辟势力，终于失败。

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来描述拿破仑同受外国指使的保王党人、阴谋家、暗害分子所进行的坚决斗争。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充分肯定了拿破仑在摧毁欧洲封建制度方面所起的客观进步作用。同时，他也正确地指出："这位从前的法国革命政府的将军的形象越是被法国皇帝的形象所掩盖，以及法国皇帝的形象越是被世界君主的形象所掩盖，那么拿破仑在使各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方面就越不坚决。"

塔尔列在本书中指出了沙俄将军们(除库图佐夫外)在指挥上的极端无能，揭露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面前的恐惧和背后的狡诈，特别是在迫使法国人民抛弃拿破仑时所施展的卑鄙伎俩。

作者对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如德里奥、索莱尔)美化拿破仑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应当指出，本书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作者虽然肯定了拿破仑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却又重复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拿破仑的污蔑。他多次称拿破仑为"天生的暴君"，"消灭任何自由的暴君"，"生下来就是专制主义者"等等。

塔尔列没有认清当时法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封建复辟势力。他正确地指出了拿破仑帝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又给它戴上“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帽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把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统治区别开来，认为拿破仑第三建立的第二帝国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权，指出它纯粹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而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制度是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的”，① 拿破仑“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② 自然，和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相比，拿破仑的统治在民主性方面确实后退了一步。对资产阶级来说，政权到手，革命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需要一个巩固时期，而拿破仑的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击反革命复辟势力。因此，决不能把这个政权称为“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重印，对书中个别疏漏之处作了订正。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作 者 序 言

我将要在本书中给他做传并且加以评论的这个人，是世界史上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因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多作品来论述这个人，这是很自然的。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使人们对这位被专家公认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无能的统帅，例如法国的尼维尔① 之流，德国的老毛奇②、小毛奇③ 和法尔肯汉④之流，俄国的伦涅康夫⑤和雅努什凯维奇之流，英国的弗兰奇⑥和海格⑦之流等等，由于这些无能之徒不胜其多，因此就连鲁登道夫⑧、福煦⑨、阿列克谢也夫⑩ 这些平庸之辈也被看成了天才的战略家；所有这些统率百万大军的无能统帅能够居于那样的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无庸争辩地证明，爆发战争和有机会率领大批军队本身并不会产生天才的统帅，正象有很多最好的白大理石采石场也并不会产生菲狄亚斯⑪或米开朗琪罗⑫一样。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成了人所公认的事实，而这也就十分自然地使人们对少数几位伟大的军事天才——汉尼巴、恺撒、苏沃洛夫，当然首先是这方面的“最强者”拿破仑，重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击溃敌人，以便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使他们长期地、牢固地、“永远地”臣服于自己，从这时起，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造战败国的历史，如果不能立即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也要影响它的历史，——这就是拿破仑认为需要战争、冲击、远征、进攻的原因。拿破仑从来不需要徒劳无益的即不会带来直接政治利益的胜利。

当然，只是在唯心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幼稚时期，特别是在所谓“英雄学派”的时期，才认为拿破仑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历史时代的

创造者，是他赋予了那个时代以思想内容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一般意义。

拿破仑扼杀了法国革命之后，从来都不让记起这个革命；他于1800年12月无情地镇压了雅各宾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后来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件事与他们毫无关系)，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共和主义者，他们不想为了取得轰动一时的沙文主义的荣誉而彻底出卖革命传统。拿破仑走上反动政治道路之后所做的，首先是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所最需要的；他所制定的整个对内对外政策，首先是为了完全满足这个阶级的利益。

他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他从自己帝国的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取缔了自由的概念，甚至早期的自由概念；在他统治庞大的帝国的整个期间，到处都噤若寒蝉，无声无息。他想指挥一切，命令一切。他的专横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他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的结婚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和指示，离婚也是一样，假如他认为需要的话。

战争给法国带来了荒凉空虚的景象。在1814—1815年，有些农村里没有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拿破仑一贯不遗余力地反对工人的革命情绪。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有一次他曾以自己特有的那种坦率精神谈道，工人是不会喜欢他的，他“上台的时候，他们贫困，以后他们还是照样贫困”。不过他忘记补充一句，就是任何一个被他镇压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在竭力压迫工人阶级方面都没有象他那样挖空心思，竟用专门颁发“工人手册”的办法，迫使工人丝毫不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减轻雇主对自己的剥削。

普希金的老年同代人和朋友瓦赞斯基公爵经历了拿破仑时代，他说过，在整个第一帝国时期，在全欧洲，到处都是压迫深重，胆战心惊、对明天丧失信心的景象。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和他的国家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拿破仑是不是会进行突然的袭击。对拿破仑推崇备

至的阿尔贝·万德尔非常委婉地、也可以说是相当雅致地谈到他所爱戴的英雄所建立的帝国的“不断移动的疆界”。但是，假如读者清楚了解这种“不断移动的疆界”是什么东西，那他马上就会相信瓦赞斯基公爵的话，并且就会懂得，为什么在这血腥时期，欧洲到处都是压迫深重、胆战心惊的景象。拿破仑帝国的疆界不仅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移动”，而且就在拿破仑没有进行战争的短短的间隙时期也在“移动”：在对他适宜的时机，他只要发布一个有关的命令，就无条件地把他想要吞并的那些国家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条约在他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在拿破仑能够实际上统治的一切国家，都进行了有计划的、公开的掠夺。尽管不断进行战争，拿破仑还能使财政收支保持令人满意的状况，几乎没有欠债(与英国相比，因为英国在拿破仑时期欠下的债，一直到其后四十年间都无法偿清)，而爱国的法国历史学家以此自我安慰，忘记了这个辉煌成就正是对所有附属国进行毫无止境的骇人听闻的掠夺的结果。

本书读者曾屡次问我，是否可以象我现在所称呼的那样，把拿破仑的战争称做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在 19 世纪初还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帝国主义这个术语。当然可以这样称呼，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称呼，因为按拿破仑的掠夺的性质和内容来说，“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名词是完全准确和适用的。况且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和约的著名演说中也谈道：“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 他好象是预见到了刚刚提到的本书读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在同一个地方做了解释：“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进行的战争。”

---

*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37 页。

政治上的奴役，利用各种借口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给被征服国家带来的一切。法国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应当对被征服的欧洲大陆实行统治。他们帮助拿破仑在本国和在欧洲保持专制统治。这就是拿破仑帝国的制度。但这只是拿破仑专制图景的一部分，如果只认识到这一点，那还没有了解这个非凡人物的活动的全部历史意义。

如果否认拿破仑彻底粉碎封建专制制度的欧洲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否认这个十分明显的无庸争辩的事实，那是不正确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德国的一些论断对大陆上其他国家也是适用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3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33年来使我们所处的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

拿破仑给了封建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使它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过来，这就是与拿破仑的名字联系着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进步意义。

拿破仑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永远也不会重复的，因为在世界史上永远也不会再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和欧洲形成的那种局面了。

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对法国第一个皇帝的生平作出尽量清楚的叙述，对这个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以及他的特性、天赋和意图，加以评论。作者只是想向本书的读者概括地介绍一下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43—344页。

革命后的法国和封建制度的欧洲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动力以及社会的阶级结构。

在当时的欧洲，正需要拿破仑给封建制度以无情的打击。读者如果不了解拿破仑帝国的历史，就根本不可能理解 1815—1848 年欧洲的全部历史。

只要多少读过评论拿破仑的著作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评论，不管是好是坏，跟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家(无论是拿破仑的批评者或赞美者)对这位皇帝所做的任何评论是截然不同的。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力求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来探讨这个复杂的重要的人物，我所注重的不仅是(与其说是)他的活动的动机，而且是(不如说是)这些活动的历史意义。一个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奥地利政论家根茨说，拿破仑是自然现象，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妨碍他极力攻击这个“自然现象”。普希金在谈到这位法国皇帝时，曾说过如下的话：拿破仑是“历史厄运的无声命令的执行者”；而我所要探讨的正是拿破仑是怎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的。

这本书不是普及读物，而是独立研究的结晶，是作者对档案材料和已出版的材料进行研究以后所得出的一些结论的简要叙述。这些材料(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发现的)是作者写作两篇关于大陆封锁的专题论文和探讨拿破仑时期的出版状况时阅读的。当然还有一些有关拿破仑其他方面活动的材料。

出 版 者 注

① 尼维尔(Nivelle, Robert Georges, 1856—19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法军总司令，他在 1917 年 4—5 月间指挥英法联军，使英法联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编者

② 老毛奇 (Moltke, Helmuth Carl Bernhard 1800—91)，普鲁士元帅，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和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的军事思想家。——编者

③ 小毛奇(Moltke, 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1848—1916)，从 1906 年起任德国参谋总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策动者。——编者

④ 法尔肯汉(Falkenhayn, Erich von, 1861—1922)，普鲁士的军事活动家。——编者

⑤ 伦涅康夫 (Ренненкампф, Павел Карлович, фон, 1854—1918)，反动的俄国将军。——编者

⑥ 弗兰奇(French, John Denton Pinkston, 1852—1925)，英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曾任英国远征军司令。——编者

⑦ 海格 (Haig, Douglas, 1861—192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军总司令。——编者

⑧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Erich, 1865—1937)，德国将军，德国帝国主义的军事理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之一。——编者

⑨ 福煦(Foch, Ferdinand, 185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8 年 4 月起)协约国的最高统帅，也是帝国主义反苏军事干涉计划的拟订者。——编者

⑩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18)，俄国将军，1917—1918 年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编者

⑪ 菲狄亚斯 (Φειδίας 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死于公元前 432 或 431 年)，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编者

⑫ 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是文艺复兴时代美术界最伟大的代表之一，天才的意大利雕刻家、写生画家、建筑家和诗人。——编者

目　　次

作者序言…… 1

第 一 章　拿破仑·波拿巴的青年时代…… 1

第 二 章　意大利战役(1796—1797 年) ……22

第 三 章　征服埃及和进军叙利亚(1798—1799 年) ……41

第 四 章　雾月十八日政变(1799 年) ……54

第 五 章　独裁者的第一步(1799—1800 年) ……69

第 六 章　马伦哥战役。独裁制度的巩固。第一执政的
立法(1800—1803 年) ……83

第 七 章　新的对英战争的开始和拿破仑的加冕
(1803—1804 年) ……111

第 八 章　第三次联盟的崩溃(1805—1806 年) ……128

第 九 章　击溃普鲁士和完全征服德意志(1806—1807 年) ……152

第 十 章　从提尔西特到瓦格拉姆(1807—1809 年) ……181

第十一章　皇帝和极盛时的帝国(1810—1811 年) ……207

第十二章　与俄国决裂(1811—1812 年) ……231

第十三章　拿破仑进攻俄国(1812 年) ……247

第十四章　附庸的欧洲起义反对拿破仑和“民族战争”。
“大帝国”崩溃的开始(1813 年) ……287

第十五章　在法国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次退位(1814年) ……314

第十六章　“百日”(1815 年) ……338

第十七章　圣赫勒拿岛(1815—1821 年) ……377

结束语 ……389

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 ……412

第一章　拿破仑·波拿巴的青年时代

一

1769 年 8 月 15 日，在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一个当律师的本地贵族的十九岁妻子列蒂契娅·波拿巴，在屋外忽然感到产前的阵痛，她马上回到客厅，立即生了一个男孩。当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产妇近旁一个人也沒有。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这个不富裕的律师夏尔·波拿巴就这样添了一个儿子。律师决定将来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法国去上学，不在科西嘉上学。后来儿子长大了，他就把儿子送进了法国一所公费的军事学校：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是供不起儿子上学的。

长期隶属热那亚商业国的科西嘉岛，曾经在一个本地地主(保利)的率领下进行暴动，反对热那亚，到 1755 年，赶走了热那亚人。虽然这是一次小贵族和地主的暴动，但他们得到山区的猎人和牧民以及一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一句话，得到了一切想要摆脱外来的商业国的贪婪剝削、摆脱行政当局的压迫的人们的支持。暴动取得了胜利，从 1755 年起，科西嘉岛在保利统治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当时，在科西嘉岛(特别是內地)，氏族制的残余还很严重，过着部落生活，这些部落有时彼此还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战爭。氏族复仇事件还很普遍，往往酿成部落之间的大血战。

1768 年，热那亚国把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对科西嘉岛的“权力”出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69 年春，法国军队击溃了保利的队伍(这是拿破仑出生三个月前，1769 年 5 月的事)，科西嘉岛成了法国的领土。

拿破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度过的，当时岛上的人因为突然再次丧失政治独立而感到惋惜，同时，一部分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也在考虑是否要最终地、死心塌地地成为效忠法国的臣民。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参加了“法兰西”党，但幼小的拿破仑却因科西嘉的捍卫者保利被赶走而感到惋惜，并且憎恨法国入侵者。

拿破仑从小就缺乏耐性、好动。他后来回忆道：“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喜欢争吵、打架，我谁都不怕。见了什么人，我不是打，就是抓，谁都怕我。最倒霉的是我的哥哥约瑟夫。我打他，咬他。他还因此挨骂，因为当他还在惊悸未定的时候，我就向母亲告状了。我这样耍花招，也的确占了便宜，不然的话，妈妈列蒂契娅是会因为我打架而罚我的，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我去侵犯别人！”

拿破仑幼时就很阴沉、暴躁。母亲很爱他，但她对他和其他孩子的管教却很严厉。他们生活很节俭，但并不困难。父亲看来是个善良而软弱的人。家庭的真正首脑是列蒂契娅，她是个坚强、严厉、勤劳的女人，孩子由她管教。拿破仑的勤劳和办事井井有条正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

与世隔绝的孤岛，深居山林中的野蛮的居民，部落之间的不断冲突和相互复仇，以及对法国入侵者的隐蔽的但却是深刻的仇恨，所有这些对幼小的拿破仑的心灵都有很深的影响。

1779年，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把两个年长的儿子约瑟夫和拿破仑送到了法国，进奥亭中学；同年春天，10岁的拿破仑转到法国东部布里埃纳城一所公费的军事学校。

在布里埃纳军校，拿破仑还是一个阴沉、孤僻的孩子；他很易激怒而且长时间地生气。他和谁都不接近，对谁都瞧不起。他对人缺乏友谊，缺乏同情。他非常自信，虽然他个子和年岁都还很小。有人曾经想惹他生气，挑逗他，嘲弄他的科西嘉口音。小小的拿破仑怒不可遏，同他们打了几架，并且都打赢了（不过他也受了伤），他的同学这

才发觉他不是好惹的。他学习得很好，希腊罗马史都学得很不错。他也很喜欢数学和地理。这所外省军校的教员自己对所教的课程也并不十分精通，于是幼小的拿破仑便靠阅读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从幼年时期起直到后来，他读起书来总是又多又快。他的科西嘉爱国主义使他的法国同学感到很惊奇，并因此而排斥他；当时，对他来说，法国人是异族，是自己家乡科西嘉岛的外来征服者。在军校时，他只能通过家信同遥远的故乡联系，因为家里没有钱让他在假期回家探望。

1784 年，即拿破仑十五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军校，接着就转入培养军官的巴黎军校。该校有第一流的教员，只要指出著名的数学家蒙日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就够了。拿破仑专心听课，如饥似渴地读书。在这个学校真有值得学的东西，也有人教。但在第一学年中，他就遇到了不幸：他是 1784 年 10 月底进入巴黎军校的，而到 1785 年 2 月，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就因患胃癌逝世（后来拿破仑自己也是死于这同样的病）。家里变成一贫如洗。当时根本不能指望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因为他既无能又懒惰。于是，就由十六岁的军官学校学生来照管母亲和兄弟姐妹的生活。他在巴黎军校呆了一年，1785 年 10 月 30 日离开学校，入陆军当少尉，被派到南方瓦朗斯城的一个团队服役。

这位年青军官的生活很艰苦。他把大部分薪金都寄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勉强维持生活，丝毫不允许自己寻欢作乐。他在一个小书铺里租了一间屋子，一有空就读书店老板的书。他不与人交游，衣服也很破旧，他不想而且也不可能过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他怀着罕见的求知欲，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做笔记，写心得。

他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史、数学、地理、旅行记等方面的书。他也读哲学著作。就在这时，他接触了 18 世纪启蒙学派的古典作家——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马布利、雷纳尔等人的著作。

现在还很难肯定，究竟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厌恶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及其哲学的，而这种厌恶情绪是他一个突出的特点。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十六岁的少尉与其说是在批判，不如说还是在学习。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根本特点：他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对任何一本书，以至于对任何一个陌生的人，都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去接近，希望尽快地吸收他所不知道的，可以充实他的思想的东西。

他也读小说和诗歌，很喜欢《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歌德的其他作品，他读过拉辛、高乃依、莫里哀的作品以及被认为是中世纪苏格兰诗人奥西恩写的曾经轰动一时的诗集（这是一部很精彩的文学作品），他读完这些作品以后，马上又去研读数学论文、军事书籍、特别是有关炮兵方面的著作。

1786 年 9 月，他请了很长时间的假，回到故乡阿雅克修去安排家务。他父亲逝世时留下了一点地产和一些杂乱事务。拿破仑很有条理地处理了这些事务，扭转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他的假期一直继续到 1788 年年中，虽然在这期间，他没有拿到薪金，但他处理家务的收获弥补了这个亏空。

1788 年 6 月，他回到法国后，很快就随自己的团队开赴奥松城。在这里，他住的已经不是民房，而是军营。他象以前一样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弄到的书，特别是 18 世纪时军事家所注意的那些军事问题的主要著作。有一次他因为一件事情被关禁闭，偶然地在禁闭室中发现了不知怎样落到那里的一本旧的查士丁尼法令汇编（关于罗马法的）。他不仅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它，而且几乎事隔十五年以后，他在制定拿破仑法典的会议上，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使著名的法国法学家大惊失色。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从事顽强的脑力劳动和长时间地进行思考的能力，在这样早年时代就已经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拿破仑后来多次这样说过：“如果

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以前，早已考虑很久了；我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的突然启示，而是我的思考对我的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在谈到自己天才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些讽刺嘲笑的意味，而在谈到自己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非常严肃和执拗的神情。他因自己巨大的工作能力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远远超过了他对无限慷慨的上帝所赋予他的任何其他才干所引起的自豪。

在奥松城，他从事写作，写了一篇不长的关于弹道学的论文（«论炸弹的投掷»）。炮兵战术最后终于成为他所喜爱的军事专业。他在这个时期，也写了一些小说、哲学、政治方面的短文等等。在这里，他的言谈往往多少带着一些自由主义的味道，有时直接重复卢梭的一些思想，但一般说来，决不能把他说成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信徒。在他这几年的生活中，可以看到一个特点他使自己的热情和欲望完全服从于意志和理性。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躲避社交，不和女人接近，不寻欢作乐，不知疲倦地工作，公余之暇就手不释卷。他这个贫穷的外省军官，出身寒微的科西嘉贵族，总是遭到贵族同僚和贵族官长的轻视，对于这样的命运，他是否真正满意呢？

当他还来不及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更不待说具体地考虑未来计划的时候，他准备登台演出的那个舞台就开始动摇了，并随之而损毁、崩溃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二

无数的拿破仑传记的作者和历史学家都喜欢赋予自己的主人公一些非凡的特性：英明，有预见性，极力仿效自己崇拜的人物。他们

都想让奥松驻军中这位二十岁的炮兵中尉能够预见到，1789 年爆发的革命对他个人有怎样的影响。

事实上，一切都要简单和自然得多。按其社会地位说来，拿破仑只能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中获得好处。在科西嘉，甚至在热那亚时代，贵族(特别是领地少的贵族)从未享受过法国贵族如此珍视的那些权利和特权；一个来自遥远的、不久前被法国人占领的意大利荒岛的外省人，根本不能指望在军队中飞黄腾达。如果说，1789 年的革命有什么能使他心醉神往的话，那就是：只有现在，个人的能力才能够帮助一个人沿着社会的阶梯往上爬。对刚刚开始活动的炮兵中尉波拿巴说来，再用不着别的什么了。

他深思熟虑地盘算着一些实际问题。他怎样才能最有利地利用这场革命？在什么地方做这件事最好？答案有两个：在科西嘉，或者是在法国。这时无论如何不应该夸大他的科西嘉爱国主义热情了。1789 年的陆军中尉拿破仑已经和十岁时不同，不再象一只狠毒的狼崽了：那时在布里埃纳军事学校，同学们模仿他的科西嘉声调，他曾大打出手。现在拿破仑懂得，什么是法国，什么是科西嘉了，他能够权衡轻重，当然也懂得这两者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但问题在于，甚至在 1789 年，他也不能奢望在法国弄到一个满意的职位，而现在，在革命爆发以后，在幸运的情况下，他已经能够在科西嘉弄到这种职位了。因此，在攻打巴士底监狱两个半月之后，拿破仑请假回到科西嘉。

拿破仑写了很多文稿，正是在 1789 年，他写完了科西嘉历史概要。他把这份手稿送给雷纳尔征求意见。这位当时享有盛名的作家对此文的赞扬，使他感到很高兴。这本著作本身就表明，他在故乡展开政治活动以前，就已经对这个岛屿有了极浓厚的兴趣。他回家探望母亲后，就立刻声明自己是拥护被长期放逐后归来的保利的，但是保利对这位年轻中尉十分冷淡，并且很快就表明，他们根本不是一路

的。保利力图把科西嘉从法国的占领下完全解放出来，而拿破仑则认为，法国革命为科西嘉的发展，也许（而这是主要的）为他个人的前途，开辟了新的道路。

回到科西嘉几个月而一无所成之后，他重返团队，并且带着自己的弟弟路易，以期稍稍减轻母亲的负担。两兄弟住在瓦朗斯，因为队伍这时又驻扎在那里。拿破仑中尉现在必须和弟弟一起生活，并且要用自己微薄的薪俸供给弟弟上学。有时，他只能吃上一块面包。拿破仑继续努力服役，并且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勤勉地阅读军事史。

1791 年 9 月，他又回到科西嘉。这一次他是调任工作。这时他与保利完全决裂了，因为保利已经公开要使科西嘉岛脱离法国，而这是拿破仑绝对不希望的。1791 年 4 月，当全力支持分离主义者保利的反革命僧侣与革命政权的代表之间展开战斗时，拿破仑甚至开枪射击向他的队伍进攻的叛乱群众。最后，政府当局对他也怀疑起来，因为他企图夺取堡垒（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他回到了法国，并且必须立刻去巴黎陆军部，说明自己在科西嘉的多少有些可疑的行为。他于 1792 年 5 月底到达首都，成为这个夏季暴风雨般的革命事件的目击者。

我们有确实的材料足以判定这个二十三岁的军官对这几个月中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即 1792 年 6 月 20 日人民群众攻入杜伊勒里宫，以及同年 8 月 10 日推翻君主王朝，是采取什么态度的。由于他不是参加者，只是旁观的、偶然的目击者，并且有两次机会在亲密友人之间谈论这件事情，所以他完全可以毫无拘束地表白自己的眞实感情，自己的全部天性。而他的言谈是极其清楚、不会引起歧义的："跟着这群无赖走吧！"——这就是 6 月 20 日，当他和布勒因在街上看见向王宫行进的人群时对布勒因说的话。当被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吓破了胆的路易十六带着红色的弗里吉亚帽（革命的一种标记）走到窗前向人群低头认罪时，拿破仑鄙视地说道："眞是一个懦夫！怎么能够

放纵这群无赖！应该用大炮消灭五六百人，其余的人就会四散逃命了！”我把拿破仑给路易十六取的绰号故意说得不那末难听，是因为在书本上根本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写上那种绰号。8月 10 日(攻打杜伊勒里宫和推翻路易十六的那一天),他又在大街上重述了给国王取的这个绰号,而把革命的起义者骂成是“最无耻的群氓”。

1792年 8 月 10 日,当他在人群中观看进攻杜伊勒里宫的时候,当然不可能知道,这时把路易十六从法国的王位上赶下来,正是为他拿破仑腾出了王位，这正如他周围的群众在兴高采烈地高呼庆祝共和国诞生的口号时，也不可能想到，这个混在群众中不引人注目的、瘦小的、穿着破旧上衣的青年军官竟会扼杀这个共和国而成为专制帝王。指出拿破仑的这种天性是很有意义的:还在青年时代,他就已经认为炮弹是回答人民起义的最适当的手段。

他再次回到科西嘉。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保利最后决定使科西嘉脱离法国、并向英国投降的时候。在英国人占领科西嘉岛前不久,拿破仑经历了不少危险,从科西嘉逃出,并且把母亲和全家都带走了。这是 1793 年 6 月的事。他们刚刚逃走,他们的家就被保利的信徒——分离主义者捣毁了。

生活开始困难起来了。一个大家庭完全破产了,年青的上尉(拿破仑不久以前得到了这个军衔）需要负担母亲和七个兄弟姐妹的生活。起初他把他们勉强安置在土伦，后来又搬到马赛。贫困的生活就这样一月一月地挨下去,没有一点起色。然而不久,他的这种枯燥无味的服役生涯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中断了。

在法国南部,爆发了反革命叛乱。1793 年,土伦的保王党赶走了、即击溃了革命政权的代表,并向航行在地中海西岸的英国海军求援。于是革命军从陆地上包围了土伦。

这个包围由于部署不当，因而没有获得成功。这次包围是由一个叫卡尔多的人指挥的。这支军队的政治领导人是拿破仑的旧相

识，科西嘉人萨利切蒂，他曾平定过南方的保王党人的暴动。他同拿破仑一道反对过保利。拿破仑去土伦附近的军营访问了这位同乡，并向他指出夺取土伦以及把英国海军从海岸赶走的唯一方法。萨利切蒂任命年轻的上尉为包围军炮兵首领的助手。

11月最初几天发动的攻势没有获胜，因为负责指挥的顿涅在决定关头没有听取拿破仑的意见和要求而命令军队撤退。拿破仑相信，要不是犯了这个重大错误，法国人一定取得了胜利。他自己身先士卒，负了伤。上级领导对这个突然出现在军营中的不知名的年轻人不很信任，对拿破仑的方案一再反对和阻挠，最后，新来的指挥官杜戈米埃终于同意实行他的方案。拿破仑配置了炮兵(这是他早就渴望的)，进行了猛烈的轰击，然后实行冲击——他亲自参加了这次冲击，夺下了控制舰队停泊处的制高点(艾希特)，向英国舰队开火。

经过两天猛烈的射击，共和党人于12月17日向要塞发起猛攻。有7千人参加了这次冲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败下阵来。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拿破仑带着后备队上来了，从而取得了胜利。第二天，所有英国人同意用军舰带走的人都开始从城里蜂拥逃窜。土伦向胜利者投降。共和党人的军队开入城市。英国舰队逃进了公海。

“我真是无法向你形容拿破仑的功勋：他的知识非常丰富，智力极其发达，性格异常坚定，但这还不能够使你对这位非凡的军官的优秀品质有个最起码的了解”——这是杜纪尔将军在向巴黎陆军部报告时这样写的，他热烈希望陆军部长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能够留下拿破仑。围攻土伦的整个军团都很清楚拿破仑在配备炮兵、巧妙布置包围、进行射击以及最后发起冲击的决定关头所起的重大作用。

这次冲击发生在1793年12月17日。这是拿破仑指挥并取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从1793年12月17日夺下土伦要塞，到1815年6月18日败北的皇帝离开死尸遍地的滑铁卢战场，有22年的时间(包括间隙时期)。这是一个漫长的、血腥的历程。在欧洲民族解

放战争的整个时期中，对这个历程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还在系统地探讨这个历程的经验。

拿破仑在其一生中指挥了大大小小将近六十个战役（比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汉尼巴、恺撒和苏沃洛夫所指挥的战役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参加这些战役的人数也远远超过前辈的军事家所进行的战役。虽然在拿破仑的活动中还有很多大规模的战役，但土伦战役的胜利（尽管规模有限）在拿破仑的史诗中永远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巴黎第一次知道了他。救国委员会表示非常高兴，因为终于消灭了土伦的叛徒，从海岸上赶走了英国人。

由于形势的这种发展，使整个南部的反革命保王党很快就被歼灭了。土伦曾被看成是无法攻克的堡垒，很多人不愿相信攻克土伦的消息，不相信它会陷于一个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拿破仑之手。胜利者幸运的是，在进行包围的军营里，除了萨利切蒂以外，还有一位很有势力的人，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兄弟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占领城市的时候，他也在场，他在给巴黎的报告中描述了事件的全貌。结果马上见效：根据 1794 年 1 月 14 日的命令，拿破仑被授予了旅司令官的军衔。这时他才二十四岁。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三

拿破仑拿下土伦，正是山岳党人在国民会议中居于完全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雅各宾俱乐部在首都和外省威名大震的时期，这是革命专政的极盛时期，这个专政成功地无情地打击了外来的敌人和内部的叛变，镇压了保王党人、吉伦特党人和不宣誓效忠的神父所掀起的暴动。

拿破仑在激烈的国内斗争中不能不看到，必需在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进行选择；共和制会给他带来一切，而君主制会夺去他的一

切，既不会原谅他攻克土伦的行为，也不会原谅他恰好在这时出版小册子«布凯尔的晚餐»，他通过这本小册子向进行骚乱的南方各城市证明，它们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整个春季和夏初，南方国民公会的委员(特别是在拿破仑直接影响下的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都在准备进攻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以威胁奥地利。而救国委员会则表现动摇，卡尔诺当时反对这个计划。拿破仑通过对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的影响，可以期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参加征服意大利的战争。这种想法本身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来说还是不寻常的：不是靠防御而是用直接向欧洲进攻的方法，来制止欧洲反革命的干涉。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似乎太莽撞了。拿破仑的计划在 1794 年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突然爆发的政治危机使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为了亲自向自己的哥哥和救国委员会表示支持进攻意大利的计划，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前往巴黎。夏季来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在热那亚完成了策划进军的秘密使命以后，回到了尼斯。这时突然从巴黎传出了一个惊人消息，不但遥远的南方省份，就连首都也都感到大为震惊：在热月 9 日这一天，在国民公会会场上，逮捕了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兄弟奥古斯丁以及圣·鞠斯特、库顿，后来又逮捕了他们的信徒，并在第二天未经审判就把所有这些人处以死刑(只宣布这些人不受法律保护)。紧接着就在全国追捕已经倒台的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亲信和被认为是亲信的人。拿破仑将军在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被处死以后，立即遭到打击。自热月 9 日(7 月 27 日)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就被逮捕(1794 年 8 月 10 日)，被押送到地中海沿岸的昂蒂布要塞。拿破仑被监禁了 14 天以后被释放，因为从他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监禁他的理由。

的确，在热月党进行恐怖活动期间，有很多与罗伯斯比尔或罗伯斯比尔派接近的人被杀害，拿破仑总算侥幸，没有上断头台。不管怎

样，他出狱以后马上就确信，时代已经变了，他那已经顺利地开始了的前程中断了。一些新人对他表示怀疑，而且对他的了解很差。攻克土伦一举还没有为他树立起很高的军人声誉。“拿破仑？”“谁叫拿破仑？他在哪儿做过事？谁都不知道。”——当年轻的中尉朱诺告诉他父亲，说拿破仑将军要他做副官时，他父亲就这样表示反对。土伦的功绩已经被人忘却了，至少对这个功绩的估价已经不象当初那样高了。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热月党的救国委员会命令他去旺代镇压叛乱，拿破仑将军一到巴黎，就听说要他去指挥步兵旅，而他当时是炮兵，不愿意指挥步兵。他和该委员会委员奥布里发生了争执，最后拿破仑只好退职不干。

拿破仑又开始过着贫困的生活。二十五岁的将军跟上级发生了争吵，退了职，分文莫名，心情沉闷地在巴黎度过了 1794 年这个艰难的冬天，度过了 1795 年更加艰难的饥饿的春天。看来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 1795 年 8 月，终于把他作为炮兵将军，编入救国委员会地形测量部。这实际上是卡尔诺建立起来统帅全军的最高司令部的雏型。在地形测量部，拿破仑为在意大利皮埃蒙特作战的共和国军队草拟“指令”（命令）。他在这几个月中间，也没有停止学习和读书。他参观了著名的巴黎植物园，参观了天文台，兴致勃勃地听了天文学家拉朗德的报告。

拿破仑的这个职务也没有给他带来优厚的薪俸，有时为了混顿饭吃，只有去很喜欢他的彼尔诺的家里去串门。尽管这几个月非常艰难，但他一直没有因为退职而感到惋惜，也没有想去做步兵，这也许是因为现在需要低三下四的请求，才能当上步兵了。但忽然他又时来运转了：共和国又需要他去跟过去在土伦交过锋的同一敌人作战了。

1795 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资

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专制封建制度以后，于热月 9 日丧失了自己最锐利的武器——雅各宾专政。资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就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一直不知道采取什么新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 1794 年冬到 1795 年春，热月党国民公会在政治上一直从左向右转。资产阶级反动派在 1794 年夏末雅各宾专政刚被推翻之后，还远没有象同年秋末那样强大，那样勇敢；而在 1794 年秋天，国民公会的右翼在言论和行动方面，远不及 1795 年那样放肆和嚣张。同时，在这可怕的饥寒交迫的冬季和春季，饥饿的工人和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活对照也越来越鲜明：在城郊工人区，母亲们先把自己的孩子溺死或勒死，然后自尽，而资产阶级则大摆酒宴，这是“中心区”、金融寡头、投机商、交易所老板、大大小小的盗用公款之徒所习以为常的现象。他们在罗伯斯比尔被杀害以后趾高气扬，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在城郊工人区发生的反对热月党国民公会的两次起义，以及两次——芽月 12 日（4 月 1 日）和牧月 1 日（5 月 20日）——演变成对国民公会的直接进攻的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示威，都没有成功。对圣·安杜安区强行解除武装以后，紧接着就是可怕的牧月绞刑；这使巴黎贫民长期不可能举行群众性的起义。当然白色恐怖的猖獗必然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旧的”保王党死灰复燃：保王党预感到，他们的时代到来了。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资产阶级在击溃了巴黎的贫苦群众以后，根本没有解除城郊工人的武装，以便让普罗万斯伯爵（即被处死的路易十六的兄弟）得以顺利地登上法国王位。这倒不是因为法国有产阶级多么重视共和制度，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珍视资产阶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成果。保王党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理解 1789—1795 年发生的事变的意义；他们不可能了解封建制度已彻底崩溃并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已在法国历史的旧时期和新时期之间挖掘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他们的复辟思想是大部分城乡资产阶级所反对的。

在伦敦、科布伦次、米塔瓦、汉堡、罗马，在所有有势力的亡命者聚居的地方，一直在发出必须严厉惩办一切参加过革命的人的叫嚣。他们在牧月起义和白色恐怖的野蛮发作以后，又一再幸灾乐祸地声称，值得庆幸的是“巴黎强盗”开始自相残杀了，保王党应当马上采取行动，以便抓紧时间，把热月党人和残存的山岳党人都绞死。他们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拖向后转，这种想法十分荒唐，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他们的一切措施也是注定要完全破产的。对于那些在热月 9 日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在牧月 1—4 日镇压了巴黎长裤汉的声势浩大的起义的人，对于所有这些塔里昂、弗雷隆、布尔东、布阿西·德·安格拉、巴拉斯之流，责备他们什么都是完全正当的：说他们是匪盗也好，是极端自私自利之徒也好，是凶残成性的野兽也好，说他们干尽坏事无恶不作也好，但是说他们在保王党面前是懦夫草包，那是不行的。当匆匆忙忙的保王党人在威廉·皮特的有力支持下，组织亡命者队伍在吉贝伦半岛(在布列塔尼)登陆的时候，热月党国民公会的领导人便毫不踌躇地派了奥什将军带领军队前去。他们把登陆部队完全击溃以后，就马上把俘虏中的七百五十人枪毙了。

保皇党在被击溃以后根本没有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全功尽弃。没有过上两个月，他们又活动起来，但这次是在巴黎。这是在 9 月末和 10 月初，或者按革命日历，是 1795 年葡月上半月。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公会已经制定了新宪法，根据这个宪法，由五个督政官来领导政权机关，而立法权集中在五百人院和元老院两个议会中。国民公会准备在实行这个宪法之后，即行解散。但是，国民公会感到在“老的”大资产阶级中间保王的情绪正在滋长，它担心保王党人会利用这种情绪，采取狡猾手法，大量钻进即将进行选举的五百人院，因此以巴拉斯为首的热月党领导集团在国民公会最后几天，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五百人院和元老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必须从现任国民公会的成员中选出，只有三分之一

的成员可以从其他人员中选出。

但这一次，在巴黎，保王党人绝不是单枪匹马的。不论是在醞酿叛乱或在发动叛乱期间，他们甚至都退居幕后，而没有赤膊上阵。这就使国民公会在 1795 年葡月的处境更加危险。有很大一部分大金融资产阶级贵族和巴黎所谓“富有者”即中心区的上层资产阶级都起来反对这项专横的法令，因为这项法令带有露骨的自私目的：巩固国民公会中现有的多数统治，并使其无限期延长下去。当然，他们起来反对这项法令是为了完全摆脱这样一批热月党人，这批热月党人与大大向右转的城乡最富裕阶层的情绪已不相适应。在 1795 年 10 月，巴黎中心区突然举行了反对国民公会的暴动。当然，在参加暴动的人中众所周知的幻想波旁王朝马上复辟的真正保王党人是不很多的，但这些保王党人高兴地看到，事态在向什么方向发展，并高兴地预见到，这个运动将要怎样结束。巴黎资产阶级中“保守的共和派”（在他们看来，热月党国民公会就已经够革命的了）为复辟扫清了道路。从葡月 7 日（9 月 29 日）起，当巴黎中心区传出惊人消息时，国民公会马上感到了自己面临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在为保卫政权而进行的新的斗争中，它能依靠谁呢？对工人区进行的牧月野蛮迫害，为时达一月之久的对革命雅各宾党人的杀害，对工人区的残酷无情的全部解除武装，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四个月前的事，现在，国民公会当然不能指望广大群众的积极援助了。

这时，巴黎的工人认为国民公会的各种委员会和国民公会本身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工人们根本不可能想到要为这个国民公会在未来的五百人院中保持三分之二多数的权力而战斗。而且国民公会本身也不会想要首都的贫苦群众来支援它，因为群众仇恨它，它也害怕群众。现在它只有指望军队了，但军队的情况也不佳。诚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士兵都会毫不迟疑地向令人痛恨的叛徒亡命者、保王党及其军队开火，不论是在哪里碰上他们：在诺曼底的森林中，在

旺代的沙滩上，在吉贝伦半岛上，在比利时，在德国的边境。但是第一，葡月运动所提出的口号不是复辟波旁王朝，而似乎是反对国民公会的法令破坏了民权原则，破坏了自由投票和选举人民代表的原则；第二，假如士兵们是完全可靠的共和主义者，只是葡月运动的狡诈的口号把他们弄糊涂了，那末将军们的情况就更坏了。就拿巴黎警备司令梅努将军来说吧。牧月4日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镇压圣·安杜安工人区，在全城布满军营，把成批的工人逮捕起来，送上断头台，这一切，梅努将军都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很成功；而牧月4日晚上，当他的军队制服了工人，在凯歌声中走过首都中心区的时候，站满街道的盛装的显贵们兴高彩烈地欢迎梅努及其司令部，这时，欢呼的人和被欢呼的人完全心心相印了。牧月4日晚上，梅努会感到自己是战胜了敌对的贫苦群众的有产阶级的代表，是反对饥饿者的饱腹者的代表。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并感到愉快的。但是现在，在葡月，为什么要向这些曾对他欢呼过、他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的阔绰的显贵开枪呢？假如说梅努和热月党国民公会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个区别就是：这位将军比最反动的热月党人还要右得多，反动得多。中心区力求获得自由选举的权利，以便选出一个比国民公会更保守的议会，梅努不愿意因此而枪毙他们。

葡月12日（10月4日）夜间，热月党首领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狂欢的喊叫声，示威游行的行列和洪亮的兴奋的呐喊声在首都传布着一个消息，说国民公会正在放弃斗争，可以不发生巷战，法令已经收回，选举将要自由举行。只有一个证据，但这个证据无可辩驳地是最真实的：巴黎一个中心区（勒贝勒蒂埃区）的部队司令，名叫德拉洛的，去见了梅努将军，同他进行了谈判，梅努同意同这批反动的家伙媾和。军队撤回军营，城市落入暴动者手中。

但这帮家伙欢喜得有些过早了。国民公会决定进行斗争。就在葡月13日夜间，按照国民公会的命令，梅努将军被革职，并被马上逮

捕。接着国民公会任命热月9日事件的首领之一——巴拉斯为巴黎武装部队总司令。国民公会需要在当天马上就采取行动，因为被激怒的中心区的大亨们得知梅努被革职并被逮捕以后，感到国民公会要起来斗争，就会毫不迟疑地匆匆忙忙地聚集到靠近国民公会所在地的街道上，准备在早晨进行战斗。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首脑里舍·德·谢里纪，甚至于国民公会中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但他们是失算了。

巴拉斯的同代人都认为他是集最低贱的欲望和形形色色的恶习之大成的人。他好逸恶劳，盗用公款，追求最荒唐的冒险奇事，使用各种手腕，追求名利，在卖身求荣方面居于一切热月党人之上(在这群人中间，在这方面居于首位是并不那么容易的)。但他并不是个胆小鬼。他这个非常聪明、明察秋毫的人，从葡月最初几天起，就很清楚，这个已经开始的运动可以使法国更加接近波旁王朝的复辟，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直接的危险。象他这样参加革命的贵族非常清楚，保王党对于自己阶级的叛徒充满多大的仇恨。

这样，必须毫不迟疑地在几个钟头之内马上展开战斗。但巴拉斯不是一个军人。必须马上任命一个将军。这时巴拉斯偶然地记起了一个穿着破灰大衣的最近曾经几次找他帮忙的消瘦的年轻人。巴拉斯对这个人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他是一个退职将军，曾在土伦显示了突出的才能，后来发生了些不快的事，现在在首都穷途潦倒，薪俸微薄。巴拉斯命令把他找来。拿破仑来了，巴拉斯立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问他能否把叛乱镇压下去。拿破仑请求考虑几分钟。他对于保卫国民公会的利益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同意这一点，没有考虑很久，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如果站在巴拉斯一边，他会得到什么好处，最后他同意了，但要附带一个条件：谁也不能干涉他的指挥。他说："等大功告成以后，我才会放刀入鞘。"

他立即被任命为巴拉斯的助手。他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感到暴

乱者非常强大，国民公会处境岌岌其危。但他有一个以炮兵狂轰滥炸为基础的行动计划。后来，当一切都已结束以后，他对自己的朋友尤诺说了一句话(后来还跟公爵德·阿布朗泰斯将军讲过)，从这句话里流露出，他把自己的胜利归之于叛军战略上的无能，他说："假如这批家伙由我来指挥，看我不把国民公会的议员们送上天才怪！"黎明的时候，拿破仑已在国民公会大厦前部署好了炮群。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葡月 13 日——到来了。这一天在拿破仑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较之他的第一次夺取土伦的战役要重要得多。叛乱者涌向国民公会，拿破仑开炮迎接他们。特别是对圣·罗赫教堂门口轰击得最厉害，因为那里聚集着叛乱者的后备队。叛乱者在夜间本来也可以弄到大炮，但他们错过了机会。他们只用步枪来回击。到了中午，全都结束了。叛乱者留下了几百个尸首，拖着伤员，四处逃散，藏到各处住宅里去，来得及的，都马上离开了巴黎。当晚，巴拉斯热情感谢年轻的将军，而且坚决要求任命拿破仑为后方武装部队司令(暴动平息以后，巴拉斯立即辞去了这个原来由他兼任的职务)。

巴拉斯和其他领导人非常钦佩这个抑郁的、沉闷的年轻人的勇敢果断的气魄，正是由于这种气魄，拿破仑才采用了直到那时为止从未在城市使用过的以大炮轰击群众的手段。在使用大炮来镇压街头暴动方面，他是俄国沙皇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的老前辈，后者曾在 1825 年 12 月 14 日沿用了这个方法。所不同的只在于，一向板着伪善面孔的沙皇说什么他很害怕，迟迟不想采用这种手段，似乎只是后来由于瓦西里契柯夫公爵的劝说才使他顾不得自己的宽厚与仁慈的胸怀，而拿破仑从来也没有想为自己作任何辩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当时骚乱者有二万四千多人的武装队伍，而拿破仑连六千人也不到，就是说，还不到叛乱者的四分之一。这样，全部希望就寄托在大炮上；他也真的使用了大炮。既然要打仗，那就不管付出多大代

价，都要争取胜利。拿破仑一直是毫无例外地遵循着这个守则的。他不喜欢白白浪费炮弹，但在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他是从来都不吝啬的。他在葡月 13 日也没有吝啬，圣·罗赫教堂门前被他打得血肉横飞。

在战斗中毫不留情，是拿破仑的一大特点。“我是两个不同的人：有头脑的人和有良心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象别人那样的多情善感的心。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止下来，以至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这是在他绝无仅有的坦率的时候，对他所爱慕的路易·罗德雷说的。

当要粉碎胆敢进行战斗的敌人的时候，拿破仑的这条心弦是从来也没有发出过声音的。

葡月 13 日事件在拿破仑的史诗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击溃葡月暴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1）保王党人曾经指望即将取得胜利，波旁王朝将卷土重来，这种打算遭到了比在吉贝伦更大的破产。2）城市上层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太急于用公开的武装暴动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他们忘了城乡资产阶级中有些人是拥护共和国，害怕过于迅速地粗暴地加强反动活动的。领导暴动的里舍·德·谢里纪是什么人？是保王党人。既然农民私有者，即广大的农村小资产阶级，认识到波旁王朝的复辟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将夺去他们刚刚买来的被没收的贵族亡命者的土地和被扣押的寺院的土地，那末他们对这次暴动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3）最后，再一次地显示出，农村的反复辟情绪对军队和士兵群众发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而军队和士兵群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因为他们是反对那些直接或间接与波旁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势力的。

这就是葡月 13 日事件的历史意义。

至于拿破仑本人，这一天第一次使他不仅在军界人士中间（其中

有一部分人过去由于土伦事件而知道他），而且在一切社会阶层中间，甚至于在以前根本沒有听到过他的名字的地方，都威名大震。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了一个具有指挥天才、果断精神和坚强毅力的人。从督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即从 1795 年葡月起）就掌握政权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他们当中为首的、五个督政官中影响最大的巴拉斯，对年轻的将军十分重视。他们当时就认识到，如果将来需要运用武力来镇压人民的骚乱，那时还可以使用他。

但拿破仑自己却另有图谋。他想登上军事舞台，独立指挥法兰西共和国的一支军队。由于督政官巴拉斯对他的态度很好，所以他的这种想法绝不会象葡月以前那样不能实现，那时这个退职的 26 岁的将军为了谋生而在巴黎到处流荡。突然在一天里面，一切都变样了。他成了巴黎卫戍司令，势力强大的共和国督政官巴拉斯的密友，作战部队的独立指挥官的候选人。

年轻将军在忽然晋升之后，第一次与恐怖时期被处死的将军博阿尔內的寡妇相会，并且爱上了她。约瑟芬·博阿尔內比他大六岁，她在一生中曾有过不少风流韵事，对拿破仑并沒有什么特别热烈的感情。她显然主要是从物质上来考虑：葡月 13 日以后，拿破仑声名显赫，占有很重要的职位。而在拿破仑这一方面，则是为突然激起的并且缠绕着他的情欲所驱使。他要求马上结婚。约瑟芬有个时期曾与巴拉斯接近，因此这个婚姻使拿破仑有机会更广泛地去结识共和国的显要人物。

著名的目录学家基尔赫森和其他专家编纂的将近 20 万册论述拿破仑的著作中，有很多著作是叙述拿破仑和约瑟芬以及一般女人的关系的。为了结束这个问题，不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想说，不论是约瑟芬，是第二个妻子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是雷缪莎夫人，是女演员乔治，还是瓦列夫斯基伯爵夫人，总之，在拿破仑一生中，曾经与他有过亲密往还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但沒有对他发

生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也不奢望对他发生影响，因为都知道他是一个专横的、暴躁的、怀疑成性的、难以驯服的人。他对著名的斯塔埃尔夫人不能容忍到了这样的程度：由于她具有对立的政治情绪，由于她关心政治（在他看来，这对女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好学不倦，独立思考，他竟然大发雷霆，对她恨之入骨。唯命是听，唯唯诺诺，这就是拿破仑认为女人必须具备的品德，没有这种品德在他看来女人就不能存在。在他的忙忙碌碌的一生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动感情，让情感长期冲动。

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这样：1796 年 3 月 9 日举行了婚礼，过了两天，3 月 11 日，拿破仑就与妻子告别，踏上了征途。

在欧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漫长而血腥的一章。

第二章　意大利战役

（1796 — 1797 年）

一

拿破仑从葡月 13 日击溃了保王党的叛乱，得到巴拉斯和其他官员的赏识以后，就不断劝说他们必须防止重新结合起来的反法联盟卷土重来，为此必须向奥地利及其盟国意大利发动进攻，首先进入意大利北部。其实这个反法联盟并不是新的联盟，而是旧的联盟，也就是 1792 年成立的联盟，到 1795 年，普鲁士由于跟法国单独订立和约（巴塞尔和约）而退出。参加联盟的有奥地利、英国、俄国、撒丁王国、两个西西里王国和几个德意志国家（符腾堡、巴伐利亚、巴登等）。督政府也象反对这个政府的整个欧洲一样，都认为即将到来的 1796 年春夏两季战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企图通过这些地方侵入奥地利本土。督政府挑选了最精锐的部队和以莫罗将军为首的最杰出的战略家来进行这次远征。为了支援这支军队是不惜资财的，它的后备供应是组织得很好的，法国政府对这支军队寄予了最大的期望。

督政府对拿破仑将军坚决要求从法国南部进入与法国毗邻的意大利北部的计划并不太感兴趣。诚然，应当考虑到，这种进攻作为一个声东击西的行动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奥地利王朝分散自己的力量，在即将展开的战争中转移它对德国这个主要战场的注意力。当时决定动用南方几万大军，以便威慑奥地利及其同盟者撒丁国王。当谈到派谁来做这个次要战区的总司令的时候，卡尔诺（而并不是史学家长期以来所断定的巴拉斯）提名拿破仑。其余的督政官都

毫无异议，因为所有比较重要比较有名的将军都不想担任这个职务。任命拿破仑为对意大利作战的军队（“意大利方面军”）的总司令是1796年2月23日的事，3月11日，这位新总司令就挂帅上任了。

拿破仑指挥的这第一次战争，给他的历史带来了特别的荣誉。他正是从这一年（1796年）起才闻名全欧，而且从那时以来，他的声誉再没有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位干将跑得太远了，现在是让他停下来的时候了！”——老将苏沃洛夫的这些话是在拿破仑对意战争的高潮时说的。苏沃洛夫是最早指出不祥的阴霾正在升起的人们中的一个；这些阴霾注定要长久地笼罩在欧洲的上空，并带来惊心动魄的闪电。

拿破仑来到自己的部队并且检阅一番以后，马上就猜测到，为什么法兰西共和国最有势力的将军都不要求担任这个职务。军队简直象一群土匪。法国军需部门的各种偷盗和贪污行为，从来都没有象热月党国民公会最后几年以及督政府统治时期这样严重。确实，巴黎供给这支军队的物资是不多的，但就是这么点东西也被很快地肆无忌惮地盗窃一空了。四万三千人住在尼斯和尼斯附近的军营里，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衣服穿。拿破仑还没有来到兵营，就听说头天晚上有一个营拒绝执行向另一个地区转移的命令，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靴子。这支被人遗忘了的军队在物质生活上的一塌糊涂，造成纪律的松弛。士兵们不仅怀疑，而且亲眼看到这种盗窃成风的行径使他们遭受到多大的苦难。

拿破仑面临着十分困难的任务：不仅要使自己的军队有衣服，有鞋穿，要整顿纪律，而且所有这些要在行军中间，在远征过程中，在战斗的空隙时间来解决。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推迟进军的时刻。由于与所属军官如奥热罗、马塞纳或塞律里埃发生摩擦，他的处境越发复杂化。这些人只愿服从年长的或功绩更大的长官（如德国西部战线的总司令莫罗），但要承认二十七岁的拿破仑作他们的长官，在他们看来简

直是一种耻辱。冲突是可能发生的，军营中的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歪曲、散布和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当时军营里传述着一个不知是谁制造的谣言，说年轻的拿破仑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曾仰头看着个子很高的奥热罗说："将军，你的个子正高出我一头，但假如你对我无礼的话，我就会马上消除这个差别。"的确，拿破仑从一开头就曾向所有的人申明，他不能容忍在他的军队中有任何反对的思想，他会粉碎所有反抗者，不论他的职位高低。"必须经常枪毙一些人"。——他这样简单地不加任何解释地向巴黎督政府报告。

拿破仑立即采取了坚决措施来肃清肆无忌惮的偷盗行为。士兵们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比枪毙都更有效地恢复了纪律。但拿破仑如果等到军队整顿结束以后再进行战争，那实际上就等于放过1796年的战争。他采取了决定，这个决定清楚地表述在他的第一个告全军书中。关于这个告全军书载入历史的最后定稿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的问题，曾经引起了许多争论；现在拿破仑传记的研究工作者都已确认，只有头几句话是拿破仑的原话，其余的全是后人增添的动听词句。应当指出，就是头几句话也很难保证每一句话都是原话，只能说基本意思是原来的。"兵士们，你们没有衣服穿，你们吃的也不好……我想带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里去。"

一开始拿破仑就认为，战争应该以战养战，必须使每个士兵都关心对意大利北部的进攻，不要等到军队已经得到自己需要的一切再开始进军，而应该向军队说明，它是否能用强力向敌人夺取必需的一切，甚至更多的东西，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年轻的将军只有这一次向自己的军队这样进行解释工作。他总是善于建立、加深和维持自己对士兵心灵的感召和统治。宣扬拿破仑对士兵的"爱"（当他坦率的时候，就把他们称做炮灰）的那些多情善感的胡言乱语是一文不值的。他对士兵谈不上爱，但是却很关怀。拿破仑善于使士兵们把这

种关怀说成是统帅对他们个人的关心，而实际上，他只是想得到极良好的战斗力。

1796 年 4 月，开始第一次远征的时候，拿破仑在自己军队的心目中，只是一个两年多以前在土伦初露头角的能干的炮手，在葡月向涌往国民公会的暴徒射击并因此得到南方军队指挥官职务的将军，如此而已。他对士兵还没有建立起个人的感召力和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他决定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地向士兵们说明到意大利可能得到的财物，只是用这种办法来影响自己所率领的缺吃少穿的士兵。

1796 年 4 月 9 日，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多卷本的拿破仑远征史的著名作者、博学的战略家和战术家、瑞士人若米尼将军(他起初在拿破仑军队任职，后去俄国)曾指出，拿破仑从自己第一次指挥的最初几天起，就显示了惊人的勇敢和不顾个人危险的特点：他率领司令部越过了一条最危险的(但很短的)道路，即阿尔卑斯山沿海山脉的有名“天险”，并且是在沿岸巡逻的英国舰艇不停的炮火之下越过的。这是第一次显示出拿破仑这样一个特点：一方面，他从来也没有装出一副能干、勇敢、无所畏惧的样子，象拿破仑的同代人兰恩、缪拉、内伊元帅、米洛拉多维奇将军，以及后来的司令官斯柯贝列夫那样；拿破仑一直认为，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一个司令官在战争期间不应当去冒人身的危险，原因很简单，因为死亡本身会带来混乱，造成一个战役甚至整个战争的失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客观情况要求个人必须做出榜样，那末一个司令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赴汤蹈火。

1796 年 4 月 5 日至 9 日平安地越过了“天险”。拿破仑到了意大利并立即采取了决定。与他相遇的是协同作战的奥地利军队和皮埃蒙特军队，他们分成三路，分散在去皮埃蒙特和热那亚的路上。与奥军司令阿根陶的第一次战役是在中部，在蒙特诺特附近进行的。拿破仑

集中了自己所有的兵力，使在南部去热那亚路上的奥军总司令博利厄摸不着头脑，于是径直进攻奥地利中部。几个钟头就把奥军击溃了。但这只是奥军的一部分。拿破仑让自己部下稍事休息之后，就继续前进。下一次战役(在米来齐莫附近)是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两天进行的，皮埃蒙特军队遭到惨败。大批死尸散在整个战场，拥有十三门大炮的五个营被俘，其余的狼狈溃逃，这就是盟军一天作战的结果。拿破仑又马上继续前进，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时间。

军事史家认为拿破仑的前几个战役(“六天取得六次胜利”)是一个完整的大战役。在这些日子里，完全可以看出拿破仑的一个基本原则：迅速地集中一切力量，完成一个战略任务，马上就转入下一个战略任务，不玩弄太复杂的伎俩，把敌人各个击破。

还可以看出他的另一个特点：善于把政治和战略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拿破仑在 1796 年 4 月这些日子里节节胜利的同时，从来都没有忘记，应该迫使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尽快地签订单独和约，这样就可以同奥军单独作战。当法军在芒多维取得了对皮埃蒙特军的新胜利，芒多维城被拿破仑攻占以后，皮埃蒙特军队的科里将军就开始议和，4 月 28 日，就签订了同皮埃蒙特的停战协定。对战败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皮埃蒙特国王维克多·亚马德向拿破仑交出了两个最坚固的要塞，以及其他许多据点。同皮埃蒙特的最后和约是 1796 年 5 月 15 日在巴黎签订的。皮埃蒙特承担了全面的义务：除法军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军队通过自己的领土，此后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将尼茨领地和整个萨伏依割让法国，另外，把法国与皮埃蒙特的边界做了大大有利于法国的“修改”。皮埃蒙特有义务提供法军所需的一切物资。

这样，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奥地利军队了。拿破仑在取得了一些新的胜利以后，已经把奥军赶到了波河边上，强迫他们向波河东面撤退，然后自己强渡波河，继续追击。意大利宫廷一片混

乱。帕尔马公爵虽然从未与法军作过战，但他是首先受难者。拿破仑没有理睬他的信仰，不承认他的中立，要帕尔马付出二百万金法郎的赔款，并交出一千七百匹马。拿破仑继续前进，到了一个叫做洛迪的小地方，需要渡过阿达河。这个重要据点有一万奥军防守。

5月 10 日，发生了有名的洛迪战役。象过"天险"一样，拿破仑再一次感到有必要去冒生命的危险：在一座桥的附近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总司令带着掷弹营冒着奥军封锁桥头的密集炮火向前冲击。二十门奥军大炮用霰弹扫荡着这座桥及其周围地带。掷弹兵在拿破仑的率领下拿下了这座桥，打得奥军狼狈溃退，在阵地上丢下了二千名左右的伤亡士兵和十五门大炮。拿破仑立即开始追击撤退的敌人，于 5 月 15 日进入米兰。还在头一天即 5 月 14 日(花月 25 日)晚上，他就向巴黎的督政府报告："伦巴第现在已属于（法兰西）共和国"。

6月，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缪拉指挥的法国军队占领了里沃诺，奥热罗将军占领了布洛尼。6 月中旬，拿破仑自己占领了摩德纳，接着占领了托斯卡纳，虽然托斯卡纳大公爵在这次法奥战争中是保持中立的。拿破仑根本不理会意大利诸国的这种中立地位。他占领城市和乡村，征集军队需要的一切，经常抢夺他认为值得抢夺的一切东西，从大炮、火药、枪枝，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的油画。

拿破仑对自己士兵当时这些掠劫行为抱着非常宽容的态度。事情发展到了发生小规模冲突与骚乱的地步。在帕维亚、卢卡，发生了当地居民袭击法军的事件。在卢卡(离斐拉拉不远)，一群人打死了五个法国龙骑兵，为此全城遭到报复：有几百人被杀，全城被法军士兵洗劫一空，所有被怀疑有反抗意图的人都遭杀害。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残酷的事例。拿破仑用从奥军和保持中立的意大利诸国手里抢来的大炮和弹药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炮兵以后，又继续向曼图亚要塞前进。按其自然条件和修筑的工事来说，它是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拿破仑刚把曼图亚团团围住，就得知有三万奥军在极有才能的维尔姆泽将军的指挥下，特地从提罗耳奉命赶来支援被包围的要塞。这个消息使所有受到法国侵犯的国家感到异常振奋。的确，在 1796 年的春季和夏季，除了天主教徒和意大利北部半封建的贵族憎恨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所带来的那些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而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样憎恨拿破仑将军的军队对他们的劫掠所带来的苦难。被击溃和被迫接受和平的皮埃蒙特可能在拿破仑的后方哗变，切断他同法国的交通。

拿破仑用了一万六千人来包围曼图亚，留下二万九千人作为后备。他等待国内的支援部队。他派了一个优秀将军马塞纳去迎击维尔姆泽，但他被维尔姆泽击退。拿破仑又派了另一个得力助手，还在他之前就取得将军头衔的奥热罗。但奥热罗也被维尔姆泽打败了。对法军来说，情况已经有些绝望了，这时，拿破仑采取了一个战术。根据老一辈以至于比较年青一辈的理论家的意见，即使拿破仑当时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就被打死，他采取的这一战术本身就已能使他享有“不朽的荣誉”(若米尼语)。

维尔姆泽已经在预祝即将取得的对凶恶敌人的胜利，已经进入被围的曼图亚，替曼图亚解了围，这时他忽然得知拿破仑率领全部队伍去进攻在拿破仑与米兰之间的交通线上的另一支奥军队伍，并且在三次战斗中把他们击溃了。这就是罗纳托、沙洛和布里西亚之战。维尔姆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带领全军离开曼图亚；他击溃了瓦来塔指挥的法军掩护队，又接连在几次交锋中打退了其他法军队伍，最后于 8 月 5 日，在卡斯奇里恩与拿破仑相遇。由于拿破仑采取了一个巧妙的计谋，一部分法军深入奥军后方，使维尔姆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维尔姆泽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新的失败，这以后他带着溃军残部先辗转于阿迪杰河上流，然后进入曼图亚。拿破仑再次进行包围。

奥地利急忙装备了一支新军，由阿尔文齐（和维尔姆泽、查理大公和梅拉斯一样，也是奥地利帝国卓越将军之一）指挥。这次已经不仅是要解救曼图亚，而且还要解救乌伦杰尔了。拿破仑带了二万八千五百人去迎击阿尔文齐，留下八千三百人包围曼图亚。几乎没有后备兵力，后备队顶多不过四千人。“一个将军作战以前，一味惦记着后备，这样的将军一定失败。”——拿破仑老是重复着这样的话，尽管他从来没有否认后备力量在长期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阿尔文齐的军队要多得多。阿尔文齐在几次交锋中击退了好几支法军队伍。拿破仑命令从维琴察和其他据点撤退。他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准备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阿尔科拉的激烈血战于 1796 年 11 月 15 日开始，11 月 17 日晚间结束。阿尔文齐终于同拿破仑相遇了。奥军人数较多，作战也很顽强，因为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精锐部队。一个最重要的据点是有名的阿尔科拉桥。法军三次发起猛攻，拿下该桥，又三次被奥军打退，而且伤亡惨重。总司令拿破仑把几个月以前夺取洛迪桥时的办法完全搬了过来：他自己打着旗帜，冲在最前面。在他的周围，有几个士兵和副官被打死。战斗继续了三昼夜，中间没有多少暂息时间。最后，阿尔文齐被击退并被粉碎了。

阿尔科拉战役结束一个半月后，奥军才逐渐恢复了元气，准备实行报复。1797 年 1 月中旬，双方又展开了战斗。1797 年 1 月 14 日和 15日在利沃里的三天血战中，拿破仑将军把奥军打得丢盔弃甲；这次奥军也仿效年轻的法国统帅的榜样，集中了所有力量。阿尔文齐把自己被击溃的残部解救出来以后，再也不敢去解救曼图亚和被包围在那里的维尔姆泽的军队了。利沃里战役结束两个半星期后，曼图亚投降了。拿破仑对战败的维尔姆泽表现了极其宽洪大量的态度。

占领曼图亚之后，拿破仑向北进发，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受

到明显的威胁。1797 年初春，被赶紧派往意大利战场的查理大公，在一系列战役中被拿破仑击溃，遭到惨重损失，逃往布林涅尔，这在维也纳引起了一片混乱。这种混乱是从皇宫开始的。在维也纳人们都在传述着，王宫的宝物正在包装、藏匿、准备运走。奥国首都受到了法军入侵的威胁。汉尼巴兵临城下！拿破仑已经到了提罗耳！明天就要到达维也纳！曾在古老而富足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度过这段时期的人们，对这些流言、议论和喊叫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几支奥军精锐部队被消灭，最有才干的将军遭到惨败，意大利北部完全陷落，奥国首都遭到直接威胁，——这就是 1796 年 3 月末拿破仑第一次任法军总司令以来一年间战争的总结。他的名字已经威震全欧洲。

二

当查理大公的军队遭到新的失败、全线溃退以后，奥国宫廷了解到继续进行战争的危险性。1797 年 4 月初，拿破仑将军得到正式通知，说奥地利皇弗兰西斯请求议和。应当指出，拿破仑是竭力争取这个对自己有利的时机结束对奥战争的，在带领全军去追击慌忙撤退的卡尔大公的同时，他通知卡尔，表示准备议和。拿破仑在一封众所周知的意味深长的信中，充分照顾了战败者的自尊心，他写道，假如他能够签订和约的话，那他所感到的自豪将会超过“由于战争胜利而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荣誉”。他给卡尔写道：“难道我们杀害的人民还不够多吗？难道我们给可怜的人类带来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吗？”

督政府同意媾和，只是考虑要派谁去进行谈判。但未等它考虑好，未等它选派的人（克拉尔克）来到拿破仑的兵营之前，节节胜利的拿破仑就在累欧本签订了和约。

还在累欧本和谈开始以前，拿破仑就已征服了罗马。刻骨仇恨

法国革命的教皇庇护六世，把在葡月 13 日镇压了虔诚的保王党而被提升为总司令的“葡月将军”看作魔鬼，因此尽量帮助奥国进行艰苦的斗争。当维尔姆泽刚刚把曼图亚和一万三千人的卫戍部队以及几百门大炮交给法军时，拿破仑就把先前进行围攻的军队抽调出来远征教皇领地。

教皇的军队在同拿破仑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中即被击溃。教皇军队逃跑得非常之快，连拿破仑派去追击他们的朱诺跑了两个小时都未追到，但当追兵赶上他们时，其中一部分就被消灭了，其余一部分被俘。接着一些城市接二连三不加反抗地向拿破仑投降。他掳走了这些城市所有的贵重财物：金钱，钻石，油画，贵重的装饰品。在这里，也象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一样，城市、寺院、古老教堂里的宝库都被胜利者洗劫一空。罗马一片混乱，有钱人和神父纷纷逃往那不勒斯。

教皇庇护六世吓得心惊胆颤，给拿破仑写了一封求饶的信，并派他的侄子玛泰主教和一个代表团带着这封信去请求议和。拿破仑将军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个请求的，尽管他马上表示要他们全面投降。1797 年 2 月 19 日，在托伦蒂诺同教皇签订了和约。教皇让出了很大一块最富庶的领地，赔偿三千万金法郎，交出自己博物馆中最好的油画和塑象。罗马的这些油画和塑象，和以前从米兰、布洛尼、摩德纳、帕尔马、皮阿琴察以及后来从威尼斯得到的一样，都被拿破仑送到巴黎去了。吓得目瞪口呆的教皇庇护六世立即接受了一切条件。这对他来说并不很困难，因为拿破仑根本不需要他的同意。

为什么拿破仑当时没有做他几年以后所做的事情，没有占领罗马，逮捕教皇呢？这是因为，第一，还要同奥地利举行和谈，对教皇的过火行为会使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天主教徒感到激愤，这就会使拿破仑的后方没有保障。第二，我们知道，在这第一次出色的对意战争中，在他屡次战胜当时十分强大的奥地利帝国的强大军队之后，这位年青的将军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自己帐篷前面踱来踱去，第

一次给自己提出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难道今后他要永远为督政府，“为这些代言人”取得胜利，占领新的国家吗？

拿破仑讲出自己这一夜曾独自考虑的问题，是经过许多年，在人们血流成河以后。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完全否定的。在1797年，二十八岁的意大利征服者并不认为庇护六世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张惶失措的、身体虚弱的老人：庇护六世在拿破仑看来是法国千百万人的精神主宰，任何一个想要对这千百万人实行统治的人，都要考虑到这些人的信仰。就教会这个词的本意来说，拿破仑认为它是帮助统治人民群众的很方便的警察工具和精神工具；在他看来，特别是天主教在这方面是更加方便的，但可惜它过去一直享有、现在还继续享有独立的政治意义，这大部分是由于它有完善的、完备的、严密的组织，服从最高主宰——教皇。

至于教皇制度，拿破仑只是把它看做是历史上形成的几乎经过两千年巩固起来的纯粹骗局；这是罗马主教巧妙地利用中世纪的有利的地方条件和历史条件制造出来的。但为什么这种骗局能够成为极重要的政治势力，对于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俯首屈从、丧失了自己最好的土地、吓得心惊肉跳的教皇暂时还住在梵蒂冈宫里。拿破仑没进入罗马；他结束了同庇护六世的和谈以后，就急忙返回意大利北部，同战败的奥地利签订和约。

首先应该指出，不论累欧本停战，还是紧接着的坎坡福米奥和约，以及其他所有外交谈判，拿破仑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他只根据自己的意见提出条件，根本不去理会别人的意见。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这样做而不受非议呢？这首先是因为“胜利者不受裁判”这个老规矩的缘故。也是在 1796 年和 1797 年初，共和国的其他一些将军们（象莫罗那样最出色的将军）在莱茵河上多次被奥军击败。这些军队一再要求给养，尽管从一开始它的给养就很充分。而拿破仑却把一群不守纪律的流氓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忠诚的军队，什

么都不要求，相反地，却往巴黎运送千百万金币、艺术品，占领了意大利，在无数的战役中，接连消灭了奥国军队，迫使奥国求和。利沃里战役，攻克曼图亚，占领教皇领地，——拿破仑的这些新功最终地确立了他的无可争议的威望。

三

累欧本是奥地利斯蒂利亚省的一座城市，该市位于离维也纳约有二百五十公里的要冲地位。但是要想把在意大利得到的一切，即把所有已经占领的地方和准备征服的南部地方最后正式地固定下来，同时要使奥地利在远离拿破仑的德国西部战场（法军在这里处于不利地位）做出重大让步，那就要给奥国一定的补偿。拿破仑知道，尽管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累欧本，但是处于绝望境地的奥地利一定会破釜沉舟，拚命自卫，因此要赶快结束战斗。从哪儿弄到这笔补偿呢？到威尼斯。诚然，威尼斯共和国是完全中立的，并且尽力使法军找不到任何借口入侵，但拿破仑在这种场合从来没有感到为难。他抓住了一个借口，就派了一个师前去。尚在出兵威尼斯以前，他就在累欧本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提出下列条件：奥国把莱茵河两岸和所有被拿破仑占领的意大利领土割让给法国，而法军则以威尼斯作为交换。

实际上，拿破仑已决定分割威尼斯：靠海湾的城市划归奥地利，威尼斯的大陆部分划归“西沙尔平共和国”，这是征服者想以他所占领的大部分意大利领土建立的共和国。当然，这个新“共和国”从一开始起实际上就是法国的领土。现在需要做的只是一点形式上的手续：向威尼斯总督和国会宣布，他们这个从5世纪中叶成立时起就是独立的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拿破仑将军为了顺利实现他的外交策略需要这样。甚至对自己本国的政府(督政府)，也是在自己的计划开始实行以后，他才把对威尼斯采取的办法通知它。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你身上沾满了法国人的鲜血。”——他对求饶的威尼斯总督这样写道。这是指在去里多的码头上一个法军上尉被人打死的事。但是甚至这样的借口也用不着。一切都很清楚。拿破仑命令巴拉戈·德·伊里叶将军占领了威尼斯。1797 年 6 月，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存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具有丰富多彩的独立历史生活的商业国不复存在了。

这样，在拿破仑手中已经掌握了一个富饶的瓜分对象，而这正是为最有利地最终订立对奥和约所需要的。但是，占领威尼斯给拿破仑又帮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忙。

1797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拿破仑的部下贝尔纳多特将军从法军占领的的里雅斯特派来了一个急使，进见住在米兰的法军总司令拿破仑将军。飞奔赶来的信使向拿破仑递交了一个公事包，贝尔纳多特的报告说明了这个公事包的来由。原来这个公事包是从一个名叫德·昂特雷格的伯爵那里没收来的；这个人是个保王党，波旁王朝的奸细，他逃开了法国军队，从威尼斯跑到了的里雅斯特，但在这里落到已经进入该城的贝尔纳多特的手里。在这个公事包里有些令人吃惊的文件。为了弄清楚这个意外得到的东西的全部意义，应当简要地提一下巴黎在这段期间的情况。

曾经是 1795 年葡月暴动的“培养基”的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贵族，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拿破仑的大炮所粉碎。被击溃的只是在这一天同积极的保王党一起举行暴动的军队上层分子和各区的领导人。而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在葡月事件以后，也没有放弃对督政府的暗中反对。

1796 年春，当巴贝夫的密谋被揭露，新的无产阶级暴动、新的牧月事件的怪影又开始使城乡有产者深感不安的时候，在葡月遭到失败的保王党重新振作起来，抬起了头。但他们象 1795 年夏在吉贝伦和葡月在巴黎一样，又犯了错误；他们又没有想到，尽管大批新的土

地所有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希望建立强有力的警察政权，尽管靠出卖国家财富而发财的新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君主制，甚至君主专政，但波旁王朝的复辟也许只能得到城乡极少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波旁任何时候都只是贵族的国王，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国王，而且封建制度和亡命之徒就会随之而来，这些流亡者将要求退还他们的土地。

由于保王党是所有反革命集团中组织得最好的，他们团结一致，并得到国外的大力援助和金钱，还有僧侣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次1797年春夏准备推翻督政府的策划中，也取得了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但归根到底这次他们所领导的运动仍然注定要一败涂地。问题是，每一次五百人院的局部选举都是右翼反动派有时甚至是明显的保王党分子占显著优势。甚至连处于反革命势力威胁下的督政府也是摇摆不定的。巴泰勒米和卡尔诺反对采取坚决措施，巴泰勒米在许多方面还暗中同情正在策划的运动。其余三个督政官(巴拉斯、勒贝尔、拉·雷韦伊埃·莱波)经常开会，但没有下决心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密谋中的打击。

巴拉斯及其两位同僚不愿意不经过战斗就交出政权，甚至交出生命，他们最后下定决心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但是有一个情况使他们深感不安，那就是1795年因征服荷兰而出名的皮什格鲁将军站在反对派那边。他被选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五百人院的主席，并被推举为向共和国"三巨头"(当时这样称呼三个督政官——巴拉斯、拉·雷韦伊埃·莱波和勒贝尔)发动进攻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这就是1797年夏季的形势。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的过程中，密切地注视着巴黎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共和国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拿破仑自己是不喜欢共和国的，而且很快就要勒死共和国，但他不打算过早地采取这个行动，而最主要的是，他不想让别人得到好处。经过了在意大利的那个不眠之夜，他已经为自己找出了答案，就是他不

能永远为“这些代言人”取得胜利。但他更不想为波旁王朝取得胜利。他和督政官一样，也由于一个有名的将军——皮什格鲁带头反对共和国而感到不安。这个名字会在决定关头使士兵们误入迷途。他们会跟在皮什格鲁后面跑，因为他们相信他是一个忠诚的共和派，因而不会认识到他究竟要把他们领到哪儿去。

现在已不难了解，当拿破仑收到从被捕的德·昂特雷格伯爵手里没收来的、从的里雅斯特火速送来的厚厚的公文包的时候，当他在这公文包里发现有关皮什格鲁的背叛以及他同孔代亲王的代表弗什·鲍列里秘密谈判的铁证，发现他很早以前就已背叛共和国的罪证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只是由于一个小小的麻烦，未能马上把这些文件寄给巴黎的巴拉斯。这就是在其中一个文件（对控告皮什格鲁来说是个最重要的文件）中，波旁王朝的另一个代表蒙加亚尔顺便谈到，他到了意大利的拿破仑的总部，也想同拿破仑进行谈判。虽然除了这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而外，别的什么都未谈到，虽然蒙加亚尔完全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借口，用另一个名字，去见拿破仑，但拿破仑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勾掉这些话，以便突出皮什格鲁的事件。他命令把德·昂特雷格带来，要他重抄一遍这个文件，把该删的段落删掉，并且签上名字，他威吓说，不然就要把他干掉。德·昂特雷格马上一切照办了，过了一段时间，就被释放了（故意让他因戒备不严而“潜逃”了）。然后，拿破仑就把这些文件寄给巴拉斯。这就给“三巨头”解了围。他们没有马上发表拿破仑寄来的令人吃惊的文件，而是首先调来了特别可靠的师团，然后等待拿破仑从意大利火速派到巴黎去支援督政官的奥热罗将军的到来。此外，拿破仑还答应从刚在意大利募集到的款项中送去三百万金法郎，使督政府在即将到来的紧急关头，在财政上有所加强。

果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半夜三点钟，巴拉斯命令把两个可疑的、态度暧昧的督政官逮捕起来：巴泰勒米被捕，卡尔诺逃掉了。

开始大批逮捕保王党人，清洗五百人院和元老院，逮捕之后紧接着就是不加审判地流放圭亚那（后来只有很少的人从那里回来），封闭有保王党嫌疑的报纸，在巴黎和外省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果月 18 日拂晓，到处都是巨幅的文告：这就是拿破仑寄给巴拉斯的文件的复本。五百人院主席皮什格鲁被捕，也被流放到圭亚那。果月 18 日政变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贫苦群众对保王党的憎恨比对督政府的憎恨还要厉害，因此对波旁王朝的走狗遭到的沉重打击，公开表示高兴。“富有区”这次没有人上街，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 1795 年拿破仑将军的大炮留给他们的可怕的葡月事件的教训。

督政府胜利了，共和国得救了，节节胜利的拿破仑将军从遥远的意大利军营，为共和国（七年以后，他就把它消灭了）的得救，向督政府（二年以后，他就把它消灭了）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

拿破仑对果月 18 日事件表示满意，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1797 年 5 月同奥军签订的停战协定还只是停战协定。夏季，奥国政府突然表现出一种兴高彩烈和几乎是威胁的征象，拿破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奥地利和整个君主制欧洲都屏息凝神地注视着巴黎的事件。在意大利，每天都在盼望督政府和共和国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因而得以收复所有被法国占领的土地。果月 18 日，保王党被击溃、皮什格鲁叛国行为被公开揭露，使所有这些幻想宣告破产了。

拿破仑将军开始坚决要求尽快地签订和约。奥地利派了一个能干的外交家科本茨同拿破仑进行谈判。这真是棋逢敌手。科本茨在漫长的困难的谈判过程中，向本国政府抱怨说，很少碰到象拿破仑“这样的诡辩家和毫无良心的人”。根据当时很多著作的意见，在这里第一次表现了拿破仑的外交才干并不亚于军事天才。他只发

了一次脾气，后来当他感到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宰的时候，他是经常发脾气的，但这时，他还只是第一次。“你的帝国是习惯于被所有的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你忘了，法国是战胜国，你们是战败国……你忘了，你是在我的掷弹兵的包围之中同我进行谈判的……”——拿破仑就是这样发狂似地喊叫。他把放着贵重玉石咖啡盒的桌子猛力摔到地板上，把这只由科本茨带来的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送给奥国外交官的咖啡盒摔得粉碎。“他象个疯子一样。”——科本茨这样报告说。1797 年 10 月 17 日，在坎波福米奥终于签订了法兰西共和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和约。

拿破仑不论是在他取得胜利的意大利，还是在奥军根本还没有被法国将军战胜的德国，几乎他所坚持的一切，他都达到了。威尼斯正象拿破仑所希望的那样，成了奥国在莱茵河上让步而得到的补偿。

巴黎听到和平的消息以后，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法国期待着商业和工业的活跃。到处都在传颂着这位天才的军事领袖的名字。谁都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其他将军在莱茵河上屡遭失败，只有拿破仑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从而使莱茵河也得了救。官方、半官方以至私人的报刊和舆论，对这位百战百胜的将军、意大利的征服者赞扬备至。“呵！伟大的自由精神呵！只有你才会产生……征服意大利的军队，才会产生拿破仑！幸福的法兰西呵！”——共和国督政官之一拉·雷韦伊埃·莱波在自己的演说中这样感叹道。

拿破仑很快就组成了新的附属国——西沙尔平共和国，其中包括他所征服的一部分领土（首先是伦巴第）。他所征服的另一部分土地直接并入法国的版图。最后一部分(如罗马)暂时属于以前的君主，但实际上也隶属于法国。拿破仑成立的这个西沙尔平共和国，表面上有个由有产阶层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而全部实力却是掌握在法国占领军当局和巴黎派来的代表手里。他对所有谈论人民的解放和兄弟共和国等等传统的空谈，是公开加以鄙视的。他丝毫都不相

信，意大利眞有那么一些人，对自由抱着那么大的热情，象他自己在对被征服国人民发布的文告中所说的那样。

欧洲流传着一种正式的说法，说伟大的意大利人民怎样摆脱了长期的迷信和压榨的枷锁，浩浩荡荡地拿起武器来帮助法兰西解放者，而实际情况怎样呢？拿破仑在给督政府(不是对群众)的秘密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你们以为，自由会使颓废的、迷信的、胆怯的、狡猾的人民去做伟大的事业……在我的军队中，除了一千五百个从街上挑选来的、除抢劫之外什么都不会干的流氓以外，再没有一个意大利人……"接着他谈道，只要善于"严办几个"，就能控制意大利。意大利人已经有机会了解到，他所讲的严办几个是什么意思。他对曾经杀害了几个法国人的比纳斯科城、帕维亚城和一些乡村，都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在所有这些场合，拿破仑一直完全有计划地执行着一种政策：既不采取任何毫无目的的残酷手段，同时，又毫不留情地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是控制被占领的国家所需要的。他在被征服的意大利，消除了一切封建权力的遗迹，剝夺了教堂和寺院募集某些苛捐杂税的权利。他在意大利驻扎的一年半中间（自 1796年春至 1797 年秋末），颁布了一些法令，使意大利北部的社会法律制度可以尽量接近法国资产阶级在本国建立起来的社会法律制度。同时他挖空心思地对他所到过的一切意大利地方进行了巧取豪夺的剝削，把几百万金币送往巴黎督政府，并把意大利博物馆和油画画廊的最好的艺术品也送了去。他也没有把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将军们忘记：他们远征回来都成了富翁。但他在这样无情地剝夺意大利的同时，也了解到，尽管意大利人胆小(在他看来)，但是要他们非常喜欢法国人(法国军队的给养一直由他们供应) 是办不到的，而且他们的长期忍耐也会突然停止。就是说，军事恐怖的威胁，这才是使他们能够本着征服者的意图行事的主要东西。

他还不想离开被占领国，但督政府委婉地然而又坚决地要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以后回巴黎去。这时，督政府任命他为对英国作战的军队的总司令。拿破仑很早以前就已感到，督政府对他开始畏惧起来。“我知道，他们在嫉妒我，虽然他们当着我的面赞扬我；但他们是骗不了我的。他们急于任命我为远征英国的军队的将军，是为了要我离开意大利，因为我在那里，与其说是将军，不如说是太上皇。”——他在一次对亲信的密谈中这样估价这次任命。

1797 年 12 月 7 日，他回到巴黎，12 月 10 日，在卢森堡宫受到了督政府全体成员的隆重欢迎。当他到达卢森堡宫的时候，数不清的群众聚集到宫殿前面，以暴风雨般的喊声和掌声欢迎拿破仑。在欢迎他的时候，督政府第一督政官巴拉斯、督政府其他成员和诡计多端、最有眼光、足智多谋、卖身求荣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以及其余官员都发表了演说，广场上的群众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对于这一切，二十八岁的将军都以十分安详的表情接受了下来，好象完全理所应得、不足为奇的样子。他心里从来没有特别重视过人民群众的狂欢情绪：“假如把我送上断头台的话，人民也会这样快地跑来看热闹的。”——他在看到这种欢呼情景以后这样说道（当然不是当众说的）。

拿破仑刚一回到了巴黎，就通过督政府着手制定新的大战的计划：作为远征英国的将军，他决定，要有一个比英吉利海峡更能威胁英国的地方，因为在英吉利海峡英国海军比法国的强大。他提议占领埃及，在东方造成进一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跳板。

他是不是疯了？——当欧洲许多人到了 1798 年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这样问自己，因为在这以前，拿破仑的新计划以及 1798 年春督政府会议对这个计划的讨论都一直是受到最严格的保密的。

但是，一般人觉得是十分荒唐的冒险的事情，实际上不仅是与革命时期的而且是与革命以前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夙愿紧密联系着的。拿破仑的计划被接受了。

第三章　征服埃及和进军叙利亚

(1798—1799 年)

一

在拿破仑的历史性的事迹中，进军埃及——他所指挥的第二场大战，——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使在法国的殖民战争历史上，这个尝试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马赛和法国整个南部的资产阶级很久以来就同近东各国，即同巴尔干半岛各国、叙利亚、埃及、地中海东部诸岛、希腊群岛等，有着极其广泛的极有利于法国工商业的联系。很久以来，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就一直想要在这些可以得到大量利润然而秩序相当混乱的地方巩固法国的政治地位，因为在这些地方，商业总是需要保护，商人需要在必要时可以得到援助的力量。18 世纪末，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天然资源作诱人的描述的书籍多起来了。这些国家是最好的殖民地和商业区。法国的外交界很久以来就看上了这些所谓土耳其没有很好保护的近东国家；这些国家曾被划为君士坦丁堡苏丹的领地、土耳其政府（当时叫做奥斯曼波尔塔）的领土。很久以来，法国统治集团一直把地中海和红海冲击着的埃及，看做可以威胁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和政治对手的地点。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给路易十四写过一份报告，建议法国国王占领埃及，以便破坏荷兰在整个东方的地位。而现在，到了 18 世纪末，主要敌人已经不是荷兰，而是英国，从上述各节可以看得很明显，当拿破仑建议进攻埃及的时候，法国政权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把他看成是疯子，而当冷静的、慎重的、多疑的外交大臣塔列朗非常坚决地支持这个计划的时候，也没有

一个人表示惊奇。

还在刚占领威尼斯的时候，拿破仑就命令他所属的一个将军占领爱奥尼亚群岛，而且就认为占领这些岛屿是占领埃及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有一些不可辩驳的材料可以证明，在整个第一次对意战爭期间，他就经常想到埃及。早在 1797 年 8 月，他从自己军营写信给巴黎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感到，要眞正打跨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在整个对意战爭期间，一有空，他就象往常一样，贪婪地读了很多书；我们知道，他摘录了、读完了沃尔内描述埃及的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同一题目的著作。他占领爱奥尼亚群岛以后，对这些岛屿非常重视。他在给督政府的信中写道，如果要挑选的话，他宁肯放弃刚刚征服的意大利，也要把爱奥尼亚群岛保留下来。他还沒有同奥军签订最后和约，就坚决地建议占领马耳他岛。他需要所有这些地中海上的岛屿是为了将来向埃及展开进攻。

现在，当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同奥国的战爭已经结束（至少是暂时地），英国成了主要敌人的时候，拿破仑就尽一切力量要督政府给他海军和陆军去征服埃及。东方始终吸引着他，在他生命的这个时期里，他向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超过了凯撒、查理大帝或其他任何一个历史上的英雄。后来，当他在埃及的沙漠上巡游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半认眞地对同行者表示遗憾，自己生得太晚了，无论如何不能象曾经征服过埃及的亚历山大那样，在那里宣布自己是上帝或上帝之子。后来他又很认眞地谈道，欧洲太小了，眞正伟大的事业，最好是在东方进行。

他的这些内心的向往恰好与他当时的政治前途的要求完全一致。实际上，从意大利的那个不眠之夜，当他决定不能永远只为督政府取得胜利以后，他就采取了夺取最高权力的方针。"我已经不会服从了"。——当他同奥军进行和平谈判，而巴黎寄来了使他气愤的指令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总部就公开这样说。但在 1797 年冬或 1798 年

春，立即推翻督政府是不行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即使拿破仑此时已经失去了服从的耐性，但还没有丧失等待时机的耐心。督政府还没有腐败透顶，拿破仑也还没有成为全军的宠儿和偶像，尽管他对在意大利的那些师团是有充分的把握的。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新的征服，踏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向古埃及王国、向金字塔的国家进军，建立新的辉煌的功绩，威胁敌对国家英国的印度领地。

在这件事情上，塔列朗的支持对他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未必可以说塔列朗有什么“信念”吧。但在塔列朗看来，在埃及可以建立一个富饶的、繁荣的、经济上有利的法国的殖民地，这是毫无问题的。他在没有听说拿破仑的计划以前，就在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塔列朗本是一个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贵族，后来投靠共和国，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近东贸易特别感到兴趣的阶级——法国商人——的愿望的体现者。这时，塔列朗还有一个笼络拿破仑的想法，这个狡猾的外交家第一个预测到拿破仑将是法国未来的主宰和雅各宾派的最可靠的镇压者。

但是，拿破仑和塔列朗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了督政府，让它拿钱、派出陆军和海军，来进行这场遥远的危险的进军。第一（这也是最重要的），由于上述一般经济原因，特别是军事政治原因，督政府也看到了这次远征的好处和意义；第二（这是次要得多的），有的督政官（如巴拉斯）实际上也可以看到策划中的遥远的危险的远征会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这次远征是那末遥远，那末危险……拿破仑突然享有这样高的声誉，早已使他们感到不安；他“再也不会服从了”，对这一点，督政府知道得最清楚：坎波福米奥和约，拿破仑是违背督政府的某些直接的意图、根据自己的意见签订的。1797 年 12 月 10 日欢迎他的时候，他不象一个年青的军人那样，带着激动的感激的心情来接受祖国对自己的颂扬，而象一个古代罗马皇帝在一次战争胜利以

后，去参加奴颜婢膝的议会所组织的庆祝凯旋的盛会一样：他态度冷淡，几乎是阴沉威严，不声不响，把眼前的一切看成理所当然、司空见惯的事。一句话，他的态度也使人产生不安。要他去埃及：他回得来也好，回不来也没有啥，巴拉斯及其同僚早就准备甘心忍受这个损失。远征已经决定了。总司令是拿破仑将军。这是 1798 年 3 月 5 日的事。

总司令立即展开了繁忙的工作，准备远征，视察舰艇，选拔远征的士兵。与对意战争初期相比，拿破仑表现了更大的才能：他在考虑最重大最困难的措施的时候，敏锐地注视着所有小的地方，同时丝毫没有顾此失彼的现象，既能看到树木，也能看到森林，而且几乎每棵树的每条树枝，他都能看到。拿破仑巡视海岸和海军，组织远征兵团，注意研究世界政治局势的一切动态，以及关于纳尔逊舰队活动的一切消息，因为这支当时还在法国海岸附近巡弋的舰队可以把渡海航行中的拿破仑海军打入海底。与此同时，拿破仑几乎一个个地选拔曾同他一起去意大利作过战的士兵去远征埃及。他认识很多士兵；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一直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哪个士兵勇敢、坚强、但经常饮酒，哪个士兵很聪明、很灵敏、但容易疲劳、因为有疝气病。他不仅后来正确地挑选了一批元帅，在需要的时候，也正确地挑选了伍长和普通士兵。为了远征埃及，在烈火般的阳光下，在五十度甚至更高的温度的条件下作战，走过炎热的、一望无边的、荒无人烟的干旱沙漠，就要挑选真能吃得住的人。1798 年 5 月 19 日，一切都准备好了；拿破仑的舰队离开了土伦。载有三万军队和大炮的将近三百五十艘大小船只，几乎必须沿着整个地中海海岸前进，躲开纳尔逊的舰队，不然这支舰队就会把他们打入海底。

全欧洲都知道，正在准备一次海上远征；此外，英国还很清楚地知道，法国南部的所有海港，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工作，不断有军队开往这些海港，率领这次远征的是拿破仑将军，这个任命本身就说明

事情的重要性。但向哪儿远征？拿破仑故意散布一种空气，说他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绕过西班牙，然后去爱尔兰登陆。这个风声传到了纳尔逊的耳朵里，使他上了当：当法国海军离开海港，直奔东边的马耳他岛的时候，他正在直布罗陀海峡防守着拿破仑。

马耳他岛从 16 世纪起就属于马耳他骑士团。拿破仑将军到达这个岛，要求这个岛投降，而且达到了目的，接着宣布该岛为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土。停留几天以后，继续向埃及进发。马尔他岛大约是在半路上，拿破仑 6 月 10 日到达该岛，19 日就继续前进。由于顺风，6 月 30 日，拿破仑及其军队就已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埃及海岸靠岸。他马上开始登陆。情况是危急的：他一到亚历山大港就听说，正好在他到达亚历山大港以前四十八小时，英国舰队就到了那里，并且打听拿破仑的动向（那里当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原来纳尔逊听说法军占领了马尔他岛以后，知道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于是拉起所有船帆，直奔埃及，以便不等法军登陆就把他们消灭在海里。但倒霉的是，他过于性急了，英国海军走得也太快了；他先揣度拿破仑定会从马尔他岛前往埃及，这是对的，但当他在亚历山大港打听到那里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拿破仑的时候，就又糊涂起来了。于是他决定直奔君士坦丁堡，因为法军既然不去埃及，就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纳尔逊这一连串的错误和偶然因素挽救了法国的远征。纳尔逊随时都可能回来，因此登陆要非常迅速。7 月 2 日深夜一点钟，法军就登了陆。

二

拿破仑和他可靠的士兵感到心安理得，什么都不怕了。他马上带领师团向亚历山大港推进（他是在离城几公里的马拉布渔村登陆的）。

埃及是土耳其苏丹的领地，但实际上，统治它的是武装精良的封建骑兵队的首领。骑兵队叫做近卫骑兵，他们的首领、埃及最好领地的占有者叫近卫骑兵公爵。这些军事封建贵族向君士坦丁堡苏丹缴纳一定的贡赋，承认他是自己的帝王，但实际上，对他的依附关系很小。

当地的基本居民是阿拉伯人，有的经商（其中有中等的甚至是富裕的商人），有的卖手艺，有的做商队运输，有的种地。处境最不好、生活最苦的是克普特人，即阿拉伯人来此以前的土著部族的残余。他们的共同名称是“费拉赫”（农民）。但贫困的阿拉伯农民也叫费拉赫。他们当雇农，做杂工，赶骆驼，有的做流动商贩。

这个国家虽然属于苏丹，但前来占领它的拿破仑却做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不是在同苏丹作战，相反地，他对苏丹抱着深厚的和平与友谊的心情，他来是要解放阿拉伯人（他沒有讲克普特人），使他们摆脱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进行残酷压榨的近卫骑兵公爵的压迫。当他向亚历山大港推进，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拿下这个城市，进入这个辽阔的在当时相当富足的城市以后，他就重复他的要把阿拉伯人从近卫骑兵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滥调，同时马上开始建立法国的长久统治。他竭力要阿拉伯人相信他对可兰经和回教是尊重的，但又要他们彻底服从，否则就要遭到严惩。

拿破仑到达亚历山大港几天以后，就向南方前进，深入沙漠。他的军队苦于沒有水喝：乡村居民在慌乱中弃家出走，临走时往井里投了毒药和脏东西。近卫骑兵缓缓撤退，有时袭击一下法军，然后骑着自己高大的马藏匿起来，使法军无法寻找。

1798 年 7 月 20 日，由于要夺取金字塔，拿破仑终于同近卫骑兵的主力相遇了。“士兵们！四千年历史今天从这些金字塔的上面看着你们！”——拿破仑在战斗开始以前向全军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战斗是在因巴贝村和金字塔之间进行的。近卫骑兵遭到了彻底失败，

他们丢下了一部分大炮(四十门)，向南方逃去。有几千人被丢弃在战场上。

在取得这次胜利以后，拿破仑就马上进入了埃及两大城市中的第二个大城市开罗。吓呆了的居民沉默地迎接征服者；他们不仅过去沒有听说过拿破仑，而且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同谁打仗。

在比亚历山大港更富足的开罗，拿破仑找到了大量食物。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以后，稍事休息。当地居民过于惶恐，这的确是件不愉快的事，拿破仑甚至用当地文字发表了一篇要人们安心的特别文告。但是，由于有几个法军士兵被杀害，他怀疑是被离开罗不远的阿尔卡村的居民干的，所以命令严厉惩办这个村庄，把它抢劫一空，然后烧掉。这样一来，阿拉伯人的惊惶心情就更加厉害起来。拿破仑不论是在意大利，在埃及，还是在以后作战的一切地方，都毫无踌躇地下达过这种命令，他是完全有意识这样做的：他的部下应当看到，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胆敢触犯一下法国士兵，他们的上司会给以怎样严厉的惩罚。

他在开罗安顿就绪以后，就着手组织管理工作。这里不详细加以叙述，我只指出几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每个城市、每个村庄的权力都要集中在法国卫戍部队司令的手里；第二，这个司令应当有一个由他指定的、由当地最有名望和最富裕的公民组成的“谘议会”；第三，回教应当受到充分尊重，清眞寺和僧侣神圣不可侵犯；第四，在开罗，总司令本身也应该有一个不仅有开罗的代表而且有外省的代表参加的庞大的议事机关。税收应当有所调整，实物税也应该组织交纳，以便国家能够保证法国军队的供应。各地司令应当同本地的咨询机关一起建立正规的警察制度，保护商业和私有财产。所有近卫骑兵公爵征收的地租一律取消。不愿归服、继续进行战争和向南方逃窜的公爵的产业，收归法国国库所有。

拿破仑在这里和在意大利一样，也是尽力消灭封建关系，而这是极其方便的，因为正是近卫骑兵支持军事反抗；拿破仑所依靠的是阿拉伯资产阶级和阿拉伯土地占有者，对于被阿拉伯资产阶级剥削的贫民，他根本不予保护。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的绝对军事独裁的基础。他集中控制着这个独裁机器，以便利用它来保证他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最后，应当指出，他所坚决主张的宽容异教和尊重可兰经是一种非常的革新，致使俄国“最高”宗教事务总署于 1807 年春，象大家所知道的，提出了拿破仑和反基督徒的“先行者”完全一样这样一个大胆的说法，其论据之一，就是说拿破仑在埃及袒护回教。

拿破仑在被占领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后，随即准备继续进军，从埃及入侵叙利亚。他决定不把随他前来的学者带到叙利亚，而让他们留在埃及。拿破仑从来没有特别尊重过同时代的学者的卓越见解，但他非常清楚，假如让这些人去完成军事、政治或经济形势所提出的具体任务，那他们是会带来很大好处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随同参加远征的学者表现了很大的同情和关怀。他在一次同近卫骑兵作战前发出的“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这个有名的命令，正说明他首先关心的，除了进军中非常珍贵的輜重牲畜外，就是科学家的安全；这两个词偶然排到一起，完全是由于军事上一般要求简单明了和命令必须简短的缘故。应当说，拿破仑的远征在埃及学的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可以说，随他前来的学者第一次为科学界展示了这个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国家。

三

早在进军叙利亚之前，拿破仑曾经多次表示确信，尽管法国征服者在其布告中经常谈什么把阿拉伯人“从近卫骑兵的暴政下解放出

来”，但远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对这种“解放”表示高兴。法军在建立了正规的、但对居民说来是沉重负担的征集和捐税制度以后，有了足够的粮食。但硬币弄到很少。要搞到硬币，还要想别的办法。

被拿破仑任命为亚历山大港总督的喀莱贝尔将军以叛国罪逮捕了这个城市从前的族长百万富翁西第·穆罕默德·艾里·科拉伊姆，虽然一点证据都没有。艾里·科拉伊姆被押送到开罗后，法军对他说，如果他想救他的脑袋的话，就交出三十万金法郎。倒霉的是艾里·科拉伊姆是个宿命论者，他说：“如果我注定现在死，那就什么也救不了我，那就是说，我交出我的披亚斯特① 也没有用；假如我注定不死，那我为什么要交出这些东西？”拿破仑命令砍掉他的脑袋，拿到开罗游街示众，并在上面写着：“这就是所有叛徒和违反誓约者的下场”。尽管想了一切办法去找，被害的族长藏起来的钱还是没有找到。其他几个富裕的阿拉伯人的表现却不同，法国征服者向他们勒索多少，他们就交出多少；在艾里·科拉伊姆被杀后不久，很快就有四百万法郎这样进入法军钱库。对一般人更加简单，更谈不上特别的礼节。1798 年 10 月末，事情发展到在开罗城爆发起义的地步。几个占领军士兵遭到公开进攻，被击毙，起义者在一些城区守卫了三天。接着进行了无情的镇压。除了有一大批阿拉伯人和费拉赫被杀害外，就在镇压以后，一连几天都在继续实行绞刑；每天都有十二人至十三人被绞死。

开罗起义在邻村也有反应。拿破仑在得知第一个起义后，就命令自己的副官克鲁阿泽前去包围整个部落，把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和小孩送到开罗，并把这个部落住过的房屋全部烧光。这些都准确地执行了。许多被赶着徒步往前走的小孩和妇女死在路上。在这次惩办性的征伐结束后几小时，开罗的主要广场上就出现了一些驮着

① 埃及货币名称。——译者注

麻袋的驴子。麻袋打开以后，犯了罪的部落的被杀死的男人的头颅在广场上滚来滚去。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来判断，这种兽行使居民一时吓得魂飞魄散。

这时，拿破仑应当考虑两个对他极其危险的情况。第一，海军上将纳尔逊终于(恰恰是军队在埃及登陆一个月以后)找到了停在阿布基尔海港的法国舰队，向它展开进攻，并彻底消灭了它。法国海军上将布律埃斯阵亡。这样，在埃及作战的军队就要长期与法国断绝联系。第二，土耳其政府无论如何不同意拿破仑散布的滥调，似乎他不是与土耳其政府作战，只是由于近卫骑兵侮辱了法国商人以及为了解放阿拉伯人，才对近卫骑兵进行惩罚。土耳其军队开往叙利亚。拿破仑也从埃及向叙利亚挺进，去迎击土耳其军队。他认为在埃及采取残酷手段是在新的远征期间确保后方安全的最好方法。

进军叙利亚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因为缺水。从艾里·阿里什城开始，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向拿破仑投降。拿破仑跨过苏伊士地峡，向雅法推进，于1799 年 3 月 4 日包围了雅法。拿破仑命令向雅法居民宣布，如果城市是被攻占的，那居民就要被全部杀光，不以俘虏论处。雅法没有投降。 3 月 6 日，法军进行猛攻，冲入城内，把所遇到的一切人全部杀光。房屋和店铺被抢劫一空。过了一段时间，当枪杀和掠夺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向拿破仑报告说，有将近四千名全副武装的土耳其士兵，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固守在一个很大的、四面都坚固设防的阵地里，当法军军官来到他们那里，要求他们投降的时候，这些士兵声称，只有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才投降，否则他们将固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法军军官答应他们可以做俘虏，于是这些土耳其士兵就离开工事，交出武器。法军把这些俘虏关在一个大房子里。拿破仑将军对这一切很生气。他认为，根本不应当答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他喊道：“我现在该怎么处置他们？我哪有粮食来养活他们？”既没有船只把他们从雅法送到埃及

去，也不能抽调那么多军队，押送这四千名精兵经过所有叙利亚和埃及的沙漠，到亚历山大港或开罗去。但拿破仑也沒有马上采取可怕的决定。他犹豫不决，翻来复去地思考了三天。在这些士兵投降后的第四天，他命令把所有这些士兵枪毙。四千俘虏被押到海岸，全被枪毙，一个未留。“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们所看到的那次枪杀的悲惨景象。”——一个法军军官曾经这样谈道。

接着，拿破仑马上继续前进，开往阿克尔城堡，也就是法军经常说的圣·让·阿克尔。土耳其把它叫做阿卡。法军在雅法是不能久留的。这一带鼠疫猖獗，法军开到哪里，鼠疫就蔓延到那里。在雅法，不论是在屋里，街上，房上，地窖里，庭院里，菜园里，到处都有沒有清理的被屠杀死尸在腐烂，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停在雅法是非常危险的。

法军把阿克尔包围了整整两个月，结果遭到失败。当时拿破仑沒有攻城炮；该城的守卫是由英国人西德尼·史密斯领导的；英军从海上运来粮食和武器，土耳其的守城部队也很强大。经过几次强攻遭到失败以后，法军于 1799 年 5 月 20 日撤除了包围；在包围期间，法军共损失三千人。当然，被包围者损失更多。接着法军就返回埃及。

这里应该指出，拿破仑一直（到死）认为这次失败含有一种特别的、宿命的意味。他认为阿克尔要塞是他命定的远征东方的极点。他想长期留在埃及，因此命令他的工程师去调查以前开掘苏伊士运河的痕迹，制定开掘这一部分的工程计划。我们知道，他曾给当时正在进行抗英战爭的迈索尔苏丹（印度南部）写过一封信，答应予以援助。他还制定了同波斯王进行联系和签订协议的计划。阿克尔的反抗，关于后方的艾里·阿里什和阿克尔之间的叙利亚农村举行起义的使人担心的传说，最主要的是不可能在沒有新的援军的情况下在这样无限长的战线孤军深入，所有这一切就使他要在叙利亚建立统治的幻想完全破灭。

撤退比进攻时更加艰苦，因为已经到了5月末，就要到6月，这些地方热得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拿破仑在这里不能久留，以致没有可能象往常那样，对于那些他认为应该受到惩处的叙利亚农村，进行残酷惩处。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是，在从叙利亚返回埃及的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总司令和全军一起同甘共苦，不许自己和自己的高级将领有任何特殊化。鼠疫逼得越来越紧了。鼠疫患者都被留下，但其他的伤病员还是带走。拿破仑命令所有的人急忙赶路，马、所有四轮车和马车全都载运伤病员。这个命令下达以后，他的一个负责管理马匹的军官认为总司令总应当例外，于是就问他要哪一匹马。拿破仑马上大发脾气，给问话的人一个耳光，并且大声喊道："全体步行！我第一个先走！难道你不知道命令吗？滚蛋！"

由于这次举动和其他类似的举动，士兵们对拿破仑的爱戴和在年老时对他的怀念，要超过他取得的一切胜利所引起的爱戴和怀念。这一点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在类似的场合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任何曾经见到过他的人后来都不能判断，当时这是一种自然的举动呢，还是故意做作的和经过考虑的。也可能两者同时都有，正象一些伟大的演员一样。拿破仑在装模作样方面确实是伟大的，尽管在他活动初期，在土伦、意大利、埃及时期，他的这个特点只有极少数人，只有与他最接近的人当中最敏锐的人才能看到。当时与他接近的人中间敏感的人是很少的。

1799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回到了开罗。但即使不是全军，至少是全军的总司令，留在被他占领的被征服的国家里的时间不会很久了。

拿破仑在开罗尚未来得及休息，就传来了一个消息，说阿布基尔附近，在一年以前纳尔逊消灭法军运输舰队的地方，有土耳其军队登陆，目的是要把埃及从法军手里解放出来。于是他马上带领军队离

开开罗，向北方尼罗河三角洲进发。7 月 25 日，他向土军展开进攻，并把它击败。一万五千名土耳其军队几乎全部被就地消灭。拿破仑下达命令，不得收容俘虏，要把敌军全部击毙。拿破仑曾洋洋得意地写道："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出色的战役之一：全部登陆的敌军无一漏网。"此后，法军的占领在几年内就完全巩固下来。有一部分土耳其军队被英国船队救了回去。海面还象往常一样，由英军控制，但埃及比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掌握在拿破仑的手里。

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桩谁都沒有预见到的事件。有几个月同欧洲断绝了一切联系的拿破仑，从一份偶然落到他手里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在他远征埃及期间，奥国、英国、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再次掀起对法战争，苏沃洛夫到了意大利，击溃了法军，消灭了西沙尔平共和国，向阿尔卑斯山进发，威胁着法国；在法国本土，到处都是抢劫、混乱，完全解体，督政府遭到大部分人的仇视，软弱无力，一筹莫展。"一群笨蛋！意大利丢了！我的一切胜利果实都丢了！我要去！"——他刚看完报纸就这样说。

他立刻作出决定。他要克莱贝尔将军统帅全军，命令赶快并且绝对秘密地配备四只船，运载他所选拔的五百名士兵，于 1799 年 8 月 23 日开往法国，他给克莱贝尔留下了装备精良的大批军队，正规的（他所建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捐税制度，以及这个被占领的大国的吓呆了的默默无言的被征服的人民。

第四章　雾月十八日政变

(1799 年)

一

拿破仑离开埃及时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就是推翻督政府，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事业。要向共和国开刀，“制止”十多年前攻占巴士底狱开始的革命，即使拿破仑有过在土伦、葡月事件、意大利和埃及建立的功勋，要做到这一切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拿破仑刚刚离开被他占领的埃及的海岸，危险就开始出现了。在到达法国以前的四十七天航行期间，越来越接近而且看来必然要与英军相遇，在这可怕的时刻，据目击者说，只有拿破仑一个人仍然保持镇静，象往常一样，精神振作地发出一切必要的命令。1799 年 10 月 8 日晨，拿破仑的船只靠近法国南岸的弗雷居斯海峡附近的港口。要想了解 1799 年 10 月 8 日拿破仑踏上法国土地到 11 月 9 日他成了法国主宰这三十天中所发生的变化，就要简单地提一下法国在得知埃及的征服者回国的消息以后的情形。

在第五年(1797 年)果月 18 日政变和逮捕皮什格鲁以后，共和国督政官巴拉斯及其同僚看来还可以依靠在这一天支持他们的那些力量：1)依靠城乡新的有产者阶层，这些人在出卖国家财富、寺院和亡命者的土地以后，发了横财，其中绝大部分都害怕波旁王朝复辟，但又幻想建立巩固的警察统治和强大的中央政权；2)依靠军队与士兵群众，他们与竭力反对旧王朝和封建君主制度复辟的思想的劳动农民有着紧密联系。

但在第五年（1797 年）果月 18 日至 1799 年秋这两年中可以看

出，督政府丧失了各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一心向往出现一个独裁者，一个恢复贸易的人，一个能够保证工业的发展、给法国带来胜利的和平和巩固的国内“秩序”的人；中小资产阶级，首先是买了土地发了财的农民，也有这样一个愿望：这个独裁者，只要不是波旁，任何人都行。巴黎工人，从 1795 年牧月大量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对他们实行野蛮的恐怖以后，从 1796 年逮捕巴贝夫和 1797 年绞死巴贝夫并把巴贝夫分子流放以后，从督政府采取一切政策全面保护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投机商和贪污分子的利益以后，这些工人继续挨饿，失业，担负物价上涨的重担，诅咒包买商和投机商，因此，无论是谁向政府发动进攻，他们当然根本不会从任何方面去维护这个政府。至于外来工人，即从农村来的短工，他们确实只有一个口号：“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吃上饭的政权”（un régime où l'on mange）。督政府的密探常在巴黎市郊探听到这种话，并把这些话报告给惶惶不安的上级。

督政府在其统治的几年中间无庸争辩地证明了，它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巩固的资产阶级制度，并把这种制度彻底奠定下来，充分发挥效率。督政府在最近期间在其他方面也暴露了自己的软弱。里昂的企业主和丝织厂老板为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带来大量生丝而欢欣鼓舞，但后来，当拿破仑不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苏沃洛夫，并于 1799 年从法军手里夺去了意大利，因而感到失望灰心。同时其他行业的法国资产阶级也有失望情绪，他们在 1799 年看到，法国同强大的欧洲联盟作战越来越困难，拿破仑 1796—1797 年从意大利运到巴黎来的几百万金币，都被督政府袒护下的官员和投机商侵吞了。法军在意大利的诺维战役中被苏沃洛夫打得落花流水，法军总司令儒贝尔在这次战斗中阵亡，法国的意大利“盟国”分崩离析，法国边境有被突破的危险，这一切都使城乡资产阶级对督政府产生非常厌恶的情绪。

军队就更不用说了。军队早就想念着已去埃及的拿破仑，士兵

们公开抱怨由于偷盗行为盛行而自己忍饥受饿，并一再说白白送他们去送死。早已销声匿迹的保王党运动，突然在旺代死灰复燃起来。舒安党人的首领乔治·卡杜达尔、弗罗泰、拉罗什雅克兰又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活跃起来。有些地方的保王党竟胆大到有时在街上喊出“苏沃洛夫万岁！打倒共和国！”这样的口号。成千上万逃避兵役的青年人被迫离开家乡，在国内到处流浪。由于财政、商业、工业普遍解体，由于使大投机商和包买主大发横财的苛捐杂税接连不断，物价每天都在飞涨。即使是 1799 年秋，马塞纳在瑞士的苏黎世战役中击溃了科尔沙柯夫的俄国军队，另一支俄国军队(苏沃洛夫的)被沙皇保罗召回，就是这些胜利也很难帮督政府的忙，也没有恢复它的声誉。

假如谁打算用几句话来概括 1799 年中期法国的形势，他可以用下述的话来表述：绝大部分有产阶级认为督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没有效率，有许多人认为它是肯定有害的；对城乡贫苦群众来说，督政府是有钱的强盗和投机分子的制度，是贪污分子大肆挥霍和心满意足的制度，是使工人、雇农和贫穷消费者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制度；最后，对士兵群众来说，督政府是由一群十分可疑的分子组成的，他们不给军队鞋子和粮食，在几个月中间，就把拿破仑在十几次战役中占领的地方交给了敌人。独裁的基础准备好了。

二

1799 年 10 月 13 日（葡月 21 日），督政府向五百人院“满意地”(文件中这样写着)通告说，拿破仑将军已回到法国，在弗雷居斯登陆。人民代表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欣喜若狂的喊叫声和欢呼声中，全体起立，长时间地表示热烈欢迎。会议中断了。当代表们走到街上，传布这个消息以后，据目击者说，首都兴奋得象发了狂一样，在剧院、沙龙、中央大街上，到处都在传颂着拿破仑的名

字。巴黎不断收到消息，说拿破仑将军在来巴黎途中经过中部和南部的所有城市时，都受到了当地居民规模空前的欢迎。农民们离开了农村，城市代表团接二连三地进见拿破仑，把他当作共和国最优秀的将军来欢迎。不仅是他自己，就是其他任何人也很难想象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规模的、意味深长的场面。别开生面的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得到拿破仑已经登陆的消息以后，奏着军乐走遍整个巴黎。很难完全弄清楚，是谁发出命令这样做的。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命令，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命令？

10 月 16 日（葡月 24 日），拿破仑将军抵达巴黎。在他到达以后，督政府还继续存在了三个星期。但不论是在政治上就要完蛋了的巴拉斯，还是帮助拿破仑断送了督政官政权的那些督政官，在当时都没有怀疑到末日即将到来，离确立军事独裁的期限已经不是以星期来计算，而是以日和时来计算了。

从拿破仑从弗雷居斯到巴黎的路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人们都把他当成了“救星”。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发表了感情激动的演说，张灯结彩，举行游行，派代表团进见。外地的农民、市民都来欢迎他。军官们和士兵们兴奋地欢迎自己的统帅。所有这些在拿破仑面前象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的现象和人们，在他来巴黎的途中，还没有使他充分相信会马到成功。重要的是首都将怎样表示。巴黎的卫戍部队兴奋若狂地欢迎统帅，欢迎建立了新的功勋、凯旋归来的埃及的征服者，打败近卫骑兵的胜利者，在离开埃及以前刚战胜了土耳其军队的胜利者。拿破仑马上就感到上层阶级是他的牢固的支柱。从最初几天还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新的所有主，对督政府采取显然敌对的态度，认为它不论是在对内政策上，还是在对外政策上，都昏庸无能。这些人公开表示害怕保王党的活动，但更害怕近郊工人的起义。近郊工人群众刚刚受到督政府的一个新的打击：8 月 13 日，根据银行家的要求，西哀耶斯消灭了雅各宾派最后一

个据点——拥有五千社员、并在两院中有二百五十个代表的自由平等之友社。无论是从右面来的危险，还是从左面来的危险，主要是从左面来的危险，只有拿破仑才能最好地加以防止——资产阶级及其首领立即坚定地相信了这一点。同时还十分偶然地显露出，即使拿破仑决定立即举行政变，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本身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够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反抗。无足轻重的戈伊埃、穆兰、罗歇·杜科根本不在话下。他们之所以成为督政官，也只是因为谁都不相信他们会提出任何一个独立见解，在西哀耶斯或巴拉斯认为不必要的情形下会表示自己的意见。

只需对付两个督政官：一个是西哀耶斯，一个是巴拉斯。革命初期由于出版过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而声名大噪的西哀耶斯，一直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思想家；他和大资产阶级心心相印地忍受了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和他们一道热烈地赞扬热月9日雅各宾专政的被推翻和1795年镇压贫民群众起义的牧月恐怖，并和这个阶级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资产阶级制度，认为督政官政权根本做不到这一步，尽管他自己也是五个督政官中的一个。他对拿破仑的回来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但对这位将军的个人的了解犯了一个十分可笑的严重错误。“我们需要冲锋陷阵的人”——他这样说道，天真地以为，拿破仑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人，而他西哀耶斯是新政权的缔造者。我们现在就会看到，他这个可悲的（对西哀耶斯来说）估计会产生什么结果。

至于谈到巴拉斯，他与西哀耶斯不同，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具有另一种经历、另一种思想的人。他当然比西哀耶斯要聪明些，因为他不是象西哀耶斯那样自负、那样自信的政治议论家。西哀耶斯不仅仅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而且是一个——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相当孤芳自赏的人。巴拉斯则是个大胆的、腐化的、多疑的、花天酒地的、无恶不作的人；革命以前，是个伯爵，军官；革命时期，是个山岳党

人，他是议会中搞阴谋的首领之一，热月 9 日事件的外部条件的创造者，热月党反动的主谋，1797 年果月 18 日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哪里有势力，哪里可以分享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物质福利，他就跑到那里。但他与塔列朗不同，他能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象热月 9 日，组织对罗伯斯比尔的进攻就是这样；他能向敌人展开直接进攻，象 1795 年葡月 13 日或 1797 年果月 18 日进攻保王党人就是这样。他在罗伯斯庇尔时期，与西哀耶斯不同，不是象藏匿起来的老鼠那样转入地下，西哀耶斯在回答他在恐怖时期做了些什么的问题时回答说，“我还活着”。巴拉斯早就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知道，保王党和雅各宾派都很仇恨他，因此对这两种人都不留情，同时也意识到，如果这两种人得势，也不会对他留情。如果拿破仑能够未受伤害地活着回来的话，他也不拒绝给他帮助。他自己在雾月以前的这些热闹日子里，也曾去看望拿破仑，暗中与他进行谈判，尽力想使自己在未来的制度中得到较高的地位，更有利的处境。

但拿破仑很快就决定了，巴拉斯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他没有用处，这样聪明的、果敢的、细致的、狡猾的政治家，尤其是担负这样高的职务的政治家，是不太多的，轻视他们是不应该的。但正是巴拉斯使自己不可能被录用。人们不仅仇恨他，而且鄙视他。恬不知耻的盗窃行为，无法掩饰的贪污行为，与供应商和投机商一起营私舞弊，在忍饥挨饿的贫苦群众面前大摆酒宴，——这一切都使巴拉斯臭名远扬，成了督政府腐败、罪恶和瓦解的象征。

相反地，拿破仑从一开始就表示喜欢西哀耶斯。西哀耶斯的声誉要好一些，他本人既然是个督政官，那末在转向拿破仑方面时，他就可以使全部过程具有一种“合法的形式”。拿破仑对他也象对巴拉斯一样，暂时还没有嫌弃，而是留着他，况且西哀耶斯在实行政变以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有用。

在这期间，有两个去看望拿破仑将军的人，是注定要把自己的名

字与拿破仑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塔列朗和富歇。拿破仑早就认识塔列朗，知道他是一个盗窃分子、贪污分子，毫无良心的但极聪明的追求名利的人。拿破仑知道，只要有人肯买，塔列朗会把任何可以出卖的人卖掉，但他看得很清楚，塔列朗现在不会把他出卖给督政官，相反地，他会把他几乎直到最近还在其中担任外交部长的督政府出卖给他。塔列朗给他提供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指示，同时极力推动事情前进。将军完全相信这位政治家的头脑和观察力，塔列朗对他进行帮助的那种坚决精神，对拿破仑来说是个很好的征兆。这一次，塔列朗公开为拿破仑服务。富歇也做了同样的事。他在督政府时期，是警务署长，他想在拿破仑时期也继续留任警务署长。他有一个(拿破仑知道这一点)宝贵的特点：作为一个从前的雅各宾派、恐怖主义者，他曾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因此极其害怕波旁王朝复辟，看来这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他不会为了波旁王朝而出卖新的统治者。富歇的帮助被接受了。大金融资本家和供应商公开拿钱给拿破仑。银行家科洛马上给了他五十万法郎，未来的统治者对此暂时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把钱欣然地接受下来，因为在这样艰巨的事业中是用得着钱的。

拿破仑从抵达巴黎到举行政变的三个半星期的热火朝天的日子里，看到有许多人靠拢自己，他也对这些人进行了许多极有益(对未来)的观察。几乎所有的人(塔列朗除外)都感到，这个漂亮的打手和勇士，在三十岁时就取得了这样多的胜利，攻下了这样多的要塞，超过了所有的将军，对政治事务和民政事务却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要控制他是不会不成功的。直到政变发生前的所有这些日子里，拿破仑的交谈者和助手所想象的拿破仑，都不是真正的拿破仑，而是某个另外的人。而他自己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们在这危险的几周内，把他当成别的什么人。过早地锋芒毕露是不必要的。在 1799 年露月整个上半月，他运用了他试验过的方法，装出一副朴实、直爽、坦率，似

乎相当单纯甚至眼光狭小的样子，而且完全奏效。未来的奴隶认为自己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个偶然的方便的工具。他们甚至没有掩饰对他的态度。他本人也知道，人们能以平等身分同他谈话的最后几天很快就会过去了，他知道，使他们暂时还不疑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他象往常一样，这时还是总司令，对正在进行的事情发布总的指令。他在进行筹备工作的这几个星期里，很巧妙地克制着自己，不仅是军队，就连市郊工人在初期都把正在进行的事情，看做是从左面来的政变，是把共和国从保王党手里拯救出来。“葡月将军从埃及回来，是为了再一次拯救共和国。”——政变前后，人们都在这样说（拿破仑眞是把事情弄成了一种神话）。

国家政变使拿破仑获得了无限权力，为简便起见，这次政变一般都叫做雾月 18 日政变（11 月 9 日），虽然实际上这个政变是在 18 日开始的，决定性的活动是在第二天——雾月 19 日，即 1799 年 11 月 10 日。

政变进行得异常顺利，因为不仅有两个督政官（西哀耶斯和罗歇·杜科）参加了政变，第三个督政官（戈伊埃）和第四个督政官（穆兰）都被极端狡猾的、一心想在策划中的政变里谋得警务署长职务的富歇骗过去了，弄糊涂了。只剩下一个巴拉斯，他总以为没有他不行，并决定采取等待政策。在五百人院和元老院中，许多有影响的代表都感觉到有人在搞阴谋活动，甚至有些人多半已经知道了这个密谋；还有许多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却对此表示同情，认为顶多是调动一下人事。

三

各个角色是到雾月 18 日的前夜才最后分派定当的。政变于雾月 18 日早晨开始。从早晨 6 时起，拿破仑的住宅和那一条街道都布

满了将军和军官。在这一天，巴黎卫戍部队有七千人是拿破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一千五百左右士兵是特别警卫，守卫着督政府和两个立法议会——五百人院和元老院。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设想，特别警卫的士兵会手执武器，起来反抗拿破仑。但是从一开始，就把事变的真实性质掩饰起来，使五百人院中的雅各宾派即左派不可能在决定性的关头号召士兵们来“保卫共和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就进行了细致的组织工作，好象是立法议会本身要拿破仑来掌握政权似的。雾月 18 日拂晓，他召集了他特别信赖的一些将军（他的两个妹夫缪拉和勒克莱尔克，以及贝尔纳多特、麦克唐纳等）和许多他邀请的军官，并通知他们说，必须“挽救共和国”的日子到来了。将军们和军官们完全保证自己的军队不会发生问题。在拿破仑的住宅附近，军队已经排列整齐。拿破仑在等待他的朋友和代理人在早晨仓卒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要通过的法令。

元老院里大部分都是大中资产阶级的代表，因此一个忠实于拿破仑的名叫科尔涅的人在这里谈到“恐怖分子的可怕阴谋”，谈到共和国很快就会被这些兀鹰啄死，等等。他发了这样一通莫名其妙、空洞无物、没有任何具体内容、没有提到任何人的议论以后，就建议立即通过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1）元老院和五百人院（连问都没有问它）的会议从巴黎移到圣克卢（离首都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去开；2）责成拿破仑将军去镇压这个“可怕的阴谋”，并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和近郊的所有武装部队的司令。很快，这个法令既为那些知道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法令的人通过，也为那些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怎么回事的人通过。谁也不敢表示反对。这个法令马上就被送交拿破仑。

为什么拿破仑在实行政变、扼杀这两个立法议会之前，要把这两个议会移到圣克卢去呢？这就要回忆起大革命的年代。一想到这个年代，我们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那可怕的、但现在已那末遥远的时刻，那时，市郊工人和贫苦群众对任何强力，都是报以及时的起义，对驱

散人民代表的威吓，都是以这样的话来回答的："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这里是按人民的意志办事，我们只对刺刀让步"，而当主子还不敢拿起刺刀的时候，刺刀本身却已指向巴士底狱；这也使人回忆起人民群众怎样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君主制度，吉伦特党人怎样被镇压下去，人民怎样在 1795 年牧月，最后一次用枪尖挑着热月党国民公会成员的头，给吓呆了的国民公会其他成员看。……尽管拿破仑非常自信，但要在巴黎做到他决定要做的事情，总不会象在一个小地方（那里唯一的大建筑物是古代法国国王的一座市郊宫殿）那样安全。

事件正是象拿破仑希望的那样开始的：法律的架子还得留着，他根据上述法令向军队宣布，他们今后要服从他的指挥，要"随同"两院去圣克鲁。

他首先率领军队去元老院开会的地方杜伊勒里宫，包围了它，在几个副官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他从来不善于当众（不是同士兵）演说，不论是在这件事情以前，还是以后。他说了几句不大连贯的话。与会者记住了一句："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人民代表制度这一神圣原则的基础上的共和国……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共和国，我对此宣誓。"但问题已经不在演说的效果。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在革命的法国曾起过重大作用的议会上的雄辩就长期地消失了。接着，他走到街上来了。他带来的军队的先头部队，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欢迎他。接着发生了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场面。巴拉斯派来一个叫鲍托的人来见他，因为巴拉斯很担心，为什么拿破仑直到现在还不叫他去。

将军一看到鲍托，就以雷鸣般的声音对这位督政府的代表喊叫道："我为你们缔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法国，而你们把法国搞成了个什么样子？我为你们创立了和平的局面，而我回来看到的是战争！我从意大利为你们运来了百万黄金，而我回来看到的却是掠夺性的法律和贫困！我为你们取得了胜利，但我回来看到的是失败！你们

把我所熟识的十万法军、我的光荣的弟兄们弄到哪里去了？他们都牺牲了！”接着就是重复那些话，说他要建立一个以“平等、道德、公民自由和政治上的容忍”为基础的共和国。

没有经过任何波折，既没有杀一个人，也没有逮捕一个人，共和国的最高执行机关——督政府就被推翻了。西哀耶斯和罗歇·杜科自己参与了这一阴谋，戈伊埃和穆兰看到全都垮台以后，也跟着军队前往圣克卢。就剩下了巴拉斯。拿破仑派了塔列朗去“说服”巴拉斯立即发表退职声明。当巴拉斯看到拿破仑决定抛弃他以后，就立即签署了声明，并宣称，他要退出政治生活，前往自己的领地，去过宁静的乡村生活。于是在一排龙骑兵的护送下，前往自己新的住所。巴拉斯就这样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过去他一直成功地欺骗了所有的人，这次忽然他自己被骗了。

督政府就这样被推翻了。雾月 18 日晚，两个立法议会的行政人员已经到了圣克卢。这些议会也要解散，虽然被拿破仑的掷弹兵、骠骑兵和龙骑兵包围的元老院和五百人院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但他想使两个议会自己承认已无存在之必要，自行解散，把政权转交给他。以一种合法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根本不合拿破仑的脾气。但这一次，直到事件结束以前，决不能完全担保，如果从一开始就公开宣布用强力消灭宪法，士兵中间不会发生骚乱。就是说，应该和平地进行这一事情，既然这样对事情有好处，可以加速事情的进展。假如不能和平地进行的话，那时(只有那时)再采取暴力。拿破仑的三万战斗伙伴在埃及，驻扎在那个国家。曾经远征意大利的士兵，也不是全体都在。对那些不认识他而他暂时也不认识的人，是不能不防一手的。

清晨拿破仑发出了在巴黎和圣克卢之间部署军队的命令，命令立刻被执行了。巴黎的人民好奇地注视着营队的转移，看着从首都开往圣克卢的军队和车队的漫长的行列。关于市郊工人区的情况，

有人报告说，那里进行着日常的工作，没有发现任何起义的征象。在中心区，有的地方传出了“拿破仑万岁！”的呼声，但整个说来，存在着等待的情绪。18 日那天，远非所有的代表都到圣克卢去了；大部分都延到雾月 19 日才去，而且第一次会议也是规定在那一天举行。

当政变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拿破仑将军表现出他是相当担心的。当然，到雾月 18 日晚，三个最高机关中有两个已被消灭；督政府已不存在，元老院表示屈服，愿意自行消灭。但还要消灭人民代表机关，即五百人院。而在这个五百人院中，将近二百个席位是雅各宾派和被西哀耶斯解散的自由平等之友社的成员。诚然，其中有些人由于私利而准备出卖，或由于害怕而俯首屈服，但还有一些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伟大革命风暴的残存力量，对他们来说，占领巴士底狱，推翻君主制度，同叛徒进行斗争，“自由，平等，或者死亡”，都不是放空炮。这些人既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他们说，在可以用断头台处死暴君的地方，就应该用断头台处死他，在不能用断头台处死他的地方，就用布鲁都的匕首刺死他。

在雾月 18 日一整天当中，左派（雅各宾派）都在举行秘密集会。他们不知道要采取什么对策。拿破仑在这一派里面也有自己的密探。这些密探尽力混淆他们的视听，一个劲儿地说现在拿破仑不是在想办法来反对雅各宾派，只是想办法来克服保王党的危险。雅各宾派听了以后，将信将疑，等到雾月 19 日晨，在圣克卢宫开会时，才开始张皇失措起来。但其中有些人的愤怒也越来越不能抑制了。

19 日晨，拿破仑将军乘一辆敞篷马车，由骑兵队保护着，从巴黎来到了圣克卢。他的亲信也随同前来。

当他来到圣克卢的时候，他得知，五百人院的代表中间有许多人已经公开表示，对这样多的军队包围了宫殿，感到非常不满，同时也很气愤，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突然地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会议从巴

黎移到圣克卢“村”(人们这样称呼这个小地方)来，并公开声明，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拿破仑的阴谋。有人向他报告说，他们说他是罪犯、独裁者，而讲得最多的是强盗。拿破仑大吃一惊，他巡视了军队，还很满意。

下午一时，在圣克卢宫，在两个会议厅分别举行了两院的会议。拿破仑及其亲信在旁边的大厅里等候两院通过必要的关于委托拿破仑制定新宪法的指令，然后自行解散。但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就连元老院也都没有做出决定，而是开始慌乱起来，迟缓地胆怯地表示要对策划中的非法行为进行反抗。11 月的一个黄昏降临了。拿破仑必须下决心马上采取行动，不然他所策划的整个活动就要破产。下午四时，他忽然闯入元老院大厅。在可怕的沉寂中，他发表了一个比头一天晚上还要模糊而紊乱的演说。大意是说，他要求赶快决定，他是来帮助他们摆脱危险的，有人“诽谤他，把他当成了恺撒和克伦威尔”，相反地，他是想要挽救自由，政府现在已不存在。“我不是阴谋家，这你们是知道的；假如我背信弃义的话，那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布鲁都来惩办我！”总之，假如他侵害共和国，他就请他们把他处死。人们开始回答他，把他说话的声音都淹没了。他接着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并提到他掌握着军队，随即离开元老院大厅，但这也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就是说，没有通过关于把政权转交给他的法令。事情有些不妙。下一步就更加难办：要跟五百人院去解释，在这一院的雅各宾派中，就更容易找到布鲁都的后辈。

有几个掷弹兵跟随着拿破仑。但假如人们对拿破仑进行群众性的攻击的话，这几个士兵就太少了，况且这种攻击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还有奥热罗将军也跟在他的后面；奥热罗在征服意大利期间曾在他的领导下作过战。在进入大厅以前，拿破仑回转身来对他说道：“奥热罗，你还记得阿尔科拉战役吗？”拿破仑记起了他在奥军枪林弹雨下，打着旗帜去占领阿尔科拉桥的可怕时刻。实际上将要发生的也

是类似的情景。他打开了门，出现在门槛上。迎接他的是愤怒的、不可遏止的喊声："打倒强盗！打倒暴君！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立即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一群代表向他涌来，若干只手臂向他伸过来，有人拉住了他的衣领，也有人想要扼住他的咽喉。有一个代表用尽全力揍了他肩膀一拳。个子很矮、当时还很瘦削、从来没有多大气力、神经质的、象犯羊癎疯那样容易动气的拿破仑，几乎被愤怒的代表们打个半死。有几个掷弹兵赶忙把被打得够受的拿破仑围了起来，把他领出大厅。激愤的代表们回到座位上去，愤怒地喊着要求通过一项建议，宣布拿破仑将军不受法律保护。

在这一天，五百人院会议是由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主持的。他也是参与这个阴谋的。这个情况大大有助于事情的成功：拿破仑在经历了大厅的可怕的一幕、清醒过来以后，决定用公开的暴力，毫不踌躇地解散五百人院，但事先他得把自己的弟弟从五百人院中叫出来。他沒有费多大力气就做到了这一点。当吕西安·波拿巴已经同他并排站着的时候，他就向吕西安·波拿巴建议，要他（吕西安）以主席的身分向列队以待的军队宣布，说他们的司令的生命危在旦夕，并请他们把"会议的大部分代表"从"一小撮狂妄之徒的手里解放出来"。如果说以前上兵们对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现在连最后一点怀疑也都消失了。鼓声大作，缪拉率领的掷弹兵跑步入宫。

据目击者说，当鼓声很快逼近会议厅的时候，有些代表号召进行反抗，宁死不屈。门打开了，掷弹兵持枪冲入大厅；他们在大厅里继续跑步前进，向着不同的方向，很快就清洗了大厅。一直沒有停息的鼓声掩盖了一切，代表们四面逃散。他们从门口逃走，有许多人打开或打碎窗子，从窗子跳到院子里去。整个过程继续了三、五分钟。当时有命令不许杀死和逮捕代表。从门口逃走和从窗子跳出的五百人院代表被从四面八方逼向宫殿的军队包围起来。缪拉的雷鸣般的喊

声把鼓声掩盖了几秒钟；他命令自己的龙骑兵:“把这些人都给我赶走!”这个声音不仅是在这几分钟内,在他们的耳里响着,而且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中有许多人一生都没有忘记。

拿破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也许是他的弟弟吕西安告诉他的。士兵们突然接到命令,要赶快抓住几个逃跑的代表,把他们带到宫里来,然后决定由这些被抓来的人组成“五百人院会议”,命令他们通过关于成立执政府的法令。这几个胆战心惊、沉默不言的代表,有的是在路上,有的是在车店里被抓住的;他们都被带进宫来,立即完成了拿破仑所要求的一切，最后表决通过了解散五百人院的法令,接着就被和平地释放。

晚上，在圣克卢宫一个灯光暗淡的大厅里，元老院也未加讨论地发布了一个指令,把共和国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三个叫做执政的人。这三个职务委托拿破仑、西哀耶斯和罗歇·杜科来担任,因为拿破仑认为这时在形式上成为单一的主宰是不适宜的,但实际上,他的执政是最完全的独裁,这他早就决定了。同时他也知道,他的两个同僚将不会起任何作用,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不算聪明的罗歇·杜科这时就已看到了这一点，而深谋远虑的西哀耶斯这时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快就意识到了。

法国已被踩在拿破仑的脚下。在夜晚两点钟，三位新执政宣誓忠于共和国。深夜，拿破仑离开了圣克卢。布尔里埃纳也随他乘车离去。拿破仑显得很阴沉,一直到了巴黎,他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第五章　独裁者的第一步

(1799—1800 年)

一

从雾月 19 日晚上缪拉在圣克卢向拿破仑报告说，五百人院已经肃清，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起，拿破仑将军就在相继的十五年中间，成了法国人民的专制的主宰。至于在这时期的头五年，拿破仑自称第一执政，后十年叫做皇帝，法国本身起初叫做共和国，后来又叫帝国，这实质上既不会改变新政权的阶级基础，也不会改变拿破仑军事独裁的性质。这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资产阶级为了追求财富，把法国引上了灭亡的边缘。它意识到了这一点，显得张皇失措，“对自己政治上的能力失去信心”，然后得出了唯一的结论，就是只有消灭革命民主主义，只有在巩固的即使是残暴的政权保护下(甚至那是可怕的打手拿破仑的政权，但却是坚定的牢不可破的政权)，资产阶级社会才会毫无阻碍地发展下去，保证私人资本的自由流转。

拿破仑掌握了未来的国家的这些原则。为了确立这些原则，他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才华，首先和主要地是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专制主宰。他取消了、建立了、改变了国家机关，但是国家机关的意义和目的还是完全未变：它们应该把国家机器变成实现统一的最高意志的工具。

拿破仑采取一切政治措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包括外交手段，善于在适当时机进行妥协，签订停战协定，能够等待和忍耐。这些才能后来逐渐丧失了，但在他统治初期，他是具备这些才能的。

“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拿破仑这样说过。

最能适应专制君主制度的集中制的国家政权机器，正是在执政府时期由拿破仑建立起来的。这个机器，从拿破仑直到现在(巴黎公社除外）的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不但不想取消，甚至不想改变它的形式。

不仅是第一执政的行政改革一直使(现在继续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感到振奋，而且由于创造了一些条件，能够平平稳稳地经营工商业赚钱，总之，由于他把大资产阶级的全部目的系统化、明确化、并付诸实施(大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才拚命摧毁和扼杀 1789 年及随后几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这也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感到十分兴奋。

拿破仑作为资产阶级实行经济统治的国家上层建筑外表形式的“设计者”的作用，正是在执政府时期充分表现出来的，这使他不仅在他统治的初期，而且在后来那些反映这个胜利了的阶级的观点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心目中，也享有极高的声望。

这样，直到目前为止，除打仗以外从未作过任何事情的三十岁的将军，意大利的征服者，埃及的征服者，一下子就推翻了合法的共和国政府，于雾月 19 日晚上成了欧洲一个最大国家的统治者。实质上，他在当时还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而且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它。即使只从克洛维斯王朝算起，这个国家也已有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这一千五百年的王国被革命摧毁，这个革命一下子就把封建制度和与它联系着的君主制度推翻了，接着开始了共和国的统治。而现在，他这位科西嘉贵族，共和国的将军，又推翻了共和制度，成了专制统治者。他面前摆着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无数问题，革命揭示了大批新材料，有许多事情开始了而没有结束，开始了而被中断，开始了而又收回；一

切都陷入混乱之中。

在对外事务方面，第一执政也碰到了极其复杂和危险的局面。在他远征埃及期间，第二次欧洲联盟从法军手里夺去了意大利。苏沃洛夫的远征消灭了拿破仑在 1796—1797 年间取得的胜利果实。确实，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和可能，象过去预计的那样，去进犯法国，但联盟根本没有放下武器，到了春天，敌人就会逼近法国边境。国库里没有钱；有好多军队好几个月没有得到薪饷。一些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带着好奇和嘲笑的神情观望着，看这位除了带兵以外直到现在什么都未做过、什么都不懂得的年轻的科西嘉人，怎样摆脱这种极端复杂、混乱而又危险的处境。

二

拿破仑首先组织新政权，即建立专制制度。看看他最初接触象西哀耶斯这样的想扮演首要角色、想在没有经验的年青人当政时期充当幕后人的老政治家的情景，是很可笑的。当时拿破仑就认为此时法国的职业政治家是过时了的空谈家，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憎恨和害怕雅各宾派，从不提起罗伯斯比尔(不论是大罗伯斯比尔，还是小罗伯斯比尔。我们知道，拿破仑同这两人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但很明显，他早就很清楚杀害了罗伯斯比尔并且代替了他的位置的那些人的身价。热月党投机商和贪污分子用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肮脏的勾当，这使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西哀耶斯受拿破仑的委托，拟定新宪法草案，他费尽心机去琢磨杜撰出来的很巧妙地拼凑起来的宪法条款，而忘记了大多数城乡资产阶级现在要求的是巩固的警察制度，把直接与工商业自由有关的权利固定下来；有产农民要求的是充分相信自己新占有的土地是很稳固的。出乎起草人的意料之外，拿破仑认为西哀耶斯的这个草案

荒唐可笑，并发出原则指示，作了“修改”。

新宪法是在政变后一个月才制定出来的。领导共和国的是三个执政，第一执政享有全权，其余两个有发言权。议会由执政任命，议会又从人民选出的几千名候选人中任命立法院和法案评议委员会的成员。

新宪法(这是最初就约许的)要进行全民投票。但拿破仑突然宣布，宪法从现在起，在全民投票以前，就发生效力。当然是拿破仑被“任命”为第一执政。

雪月 4 日(1799年 12 月 25 日)举行全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和以拿破仑为首的三执政。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票赞成，一千五百六十二票反对。军队也参加了投票，同时有的地方是以团为单位举行投票，士兵们齐声回答指挥官的问题。城乡的投票是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同时，有产者农民、大部分城市资产阶级，据当时人证明，甚至城市里有不少工人当时都是站在第一执政这方面的，他们认为他是葡月 13 日把共和国从保王党手里解救出来的人，他能够击退还在威胁着法国的英国、奥国和俄国的可能的进犯。

全部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里。所有其他机关形同虚设，从来没有发生作用而且也不想发生任何作用。西哀耶斯感到困惑和气愤。但拿破仑给他的薪俸很高，永远也不要他发挥任何积极作用。他需要的是仆从和执行者，而不是顾问和立法者。

很快就显示出，他也不需要批评者。颁布执政宪法以后不久，拿破仑就发布一项决定(雪月 27 日)，命令从当时的七十三种报纸中封闭六十种，其余十三种暂时续办的报纸(再过一段时间，又封闭了九种，只剩四种)要受警务大臣的严密监督。拿破仑本能地不能容忍甚至稍微类似出版自由的东西。初期的这些措施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拿破仑对自己政权的看法。他觉得，他的绝对权力只是掷弹兵于 1799 年雾月的日子里给予他的。把一切只归功于自己的掷弹兵即他自己，把

一切建立在占领的权利上，这不仅是拿破仑的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处事态度。“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正确”(Les gros bataillons ont toujours raison)。——这是拿破仑最喜欢的成语之一。强大的军队于雾月18日和19日为他赢得了法国，正象他们以前在他的指挥下占领了意大利和埃及，后来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一样，根据他的说法，谁也不能要他加以说明，或者要求分掌政权。西哀耶斯带着失望的心情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雾月18日阴谋的其余参加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随后所有的人也都认识到了。

诗人歌德关于拿破仑说得很对：权力对拿破仑来说，正象乐器对伟大的演员一样。他刚刚掌握了这个乐器，就立即运用它。他首先是要停止法国西部的内战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消灭南部和北部日益猖獗的匪患。他很着急，因为在春季以前，要把最紧急的事情做完(如上述两项工作)，因为春季要恢复战争。

三

在督政府末期，使法国南部和中部的所有道路无法通行的强盗集团，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路上拦劫马车，常常杀害乘客，公开袭击乡村，接连几小时用火刑拷问被捉住的人(所以当时把这帮匪徒叫做“烤人者”)，要他们供出钱藏在什么地方，有时也去袭击城市。这些匪徒用波旁的旗帜来掩护自己；似乎是为被推翻的王朝和天主教会复仇。的确，有很多直接受到革命打击的人也参加这些匪帮。有一种传说(一直沒有得到证实，但是似乎是十分眞实的)，说有些匪帮首领把一部分掠夺来的东西送给了保王党的代理人。总之，督政府统治末期，警察制度的瓦解和混乱使这些匪徒几乎是无法无天，他们的行动也沒有受到惩处。第一执政首先决定肃清这批匪帮。他用了半年的时间，肃清了盗匪的活动，但那些

匪徒首领，在他统治的头几个月就被击溃了。

措施是很残酷的。不抓俘虏，而是就地正法，窝藏盗匪或者购买赃物的人，或者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要处死，这就是主要的命令。拿破仑派出了一些军队，这些军队不仅毫不留情地镇压了直接的罪犯及其帮凶，而且镇压了那些对罪犯姑息纵容或者不采取强硬措施的警官。

这里又反映了拿破仑的一个特点：对罪犯毫不留情。在他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一种罪过都是犯罪行为，他不采取、也不想采取任何宽恕措施。可以说，他根本否认仁慈，认为仁慈对统治者来说是个直接有害的不能容许的性格。有一次，在 1806 年被他任命为荷兰国王的他的弟弟路易要在他面前夸耀一下，说他在荷兰很受人们的爱戴，结果这个哥哥就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我的兄弟，当人们说一个国王仁慈的时候，就说明统治没有成功（quand on dit d'un roi qu'il est bon，le règne est manqué）。

1811 年 4 月，有一份报纸（《法兰西报》）忽然热情有余地用一种娓娓动听的激动人心的口吻谈到皇帝的"仁慈"，说他由于生了一位继承人，高兴地满足了一位请求者的要求。结果拿破仑大发脾气，马上就给警务大臣写信说："罗维戈伯爵先生，是谁允许《法兰西报》今天发表这样荒唐的有关我本人的文章？"，并命令马上把编辑撤职，因为"这个人做的蠢事太多"。"撤除他的报纸编辑职务！"看来，假如是散布一种相反的议论，说他是野兽，那还会比给他加上仁慈这个不白之冤好些，还可以得到宽恕。这一切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显露出来的，但残暴地大批镇压强盗这一事实就表明，与有名的格言相反，这位新统治者是宁肯错杀一百，也不让一人漏网的。

拿破仑在肃清法国的强盗集团的同时，对旺代也给予了极大的注意。

在这里，象从前一样，贵族和僧侣（由于该省及毗邻的诺曼底南

部所具有的许多独特的经济原因)还能够吸引一部分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用英国人从海上供给他们的最好的武器武装他们，利用森林和沼泽地带，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来反对一切革命政府。拿破仑对旺代人和舒安人(民间这样称呼这些暴徒)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于对上述匪帮所采取的策略的。正是在雾月 18 日政变以前，舒安人在与共和国军队战斗中，节节取得胜利，拿下了南特城，大声叫嚷波旁王朝即将复辟。拿破仑一方面加强进攻舒安人的军队，一方面答应对立即放下武器的人实行特赦，并表示对天主教礼拜不加迫害，最后，表示希望同舒安人的著名的领袖乔治·卡杜达尔会面和举行谈判，并答应不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保证他在巴黎停留期间的绝对人身安全并保证自由回去。

这样，这个狂热的、高大的、刚健有力的布列塔尼的农民，就同矮小的、当时还很消瘦的拿破仑单独会面了。这次会见持续了几小时。为拿破仑的生命提心吊胆的副官们都挤在旁边的屋子里：谁都知道，卡杜达尔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做出任何牺牲，他早就以为自己注定要死的。

他为什么没有打死拿破仑呢？只是因为他当时还有一个幻觉(这个幻觉后来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幻觉在拿破仑上台初期，使保王党的认识模糊起来。他们都以为，年轻的著名的统帅将要起蒙克将军于 1660 年在英国所起的作用：帮助被赶走的斯图亚王朝复辟，消灭共和国。当然，拿破仑确实消灭了共和国，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说，是为君主制度开辟了道路，但要是以为象拿破仑这样的人，会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另外一个人（即使抛开这样做的可能性问题不谈），那简直就再也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荒唐的了。

卡杜达尔没有弄死拿破仑，但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还是没有跟他协调一致。第一执政提议给他一个将军头衔，加入军队，目的当然是为了只同外国军队作战。卡杜达尔表示拒绝，返回旺代。舒

安人的另一个重要首领弗罗泰被俘，并被枪决。早在 1800 年 1 月就被政府军队击败的卡杜达尔，现在在同拿破仑会见以后，还是继续作战，但他不得不长期隐蔽，只是对小批的偶然被击败的士兵进行突然袭击。政府军队的胜利，答应实行特赦，反教会政策的缓和以及刚刚提到的波旁王朝及其追随者对拿破仑的期待，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舒安人的战斗和士气。卡杜达尔看到，他的队伍越来越少。在旺代，传布着一种观望的情绪，以及支持和争取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元首为保王党服务的倾向。拿破仑暂时没有更多的要求：他在这头几个月，即 1799 年 11 月 12 月和 1800 年上半年，只是要推行最迫切的措施，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将开始的春季战争。

他处理了一个迫切任务，接着就去处理另一个迫切任务：肃清了土匪，接着就是旺代事件，旺代事件完了就是财政问题，因为他准备用于进行春季战争的大批军队，要吃、要穿、要武装，而国库又根本没有钱（真正的铸造的货币），督政府统治的结果，就是国库分文莫名。拿破仑需要一个专家，一个优秀的专家，而且立即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专家：这就是戈丹。拿破仑任命他为财务大臣。

当然，在拿破仑统治初期，在财政方面所采取的方针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军事独裁者和他的意志的执行者戈丹都决定重点不是直接税，而是间接税。拿破仑认为，这种间接税，归根结底，不论从富有的还是从贫穷的消费者那里都征收同样的税额，由于它是自动征收的，所以方便易行，纳税人跟收税人和政府就不会发生争吵，这是由于在购买消费品的时候，尽管税额很高，但是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收税人。

城乡资产阶级对财政政策的新方针是表示满意的；他们对其他许多财政措施也是满意的：实行监督，整顿会计制度，对营私舞弊和贪污行为从严惩处。当时贪污分子非常之多，以至史学家有时都想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一个特殊“阶层”划分出来。

有些投机分子和贪污分子很快就感觉到了新统治者的厉害。他把当时有名的供应商和营私舞弊分子乌弗拉尔送入牢狱，接着开始惩办其他一些人，命令最严格地检查帐目，扣押他认为没有必要支付的款项。他有几次曾经采取这种办法，当他确信一个财务人员有舞弊行为时，不管他是否已经很巧妙地销赃灭迹，都要把他送入监狱，直到他退出这份赃物，才把他放出来。虽然如此，侵吞公款的行为仍未绝迹。

四

拿破仑大力进行国家管理的组织工作。他把法国分成若干省，但马上就清除了一切地方自治的痕迹。城乡一切选举的职务，甚至于选举的会议，都撤销了。从现在起，每个省都由内务大臣任命一个地方长官，他是地方的主宰、统治者和地方上的小皇帝。地方长官再任命地方委员会以及城市长官(市长)和公社(乡村)的长官。这些官员对地方长官负责，他可以撤除他们的职务。地方长官有一个纯粹议事机关——“总议事会”，它完全服从地方长官，其使命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向地方长官介绍省的要求。内务大臣管理国家的全部行政生活；他主管的部门包括商业、工业、社会工作，以及后来被拿破仑逐渐并入其他各部的很多工作。

对司法工作也进行了大力的改革：3月中旬，拿破仑还签署了一项法令——关于建立司法部的法令。他改组了法院，后来又废除了陪审制度：他的专制制度按其本质说来，不能容许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有不按他的意志办事的社会人士参加。但他并不是马上废除这个制度的。

当问题牵涉到消灭政敌的时候，拿破仑从来都没有受任何关于司法权独立和遵守法律程序等想法的束缚。但在其余的情形下，当

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进行民事诉讼或一个人被控告为刑事犯而不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拿破仑就要求法庭不带政治偏见去审理案件。当拿破仑任命的第一批法官来谒见他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任何时候，当有人交由你们裁判的时候，不要管他是属于哪一个党派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把防止国内敌人破坏他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切保卫工作，交与一个特别的部去进行，这个部与内务部毫无关系，而是象其他所有直接从属于第一执政的独立的部一样。这是警务部。这个部不论从权力还是从经费方面来看，都是督政府时代所从未有过的。

拿破仑非常重视建立首都警察总部的工作。巴黎警察总监虽然服从警务大臣，但他与其他官员完全不同，他直接隶属于第一执政。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第一执政是要把巴黎警察总监变成一个实行监察的谍报机关，用以监视当时权力就已过分强大的警务大臣的行动。

拿破仑故意把政治警察分成几个部分，尽力掌握不是一支而是两支、甚至三支警察部队，要他们不仅监视公民，而且相互监视。他所任命的警务大臣富歇是个非常狡猾的间谍、蛊惑家、阴谋家，总之，是个密探专家。但拿破仑也看到，富歇不仅会出卖他，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有适当的价钱，也是会出卖的。为了自己的安全，第一执政就委派了一些可靠的间谍，给他们规定了任务：监视富歇本身。为了准确知道富歇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被监视以及怎样力图收买这些监视他的间谍，拿破仑还有第三批间谍，其使命就是监视那些监视富歇的特务。

拿破仑一直认为，富歇是个感觉迟钝的人，他根本丧失了能为一种什么事情感到愤激的能力。许多年过去了。拿破仑早就成了皇帝，而富歇身上佩戴的勋章和镶着金边的警务大臣的礼服也耀人眼目；有一次，拿破仑因为一件什么事而感到气愤，想要刺激他一下，并表明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大臣的全部经历。他突然对他说道："你不

是也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吗？”“完全正确！”——富歇象往常一样，一面深深鞠躬，一面这样答道，并说：“这是我给陛下建立的第一个功勋。”这是一种有着深远意味的对话：富歇提醒皇帝，他们两人的地位都是从革命中得来的，虽然这种地位是建立在：一个是占据了路易十六空出来的王位以后，就扼杀了革命；另一个是竭力帮助他做到这一步。现在，在 1799 年，拿破仑特别需要富歇，因为后者非常熟悉他所背叛的和被他出卖给新主子的那些同僚。

拿破仑在其统治的第一个冬天，就建立了在一切方面都经过周密考虑的、由巴黎的上层官僚管理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建立一个专制政权，把权力集中在第一执政手里，这就是新“宪法”的主要目的。

拿破仑曾说过：“对，要写得简短，含糊”。他的这句话说明了他的总的原则：当牵涉到用宪法的形式来限制最高权力的时候，就要写得简短些，含糊些。如果说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独裁者，根本不容许对自己的权力进行任何即使是轻微的但却是实际的限制的话，那末这个独裁者，就是拿破仑。

雾月 18 日以前一直支持拿破仑的人们（特别是西哀耶斯）的那种天真的错觉，在政变以后的最初几天，就象烟雾一样地完全消失了。西哀耶斯向拿破仑提出了一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他拿破仑应当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就象后来的共和国的总统），享有最高的荣誉，并有最高的收入，但进行统治的是另一批只是由他任命，而不依附于他的人，这时，拿破仑就说：“我永远也不要扮演这种可笑的角色”，并断然地否决了西哀耶斯的草案。西哀耶斯本来打算坚持、争辩。这时，警务大臣富歇来看他，友好而秘密地提醒他注意，拿破仑掌握着全国武装力量，因此同他过分争执，对争执的人不会带来很大好处，而且会恰恰相反。显然，这个论点使西哀耶斯十分信服，于是他默不作声了。

“共和国第八年宪法”（这是在拿破仑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法国国家体制的名称）最符合拿破仑的原则。全部权力都掌握在第一执政的手里，其余两个执政只有发言权。拿破仑被任命为第一执政，任期十年。第一执政任命议院，议院由八十名代表组成。他还任命所有文武百官，从大臣开始，所有这些官员都只对他负责。还建立两个构成立法机关的机构：1)法案评议委员会和2)立法院。两个机关的成员由议院（也就是由第一执政）从选民经过最复杂的选举手续“选出”的几千候选人中任命。显然，如果人民提出的几千候选人中，只有四百人站在政府一边，那末就是这四百人去占有法案评议委员会和立法院的位置。在这样的选举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这种人有可能进行独立活动。但是不仅如此。除了这些机关以外，还建立了一个完全由第一执政的政府直接任命的国务院。

立法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政府把法律草案提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加以修改，再提交给法案评议委员会。法案评议委员会有权对这个草案发表意见，但没有权利做出任何决定。法案评议委员会就草案进行了讨论之后，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接着就把草案提交立法院。立法院则相反地没有权利讨论草案，但有权做出决定，然后由第一执政批准，成为法律。这种故意编造出来的荒唐的“立法”程序，在拿破仑全部统治时期，当然是他的意志的无言的执行者。后来（1807年），他由于完全不需要而撤消了法案评议委员会。无需说明，这些机关的活动是应当（而且做到了）绝对保密的。为了加速事务的进行，第一执政可以直接向议会提出法律草案，由议会以“议会和执政”的名义发布所需要的法律。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这样，全部实际的立法权力，也象全部执行权力一样，都集中在拿破仑的手里。

这样，新独裁者于1800年春季，就已完成了最迫切的任务：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肃清了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量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匪徒，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是匆忙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缓和旺代的

局势，实行中央集权制，采取了第一批最迫切的措施来严惩投机行为。富歇指挥下的庞大的经过周密布置的警察密探网迅速笼罩了全国。

约瑟夫·富歇是个天生的密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古代罗马有句俗话："演说家是后天的，而诗人是先天的。"富歇是挑拨陷害和密探系统的"发明人"，后来有些门徒和模仿者，如那不勒斯的德里卡列托之流、俄国的宾津道尔弗和杜贝尔特之流、奥国的谢里尼茨基之流等，都曾竭力仿效过。拿破仑为富歇的这种发明创造提供了广阔的机会，不过只是由于了解到他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和两面三刀的天性，象前面所说的那样，为了以防万一，又派了一批警务大臣富歇所不知道的密探，来监视富歇本身的行动。拿破仑知道得很清楚，他春季出发去远征，必须有一个政治上巩固的后方，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新的"第八年宪法"就沒有任何意义，而警务部却有重大意义。因此拿破仑不但给警察部门以大批的经费，不但尽力使他刚刚在巴黎和外省建立的行政管理部门更加完备，提供必要的有才干的有本事的人，而且还要严格控制第一执政一下子就封闭了六十家报纸以后还继续存在的十三家报纸。在出征以前，拿破仑给大臣们留下了他所建立的专制机构，并要求他们在他同欧洲各国的联盟作战期间，保持秩序。

但早在拿破仑出发以前一个月，即 1800 年 4 月，富歇就发现了并向第一执政提供了巴黎有英国和保王党的奸细的铁证；这些奸细同亡命国外的波旁王室的两个亲王、革命时期被处死的路易十六的两个亲兄弟有着直接联系。这就是普罗旺斯伯爵路易和阿图瓦伯爵查理。保王党人完全公开地指望，利用英国人和其他干涉者的援助来夺取政权。英国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法国保王党身上，因为保王党人只要能够使波旁王朝复辟，就准备做出一切有利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这一点拿破仑从 1800 年 1 月起就很清楚，当时他曾建议进行和平谈判，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则正

式公开提议……在法国恢复波旁王朝。

第一执政完全肯定，国内斗争一个最严重的任务是无情地镇压背叛祖国的保王党徒，而国外斗争最主要的任务是同英国进行顽强的战争。对富歇发出了同积极活动的保王党徒做斗争的相应命令：紧紧盯住他们，逮捕他们，对他们进行法律制裁。拿破仑常常重复一句可以反映他的牢固想法的话，就是说：有两个杠杆可以推动人们前进，一个是恐惧，一个是个人利益。“他所了解的”利益不仅是指钱，而且是指虚荣心、自尊心、权势观念。怎样对付保王党呢？可以明显看出，拿破仑对这类敌人，在不同的时期，是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的：有时候采取恐怖手段，有时候又以小恩小惠、职位、金钱来吸引他们。

现在，1800 年春季，因为忙于准备远征，他就没有时间采取任何其他办法来对付叛徒，只有对他们实行无情的恐怖。

另一个主要任务——同英国作战，也应当象以前那样，不与强大的英国海军在英国海岸一决雌雄，而应该在欧洲大陆进攻英国的盟国，首先是奥地利帝国。

1800 年 5 月 8 日，拿破仑在实行政变以后第一次离开巴黎去进行战争的时候，自己非常清楚，他在法国的专政的未来命运完全取决于正要开始的战争的结局。或者是他再次从奥军手里拿下意大利北部，或者是干涉者联盟再次出现在法国边境。

第六章　马伦哥战役。独裁制度的巩固。第一执政的立法

(1800—1803 年)

一

拿破仑往往事先不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他只是规定主要的“目标”，几个主要的具体的目的，他要遵行的日程(当然是大致的)，要经过的路程。在进军当中，他每天，有时甚至是每小时，不仅根据自己已经规定的目标，而且根据情况，特别是不断收到的有关敌人动向的情报，改变自己的作战部署，只是在这样的时候，他才把全副精力用来研究作战问题。他有一个一直遵循的规则，就是在没有实际较量以前，决不认为敌人比自己愚蠢；预计敌人采取的措施决不比自己在同样的条件下采取的措施相形见拙。

他面临着一支强大的供应充足的奥地利军队。这支军队占领了意大利北部。苏沃洛夫在去年把法军从那里赶了出去。但这一次，苏沃洛夫没有同奥军在一起，拿破仑非常重视这一点。他知道，俄国这一次没有参加联盟；虽然还不可能知道，正是在 1800 年这一个月（5 月），当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开往意大利去消灭苏沃洛夫的胜利果实的时候，彼得堡涅瓦河上的亚历山大修道院正在举行苏沃洛夫的葬礼。他面临的敌人不是苏沃洛夫，只不过是梅拉斯。这是一位正规的将军，司令部的参谋，是在 1800 年前后被拿破仑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些正规将军中的一个；这些将军总是痛苦地证明，拿破仑打仗全然不按规则办事。这一次，拿破仑根据自己的原则，作战时把梅拉斯当做拿破仑来设想，而梅拉斯作战时则把拿破仑当做梅拉斯

来设想。

奥军集中在意大利北方战场的南部，朝着热那亚那一个方向。梅拉斯认为拿破仑不可能从瑞士经过圣伯尔纳峡谷这条险峻的道路进军，因而没有在那里部署重兵设防。然而第一执政却正是选择了这一条路。雪山的酷寒，脚下的万丈深渊，雪崩，暴风雪，雪中宿营，这一切，拿破仑的士兵们于 1800 年在阿尔卑斯山就已经领略过了，正象苏沃洛夫的士兵于 1799 年在同一个地方，以及在苏沃洛夫与拿破仑之前二千年的汉尼巴的战士都已经领略过了一样。不过，现在陷入深渊的已经不是大象，像汉尼巴作战时期那样，而是大炮、炮架和弹药箱。走在前面的，是拉纳将军和先头部队；跟在他后面的，在悬崖峭壁之间展开漫长的行列的，是拿破仑的全军。5 月 16 日，开始攀登阿尔卑斯山；5 月 21 日，拿破仑带领主力到了圣伯尔纳峡谷，前面，在通向意大利的山麓地带，法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同驻在该地的弱小的奥军掩护部队开始交火。奥军被击溃，法军更快地伸向南部。到 5 月末，拿破仑的全军一个师跟着一个师地离开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峡谷，突然出现在奥军后方。

拿破仑抓紧每一小时时间，直奔米兰。1800 年 6 月 2 日，就进入伦巴第的这个首府；然后又立即占领了帕维亚、克雷莫纳、皮阿琴察、布里西亚等许多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击败了根本没有料到会从这个方面实行主攻的奥军。梅拉斯的军队在包围热那亚；几天以后它从法军手里拿下了这个城市。但拿破仑在伦巴第的出现，使奥军在热那亚的这一胜利变成毫无意义。

梅拉斯急忙去迎击从北部突然袭来的法军。亚历山大城和托尔托纳之间是一片大平原；这个平原中间有一个小村庄叫马伦哥。早在 1800 年初，当拿破仑在巴黎宫里研究意大利北部的详细地图的时候，他就用手指指着地图上的这个地方，对自己的将军们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击溃奥军。"1800 年 6 月 14 日，双方主力正是在这个地方

相遇。

这个战役在国际政治上，特别是在拿破仑的经历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巴黎和整个法国都感到不安。保王党人每天都在盼望拿破仑会葬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深渊里；人们都知道奥军非常强大，它的炮兵要比法国厉害。传说英军很快就要在旺代登陆。舒安人的首领卡杜达尔及其一伙不仅认为波旁王朝的复辟已经肯定无疑，而且很快就会实现。只是在等待一个信号：拿破仑阵亡或法军战败的消息。就是保持中立的欧洲，也在密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那里也在期待着奥军战胜的消息，以便加入反法联盟。波旁王室准备前往巴黎。

拿破仑及其将军、军官和士兵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和遭到失败的可能性：这一次，奥军人数要多得多；当拿破仑在进行越过圣伯尔纳峡谷的艰苦行军的时候，他们就在意大利的城市和乡村以逸待劳。拿破仑身边一共只有二万人，他在5月间带着越过大圣伯尔纳峡谷的炮兵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因为大部分炮兵已用于包围和进攻奥军山地守卫部队，这一部分炮兵现在还在路上。而梅拉斯的军队有三万士兵和弹药充足的强大炮兵（约有一百门大炮）。即使只有这样少的炮兵，拿破仑还把其中一部分给了德塞将军，这样一来，他就大约只有十五门炮来对付奥军的一百门大炮。

1800年6月14日晨，在离马伦哥不远的地方揭开了战幕。奥军从开头几小时起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威力：法军边战边退，虽然给了敌人重大的打击，但自己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下午二时左右，战斗看来已经完全失败。下午三时以后，欢喜若狂的梅拉斯派了一个信使前往维也纳，报告奥军已获全胜，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已被击溃，以及战利品和俘虏的数目。法军总部陷入混乱。拿破仑还很镇静，一再强调必须坚持，战斗尚未结束。在四点刚过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德塞将军的师已经赶到；这个师是被派往南方去切

断敌人从热那亚撤退的后路的，现在用最快的速度，在紧要关头赶到战场，给奥军以打击。

奥军十分确信自己会获全胜，所以在这个时候，整批整批的军队去休息和用午饭。在从天而降的德塞师的打击下（接着拿破仑全军也蜂拥而上），奥军被完全击败。到五点的时候，奥军就在法军骑兵的追击下，狼狈溃逃。德塞本人在攻击开始时被击毙，拿破仑在这一战斗、平生最大的凯旋之一的晚上，含泪说道："如果今天能够拥抱德塞，这一天该有多好呵！"在此之前几小时，当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有人通知他，德塞被打死，从马上掉了下来，当时他说："我为什么哭不出呢？……"

拿破仑的战友只看见他在战斗结束以后掉过两次眼泪。第二次是在若干年以后，当拉纳元帅被炸断了两腿而在他的手上死去的时候。

正当维也纳宫廷收到梅拉斯的第一次的使人兴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紧接着第二个信使来到了维也纳，说第一个信使刚走不久就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奥军又失去了意大利，看来，这一次是永远失去了。危险的敌人看来又是不可战胜的了。

关于在意大利的这次主要战役的消息，是过了六天以后，6月20日（获月1日）才传到巴黎政府的。但消息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城市里，人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消息。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战争失败和拿破仑阵亡的消息。突然在下午一时，响起了礼炮声，一下、两下、三下：这时，一个信使带来了正式的消息：奥军被撤底粉碎，一半奥军炮兵被俘，成千的俘虏、成千的奥军士兵被杀。意大利又被拿破仑占领了。

这一次，不仅是资产阶级区，就是工人区，情绪都很高涨：圣·安杜安郊区很久以来就未曾有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当然，工人们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新主宰将用铁腕来对付他们，会实行"工人手册"，

使他们完全依附于雇主，新的统治将最终扼杀革命，并且大力地有计划地巩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法律支持资本对劳动进行无限制的剥削。

在巴黎，在交易所附近，银行出纳处附近，在大街上紧张的人群中间，人们欢腾的情绪更加热烈，因为是拿破仑这位于雾月 18、19 日扼杀了革命的人得胜了，他现在争得了完全巩固的地位，并且有可能一方面用暴力来镇压“无政府状态”和一切侵犯有产者和私有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不让贵族封建君主制度复辟。

有些最坚决的雅各宾派沉默不言；保王党人表现消沉。但由于首都和外地的高昂的兴奋情绪，这两种人暂时都不被人们注意。另外，还有一些人由于自豪而陶醉，对军事爱国主义得意忘形，许多一直比较清醒的人也患了狂热病。这一切当拿破仑回到巴黎的时候，就达到了顶点。数不清的人群去欢迎他，甚至对拿破仑表示一点冷淡，都会被群众认为有保王党的嫌疑。“那里住的是贵族？为什么这所房屋没有张灯结彩？”——群众这样喊道，并打碎房子的玻璃。数不尽的人群整天停留在杜伊勒里宫的周围，用欢呼声呼唤拿破仑。但他没有走到凉台上去。

二

马伦哥战役结束以后，拿破仑的迫切任务，第一，是争取同奥国订立有利的和约；其次，他想同英国和整个欧洲联盟媾和；第三，是继续和加强雾月政变以后就立即开始的、由于远征意大利而中断的立法工作。

但有一个问题，总是使拿破仑分心，而且在整个执政府时期，一直使他不能去解决主要任务。这就是同雅各宾派和同保王党斗争的

问题。富歇认为保王党是最严重、最直接的危险，但拿破仑当时就不太相信富歇，并且认为，富歇害怕复辟，以为自己过去的朋友雅各宾派祸害较小，因而觉得可以不必过分迫害他们，况且他们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地，在马伦哥战役以后，第一执政认为雅各宾派是更加危险的敌人。

从建立自己的专政的最初几天起，拿破仑就不得不对付来自“左面”的敌人——雅各宾派，和来自“右面”的敌人——保王党。他对这两种敌人的态度是不同的。

他对保王党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的，他公开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执政府行政部门很乐意录用有名的保王党人，并且指出，既然这些人同意为拿破仑服务，那就说明，他们应当受到宽大待遇。拿破仑对某些亡命者实行的特赦就表明，他对保王党是愿意多多谅解和宽容的。

但对雅各宾派就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对他们实际上是仇恨的、迫害的。因为他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对他来说，同罗伯斯比尔的兄弟和雅各宾派的暂时接近只不过是贪图名位的一种策略。拿破仑是天生的独裁者、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在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有意识地建立某种大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他不可能完全估计到雅各宾派过去在法国革命史上的巨大功绩，也就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革命。不仅如此，拿破仑还完全和他所支持的大资产阶级一样，老是首先指出雅各宾专政具有镇压的、强暴的性质，却闭口不谈使这种现象成为不可避免的原因以及拯救了革命法国的那些后果。拿破仑在 1812 年辱骂放火烧毁莫斯科的罗斯托普钦，把他叫做“俄国的马拉”，拿破仑不了解，把一个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同一位莫斯科的老爷、农奴主等同起来，是最愚蠢不过的；对后者来说，拯救俄国与拯救农奴制是一致的，而且只是用滑稽剧和马戏团的“戏报”以及没有必要地莫名其妙地在库图佐夫面前张皇失措，向沙皇密告

库图佐夫等来参加祖国保卫战。对拿破仑来说，如果新的一代把雅各宾专政只看成是带来各种灾难的血腥暴政，那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同时，拿破仑也很清楚，不能完全否定这个专政的历史功绩。拿破仑仇恨雅各宾派，但有一次他在谈到 1793—1794 年的雅各宾专政时曾公开指出，国民公会拯救了法国。实际上，他极其鄙视路易十六，正象他一直极其鄙视一切懦弱的表现一样。“去告诉这个女人，我不是路易十六”，——当他知道斯塔埃尔夫人在她的客厅里谈得太多的时候，这样说道。

正因为他知道，他的最坚决、最顽强、却又隐蔽起来的敌人，是还继续存在的以前的雅各宾派，因此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迫害。

实际上，对雅各宾派的迫害，从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就开始了，直到帝国崩溃都没有结束，只是有时稍见缓和罢了。

逮捕雅各宾派或与他们接近的有嫌疑的人，在首都和外省都时有发生，而外省比首都还要厉害。地方上残存的贵族，特赦回来的亡命者，当地富裕的资产阶级，农村里新的有产农民阶级，所有这些人都很了解所有过去雅各宾俱乐部各地支部的人员以及过去罗伯斯比尔时代的供职人员，于是现在就对这些仇敌进行无情的加倍的反攻倒算。由于政治警察积极进行秘密活动，从而加速了 1800 年 10 月 10 日的“暗杀”事件，就是说，在歌剧院里逮捕了四个带着匕首奔向第一执政的包厢的人，结果不仅这四个人被处死，而且全法国都大批逮捕“雅各宾派”。大部分被捕者或者一直没有返回家乡，或者过了许多年回来时已经成了残废。有些人死在狱中（当时，政治犯的“自杀”事件相当普遍），有些人死在凯恩——法国在美洲的流放地。在这次“暗杀”事件一个月以后，富歇的警察逮捕了（于 1800 年 11 月 18 日）一个准备进行爆炸的真正的雅各宾分子谢瓦利埃。全国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逮捕和流放的风潮。到处进行逮捕，尽管被捕者根本就不知道谢瓦利埃这个人以及他的计划。不仅如此，1800 年 12 月，当对第一

执政眞正进行严重暗害的时候，拿破仑也就利用这次暗害来对雅各宾派进行新的可怕的迫害，尽管这个“定时炸弹”完全是保王党搞的，与雅各宾派沒有任何关系。

只要了解拿破仑的本性和他的心理动机的人，都不会被数不尽的有关拿破仑的作品中的大量动听的言词所蒙蔽，这些作品企图把拿破仑说成是一个“半革命者”，以及什么“马上的罗伯斯比尔”——这种称号最初是敌人这样叫的，后来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那些吹捧拿破仑的人也跟着这样叫开了。但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专制者，先天的独裁者，但考虑到实际条件，在最初一个时期，由于需要，还可以容忍一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纯粹外表残余的存在。但一有可能，他就把共和国残存的一切都消灭干净，把法国完全变成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把欧洲变成绝对服从这个军事独裁国家的附庸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集合体。雅各宾派、特别是拿破仑所仇视的雅各宾派思想及其关于“兄弟共和国”、平等、自由的梦想，在拿破仑的君主专制制度中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一个时期(“奥国婚姻”)，在这个时期以后，拿破仑的这个新的专制帝国就开始迅速地吸取古代传统的君主国的一切外表特点。当然，不管是新的暴政，还是旧的暴政，都不仅绝对不会容忍英雄的雅各宾派的传统，而且也不会容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胆怯、最微不足道的回忆。

对雅各宾派进行残暴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随心所欲的迫害，是拿破仑统治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与拿破仑的看法相反，正如上面所述，富歇在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就认为，当时雅各宾派并不比希望波旁王朝复辟的保王党人更危险。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富歇的警察式的观察能力要超过他的主人。问题是，贪图王位的普罗旺斯伯爵和他的兄弟查理以及几乎所有上层的亡命者在雾月政变以后都确信，这个政变的成功和独裁制

度的确立证明，恢复君主制的时机成熟了。既然如此，那末难道法国会不要旧时历史上的王朝，而宁愿去服从一个科西嘉人吗？经过十年的混乱，革命终于被雾月 18、19 日的政变给断送了。现在只是希望，1799 年 11 月在圣克卢宫给督政府以致命打击、而在 1800 年 6 月在马伦哥战役中击溃了奥军的这个人，让笃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八（他暂时还是普罗旺斯伯爵）去继承法国祖先的王位。不知道是普罗旺斯伯爵自己决定去玩这种可笑的把戏呢，还是他的那位天资愚钝的兄弟给他提出的建议，总之，在雾月政变 3 个半月以后，进行马伦哥战役很早以前，路易从他所住的米陶给第一执政写了一封信，要求拿破仑恢复波旁王朝。如果拿破仑恢复了波旁王朝，他可以为自己和为自己的朋友要求任何奖赏——他可以得到一切！除了奖赏，还可以使“后代得到幸福”。拿破仑没有给以任何答复。他和他的夫人约瑟芬以后不断收到新的委托、建议和信件。

1800 年夏，马伦哥战役结束以后，当时已经很明显，拿破仑的意志可以使法国产生一切他认为适当的变化，这时路易又向拿破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拿破仑对这位要求者给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答复：“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我感谢你对我表示的好意。你不应该希望回到法国来：你回来是要用十万死尸作代价的。为了法国的安宁和幸福，牺牲你的利益吧！历史是会为你记上一笔的。”

当亡命者已经确信，拿破仑并不是被统治的人，而是进行统治的人，并且收到他的公开拒绝的信以后，决定杀害他。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雅各宾派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但正如上面所说，在这方面，富歇的秘密活动取得了胜利。富歇通过自己的密探得知策划中的暗害活动，并得到确切情报说，暗害将于 1800 年 10 月 10 日晚在歌剧院进行，于是当密谋者带着武器走近第一执政的包厢的时候，就逮捕了他们（塞拉奇、阿雷纳、德梅尔维里、托皮诺—勒布伦）。后来人们断定说，是富歇本人供给了他们武器。密谋者被处

死，富歇的势力更加扩大起来。他的密探大肆活动，尽力钻入一切地方，从上流社会的沙龙到最寒酸的下等饭店。

雪月 3 日(1800 年 12 月 25 日)晚上，当第一执政经过圣·尼凯斯大街去歌剧院的时候，他的马车附近发出了猛烈的爆炸声。拿破仑的马车在爆炸前十秒钟走过这个“定时炸弹”。街上全是死尸和受伤的人，炸得东倒西歪的马车总算把第一执政安然拉到了歌剧院。他走进包厢时很镇静，因此剧院里的观众只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立即开始的侦察起初毫无结果，在暗害地点，没有一个人被逮捕。拿破仑确信这一次暗害是雅各宾派干的。他责备富歇，说他只是去搞保王党，对雅各宾派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他决定肃清从左面来的反对派。他命令造一份一百三十名雅各宾派首领或被认为是这种人的名单。他们都被逮捕，大部分被流放到戈万和塞舌尔群岛，很少有人回来。外省的地方长官对于所有在革命时期对坚决镇压反动势力曾经表示同情的人，都横加摧残。现在残存的反动派要同他们算帐了。在富歇编制的这第一份名单中间，有些人不仅是被流放，而且是未经审判和侦讯，就被送去做苦工，甚至眞相大白以后，也一直没有获释。眞相是富歇弄清楚的，而且几乎恰恰是在把雅各宾派送去服苦役和流放的那些日子里弄清楚的。他最先知道，雅各宾派与这件事毫不相干；他流放他们只是为了讨好盛怒的拿破仑。

正好是在暗害事件两星期以后，对雅各宾派采取疯狂的恐怖手段的时候，一个叫卡邦的人被捕了，不久，又有一个圣雷让，后来又有布尔蒙和几十个合法地和秘密地住在巴黎的保王党人被逮捕。暗害活动的直接罪犯卡邦和圣雷让承认了罪行。一切都是保王党组织的，目的是要刺杀拿破仑，使波旁王朝复辟。这并不妨碍反雅各宾派的措施仍然有效，但决定对保王党也决不留情。这样，拿破仑就决定从一次暗杀事件中取得双重的政治利益。当后来他听说，富歇曾认为被流放的雅各宾派完全无罪的时候，拿破仑回答说：“眞的吗？

富歇！他总是这样！唉，算拉。现在我总算摆脱他们（雅各宾派）了。”直接参加暗杀活动的保王党人被处死刑，许多人象雅各宾派一样被流放。

但是，同镇压与“定时炸弹”毫不相干的雅各宾派相比，拿破仑当时对保王党的愤恨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厉害。这里，问题不仅在于拿破仑的亲信对他进行的心理观察，不仅在于他在暗害事件发生后最初几个星期已经把全部愤怒都发泄在雅各宾派身上，因而对保王党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怒火。只要认为必要，拿破仑是非常善于采取残酷手段，而且保持冷静、安详的神情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想使保王党中那些与法国新制度完全可以调和的分子脱离波旁王室。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承认他拿破仑的权力的合法性、并且甘心服从他的权力的保王党人，他会宽恕他们过去的罪恶，而对那些不妥协的、一定要恢复波旁王朝的旧制度的保王党人，则要进行无情的斗争。

早在马伦哥战役以前，第一执政就命令富歇拟定一份可以准许返回法国的流亡者的名单；尽管发生了圣·尼凯斯大街的“定时炸弹”事件，这份名单仍然在继续拟制。按照最初的名单，流亡者约有十万人，其中五万二千人已经根据葡月 1 日（1800 年 10 月 20 日）的决定回到法国。根据后来的名单，流亡者比原来假定的几乎要多一半。在十四万五千流亡者中，有十四万一千人得到了返回法国的权利；他们回国以后，受到警察的监视。只有三千三百七十三名流亡者还象以前一样，被禁止回国。但他并不到此为止：1802 年 5 月，发布了一项议院执政府联合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任何一个流亡者，只要宣誓效忠新的国家制度，就可以取得回国的权利。大批在国外过着贫困生活的流亡者在这个法令公布后回到了法国。

在一段时间内，暗害活动停止了。拿破仑以更大的精力从事外交事务。无论是这个时期以前或是以后，他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想同反法联盟赶快媾和。他之所以需要媾和，一方面是为了要改善

财政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法国人民明显地要求尽快地实现和平，当然也是为了能有一个暂息时间，来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和实现预定的改革。

三

他所选择的外交方面的助手并不比政治迫害方面的助手差，因为如果说富歇是搞暗探活动的专家，那末塔列朗公爵也是一个玩弄外交手腕的能手。但拿破仑本人在这两个方面的本领是不一样的：拿破仑利用富歇及其机构，却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下流货；他不相信富歇，因此自己还有一批警察，来监视富歇本人的行动，但在这个战场上，在这个竞争中，他要想战胜自己的大臣，当然是办不到的。在这方面，不论是拿破仑，还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都不是富歇的对手。富歇一瞬间就可以发觉监视他的人（拿破仑派去的）。在警察方面，拿破仑需要富歇及其特殊的才干，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远远不能同自己这位大臣相比，而且也很重视这一点。相反地，在玩弄外交手腕方面，拿破仑不仅不低于塔列朗，而且比后者还要高出一筹，尽管后者也是颇有才干的外交大臣，但是一些指导思想是拿破仑自己向塔列朗提出的，一切重要的和平谈判是由他自己进行的，塔列朗只是提供建议，起草外交文件，制定一些达到预定目标的策略性的办法。

毫无疑问，拿破仑在外交上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对俄政策上的大转变。他向同法国正式进行战争的保罗皇帝表示，要把 1799 年秋科尔沙柯夫军团被击溃以后遗留下来的所有俄国战俘立即送回俄国。他甚至沒有要求交换战俘（不过当时俄国几乎沒有法国的战俘）。这使保罗感到非常高兴，便派斯普连格波尔琴将军去巴黎解决战俘问题。

1800 年 12 月中旬，斯普连格波尔琴到了巴黎。拿破仑立即对

保罗·彼特罗维奇表示最大的好感和敬意，特别强调他所认为的俄国沙皇的高尚和伟大的品德。同时可以看出，第一执政不仅命令遣返所有俄国战俘（六千人左右），而且命令用法国的国库开支为他们所有的人缝制他们本国式样的军服，发给他们服装、新的皮靴，把武器发还他们。除了这种在战争中谁都没有过的友善态度外，拿破仑还给保罗写了一封信。拿破仑在这封信中用友好的词句表示，只要保罗派一位全权代表来巴黎，法俄之间的和约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即可签订。这一切把保罗完全迷住了。这位法国的疯狂敌人，忽然变成了法国的友人。他给了拿破仑一封回信，预先表示同意议和，并且希望在第一执政的赞同下，使欧洲恢复“安宁”。

“您的君王和我，我们有责任改变地球的面貌”，——拿破仑向保罗的代表斯普连格波尔琴将军这样说。

拿破仑在取得这第一个胜利以后，决定不仅同俄国签订和约，而且订立军事同盟。订立同盟有两个根据：第一，两国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第二，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共同的力量威胁（经过南俄和中亚细亚）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拿破仑从远征埃及直到他的统治的末期，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印度的打算。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但在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在 1798 年同远征埃及联系起来，在 1801 年，同俄国沙皇的突然和好联系起来，在 1812 年，在远征开始的时候，又同莫斯科联系起来。在所有这三个场合下，拿破仑对印度这个遥远目标的意图甚至都没有开始真正定型。但我们马上可以看见，这一次却达到了进行深入的军事侦察，或者类似军事侦察的地步。

保罗皇帝在同拿破仑异常迅速地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也突然加深对他昨天在反法战争中的盟国——英国的仇视。拿破仑考虑了（暂时还是大致地）一个联合行动计划：他率领法军向南俄进发，在那里，同俄军会师，然后他率领两国军队取道中亚细亚向印度推进。保

罗不仅倾向于进攻驻在印度的英军，而且在实现这个计划方面，比拿破仑早走了一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保罗监禁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一年半的哥萨克首领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普拉托夫，突然从监牢里被直接带到沙皇的宫中。在这里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他知不知道去印度的路？普拉托夫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考虑到，如果作否定的答复，一定会马上带回要塞，因此急忙回答说，他知道。于是他马上就被任命为几乎全部奉命开往印度的顿河军队四个梯队中的一个梯队的司令。所有四个梯队(二万二千五百人)都参加这次远征。他们在 1801 年 2 月 27 日从顿河出发，但走不多久就停下来了……

在欧洲，人们都以日益增长的不安心情注视着法国统治者和俄国皇帝之间的友谊的巩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同盟得到巩固，就会共同控制整个欧洲大陆，这不仅是拿破仑和保罗的意见，而且是当时所有欧洲外交官的意见。英国也感到十分不安。诚然，法国海军比英国海军要弱得多，而俄国的海军更不足道，但拿破仑远征印度的计划和一些俄国军队突然开往印度，使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十分震惊和愤怒。所有欧洲的外交部门和王室都惶惶不安地等待着 1801 年春季的来临，因为那时两个未来的强大盟国将会采取某种决定性的步骤。但是在这个初春的某一天，3 月 11 日，却发生了完全另外的事情。

当巴黎突然接到了保罗在米海洛夫宫被刺的消息的时候，拿破仑大发雷霆。他在几个月之间，在同俄国的关系方面，那样巧妙那样顺利地取得的一切，完全化为泡影了。“英国人雪月 3 日(圣·尼凯斯大街上定时炸弹爆炸的那一天。——作者注)在巴黎对我的暗算落空了，但他们在彼得堡对我的暗算却没有落空！”——他这样喊道。他坚决相信，暗杀保罗是英国人策划组织的。在三月的那个晚上，当阴谋者进入保罗的寝宫的时候，同俄国的同盟就宣告破产了。

这时，第一执政不得不立即大幅度调整所有的外交部署。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象他调动炮兵队一样，能够很巧妙地迅速地随机应变。

四

从现在开始，应该采取另一种方针：不是继续进行战争，而是同英国议和。同奥地利的和谈，早就进行了；1801 年 2 月 9 日，奥国全权代表科本茨已在吕纳维尔城在奥法和约上签了字。谈判是由第一执政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和外交大臣塔列朗进行的。但他们两人只是执行了拿破仑的命令，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同保罗突然产生的友好关系。奥国有可能遭到西方和东方的夹击，因而不得不在各方面让步。在马伦哥战役以及法军在亚尔萨斯取得胜利（莫罗将军在戈根林顿打败了奥军）以后，奥军已经很难进行反抗了。拿破仑根据吕纳维尔和约得到了他想从奥国得到的一切：比利时完全脱离奥地利，让出卢森堡和莱茵河左岸的所有德国领土，承认巴达维亚共和国（即荷兰），承认赫里维特共和国（即瑞士），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即热那亚和伦巴第），这些领土事实上当然都成了法国的领地。至于皮埃蒙特，它以前和现在都是由法军占领的。“这就是我不能不签订的倒霉的和约。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这个和约都是很可怕的。”——科本茨很伤心地在一封信中向自己的上司（科洛雷多）这样报告说。

科本茨更有理由愤慨，因为他知道塔列朗在谈判期间拿了奥国王室很多礼物（当然是偷偷地拿的），但没有做出一点有利于奥国的事情来，因为和约自始至终都是在拿破仑本人的授意下签订的。

总之，同奥国的问题已暂时告一段落。显然，奥地利帝国遭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是要等待适宜的时机，来挽回这种形势的。它为了等

待更好的时机，暂时表示屈服了。

这样一来，保罗死后，在所有大国中间，能对法国作战的，只剩下一个英国了。保罗死后，拿破仑把战线完全转换了，他要尽快同英国签订和约。

英国当时的处境很困难。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在纯粹经济方面，是沒有对手的。由于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工业技术革命，英国在经济方面最终地成了首屈一指的国家。法国资产阶级激烈反对法国旧王朝的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 1786 年签订了英法商业条约。在签订这个商业条约之后，英国的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顺利地夺取了法国的国内市场。国民公会和督政府反对英国商业的一切措施都受到法国工业家的热烈欢迎。革命时期英法之间的全部战爭，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都被看作是英国商人和工业家反对法国商人和工业家的战爭。

领导各种反对法国的政治活动和欧洲各种军事联盟的，是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他在当时大力资助普鲁士、奥地利、皮埃蒙特、俄国，并再次资助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法国在大陆上的日益强大，从英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资助欧洲的联盟，还是用海军、金钱、弹药和武器来援助旺代的反革命，都于事无补，因此到了 1801 年，英国国内开始流传着一种意见，认为最好是同法国的新主宰进行谈判，签订协定。的确，工业家和那些直接剝削在长期战爭中掠夺来的法荷殖民地的商人，是根本不同意这个意见的。但与欧洲贸易有关系的商人却是希望签订和约的。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对剝削行为和自己的饥寒交迫的地位深为不满，工人的愤慨不仅表现为捣毁机器，而且有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希望本国遭到失败的情绪。

总之，当拿破仑同奥地利签订了极为有利的和约而得到了德国

和意大利的大量领土的时候，当保罗死后他同保罗的继承人亚历山大签订了和约，并同时向英国建议媾和的时候，由于击败法国的希望落空而暂时垂头丧气的英国统治集团，这时也决定进行谈判。威廉·皮特正是在保罗被刺以前退休的，那些反映了认为可以和解的阶层的意愿的人代替了他。内阁首相是艾丁顿，外交大臣是霍克斯贝里爵士；后者表示英国同意签订和约。

和谈是在亚眠进行的，1802 年 3 月 26 日，在这里签订了法英和约。英国把在九年战争中间占领的所有殖民地（锡兰和特里尼达岛除外）都归还给法国及其附庸国（荷兰和西班牙）。马耳他岛应归还给马耳他骑士团。英国应从它在战争期间所占领的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上的所有据点撤退。法国应从埃及和罗马撤退，把罗马及其他教皇领地归还罗马教皇。这就是所有主要的条件。但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统治英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九年中间用了几百万经费去装备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派遣许多舰队去各大洋，难道是为了签订这样一个和约吗？

英国统治集团感到最沉重的是，他们没有能够从拿破仑的手里夺得他占领的欧洲的任何一块土地。比利时和荷兰、意大利、莱茵河左岸和皮埃蒙特还在拿破仑的直接控制下，整个西德从现在开始成了他的孤立无援的胜利品。所有这些已经占领的或暂时还没有完全占领的国家都在拿破仑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之下，使英国工厂主和英国殖民地产品失去了销售和输入的场所。英国代表在亚眠想尽一切办法，为制定对英国稍微有利的商业条件奠定基础，但未取得任何结果。对于富足的法国国内市场，当然根本不要去想：早在拿破仑执政以前，这个市场对英国就是封锁的，现在也还是封锁的。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从纯粹军事观点、纯粹政治观点来看，要使英国不受法国的进犯，是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的。拿破仑在他统治比利时和荷兰的时候，就说“安特卫普是对准英国胸膛的手枪”。

亚眠和约不可能是持久的。英国并没有认为自己是这样一种战败国。但当巴黎和外省知道法英和约签订的消息时，普遍表示满意。最危险、最富裕、最顽强、最坚决的敌人似乎已经承认自己被打败了，用自己的签字承认拿破仑的一切胜利。欧洲的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结束了，并且是在一切战线上获得全胜而结束的。

五

在拿破仑时代，法国和欧洲不会有很长的和平时期。但从 1801 年春(同奥地利议和)到 1803 年春(经过短期的亚眠和约又同英国开始进行战争)，在这两年中间，拿破仑在建立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和立法方面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现在他可以系统地着手进行以前不得不搁下来的立法工作。虽然他在马伦哥战役结束以后，就曾开始进行此项工作，但他还不可能把这种事情放在首位，因为同奥国和英国还没有签订最后的和约，同保罗皇帝的联系还促使他去考虑新的艰苦的战争和远征。

现在他可以提出、讨论和解决行政管理、财务、经济、民法、刑法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了。他解决他所不了解的那些国务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拿破仑主持他召开的国务院会议，听取大臣们的报告，命令直接起草这些报告的人出席会议，详细讯问所有不清楚的问题。

他最喜欢同专家谈话，向他们学习。“当你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城市的时候，你不要闲着，而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城市：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不会来占领这个城市呢？”——他这样教导自己的继子、后来的意大利的副王欧仁·博阿尔内。这就是拿破仑的整个形象：为了实际应用而积累知识。他使英国船长们都感到惊奇：他不仅能谈出法国船具的细节，而且能谈出英国船具的细节，谈出英国和法国的锚索

的区别。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非常重视经济问题（当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问题），他在开始进行统治以后的两三年间，就把工商业问题，生产的销售、税率和关税、水运和陆运等问题研究得非常透彻，以至他所了解的里昂丝绒价格涨落的原因，并不比里昂的商人差，他可以揭露在大帝国的边界建设公路的包工头的欺骗行为，并且确定是什么样的欺骗行为，他不仅可以用自己权威的论断解决边境问题的争论，解决德意志诸国之间和公侯之间关于地界的纠纷，而且能援引争论的历史和地界纠纷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解决办法是正确的。

拿破仑听取所有能够提供有益的建议的人的意见，但决定是由他自己来做的。“取得战斗胜利的人，不是提出好的建议的人，而是负责执行和下命令执行这个建议的人。”——他这样说过。在总司令听取的许多意见中，往往只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但要善于抓住和利用这个意见。在立法改革和整个对内政策方面，都是这样。但下命令也绝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拿破仑认为，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丝毫不次于发布命令，并且认为，对不执行命令、不认真执行命令和拖延执行命令的现象，十分认真地追究责任，是每个大臣必尽的职责。在他统治时期，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当时供职的一些年长的官员后来回忆说，那时睡得很晚，起得很早。他认为，对政府来说，从每个人身上榨出一切能够榨出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样一来，人的寿命有所缩短，这对国家是无关紧要的。拿破仑甚至用下面这样露骨的话说明了他的这个特别的信念：“不要让人活到老（ne pas laisser vieillir les hommes）——这是统治的极大的艺术。”他极力发给供职人员很高的薪俸，然而却从这些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血汗。他自己除了几小时睡眠，十五分钟的午餐和不到十五分钟的早餐时间外，全部时间几乎都用来工作。拿破仑认为对别人的要求不需要比对自己松些。也象对待士兵和军官一样，拿破仑不

只是用法庭、惩罚、解雇来威吓官员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超出一切限度来工作。据一位在拿破仑时期长期干过繁重的差事，先任办公厅官员，后进国务院检察官的老人特列莫克说，拿破仑“有一种用亲昵而毫不拘礼的态度提高人们对事业的忠诚的本事；他在必要的场合下，善于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下级，象对待平级的人一样”，这种本事“使人们产生了激情，就象他在军队里使官兵们产生激情一样。人们在工作中累得精疲力尽，就象（官兵们）在战场上牺牲一样。”文官们也象武官们一样，为了得到一枚勋章或主宰的一个微笑，而不惜赴汤蹈火。

通过亚眠和约签订后马上举行的全民投票，以及由此而来的1802年8月2日议院作出的“全民决定”，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终身执政”。赞成这个措施的有三百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五人，反对的有八千三百七十四人。显然，法国变成了专制君主国家，第一执政迟早就要宣布为国王或皇帝。拿破仑想把自己这个未来的王位以及现存的“共和”独裁，建立在城乡大资产阶级即有产商人、有产工业家、有产地主、有产农民的巩固的基础上。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私有权应当成为他所建立的新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永远地、坚定不移地消除贵族、地主、领主对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祖先曾经占有的土地的旧的封建权利的任何怀念；另一方面，永远地、坚定不移地确立在革命时期从没收流亡者和寺院的土地中购买的土地的所有权，确立所有在当时占有这些土地的人的这种权利。

至于谈到商业和工业，那末，一方面，工商业企业主享有不受任何限制在“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同职员和工人订立契约关系的权利（即享有资本剥削劳动的无限自由），同时，工人丧失了同剥削现象进行集体斗争的一切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使法国工商业家相信，拿破仑政府想要而且能够顺利地使法国国内市场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并且把一部分欧洲，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把整个欧洲都变成法国

工商业资本剥削的对象。拿破仑相信，他所建立和巩固的制度以及他的对内对外政策都会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有产农民对一切暴力行动表示谅解，不再贪图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国家管理工作和立法工作，同意服从任何的专制形式，甚至于路易十四时期所未曾有过的形式，去忍受和承担在旧制度的最艰苦的年代都未曾有过的牺牲和兵役。

六

拿破仑决定消除一切妨碍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和奠定他个人的权力的困难因素，他不仅特赦了亡命者，给了他们一部分尚未售出的财产，而且在法兰西国家和天主教之间，实行了正式的和解。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信奉天主教已是自由的了。现在他准许过礼拜日，把许多神父从流放地和监狱中释放出来。接着，拿破仑同教皇开始谈判关于第一执政同意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和天主教堂由国家保护的条件。谈判结束后，颁布了有名的条约，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这是“国家英明的杰作”。

实际上，条约把革命时期从教会夺取的大部分有利于思想自由的阵地都交了出来。革命剥夺了天主教公开影响法国人民的可能性，而拿破仑却又创造了这种可能性。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答案很明显，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拿破仑本人即使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至少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冷漠的不坚定的自然神论者。一般说来，拿破仑一生很少谈论宗教问题。他从来都没有想要依靠自然神论者假想的上帝的援助，没有表露出任何神秘主义的情绪。不管怎样，拿破仑并没有把从 1799 年成为教皇庇护七世的意大利贵族加拉蒙奇伯爵看成是圣徒彼得的继承人和上帝在人间的使者，而是把他看成是狡猾的意大利

老头儿。教皇为了收回在革命时期被扣押的教会财产，当然乐意进行阴谋活动以利于波旁王朝的复辟，但他害怕拿破仑，因为几乎整个意大利都被法国人所占领，而在马伦哥战役以后，罗马和罗马教皇完全在第一执政拿破仑的控制之下。

庇护七世非常害怕拿破仑，认为他是暴徒和强盗。拿破仑根本不信任庇护七世，认为他是阴谋家和伪善者。在开始谈判以前，他们就相互抱着这样的看法，在谈判结束以后，一直到死，他们显然都从来没有怀疑这种相互看法的正确。问题不在于教皇本人。在拿破仑看来，天主教组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组织站到敌人一边会带来很多害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站到朋友一边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教皇总要比加利奥斯特罗、康德或所有这样的德国空谈家骗子好些”，——拿破仑把冒险家加利奥斯特罗和哲学家康德放在一起这样说道，并补充说，既然人们生来是要相信各种神怪的，那与其让他们大谈哲理，不如让他们有可能利用教堂和已有的教义。给人种痘，就为的是使人不得天花，拿破仑这样论证说。换句话说，与其让波旁王朝敌人来利用这支人数众多的僧侣和神父的大军，而使自己统治的人民为无法捉摸的空谈家和哲学家所控制，发展自由思想，那么，就不如同自称教皇庇护七世、同时人们由于自己的愚蠢而相信他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的狡猾的老头儿加拉蒙奇伯爵达成协议，使教皇庇护七世的无数黑衣警察同富歇的宪兵和警察一道，为自己服务。此外，拿破仑还清楚地看到，这支黑色的天主教大军在彻底消灭他所十分仇视的启蒙的革命思想方面，是有很大好处的。

1801 年 7 月，教皇和拿破仑签订了协议(条约)，1802 年 4 月 15 日，正式公布了关于这项条约和法国天主教的新体制的法令。这就是他的根据。

拿破仑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但与革命前不同，不是国教；他准许全国人民信仰宗教，不受任何阻挠。为了补偿这一

点，教皇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把革命时期没收的教会土地归还教会。主教和大主教由拿破仑本人挑选和任命，在此以后，被任命的僧侣才能得到教皇的教职；同样，主教任命的神父也只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能任职。教皇的敕谕、诰文、通告、决定在任何时候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能在法国发表。这就是条约的主要内容。在拿破仑死后，这项条约还继续存在了一百多年。拿破仑没有失算。条约公布以后（当时已经是帝国），天主教马上就在法国所有学校设置了必修的教义问答，而且规定一定要能够背诵问答的条文：1）“上帝……要拿破仑皇帝成为行使自己权力的工具，成为自己在人间的化身”；2）“谁要反对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自己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身受到谴责，他的灵魂就要永远毁灭，堕入地狱。”除了这两条外，教义问答还宣扬了很多类似的“眞理”。这是课堂上的“圣律”。节日的时候，教堂的讲坛上总要讲，“上帝的神灵”暂时决定依附在拿破仑的身上，目的是要根除革命专横和不信任的风气，第一执政（后来的皇帝）对所有国外敌人不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圣灵”的直接的战略上的干预。

正是在教皇和拿破仑签订初步协议到公布条约法令之间的几个月里，拿破仑设置了荣誉军团勋章，直到现在，法国还颁发这种勋章。拿破仑早在 1801 年初就想设置这种勋章。他决定设置一种奖励军事方面和民事方面的功绩的勋章。这种勋章分几等，颁发由元首决定。

在拿破仑时代，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直到今天还几乎毫无变更地沿用着。诚然，在他当时，初级学校是没有的，但在高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变更。

在这个制度下，最高机关是“大学”（l'Université），领导这个机关的是它的主要负责人——Grand-Maître de l'Université（现在的教育部长）。拿破仑时代的“大学”，负责管理：1）高等学校和 2）中等学

校。在拿破仑时代，只是建立了高级专科学校，主要是培养技师、工程师、公证人、法官、行政官员、财政部门的官员等等。纪律是很严格的，纯粹是军队的纪律，考试十分严格。中等学校首先是培养军官。中学毕业生经过补充考试，可以进入高等专门军事学校。中学毕业后，不需要更高的学历，就可以在民事机关供职，但他们当然不能享有那些先在中学毕业又在高等学校毕业、然后才去供职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地位。

拿破仑喜欢吹嘘自己如何保护科学。他经常给数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一些恩惠，特别是对研究埃及学的学者表示好感，因为科学的埃及学的奠基是与他远征埃及联系在一起的。

但他要求科学要有实际的成果，他重视科学活动的纯粹实用的成果。他首先要求科学要促进“帝国的荣誉”(这是他 1812 年 7 月从威特斯克写给拉普拉斯的信中说的)。在当时，就连天文学这样抽象的科学都是有用的。但他不喜欢历史学，对这门学科表示怀疑。譬如他不能容忍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因为他不尊重罗马的皇帝。哲学，特别是启蒙哲学，是他所仇视的一种“思想体系”；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农学派的学说)，他认为是哄骗术；哲学家康德，他也认为是骗子。在他统治时期，大学和中学里的讲课具有非常严格的实用的主要是技术的倾向。

拿破仑首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尽量使人们不去回忆刚刚结束的革命时代，其中不仅包括他所憎恨的革命的“思想体系”，甚至包括一些历史事实和革命年代的事件。他不仅禁止写革命，甚至禁止提到革命和革命时期的人物。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罗伯斯比尔，什么马拉，什么巴贝夫，什么米拉波。1807年，有一次在巴黎科学院，有人十分善意地偶然谈到米拉波，拿破仑听到以后就大发雷霆，写给警务大臣说：“谈论米拉波不是学术团体负责人的事情”。刊物上禁止提到“革命”这个词。“为了管制刊物，就需要鞭子

和棍子”，他的这个信条，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在他统治的初期就开始实行了。雾月 18 日政变后两个多月，拿破仑于雪月 27 日发布了一项决定，不说明原因就封闭了六十家报纸，只保留了十三种。但这十三种，很快就只剩下四种。这四种篇幅不大的报纸（英国人把这些报纸叫做“擤鼻涕的手帕”），内容非常贫乏，因此很少有人去看。拿破仑不仅不想使自己的刊物去同革命原则进行斗争，不，他根本不想使读者想起什么时候宣布过这些原则。譬如他禁止德国一些竭力反对革命思想、赞扬拿破仑镇压革命的报纸输入到帝国里来。拿破仑甚至想用禁止输入这种报纸的办法，来使自己的臣民不去想起革命。当时严格禁止发行所有提到革命事件的游览指南和地理方面的著作，由于经常搜查，这种游览指南（在拿破仑以前出版的）在印刷所中就被取缔了。禁止教科书提到荷兰和瑞士曾经（“有个时候”）成立过共和国，尽管荷兰的共和国，拿破仑直到 1806 年才推翻了它。

1810 年，有一个叫巴留叶里·鲍维尔德的人冒险写了一本书《哲学家和共和派的事迹》。作者曾经指望，既然他这样粗暴地深恶痛绝地辱骂革命派，同时他又这样虔敬地把拿破仑吹捧了一番，事情总该好办一些，他这本书总该问世。但他的算盘打错了：这本书被禁止发行，并且因为“它会引起痛苦的回忆”而被没收。正式公文就是这样说的。

拿破仑政府任何时候都不原谅作者的这种罪过：“秘密的雅各宾派”。一些最意料不到的形迹，都会被认为是“秘密的雅各宾派”，例如有人十分赞扬古希腊人阿里斯蒂德斯的德行或卡顿的诚实，那末，因为雅典和罗马是共和国，作者马上会有赞扬共和制的嫌疑。……

拿破仑对被征服国的报刊也进行了残酷的压迫。这些国家的出版物即使稍微暗示一下本国遭到奴役，那就不仅有报社被封闭、书籍被没收的危险，而且作者也会有危险。一个名叫帕尔姆的书商，仅仅因为不肯说出拿破仑所不喜欢的一本小册子的作者的姓名，根据拿

破仑的要求，在纽伦堡被枪毙。这个例子说明，在被征服国，作者和出版者对自己被压迫的祖国表示一点点忧伤，就会遭到什么后果。

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严禁法国人民回忆任何革命事件和革命原则，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一切有关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暗示都进行最坚决的迫害，这就是拿破仑在出版方面所采取的基本方针。

七

马伦哥战役结束后两个月，即从意大利回到法国几个星期以后，第一执政就发布了一项决定（1800 年 8 月 12 日），成立民法法典草案起草委员会，这个法典应该成为法国及其占领国的法律方面的基石。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因此拿破仑决定这个委员会一共由四个人组成：他不能容忍庞大的委员会、冗长的演说和过多的会议。这四个人都是大法学家。

这个法典后来就叫做“拿破仑法典”，由 1852 年的敕令批准，直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废除（虽然它也叫做“民法法典”）。根据立法者的想法，拿破仑的民法法典应该在法律上把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取得的胜利明文规定和固定下来，保证私有制在新社会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使整个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原则不被任何进攻所损伤，不管这种进攻是来自何处：是来自不甘心躺进棺材的封建主，还是来自想要粉碎自己身上的枷锁的无产者。

拿破仑认为，法国发生革命不是因为法国渴望自由，而是因为要求平等。他所了解的平等是法律上所保证的同样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公民生活的同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他就决定用自己的法典确保公民权利的平等。“自由只是一个借口”（la liberté n'a été qu'un prétexte），他谈到革命这样说道。他消灭了政治自由，把他所了解的“平等”巩固下来，编成了法典。

从明确地、彻底地、逻辑上始终如一地保卫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拿破仑法典实际上也许是值得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法学界长期以来大量赞扬的(现在还在赞扬)。但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公正的态度，就不会否认，这个法典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立法比较起来，是退了一步。当然，它与其余的欧洲大陆上普遍实施的法典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步。但革命争得的许多东西都被取消了。

拿破仑使妇女在男子面前处于无权的地位，另外，在继承权方面，与兄弟相比较，处于被侮辱的不利的地位。同时完全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关于“非婚生子”和“婚生子”的权利平等的人道法令。对被判服苦役和其他重刑的人实行的所谓“公民死刑”又恢复了，虽然这种对刑罚的补充处罚在革命时期已经废除。拿破仑在帮助建立新社会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使大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最广泛的毫无阻碍的经济活动，消除一切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的趋势。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在这样重大的制定民法的工作中，就没有人企图进行反对，要求在新的立法中保持过去革命的成果？这样的尝试是有过的。当法典送交“立法机关”的时候，法案评议委员会里有人想要稍微表示一点反对，但这种软弱的反对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种反对意见：除了五十个唯唯诺诺的委员外，他把其余委员全部开除出法案评议委员会，同时决定，从此时起，法案评议委员会人数永远不得超过五十人。在顺便实行了宪法的这种改革之后，一切都很顺利了。1803 年 3 月，拿破仑法典经过国务院讨论以后，提交给立法院，而立法院甚至无权讨论，只是一声不响地一条一条地通过。1804 年 3 月，法典经拿破仑签署，成了基本法和法国法学的基础。法国大资产阶级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死刑，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在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法国革命还在继续进行。但任何

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理由忘记这个民法法典对拿破仑所占领的欧洲各国的巨大进步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典后来又补充了拿破仑比以前更加严厉地惩办工人阶级的那些法令。不仅是勒·霞不列的法令（1791 年）完全有效;这个法令甚至把最和平的罢工，一般的合伙罢工，都看成是应受到刑事处分的罪行。而且另外还设置了“工人手册”，这种手册由雇主保管，工人没有这种手册到哪里都不能找到工作。以前的雇主在这些手册上写上对工人所作的鉴定，并注明由于什么原因解雇那个工人。不难想象，雇主们会怎样滥用这种最有利的条件来掠夺工人的工资和面包。

在同一个时期，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制定的商业专门法典，以一系列新的条款补充了民法法典，这些条款调节了并在法律上保证了商业契约、交易所和银行的活动以及票据和公证的权利，因为这些都与交易有关。最后，拿破仑还颁布了刑事法典，从而完成了一般性的基本立法工作。他保留了死刑，对某些罪行恢复了革命时期已经废除的苦刑和烙刑，对一切侵害私有财产的罪行都严加惩罚。他的刑事立法与革命时代的法律相比无疑是倒退了。

由于 1803 年 3 月又同英国开始进行战争，这全部繁重的立法工作没有能够彻底完成。拿破仑又拔剑出鞘，一直到他的长篇的血腥史诗结束。

第七章　新的对英战争的开始和拿破仑的加冕

(1803—1804 年)

一

经过短暂的间隙以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双方都非常清楚这场战争的艰苦性。虽然拿破仑控制着法国、意大利的大部分、西德的许多城市和领土、比利时和荷兰，但他的对手的力量也并不弱，无论是按军队的数量或性质不同的兵种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拿破仑一生都是在同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君主国的联盟作战，但率领这些国家进行这场战争的却是经济上先进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居于首位的国家。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不仅表明资产阶级的法国竭力要使经济落后的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同时这些没有止境的战争还是刚刚走上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法国和早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英国之间的搏斗。

这里应当谈谈从一开始就与法国革命时期的战争显然不同的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列宁恰恰是针对法国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这样说过:“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

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①。列宁在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指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瓜分这种获取物而进行的战争”，象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谈到拿破仑时代的时候所解释的那样。

英国资产阶级在反对日益强大的对手——法国资产阶级的顽强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具有高超的技术、大量的现金、被残酷剥削的殖民地以及在全世界的极广泛的商业联系。在这个斗争中，英国长期地顺利地利用了经济上落后的半封建君主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用英国的经费、英国的武器来武装这些君主国的军队。小威廉·皮特用了几百万款项来资助俄国或奥国或普鲁士，要他们去反对法国革命或拿破仑，这实际上和四十年前，他的父亲——老威廉·皮特资助北美印第安人和所有印第安种族，要他们起来反对在加拿大的法国人是一样的。差别当然只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赌金的多少而已。

为什么英国 1802 年 3 月签订了亚眠和约结果只停战一年呢？因为停止艰巨的战争所带来的欢乐气氛过去以后，英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都清楚地看到，他们战败了，拿破仑胜利了。拿破仑不仅不允许英国商品输入他所管制的广大市场，而且由于他控制着比利时和荷兰，因此他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威胁英国海岸，而主要的是，在 1802 年，他已经可以毫无阻碍地公开胁迫许多暂时还算“独立”的国家同他建立“联盟”。他在签订亚眠和约的时候，就比极盛时期的路易十四还要危险可怕得多，因为路易十四在西德莱茵河流域吞并的领土，即使是与拿破仑在西德占领的土地相比，都简直是儿戏。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法国军事独裁者的巩固的霸权，可以成为直接进攻英国的桥头堡。

应该指出，拿破仑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短暂的亚眠和约来镇压圣

①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302 页。

多明各岛上的黑人起义。早在督政府时代，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就在这个岛上建立了巩固的领导地位。他形式上承认该岛附属法国，实际上是独立的。

拿破仑在殖民地问题上抱着与法国种植场主同样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还在革命国民公会时期就已实行的解放殖民地奴隶的政策。拿破仑根据亚眠条约收回曾被英国占据的殖民地（圣多明各岛、小安的列斯群岛、马斯卡连群岛、圭亚那海岸），在已废除奴隶制的地方，他没有恢复过去的奴隶制，而在由于英国暂时占领以致还未来得及废除奴隶制法律的地方，他批准了奴隶制法律。为了镇压杜桑·卢维杜尔的起义，拿破仑于 1802 年装备了一万人的海军。杜桑·卢维杜尔被用诡计骗到法军军营里来，于 1802 年 6 月 7 日被捕，并被押送到法国。黑人解放战争的英雄刚被送到法国，拿破仑就下令把他监禁到位于一座荒山上的日乌要塞的一间单独密室里去。严寒的气候，残酷的监禁，不能同亲属会面，不能散步，最厉害的虐待，杜桑·卢维杜尔被折磨了十个月就死去了。

拿破仑制订了一些有关组织和剥削殖民地的计划。但 1803 年春重新开始的对英战争使他不得不放弃实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计划。由于沿海交通完全断绝，不可能控制遥远的密西西比河上的领地，因此拿破仑甚至不得不把过去法国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路易斯安那全部出卖给美国(1803 年 4 月 30 日)。

1803 年春，一部分(大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竭力要求解除亚眠和约，他们除了其他一些理由以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阻止拿破仑控制法国的旧殖民地和占领新殖民地。

但不仅在英国，就是在巴黎，亚眠和约也已开始动摇并遭到破坏。拿破仑原以为，英国在签订这个和约以后就不会干预欧洲的事务，最终同意他在大陆上的未来的霸权。但他突然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要英国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是办不到的。

复杂的外交谈判开始了。双方都不想而且也不可能让步，双方彼此都很了解。1803 年初，谈判就有即将破裂的危险。伦敦方面和巴黎方面当然都有些动摇。英国大臣们远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英国已经充分准备好再次投入最危险的战争，况且初期还没有盟国，法国在当时同一切国家都订立了和约。拿破仑知道，巴黎和里昂的商业资产阶级以及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家，收到了英国的大批定货单，亚眠和约签订后的那几个月，由于一万五千个英国富翁来法旅行，使商业大大繁荣；同时他也知道，即使在现在的和平时期，他也可以不准英国商品输入法国，因此从对法国工业家的利益来说，对英战争不会有什么意义。诚然，在战争条件下，可以加强禁运制度，把这一制度扩展到其他一些国家，这是拿破仑十分盼望的。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摇摆不定。

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接见英国大使时大发雷霆的那场著名的戏，是他进行威吓的最后一次尝试；这场戏终于把两大国家拖入了战争。

这里应该简要地说一下拿破仑的这一常常使许多人感到困惑莫解的特点。无疑地，这个傲慢的、阴郁的、极易激怒的、几乎蔑视普天下的人的人物，是很喜欢暴跳如雷的。但是应当指出，拿破仑是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他甚至对著名的悲剧演员塔里玛（他自己向这位演员学到了很多东西，因而对他表示好感）指出，有些悲剧演员为了在戏台上表达出强烈感情，以致表现出装腔作势的不自然态度："塔里玛，你找个早上到宫廷里来见我。你在这里会看到失掉爱人的王妃，失掉自己国家的君主，被战争夺去了王位的国王，以及想要得到王冠和恳求得到王冠的著名将军。我的周围全是巧加掩饰的虚荣心、激烈的钩心斗角，我的周围全是惨剧、隐藏在内心里的忧伤、突然爆发出来的苦痛。当然，这些都是悲剧；我的宫廷充满了悲剧，我自己当然是当代最富悲剧性的人物。怎么样，难道我们要举起双手吗？

难道我们要来研究我们的手势吗？要装腔作势吗？要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吗？难道我们要大喊大叫吗？不，不是这样！我们将象受到利益和激情鼓舞的任何一个人那样，很自然地讲话。在我以前的那些曾经占据世界舞台、并且在王位上演过悲剧的人物，也是这样的。这是值得思索的。”

拿破仑几乎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自己。但有一种感情——愤怒，他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加以控制。这种感情的发作对周围的人来说是很剧烈的、可怕的。在他发怒的时候，即使最坚强、最勇敢的人，也都感到非常害怕。但同时，拿破仑有时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根据深思熟虑的理由（完全不是由于天生的暴躁），故意表演一些狂怒的场面，同时还有很高的表演才能，装得逼真，以至只有最了解他的观众才能猜出这个喜剧，但也不是每次都能猜到，他们也往往猜错。

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大使的威特渥特从最初起就不相信可能同拿破仑保持和平，这还不是因为法国根据亚眠和约占了很多便宜，而是因为亚眠和约签订以后，第一执政向法国毗邻的欧洲国家发号施令，好象这些国家已经在他管辖之内似的。例如，1802 年秋，他向瑞士宣布，他想在瑞士实行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一个“与法国友好的”政府。他在说明这个要求的时候，向瑞士人指出，瑞士的地理位置是在法国和法国所属的意大利之间，而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地理上的理由，他派了内伊将军带领三万士兵开往瑞士国境。瑞士表示屈服，成了被征服的国家。几乎同时，拿破仑又正式最后宣布皮埃蒙特王国并入法国。1801 年吕内维尔和约以后对奥地利已表失望的西德各小国的君主和王公，被拿破仑吓得心惊胆颤，而拿破仑简直把他们当成奴仆一样。最后，荷兰也被他牢牢地控制着；显然，它是挣脱不出他的魔掌的。

英国是不想而且也不可能容忍所有这一切的。在 1803 年 2 月 18 日第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接见中，拿破仑演出了大发雷霆和进行威

吓的场面。他谈到了法国的强大，谈到如果英国敢于发动战争，那将是一场“歼灭战”，说英国对盟国的指望会落空，奥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不再存在了”。他讲话时盛气凌人，大叫大嚷，因此威特渥特在给自己的上司外交大臣霍克斯贝里公爵的信中说：“我觉得与其说是在听欧洲一个最大国家的首脑讲话，不如说是在听一个龙骑兵上尉讲话。”恫吓一下英国，从而防止战争，以便继续统治欧洲，这个念头一直没有离开拿破仑的脑子。但是这回却棋逢对手了。当时在许多方面有着严重分歧的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都一致认为，不能容忍欧洲隶属于独裁者拿破仑。拿破仑恫吓说，他要召集五十万大军。英国政府对他这个恫吓的回答是加强扩充海军，大力进行备战活动。

3月 13 日，演出了新的最后一场戏。“总之，你们想打仗……你们还想打十五年仗，而且你们要逼我这样做。”他要求归还马耳他岛；这个岛是英国人在亚眠和约以前占领的，应该归还，但英国人借口拿破仑有与和约相抵触的行动，而不急于归还。他大声喊道：“英国人想要战争，但如果他们先拔剑出鞘，那就让他们知道，我要最后一个插剑入鞘……如果你们要进行武装，我也要武装起来；如果你们想打仗，那我也打仗。你们也许会消灭法国，但你们要吓倒它，那是办不到的……倒霉的将是那些不履行条件的人！……要末归还马耳他岛，要末就是战争！”——他这样气愤地喊道，接着就退出接见大使和官员的大厅。

1803 年5月初，威特渥特离开巴黎，接着拿破仑同英国的战争就开始了，一直到他统治结束前都没有停止。

二

英国人都知道，战争将是艰苦的、危险的。战争刚一开始，实际上又是威廉·皮特出来领导英国政府；他在 1801 年，当英国贵族和资

产阶级这些统治阶级认为可能而且必须开始同拿破仑进行和谈的时候，曾经告退。

现在，1803 年，威廉·皮特的时代又来了。同法国革命曾经作过九年战的人，现在应该担负起更加危险的同拿破仑的战争了。但威廉·皮特认为，假如说同拿破仑作战比同过去的各届革命政府作战困难些，那末这个新的战争不会象过去同革命法国的战争那样，在英国国内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定。当然，与以前相比，1803 年的法国，领土大得多，富足得多，军队组织得更好；这支军队的首领是天才的组织者和伟大的统帅，但另一方面，“革命的病毒”没有了，这种“病毒”使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都传染上了，工业和煤矿中心区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威廉·皮特非常清楚地记得 1797 年的水兵起义。现在在法国进行统治的，是大力镇压雅各宾派和消灭任何政治自由的暴君。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但在决斗的最初一年半中间，当英国和拿破仑法国彼此对打的时候，可真使人惊慌不安。

如上所述，热烈欢迎亚眠和约的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经过几个月以后就确信，拿破仑无论如何都不会同英国签订商约，不会让英国货物运入法国或是它的欧洲附属国。至于谈到贵族，他们完全是有意识地准备作战的，因为没有战争，坚决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改革的要求就会得到满足，或者要经受长期的最危险的国内斗争。这是十分确凿的无庸争辩的事实。除了这一切之外，工人运动这个可怕的魔影也使这两个准备进行顽强搏斗的阶级惶恐不安。

威廉·皮特决定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拿破仑在英国海岸登陆。

拿破仑首先占领整个汉诺威；这是英国国王（他兼汉诺威的选侯）在德国的一大块领地。接着他命令占领还没有法军的南意大利的一些据点。他命令荷兰和西班牙提供海军和陆军来援助法国。同时，他马上下令在一切附属地区没收英国商品，逮捕居住在法国的英国人，一直拘留到同英国签订和约为止。最后，他开始在布伦（在英

吉利海峡附近，隔海就是英国）建造庞大的军营。在那里集结了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大军。“只要三天下雾，我就可以成为伦敦、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主人”，——他在 1803 年 6 月，开战一个月以后这样说。布伦军营是在 1803 年积极建设起来的，到 1804 年建设工作更加紧张。在法国一切港口，一切造船厂，都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作。“三个雾天”就可以使法国海军绕过英国舰队，使法军在英国海岸登陆，这样一来，拿破仑就可以摧毁一切障碍，从登陆地点前往伦敦，直入首都。拿破仑就是这样想的，英国许多人也是这样想的。

许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英国人后来曾谈到，在开战后的头几个月，英国人还在嘲笑拿破仑的登陆计划。但从 1803 年年底，特别是在 1804 年，英国人已经不敢嘲笑了。英国从 1588 年迎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以来，从来都没有这样张皇失措过。拿破仑巡视法国西北部的港口和沿海城市，赶忙进行工作，在宣言中向商业中心的居民描绘了将要战胜长期的历史上的竞争者的光辉前景。英国政府收到了关于拿破仑大规模扩军备战的令人胆寒的消息。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既然这个人在 1798 年能够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和军队绕过在整个地中海上追赶着他的英国海军，并能顺利地在埃及登陆，同时顺路占领马耳他岛，那末这个人实际上也可以利用在地中海罕见的而在英吉利海峡很常见的浓雾，而这时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是以月来计算，而是以小时或几昼夜来计算。

怎么办呢？

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不管花多少钱，迅速地酝酿和成立欧洲各国联盟，以便从东面来打击拿破仑，从而防止他进犯英国。但被拿破仑击溃的、根据吕内维尔和约的规定受到很多损失的奥地利，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它虽然想进行战争，但没有决心。普鲁士摇摆不定，俄国犹豫不决。谈判在进行，皮特对成立联盟仍然抱着希望，这个办法虽然是可靠的，但是太缓慢，用这个办法可能误事。

还有一个办法。威廉·皮特和霍克斯贝里早就知道，舒安人和布列塔尼起义者的狂热首领乔治·卡杜达尔此时正在伦敦，他同贪求路易王位的普罗旺斯伯爵的兄弟查理·阿图瓦有联系，这些法国亡命者一定是在打什么主意。英国政府很快就大致地打听到这些住在伦敦的保王党在搞些什么名堂。他们在看到旺代骚乱完全失败、用公开暴动不可能推翻拿破仑以后，就决定杀害他，也就是重复他们在 1800 年的尝试，那次他们安置了定时炸弹，但由于偶然的情况而未击中。

威廉·皮特忽然有了一线希望。英国政府打算非常慎重地来做这件事。最好是能够象 1801 年对付准备远征印度的保罗一世那样：就是说尽量一方面暗中进行活动，一方面能有一个正式的机会郑重地表示哀悼之意，就象当俄国大使沃龙佐夫正式通知英国人说俄国沙皇在寝宫中得了“中风症”逝世以后、对这个沉痛的消息表示哀悼一样。但现在，在 1804 年，要在杜伊勒里宫组织新的中风症，比当时 1801 年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城堡更困难、更复杂。在拿破仑宫里，既没有性情暴躁的近卫军官，没有帕伦伯爵，没有本尼格森，也没有“中风症”的直接制造者之一——普拉顿·祖波夫。而且这次交谈的对象也不是普拉顿·祖波夫的姐姐，举止文雅的交际花俄尔加·亚历山大罗芙娜·日列布佐娃；当时，在彼得堡的英国大使威特渥特曾通过她表示自己对保罗一世的健康的关注。现在是要同头发蓬乱的布列塔尼的农民打交道；这个人既不懂得微妙的暗示，也不了解沉默的办法，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只能“偷取”第一执政。总之，卡杜达尔不很明白，怎能去首都“偷取”国家的元首。他根本不了解所有这些文绉绉的谈话的微妙含意，也不会使自己穿着猎人长靴的两条长腿，在伦敦外交机关的办公室和客厅的光亮的地板上运动自如。在这种谈判中，“偷取拿破仑”一语象 1801 年 3 月 12 日前夜在帕伦伯爵和亚历山大的会议上“建议保罗皇帝退位”这句话一样，是很含蓄的。“话

不伤人”,——小威廉·皮特虽然不懂俄文，但一生都遵循着所有俄文成语中这个最富外交气味的成语。

这个密谋是在伦敦考虑好的。乔治·卡杜达尔要消灭第一执政，就是说，当拿破仑一个人在城郊马尔梅松宫附近骑马漫步的时候，就在几个武装人员的协助下，向他突然袭击，把他带走，杀掉。

乔治·卡杜达尔是一个十分狂热的人。他在旺代曾有几十次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这次毫不犹疑、毫不胆怯地准备去刺杀拿破仑，因为他认为拿破仑是他所憎恨的革命获得胜利的象征，是妨碍合法的国王路易·波旁登上王位的篡位者。

在 1803 年 8 月一个漆黑的夜里，乔治·卡杜达尔及其一伙乘坐一只英国船在诺曼底海岸登陆，然后立即前往巴黎。他们有人，有许多钱，同首都有联系，有秘密地址和接头地点，有安全避难所。但必须同拿破仑下台以后马上掌握政权、并请波旁王朝就任祖传王位的人取得联系。保王党选定的这个人就是莫罗将军，莫罗和卡杜达尔之间的中介人是另一位将军——皮什格鲁；他在果月 18 日以后被流放到圭亚那岛，后来逃了回来，现在，1803 年，秘密地住在巴黎。皮什格鲁这个被揭发的叛徒、潜逃的流放犯是没有任何牵挂的。但莫罗将军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和另一种地位的人。莫罗是法军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是个野心家，但是个不很坚决的野心家。他很久以前，在雾月 18 日，当拿破仑决定夺取他所没有决心去夺取的东西的时候，就仇恨拿破仑了。他从那时起就采取了沉默的反对立场。有些雅各宾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共和派；了解他的保王党深信，由于他仇恨第一执政，他将会同意帮助他们。

仇恨拿破仑是莫罗的主导情感，但不能因此而设想，他会让波旁来继王位。不管怎样，他了解密谋而不告密，就已经把他拖下水来了。和英国政府的密探保持经常的接触的皮什格鲁一再向英国人和保王党说明，莫罗同意予以协助。但莫罗拒绝同卡杜达尔接谈，对皮

什格鲁则明确地表示，同意采取行动来反对拿破仑，但不愿为波旁王朝服务。正在谈判这些问题的时候，拿破仑的警察当局就发觉了这个密谋，逐日向第一执政报告所发现的新情况。

1804 年 2 月 15 日，莫罗将军在自己住宅中被捕，八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由于自己最好的朋友、进行秘密活动的住宅的房东，接受了三十万法郎赏金而向警察当局告密，皮什格鲁也被捕了。一再进行审问，但皮什格鲁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拿破仑派代表来见莫罗，告诉他说，假如他承认曾同卡杜达尔会晤过，他就会得到宽赦和自由。莫罗拒绝了。被捕四十天以后，人们发现皮什格鲁在禁闭室里用自己的领带吊死了。从那时起一直流传着一种议论，说这不是自杀，而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执行的谋杀。拿破仑后来以轻蔑的口吻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我有法庭可以审判皮什格鲁，我可以派兵去枪毙他。我从来都不干这种无益的事情"。但这种传说之所以能够使人相信，特别是因为在皮什格鲁秘密死去之前的几天，发生了一个震撼法国和欧洲的上层人士的十分意外的事件：波旁王室的成员当甘公爵被枪毙了。

自从莫罗和皮什格鲁被捕以及其他与密谋有关的人陆续被捕以来，拿破仑几乎一直在大发雷霆。他知道这是英国人指使干的，他也知道波旁王朝的人在密谋中起领导作用。他已经知道，英国人在 1803 年夏末就把乔治·卡杜达尔送到了法国，他是带着英国钱和查理·阿图瓦的指令到法国来的，他在巴黎每天都可以一个人进行暗杀活动，或者同一伙人一起进行暗杀活动。拿破仑有一次发脾气时说道，波旁王族以为他不会对他们的谋杀活动进行相应的报复，那是妄想。这个吼声，塔列朗也听到了；他为了阿谀奉承，同时为了自身安全，向憎恨他的保王党报复起见，便向拿破仑说："显然，波旁家族以为，您的血没有他们的血那样高贵。"这句话把拿破仑气得简直达到发狂的程度。这时第一次提到了当甘公爵的名字。狂怒的拿破仑

立即召集了由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富歇和塔列朗参加）决定逮捕当甘公爵。有两个困难：一个是当甘不住在法国，住在巴登；一个是他和被揭穿的密谋没有任何关系。但第一个困难对拿破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当时就已经支配着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象在本国一样。第二个困难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事先就决定把公爵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而军事法庭是不需要去找什么证据的。命令马上就下达了。

当甘公爵住在巴登的埃登海姆城，根本没有想到大祸即将临头。1804 年 3 月 14 日晚上，一队法国宪兵马队闯入巴登，进入埃登海姆城，包围了住宅，逮捕了当甘公爵，马上把他押往法国。看来，巴登的大臣们已经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己没有同公爵一道被带走，在这一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巴登当局之中谁都不敢抱活命的希望。3 月 20 日，公爵被带到了法国，被关在溫森斯城堡中。3 月 20 日晚上，军事法庭在溫森斯城堡中开审。当甘公爵被控告曾从英国拿钱，参与对法战爭。在深夜两点四十五分，他被宣判死刑。他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并请求把这封信交给拿破仑本人。军事法庭庭长于兰（攻占巴士底狱的英雄之一）想以法庭的名义给拿破仑写一份呈请减轻判刑的信件，但杜伊勒里宫特别派来监视审判的萨瓦利将军从于兰的手里夺过了笔，并声称："您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应该由我来办了。"早晨三点钟，当甘公爵被拖到溫森斯战壕，在那里被枪毙。

当拿破仑读到当甘公爵临死以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说，假如早读到这封信的话，他会予以赦免的。他这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陷入沉思，谁都不敢同他讲话。后来他又认为，他是做得完全正确的，处死公爵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应该给波旁王朝以严厉的警告。

在枪毙公爵的前几天，终于逮捕了卡杜达尔。在街上逮捕他的时候，他曾拚命进行顽抗，有几个密探被他打死了，有几个被打成残

废，他和他的同伴被送上断头台。莫罗将军被逐出法国。

三

3月间，在枪毙了当甘公爵，正准备审讯卡杜达尔的时候，在巴黎，紧接着在外省，都流传着一种风声，说卡杜达尔及其同伙在干掉第一执政以后，正是要当甘公爵登上王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种传说给拿破仑帮了很大的忙。装扮成是人民的代表机关，但其组成人员全是第一执政的走卒及其意志的执行者的法案评议委员会、立法院和议会，都直截了当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开始谈到必须永远结束这种情况：全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死，以及法国的一切敌人可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暗害活动上。结论是很明显的：终身的执政职应当变成世袭的君主制度。

这样一来，继第5—8世纪的梅罗温王朝、第8—10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第10世纪至1792年路易十六（革命时期，把他叫做路易·加贝）被推翻为止的加贝王朝（后来分为两个家族：一是瓦路亚家族，一是波旁家族）之后，统治法国的就该是“第四王朝”即拿破仑王朝。1792年8月10日成立的共和国又要变成君主国了。

可是，拿破仑这个新王朝不应该象过去的王朝那样沿用国王的称号。新统治者打算采用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加冕以后第一次取得的皇帝的称号。现在，一千年以后，在1804年，拿破仑公开宣称，他要象查理大帝那样，成为西方的皇帝，他不是继承过去法国国王的遗产，而是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

但要知道，查理大帝的帝国本身也只是恢复和继承另一个要大得多的罗马帝国的尝试。拿破仑想要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西方文明列国的统一者。后来他终于把比查理大帝曾经占有的领土大得多的领地置于自己直接统治或间接管制之下。在1812年远征俄国

以前，拿破仑的巨大的帝国（即使不算罗马在北非和小亚细亚的领地，只算欧洲部分）比罗马帝国还大，也富足得多，人口也多得多。但在初期，当欧洲得知拿破仑的恢复查理大帝帝国的计划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狂妄自大，是盲动的征服者向整个文明世界发出的疯狂的挑衅。

各国大使密切注视着在乔治·卡杜达尔的密谋被揭发和当甘公爵被枪毙以后，法国那样明显地突然急剧地向君主国演变。经过周密计划的纯粹保王党式的乔治·卡杜达尔的密谋使人们大为震动。随着侦讯和审判的消息的公布，大资产阶级和购买了寺院与流亡者被没收的土地的人们，更想巩固拿破仑所建立的政权和制度，坚决不使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受到旧时的主人——贵族的侵害。1804年4月18日，议会通过了一项决定，授与第一执政波拿巴·拿破仑以法国世袭皇帝的称号。全民投票的形式比1799年雾月政变以后更加容易地做到了。

不满的情绪还是很强烈的，尽管早在1802年人们就已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大资产阶级完全支持拿破仑的这个政治行动，认为君主制度的恢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当然，坚定的共和派是不会容忍这种状况的。他们回忆起了革命的年代、幻想自由平等的年代以及对戴上王冠的暴君的强烈的诅咒。有些人认为，拿破仑给自己震动全球的名字加上一个封号，这就降低了自己的荣誉。“当了拿破仑，还要当皇帝！这简直贬低了自己！”——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著名的政论家和批评家波里·路易·库里叶后来这样感叹道。为拿破仑所鼓舞的贝多芬曾把“英雄交响乐”献给他，但是当他知道拿破仑从一个公民变成了皇帝以后，就不把这支交响乐献给他了。当满身金光闪闪的大臣、将军和服饰华丽的宫廷妇女第一次在杜伊勒里宫的大厅里向新皇帝祝贺的时候，只有几个得悉内情的人知道，新统治者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登极典礼已经结束，他并不只是重复一下查理大帝

那一套。拿破仑想要罗马教皇亲自参加他的即将举行的加冕典礼，象一千年以前，在公元 800 年对查理大帝那样。同时拿破仑还决定作某些相当重要的修改：查理大帝是自己到罗马教皇那里去加冕的，而拿破仑却想要罗马教皇到巴黎他这里来。

庇护七世听说拿破仑皇帝的这个愿望以后，感到非常惊恐和气愤。他的亲信尽力用历史上的先例来安慰他。这里也提到了累昂教皇，说他有一次（第 5 世纪中叶）就曾无可奈何地、心情阴郁地去见匈奴的领袖阿提拉；后者总不会比新的法国皇帝更有教养、更知礼节、更加温文尔雅。并且去巴黎是根本不能拒绝的。罗马处于驻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拿破仑军队的威胁下。

经过短时间的考虑之后，教皇决定满足拿破仑的要求，但还是要讲价钱，要求退还几块被拿破仑占领的意大利茨科省北部的教皇领地。但教皇庇护七世、红衣主教孔萨尔维、甚至整个红衣主教会议在玩弄阴谋诡计方面根本不是第一流外交家拿破仑的对手。教皇用了许多诡计，诉了许多苦，一再使用诡计，一再诉苦，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弄到手，结果带着拿破仑所给予的一线希望前往巴黎：到巴黎以后也许会得到点什么。他到了巴黎，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拿破仑在加冕前和加冕时表现出来的两面派手法是很有意思的。教皇是他所需要的，因为当时世界上有千百万人，特别是大部分法国人，在宗教上是相信教皇的。就是说，教皇应该是加冕的必要的点缀品，特别是因为他要复活查理大帝的那种权利和野心。但另一方面，拿破仑自己又把庇护七世看成是黄教僧和巫神，甚至是有意识地在教堂内外靠各种各样的咒语和诡计来利用人们的愚蠢的人。他向教皇发出邀请以后，答应红衣主教，说他要去迎接他。他也确实去迎接了，但他是穿着猎人服装，带着猎人、管猎犬的人和猎犬，在离巴黎不远而离他当时居住的城郊宫殿只有几步路的枫丹白露森林迎接庇护七世的。教皇的马车停了下来，有人请教皇下了马车，走过一条道路，踏上皇帝

的马车，而这辆马车根本就没有去迎接他。教皇在巴黎的整个停留期间，他都是这样对待教皇的。

1804 年 12 月 2 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为拿破仑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当宫廷的络绎不绝的金碧辉煌的马车车队载着所有的宫廷权贵、大臣、将军、官员、教皇和红衣主教向圣母院大教堂进发的时候，数不清的人群都在望着这个光辉夺目的车队。同时，顺带说一句，在这一天，有些地方人们都在重复传述着一句话。根据历史的传说，传述这句话的有各种各样的人。这句话似乎是一个老共和派军人说的。当时，拿破仑问这个军人说，他是否喜欢这样隆重的场面。这个共和派老战士回答说："这太好了，陛下。但遗憾的是，今天少了三十万人把自己的头割下来，以便使诸如此类的仪式不可能进行下去。"这句传奇般的话有时被认为是在拿破仑同罗马教廷签订条约时说的。但这种话不管是对这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场合，都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拿破仑对加冕的主要仪式做了一个教皇所根本没有意料到的、与预定计划相违背的十分特别的修改：象一千年前庇护七世的前辈圣皮埃尔主教给查理大帝戴上皇冠一样，当庇护七世在隆重的时刻举起很大的皇冠要给皇帝戴上的时候，拿破仑突然从教皇手里夺过皇冠，自己戴上，接着他的夫人约瑟芬跪在皇帝面前，他把一个比较小一些的皇冠给她戴上。这种自己给自己戴皇冠的做法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拿破仑不想使教皇的"祝福"在这个仪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想从任何人手里，而只想从自己手里接受皇冠，更不能从他认为应当考虑其影响、但自己并不喜欢、也不尊重的宗教组织的首领的手里接受皇冠。

皇宫、首都和外省的庆祝活动进行了好几天，到处张灯结彩，鸣炮敲钟，音乐声不绝于耳。拿破仑在这大事庆祝的日子里就已知道，帝国又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危险。在加冕以前，他就收到了许

多情报，这些情报使他完全肯定，威廉·皮特在卡杜达尔的密谋破产以后，在加倍努力进行外交活动，要建立新的从革命战争开始后已经是第三次的反法联盟，而且这个联盟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八章　第三次联盟的崩溃

(1805—1806 年)

一

欧洲列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法联盟于 1792 年拿破仑执政前就开始了对法战争，但在 1797 年被战胜并彻底瓦解，结果奥国代表同拿破仑将军在坎波福米奥签订了和约。欧洲的这些国家利用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机，又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战争。但是，这第二次联盟又被得胜还朝的拿破仑所击败，在保罗一世退出联盟、奥地利被迫于 1801 年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以后，也宣告解体。现在，1805 年，拿破仑又第三次面临着全副武装的欧洲头等强国的联盟。面前又是一次重大的实力考验。

拿破仑在 1804—1805 年曾经考虑在英国境内进行“帝国战争”，“占领伦敦和英格兰银行”，结果在 1805 年虽然他还是跟同样的敌人作战，但是这场战争不是在伦敦附近，而是在维也纳附近结束的。

威廉·皮特不惜付出千百万英镑，着手组织新的联盟。一向自信若定的英国开始陷入了真正的慌乱状态。拿破仑设置的布伦军营在 1804 年末和 1805 年上半年已经成为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装备精良的军队驻扎在布伦，等待英吉利海峡降雾和登船起航的信号。在英国已有人企图组织一种类似民兵的军队。这样，英国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联盟上。

奥地利也倾向于进行新战争的主张。吕内维尔和约给它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主要的是，拿破仑在此以后非常专横地支配着西部和南部的各德意志小国，因此对奥地利帝国来说，新的战争是使自己

免于沦为二等国家的唯一希望。况且这次战争还可以由英国出钱来打。几乎在同奥国进行这种秘密谈判的同时，威廉·皮特还同俄国进行了这种谈判。

拿破仑知道，英国对这次战争抱着很大的期望，因为它指望大陆上的俄国和奥国会和它共同作战。他也知道，对他在签订吕内维尔和约以后侵占了西德很多地区深为不满和张皇失措的奥地利，是十分重视英国内阁的劝告的。还在 1803 年，第一执政官就宣称，只要英国在大陆上的可能的盟国或“走卒”(les salariés，他这样轻蔑地称呼它们)未被击溃，他就不认为对英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假如奥地利出来干预，这就说明，正是英国逼迫我们占领欧洲。”——他这样对塔列朗说道。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即位以后，就停止了他父亲已经开始进行的同拿破仑成立联盟的一切谈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使他父亲得了“中风症”的策划过程，而且他自己在筹划这件事情当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年轻的沙皇还知道，向英国销售农产原料和粮食的贵族是多么关心同英国的友谊。除了所有这些理由而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早在 1804 年春就完全可以预料到，英国、奥国、那不勒斯王国(当时以为它会参加)以及普鲁士都会参加新的联盟：当时普鲁士也因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行动而深感不安。这是俄国参与反对法国独裁者的战争的最好机会，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拿破仑要对付这么多的敌人，财力和人力都是不够的。

枪毙当甘公爵的事件发生以后，早就准备进行活动的整个君主制的欧洲，顺利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来反对杀害波旁王室的亲王的“科西嘉恶魔”。当时决定尽量利用这个恰巧发生的事件，起初人们都提议巴登大公对逮捕当甘公爵时严重破坏巴登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行为提出抗议，但被吓得心惊肉跳的巴登大公却装

聋作哑，甚至于急忙通过别人探听拿破仑对巴登当局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是否满意，法国宪兵当局要求他们做的一切，他们是否很好地做到了。其他一些君主也只是在狭窄的家庭圈子内悄悄地表示不满。一般说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活动的勇敢程度，必定和他们国家跟拿破仑的距离成正比例。正因为如此，俄国皇帝表现得最坚决。亚历山大正式提出一份特别照会，从国际法的角度抗议破坏巴登领土的不可侵犯性。

拿破仑命令自己的外交大臣作了有名的答复；亚历山大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这个答复，因为在他一生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凶狠地侮辱过他。这个答复的内容是：当甘公爵是因为参加谋杀拿破仑的阴谋被捕的；假定亚历山大皇帝知道，杀害他已死的父亲保罗皇帝的凶手是在外国，而且可能抓到，同时假定亚历山大事实上已经逮捕了他们，那末他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这种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是不会提出抗议的。不可能比这些话更明显地公开而正式地指明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了。整个欧洲都很清楚，密谋者是同亚历山大串通以后杀害保罗的，年轻的沙皇在登极以后丝毫不敢触动这些人：不管是帕伦，本尼格森，祖波夫，还是塔里津，总之不管是谁，他都不敢动一下，尽管这些人非常安详地不是呆在“他国领土”上，而是呆在彼得堡，并且经常到冬宫去。

如前所述，亚历山大对这个残酷无情的侮辱者的仇恨，在整个贵族和宫廷中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响。

为了扩大自己军事措施的阶级基础，取得社会自由阶层的同情，准备加入第三次联盟，亚历山大在自己的谕告中对拿破仑的专制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灭亡表示痛心疾首。这是一种掩饰得不很巧妙的伪善行径：亚历山大从来都没有丝毫关心过法兰西共和国的命运，但他很准确地感觉到，法国变成专制帝国这个事情本身，破坏了拿破仑在法国和欧洲一部分社会阶层中的道德威望，在那些仍然向往着过去

的革命的人们中间的威望。这个农奴制帝国的领主和暴君对拿破仑发出自由主义的谴责，说他是一个暴君，这也是第三次联盟准备对新的法兰西帝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夜的奇谈之一。

威廉·皮特毫不犹疑地同意拨款援助俄国，而在此之前，他还表示要拨款帮助奥地利、那不勒斯、普鲁士和所有愿意拿起武器反对拿破仑的国家。

法国皇帝在这期间做了些什么呢？他当然知道自己敌人的外交把戏，但由于结成联盟的事进展缓慢（尽管皮特非常卖力），同时拿破仑到 1805 年就感到，奥地利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于是他就一面继续准备在英国登陆，一面在欧洲为所欲为，似乎在这个地区，除了他就没有任何人一样。他想吞并皮埃蒙特，就吞并了；想吞并热那亚和卢加，就吞并了；想成为意大利国王，并在米兰加冕，就加冕了（1805 年 5 月 28 日）；想把德国一些小块领地给予自己的德意志“盟国”即附庸国（如巴伐利亚），也就给了。

德意志诸国的王公，西欧土地的领主，从 1801 年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完全被扔开以后，把祈求苟安的全部期望都寄托在拿破仑身上。他们聚集在巴黎所有宫殿和各部的前厅里，一再表示自己的忠心，请求恩赐一小块邻国的领土，他们相互告发，相互暗算，在拿破仑身旁转来转去，向塔列朗一再哀求和行贿，甚至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有过这样的场面：在杜伊勒里宫，一个德意志小国的君主站在玩纸牌的拿破仑的椅子旁边，不时弯下身去，匆匆地吻拿破仑的手，而皇帝根本不理睬他。起初，拿破仑的群臣还带着某种惊奇的神情看着这种场面，后来就不再惊奇了。

二

1805 年秋季到来了。拿破仑向自己的海军将领宣布，现在已经

不是需要三天，而是两天，甚至只要一天，如果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没有风暴，不碰上英国海军，他就可以在英国登陆。雾季快到了。拿破仑早就命令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从地中海前往英吉利海峡，与驻守英吉利海峡的舰队合并，以便用联合起来的力量渡过海峡，在英国登陆。但突然几乎是在一天里面，给正在布伦自己军队中的皇帝送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个是海军上将维尔纳夫不能很快执行他的命令，一个是俄军已经出发前来与奥军会师，奥军准备对他以及他的德意志盟国展开进攻，敌军正在向西方推进。

拿破仑立刻毫不犹疑地采取了新的决定。当他亲眼看到威廉·皮特总算终于挽救了英国、根本不能再去考虑登陆的时候，他就立即召见了自己的总军务官达律，要他向各军团司令官传达事先拟定的新的作战部署：不是进攻英国，而是进攻奥国和俄国。这是8月27日的事。

布伦军营，两年来为组织这个军营而进行的全部工作，以及征服顽强的仅一海之隔就难以接近的敌人的全部幻想，都宣告破产了："即使我十五天以后不能在伦敦，也要在11月中旬在维也纳出现。"——皇帝在没有接到使他彻底改变最近的打算的消息以前还是这样说的。伦敦得救了，但维也纳却要为此付出代价。接连几小时，他口述了新的作战部署。他向一切方面发出命令，要募集新兵来补充后备力量，要军队在经过法国和巴伐利亚去迎击敌人期间保证供应。信使带着新的外交指令、恫吓、命令、建议和诱饵，前往柏林、马德里、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巴黎呈现出一片惶惶不安和某种惊慌失措的景象：有人向拿破仑报告说，商人、股票经纪人、工业家都在暗中抱怨他这样热中于吞并他国领土和他的不顾一切的对外政策，认为全欧发起新的大规模的反法战争是他的罪过。尽管这种抱怨是私下发出的、不敢公开表示出来，但却已经存在。

尽管如此，几天以后，拿破仑还是利用了他所建立的严密的军事

组织，动员了庞大的布伦军营，安排好了准备远征的军队，用新的编制加强了这支军队，从英吉利海峡岸边出发，经过整个法国，开往与法国结成联盟的巴伐利亚。

拿破仑进军非常迅速，从北面绕过了驻扎在多瑙河上的奥军（其左翼是乌尔姆要塞）。

第三次联盟的主要成员早在 1804 年年中就原则上决定成立这个联盟，过了一年半，即到 1805 年秋才走上战场，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在这一次准备得特别好些，保证有最大的可能取得胜利。奥军的装备和组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麦克的军队要同拿破仑的先头部队打第一个回合，因此对它的期望就特别大。这第一个回合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奥国、英国、俄国以及整个欧洲都预料麦克会取得胜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师团训练很好、装备精良，而且是因为联盟的首领预计到，拿破仑不会立即完全动用自己的布伦军营，不会把自己全部力量从布伦开往东南方，即使开去，也不可能很快就把这些军队开往和集中到目的地。

麦克进入巴伐利亚以后，深信拿破仑也会直奔巴伐利亚。二等国的中立，不论是在拿破仑执政以前、执政期间还是执政以后，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形式上的。巴伐利亚的选侯表现动摇，战战兢兢。以英国为首的英奥俄的强大联盟对他进行威胁，要求与之结成联盟；拿破仑也对他进行威胁，要求与他结成联盟。选侯起初同联盟国秘密结成联盟，答应在已经开始的战争中，尽力帮助奥军，但过了几天，考虑成熟以后，又带领自己全家和大臣们逃往维尔次堡（一支由贝尔纳多特指挥的法军队伍已经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开往这个城市），从而完全转到拿破仑这边。

符腾堡选侯和巴登大公爵很快地也有了这样的变化。“他们咬紧牙关，使自己的日耳曼人的心暂时停止跳动”，——后来德国的中学课本这样沉痛地谈到这个事件。为了表彰他们对自己日耳曼人的

心灵要求所作的这种英勇的反抗，拿破仑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选侯为国王，他们以及后来他们的后代一直沿用这个称号到 1918 年 11 月革命，巴登大公爵也和这两个新国王一样，得到了奥地利一些土地，作为奖励。他们还请求给一些钱，但遭到拿破仑的拒绝。

去巴伐利亚的路打通了。元帅们奉命加速前进，他们从各个方面，以最大的速度，奔向多瑙河。贝尔纳多特、达乌、苏尔特、拉纳、内伊、马尔蒙、奥热罗等元帅指挥的军团和缪拉的骑兵队，得到皇帝的确切命令以后，象当时一个普鲁士军事观察家所形容的那样，象时钟一样准确地执行了这些命令。在不到三个星期、不满二十天的时间内，这支当时庞大的军队从英吉利海峡开到了多瑙河几乎没有一个病号和掉队的。拿破仑对军事艺术下了许多定义，其中有一次他说道，军事艺术就在于善于使军队“宿营时化整为零，作战时化零为整”。元帅们沿着皇帝指定的许多道路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给养，不致堵塞道路，而到了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聚集在乌尔姆周围，麦克及其奥军劲旅就象装进袋子里一样，被困得喘不过气来。

9 月 24 日，拿破仑从巴黎动身，26 日到了斯特拉斯堡，军队马上开始渡过莱茵河。拿破仑从战争一开始，在向斯特拉斯堡前进的途中，立即彻底调整了军队的组织。这里应该稍稍谈一下调整的情况。

为了区别于其他远离战场的卫戍部队和占领军团，开往奥地利的军队叫做大军。大军分成七个军团，军团由拿破仑加冕后提升为元帅的那些最优秀的将领指挥。

七个军团共有十八万六千人。每个军团都有步兵、骑兵、炮兵以及所有军队必须设立的机关。拿破仑的想法是要使每个军团本身都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主要的炮兵和骑兵队伍不隶属于某一个元帅，不编入这七个军团，而单独组成大军的特种部队，由皇帝本人直接指挥：例如被拿破仑任命为骑兵队(有四万四千人)的司令的缪拉

元帅，只是他的助手，是他的命令的传达者和执行者。拿破仑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用整个炮兵队和骑兵队来支援某一个军团。

皇帝的近卫军与七个军团、炮兵、骑兵完全无关，它是单独存在的。这是特别选拔出来的七千人(后来他们的人数又有所增加，这里只是指 1805 年)；近卫军包括几个团的步兵掷弹兵和步兵狙击兵、骑兵掷弹兵和骑兵狙击兵、两个骑兵宪兵连、一个在埃及募集来的近卫骑兵连以及一个“意大利营”(因为拿破仑不仅是法国的皇帝，而且是他所占领的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国王)。诚然，在近卫军的这个“意大利营”里，法国人比意大利人多。皇帝的近卫军全是出类拔萃的士兵。他们有薪金，吃得好，住在离皇帝大本营很近的地方，穿着特别漂亮的军服，戴着高大的熊皮帽子。在这些士兵中间，有许多人拿破仑都认识，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

拿破仑非常注意物色指挥人员，他会毫不犹疑地授予还不够四十岁的人以将军“证书”。他的一些元帅在当上元帅时还只有三十四岁。在拿破仑提升军官的过程中，年轻是积极的因素，不象当时所有的军队中那样是消极的因素。

拿破仑执行的纪律是很特别的。他不允许在军队中实行体罚。犯有严重过错的人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或服苦役，对情节较轻的人则关进军人监狱。

当时有一种有特别权威的机构——同志审判会，这个组织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但得到拿破仑的默认，在大军中推行。目击者这样谈到这个机构。战斗开始了。连队里面有人发现，有两名士兵在战斗期间谁都没有看到过。他们在战斗结束时才出现，并承认了自己没有参加战斗。连队确认，这两个罪犯完全是由于胆怯而躲藏起来了，于是立即从士兵中间选出三个法官。他们听取了被告的申诉，判处他们死刑，并且就地执行。这一切，上级全都了解，但并不干预。事情就到此为止。任何一个军官，不但不应该参加审判，而且连枪毙的

事都不应该知道(至少是不应该正式知道)。

作为一个宣布为世袭皇帝的独裁者,由教皇加冕的皇帝,从1810年起成为奥地利王室的亲戚的拿破仑,却善于使自己的部下确信,他和他们都象过去一样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波旁王朝和干涉者的侵犯,他象过去一样,只是法国的第一名士兵。实际上,在他的眼里,士兵只是"炮灰",他经常这样说,但士兵们由于对他盲目信任和服从,还给他起了一些亲热的、温存的、可爱的绰号。他是威慑四方的恺撒,欧洲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皇帝们在他面前匍伏跪拜,但士兵们却把他看成一名士兵,他们在私下交谈中间,称他为"小伍长"、"小和尚(le petit tondu)"等。

他们也相信,拿破仑所说的"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不是一句空话;他们高兴地回忆起,缪拉、贝尔纳多特、勒费弗尔以及帝国的其他许多杰出的将军是从哪个军衔开始服役的。

拿破仑对所有的士兵和军官都是完全信任的,而对将军和元帅,就不是全体都信任,也不是完完全全信任他们。至于谈到元帅们在军事上的作用,那是这样的:拿破仑身边有一大批有才干的军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互不相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尽管程度不同)迅速的判断力和对客观形势的理解力,他们善于迅速做出决定,而且具有能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突然找到出路的军人的敏感,以及在紧要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而主要的是,拿破仑教会了他们从片语只字里就能掌握他的思想,然后独立地进一步去发挥这个思想。

拿破仑的战略天才使得元帅们成了他的意志的最准确的执行者,但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在战场上发挥独创性。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勇士勒费弗尔,冷酷的铁石心肠的贵族达乌,威风凛凛的骑兵将军缪拉,制图专家贝尔蒂埃,所有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有独创精神的战术家。内伊或拉纳等勇士在这方面丝毫不次于狡猾的谨慎的贝尔纳多特、有

条理的马塞纳或是冷漠而沉着的马尔蒙。当然，个人的勇敢在他们身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在这方面，他们养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有一次，当人们对拉纳元帅多次率领骠骑兵团冲锋的英勇行为表示赞赏的时候，在场的拉纳却带着遗憾的神情喊道："一个骠骑兵到三十岁还没有被打死，这不是骠骑兵，而是废物！"他说这话的时候才三十四岁，两年以后，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阵亡了。拉纳不仅是个勇敢的骠骑兵，而且是个能干的统帅。拿破仑亲自选拔并提升为最高将领的助手就是这样一些人。

当 1805 年同第三次联盟开战的时候，这些人几乎全都健在。只有德塞在马伦哥战役中阵亡了，还有一个几乎被拿破仑认为是最卓越的将领的人也不在，这就是被驱逐的莫罗，当时他住在美国。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和有这样一批助手的拿破仑，当时正处在天才焕发的黄金时代。

苏尔特和拉纳的军团和缪拉的骑兵队渡过多瑙河，突然出现在麦克的后方。一支奥军队伍发现危险后，赶紧向东逃去，但大部分军队被内伊赶进要塞。麦克四面被困。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撤退，但麦克上了拿破仑派去的以著名的舒尔迈斯特为首的狡猾的间谍的当：他们一再向麦克说，应当固守阵地，拿破仑很快就会撤回，因为巴黎发生了反对拿破仑的起义。当麦克表示不相信的时候，间谍就向法军军营通风报信，于是军营就用军中印刷机印了一期载有巴黎发生革命的假消息的巴黎报纸专号。暗探把这一期报纸交给了麦克。麦克读了这份报纸，也就放心了。

10 月 15 日，内伊和拉纳元帅强夺了乌尔姆周围的高地。麦克陷入了绝境。拿破仑派去一名军使，要求麦克缴械投降，并警告说，假如他攻下乌尔姆，任何人都不会得到宽恕。1805 年 10 月 20 日，麦克的残存部队连同所有弹药、大炮、军旗以及乌尔姆要塞都交给了胜利者。拿破仑把麦克释放了，把投降的军队送到法国去做各种工

作。过了一段时间，拿破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缪拉又俘虏了在乌尔姆要塞陷落以前侥幸逃走的八千人。

在乌尔姆遭到屈辱的惨败以后，第三次联盟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了，不过在奥军和俄军司令部里，只有很少的人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拿破仑及其元帅们没有在乌尔姆停留，就从多瑙河右岸直奔维也纳。在以后的追击中，法军又抓了大批俘虏。把在乌尔姆以前的几次战斗中抓到的计算在内，他们一共抓了将近二万九千名俘虏。如果把乌尔姆战役中抓到的三万二千名俘虏也计算进去，那么单是俘虏就有六万一千人；阵亡的、未被俘虏的重伤病号和失踪的还未计算在内。

“二百门大炮、九十面军旗、所有的将军，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支军队只有一万五千人得救。”——拿破仑在一次特别通告中，向自己的士兵们这样谈到最初几个战役的战果。

法军继续迅速向维也纳推进。但库图佐夫的军队在多瑙河左岸的敦斯坦对莫蒂埃的军团还是展开了攻击（11 月 11 日），使莫蒂埃遭到严重的失败。11 月 13 日，拿破仑以缪拉的骑兵队为先导，在自己近卫军的护卫下，进入维也纳。他住在维也纳城郊的肖恩布鲁恩皇宫里。从维也纳逃走的奥国皇帝弗兰茨在慌忙出逃以前曾向拿破仑建议媾和，但拿破仑没有同意。

从现在起，第三次联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俄国军队和俄国皇帝身上，而俄国皇帝则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要普鲁士加入联盟这一点上。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的希望，都很快地成了泡影。

三

1805 年 10 月，即当麦克困守乌尔姆、准备投降和已经率领全军投降的时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正在柏林敦促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

希·威廉三世向拿破仑宣战。威廉也和前面提到的南德的选侯一样，战战兢兢，犹豫不决。他既怕亚历山大，又怕拿破仑。起初亚历山大甚至想用威胁的口吻暗示俄军将强行通过普鲁士领土，但当这位国王表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强硬态度和准备进行反抗的时候，亚历山大就开始采用软功。这时恰巧又传来消息说，拿破仑命令贝尔纳多特元帅经过普鲁士的南部领地——安斯巴赫去奥地利。破坏中立已经成为事实，国王一方面因为受到拿破仑的专横的侮辱，另一方面，还没有估计到拿破仑大军的胜利(这时还在乌尔姆投降以前)，就同意站到第三次联盟方面来，投入战争。结果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亚历山大订立了秘密条约；条约规定普鲁士向拿破仑提出某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接着演出了极端荒唐的一场戏：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后路易莎和亚历山大来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陵墓里，在他的棺木前宣誓永远友好。这出戏富有当时流行的那种多情善感的情调，它的荒唐性就在于，俄国以前就同这位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行过七年战争，不是弗里德里希打俄国人，便是俄国人狠狠地打弗里德里希，并且占领过柏林，迫使国王险些自杀。而这样可笑地表演了俄德永恒的热烈的友谊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就离开了柏林，直赴奥地利战场。

在英国和奥国，人们欢欣若狂。如果普鲁士全军越过鲁特山脉出现在战场上，那拿破仑马上就会完蛋。当报纸欣慰地谈到俄普两国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灵前的感人的誓言时，就是这样估计的。

拿破仑无论如何必须在普鲁士尚未参加联盟以前，就展开战斗。法军在占领维也纳之后，马上一弹未发就夺下了奥军不知为什么缘故唯一没有破坏的一座连接维也纳和多瑙河左岸的大桥。关于夺取这座桥的事，有许多荒唐不经的传说。看过《战争与和平》第2卷的读者，就熟悉这种传说中的一个，而该书中的那个传说也是不很准确的，有些添枝加叶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缪拉、拉纳、贝尔特朗和一个工兵团长(道特)把一个掷弹兵营巧妙地隐藏在灌木林中，自己不加

掩护地走向桥头堡，向张皇失措的奥军(他们曾经接到一项命令：一出现敌人，就把桥炸掉)宣布，说已经达成停战协议，然后就走过桥去，唤出将军奥斯贝尔公爵，把同样的关于停战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未等奥斯贝尔回答，法军掷弹兵就按规定的信号，突然从灌木林中跳出来，向奥军和架在桥上的大炮冲去。只用一分钟，法军一个营就把桥拿了下来；奥军想要进行抵抗，但很快就被粉碎了。

拿破仑听取了十分兴奋的缪拉关于这个惊人事件的报告以后，连一小时也不耽搁，马上命令过桥，直扑俄军。俄军的艰难的时刻到来了。拿破仑率领主力在维也纳附近渡过多瑙河，极力想切断俄军往北方的退路。联军总司令库图佐夫清楚地看到，从克雷姆斯迅速撤到奥尔莫乌茨以南的奥里汕阵地，是唯一的出路：他有四万五千人，拿破仑却有将近十万人。维也纳大桥的丢失对俄军来说显得如此之荒唐与出乎意料，它根本无法理解这座桥被占领的经过。俄军愤慨地谈论着奥军的叛变，说奥军已私下与拿破仑订立了密约。大桥的丢失使拿破仑不费一弹就占领了多瑙河左岸，而这必然会使俄军遭到全军覆没。为了让主力部队有时间撤走，库图佐夫留下了几个决死的后卫队作掩护。经过几次浴血的掩护战以后，在大约四万五千人中牺牲了近一万二千人，剩下的军队也已疲惫不堪。但是库图佐夫终于避免了一直威胁着他的可耻的投降，并且摆脱了拿破仑的追兵，把残存部队带到了奥尔莫乌茨。两个皇帝——亚历山大与弗兰茨都在这里。

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刚刚从俄国调来了一个近卫军，还有增援部队；所有俄国军队，包括库图佐夫带到奥尔莫乌茨及其近郊的军队在内，一共有七万五千人。而奥军这时剩下了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不能忘记，奥军的一支强大的部队，拿破仑在占领维也纳以前就已把它消灭了；而另一支更大的装备更好的队伍，这时正在威尼斯地区抗击马塞纳元帅的军队；拿破仑曾命令马塞纳元帅肃清北意大利

的东部。这样一来，联军在奥尔莫乌茨附近顶多只有九万人。但库图佐夫比任何人都清楚，绝不是纸上有名的所有这七万五千人都能作战，能作战的人要少得多。他担心进行战斗不利，认为应该继续撤退（这个撤退在拿破仑突然渡过多瑙河以后就开始了），应该继续向东撤退，等待时机，拖延战局，使普军有时间最后决定投入反法战争。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到了最有力的反对：亚历山大皇帝主张立即进行决战。

亚历山大一世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但他为荣誉心所趋，又自信取胜是毫无问题的，认为普鲁士的迅速参战（在弗里德里希灵前进行了有名的宣誓以后）也是绝对有把握的，就投入了战斗。在沙皇看来，有刚刚调来的生力军——近卫军，又有庞大的军队而还要逃走，还要在这个贫穷的多山的国家藏匿几个月，躲避拿破仑，这是可耻的、不必要的。他所喜欢的年轻的侍从武官长彼得·道戈路柯夫公爵之所以是他的亲信，也就是因为他和几乎所有的近卫军军官一样，支持他的意见。库图佐夫知道，不论是沙皇，还是道戈路柯夫，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人，在军事问题上，都是十足的草包，虽然其中有些人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聪明。尽管库图佐夫深信，俄国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必须避开拿破仑，不要浪费时间，赶快退却，走得远些，避免决战，但他对沙皇的足以致命的轻举妄动不能坚决反对，因为全部权力都集中在亚历山大的手里。

库图佐夫在俄奥军队中是唯一的真正的统帅，唯一的明察秋毫的人（在那些发言多少有些作用的人中间）①，人们毕竟还是听从他的。但这时，一种使库图佐夫无可奈何的力量参与了进来，尽管他本人已猜透了拿破仑的把戏。

当俄军在奥尔莫乌茨停下来的时候，追赶俄军的拿破仑也突然连同自己的大本营在离奥尔莫乌茨不远的布尔诺停了下来。拿破仑

① 巴格拉吉昂对沙皇没有影响。

这时只怕俄军撤走和拖延战争。远离法国的拿破仑知道普鲁士的豪格维茨正带了最后通牒来见他，他很希望赶快进行决战：他完全相信会取得胜利，这样就会马上结束战争。他的外交天才和演员天才在这些日子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猜到了俄军司令部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从中帮助亚历山大来反对库图佐夫，因为库图佐夫正在尽最后微弱的努力，以便尽快地撤退，拯救俄军。拿破仑象演员一样，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张皇失措、软弱无能、尤其害怕作战的人。他必须使敌人相信，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容易粉碎法国军队，这样就会驱使俄军立即向他发起进攻。他着手实行自己这个计谋：第一，命令前哨开始撤退；第二，派了自己的侍从武官长萨瓦里去见亚历山大，建议休战、媾和；第三，命令萨瓦里请求亚历山大举行个人会见；第四，还是命令萨瓦里请亚历山大(如果拒绝个人会见的话)派一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俄军司令部一片欢呼声：拿破仑胆怯了！拿破仑打得精疲力尽，要完蛋了，主要的是现在不要放过他！

实际上，拿破仑的这些行动和他本人这样的不相象，这样的反常，这样的有失身分，以至使人觉得，这位傲慢的皇帝、世界上第一名统帅，假如不是事情逼得他非如此不行，他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想到要这样做的。库图佐夫和他的忧虑备受羞辱而被否定了。亚历山大拒绝同拿破仑会见，派了道戈路柯夫公爵去见他。拿破仑后来很久都在嘲笑这个年轻的宫廷将军；他甚至在公开刊物上把他称做“freluquet”。这个译不出来的法文绰号在俄文里有两个含意，一个是“毛头小儿”，一个是“轻浮之辈”。当时，道戈路柯夫表现很傲慢、态度强硬不可一世，把法国皇帝当成了“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贵族”，——拿破仑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见时，这样挖苦地说。拿破仑继续天才地表演着这个喜剧，装出一副不安和忧伤的样子。同时他也知道，不能表演过火，世界上的一切，即使是道戈路柯夫的愚蠢，也是有限度的，他在会见的最后时刻声称，不能同意提出的条件(道戈路柯夫

提议他放弃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占领地)。但这个拒绝本身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它加深了而不是削弱了有关拿破仑信心不足和胆怯的总的印象。

在道戈路柯夫兴奋地报告了他的印象以后，联军军营中的一切动摇现象都结束了：决定立即向正在退却的、削弱了的、张皇失措的拿破仑进攻，把他打垮。

1805 年 12 月 2 日，恰恰是在拿破仑加冕一年以后，在奥斯特里茨村以西、维也纳以北一百二十公里的普拉琴高地周围的丘陵地带，展开了这场血腥的大战；这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战之一，也是拿破仑史诗上最著名的大战之一。

拿破仑自始至终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几乎他的所有的元帅都在场。俄军和奥军的失败在早晨最初几小时就已决定了，但是，如果俄国将军们沒有上拿破仑的圈套，俄国军队是不会遭到那样惨重的失败的：拿破仑预料到，俄军和奥军一定要想法截断他去维也纳和多瑙河的退路，以便把他包围起来，或者逼到北面山区里去，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故意把自己的左翼调开，好象是不掩护和不保卫这个地区似的。当俄军开往这个地方的时候，拿破仑用占领了普拉琴高地的大批军队击溃了它们，把俄军逼到半冰冻的池塘里去。几团人有的在池塘里淹死了，有的被法军的霰弹击毙，其余的当了俘虏。俄军近卫骑兵在同拿破仑近卫军骑兵掷弹兵进行残酷搏斗之后即被全部消灭(那时还是战斗正酣的当儿)。元帅们对俄国士兵的勇敢非常惊奇，但同样地，对俄国将军们(库图佐夫除外)的荒唐行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窍不通、以及他们的张皇失措和庸碌无能，也非常惊奇。例如，他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俄军左翼司令布克斯盖弗登有二十九个步兵营、二十二个骑兵连，他不去支援濒危的俄军，却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很不重要的地点转来转去，被为数很少的法军牵制了几小时之久。当布克斯盖弗登终于想到要开始撤退的时候，已经很迟了，而且行

动很笨拙，以至他的军团有几千人都被逼退到池塘里淹死了：拿破仑一发现俄军撤退，就命令向冰上开炮。其余的人都当了俘虏。

弗兰茨和亚历山大两位皇帝在全军覆没以前很久就逃之夭夭了。他们的侍从人员四散逃命，把两位皇帝丢在路上，这两位皇帝也从战场逃跑，很快就骑着马各奔一方了。

短暂的冬日已近黄昏，整天发射出耀眼光芒的太阳下山了，亚历山大和弗兰茨在昏暗之中得救了，没有被俘。亚历山大象得了疟疾一样，全身发抖。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哭了起来。他飞快地跑了好几天。受伤的库图佐夫也险些被俘。

夜晚降临了。一切都结束了。拿破仑在一大群元帅、近卫军将军和副官的伴随下，在从四面八方跑到皇帝面前来的士兵的热烈欢呼声中，不断地踩着难以数计的人和马的尸体，穿过广阔的平原。这次胜利的大致结果是：俄军和奥军近一万五千人阵亡，二万左右被俘，几乎全部炮兵被消灭，而最重要的是，俄奥联军事实上已被消灭：其中四分之三都四散逃命，丢掉巨大的辎重队、全部弹药和粮食。法军损失不到九千人(总共八万人)。

第二天，法军所有部队都读到了拿破仑的命令。“士兵们，我对你们表示满意：在奥斯特里茨的一天中间，你们完成了我要求你们以果敢精神去完成的一切。不朽的光荣归于你们，我的雄鹰们。在俄奥皇帝指挥下的十万军队，不到四个小时，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没有死在你们剑下的那些人，也在湖里淹死了……”——这道命令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不久，奥国皇帝弗兰茨就向亚历山大表示，继续这场战争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大对此表示同意。弗兰茨给胜利者寄去一封信，要求个人会面。拿破仑就在离奥斯特里茨不远的自己的野营里，接见了他。他接待弗兰茨皇帝时很有礼貌，但是首先要求俄军残余部队立即撤出奥地利，而且亲自对他们规定了一定的阶段。

他表示，只同奥国进行和平谈判。弗兰茨当然表示无条件同意。

欧洲列强的第三次联盟就这样宣告解体了。

四

在 1805 年 11 月下半月和 12 月初，威廉·皮特以十分焦急的心情期待着决战的消息。作为英国政府的首脑、反对拿破仑的第三次联盟的创立者和鼓吹者，他知道，现在，英国在较长时期内可以不致遭到侵犯。早在 1805 年 10 月 21 日，在特拉法加角的海战中，纳尔逊海军上将就向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展开进攻，并把它消灭，他自己在战斗中阵亡。从这时起，拿破仑就再没有海军了。但威廉·皮特却怕另外一着。他和整个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一样，知道事情并不就到此为止。拿破仑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要把英国商人从他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欧洲国家的商业市场完全赶出去的方针。不仅如此，拿破仑还支配着大陆上最富足的国家、港口和造船厂，因此他有一切条件来建立一支新海军和恢复布伦军营。

麦克在乌尔姆的覆灭，拿破仑进入维也纳，法军占领大桥，库图佐夫在拿破仑军队的追击下象逃跑一样的撤退，这些都使皮特感到十分苦恼。但普鲁士表示同意加入联盟，又使他有了一线希望。在遥远的、奥尔莫乌茨附近的摩拉维亚，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是拿破仑对半个欧洲的专制统治被推翻，或者是另一半大陆也将沦于他的统治之下。

最后，英国终于收到了最先载有致命消息的报纸(荷兰的)：第三次联盟在奥斯特里茨血战中可耻地崩溃了。在议员之间，大肆责备皮特的招致毁灭的幻想，反对党要他下野，议员们大声谴责他使英国蒙受耻辱，谴责他耗费几百万黄金建立起来的联盟落得了土崩瓦解的结局。皮特经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震动，就此一病不起，过了几个

星期，于 1806 年 1 月 23 日逝世。正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奥斯特里茨战役也把拿破仑的这个最顽强、最有才干的敌人送上了天。以福克斯为首的新内阁决定同拿破仑媾和。

拿破仑处在所向无敌的全盛时期。他命令提出媾和条件，无论是战败国或非参战国都卑躬屈节地向他俯首就范。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伟大胜利。普鲁士的外交使节豪格维茨带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最后通牒，经过很长时间终于来到维也纳，但豪格维茨急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忘掉此行的目的。他带着甜蜜的微笑拜会了拿破仑。他对拿破仑深深鞠躬，对他击溃所有对手表示热烈祝贺。豪格维茨吓得心惊肉跳，同时他的国王也以惶恐的心情等待着对自己在弗里德里希灵前的宣誓以及不久前的其他一些冒险活动的惩罚。“我向陛下祝贺胜利！”——豪格维茨开头这样说道。“命运女神把您祝贺的对象改变了！”皇帝打断了他的话。

拿破仑起初大喊大叫，说他非常了解普鲁士的所有欺骗行径，后来同意把这些都忘掉，表示愿意宽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普鲁士要同他订立联盟。联盟的条件是：普鲁士把自己南部领地安斯巴赫交给巴伐利亚；普鲁士把自己的领地纳沙特尔公国、克累弗和威塞尔城交给法国；而拿破仑把自己军队早在 1803 年占领的以前属于英国的汉诺威交给普鲁士；普鲁士同法国结成联盟，也就是说，要向英国宣战。豪格维茨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他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同意，而他本来预料的要比这坏得多。作为盟国的巴伐利亚，从奥地利手里得到了提罗耳，从普鲁士手里得到了安斯巴赫，但为此却要把贝格这个富饶的工业区交给拿破仑。最后，奥地利把整个威尼斯和威尼斯省、弗里乌利、伊斯的利亚、达尔玛提亚都割给作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总的说来，奥地利失掉了六分之一的人口（二千四百万人口中失去了四百万），七分之一的国家收入，还有大片土地，并且付给胜利者四千万金佛罗伦。

和约于 1805 年 12 月 26 日在普列斯堡签订。在和约签订之前几天，拿破仑还同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订立了严密的攻守同盟。载着从奥地利获得的大批战利品的辎重队不断地开往法国和意大利。单是从兵工厂和战场上缴获来的大炮就有二千门，还有十万多支枪枝及其他各种战利品。但拿破仑在离开战败的奥地利以前，还做了一件事。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德及其夫人加罗林娜早在 1805 年 10 月特拉法加战役以后就认为这次拿破仑一定要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同英国和俄国拉上了关系。这一代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经常特别痛苦地受到拿破仑的压迫，因此仇恨他。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加罗林娜是被绞死的玛丽亚·安东尼特王后的亲姊妹，她与法国，特别与拿破仑早已是不共戴天了，甚至在法国外交使节阿尔基埃的面前也不加掩饰地说，她想使那不勒斯王国成为一根点燃燎原烈火的火柴。“但请陛下想一想，火柴总是首先烧尽，甚至不管这场大火的结局如何。”——拿破仑的使者这样回答她说。现在，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火柴”在转瞬之间就燃成灰烬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拿破仑对波旁王族进行了残酷的清算。“波旁王朝不再统治那不勒斯了”。——拿破仑这样宣告，并命令法军立即占领整个王国。波旁王室逃到西西里岛，由英国舰队保护，而拿破仑很快就任命自己的兄弟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接着，他大大奖励了一批有卓越功绩的将军、军官和士兵，发给他们奖金、勋章，提升军级，有的一次提升了两三级。然后他于 1806 年 1 月 26 日离开维也纳回巴黎，受到无数狂欢的民众的欢迎，随后进入杜伊勒里宫。过了几天以后，他才获悉他的死敌威廉·皮特在他回到巴黎前三天已经逝世，同时英国要求签订和约。现在他确实可以自称查理大帝、西方的皇帝了。

无数豪华的筵席、宴会、舞会——拿破仑过着空前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几百个奴颜婢膝的宫廷人员都在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对他表示无上的尊敬，无耻的阿谀和奉承。

五

拿破仑在威廉·皮特逝世之后还不能指望英国的政策会有所改变。但当一贯反对皮特的对外政策的福克斯执政以后，欧洲就开始议论英法很快就会议和。实际上也确实开始了和谈，福克斯派亚尔默思勋爵去巴黎进行和谈。拿破仑不很相信和平真有可能实现，他早在 1806 年 2 月就强迫普鲁士同英国断绝关系；他不仅极力使普鲁士离开英国，而且使它离开俄国，从而给它以决定性的打击。

普鲁士国王早在 1806 年初春就开始认识到，他陷入了多么危险的境地。诚然，拿破仑对他曾经表示"宽恕"，拿破仑甚至希望普鲁士同他订立同盟，答应把汉诺威送给它。但英国对此的回答是向普鲁士宣战。这样，拿破仑就没有把汉诺威给普鲁士，而他的军队仍然驻在那里。这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忽然获悉，英国政府的首脑派了亚尔默思勋爵到巴黎去同拿破仑议和，拿破仑曾向亚尔默思勋爵表示，如果英国在他的希望的基础上签订和约，他就把汉诺威还给英王。普鲁士宫廷和政府都看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欺骗。特别是那些在 1805 年一年当中白白地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倒向第三次联盟一边的人对此更为愤慨。他们断言，当时如果这样做了，便可以预防奥斯特里茨的失败，也不致使普鲁士今天在同拿破仑面对面的斗争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时，拿破仑决定把自己对德国西部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绝对统治固定下来。他建立了莱茵同盟。1806 年年中，同盟最终形成，德意志各国君主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于 7 月 12 日签订了相应的条约。参加莱茵同盟的有巴伐利亚、符腾堡、拉蒂斯邦、巴登、贝格、赫逊·达姆什塔特、纳骚(两个家族)，还有八个德意志公国。这个同盟"选举"拿破仑皇帝为自己的保护人。为了对皇帝接受这个新的高位

表示感谢，同盟有义务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拿破仑提供六万三千名士兵，归他指挥。许多以前服从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们的最高主权的独立小国，现在要受莱茵同盟各国君主管辖，他们的领土也都已划入莱茵同盟各国。这样，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是奥地利历代皇帝对分裂的德意志及其实际上独立的各个大公行使最高权力的名称)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义。这个称号几乎整整存在了一千年。现在，在 1806 年，奥地利皇帝弗兰茨根据拿破仑皇帝的直接建议而放弃了这个称号。

拿破仑把新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的新的掠夺行为，使普鲁士王室和政府大为震动并深深感到不安。莱茵同盟使拿破仑的权力深入到德国的心脏，直接威胁了普鲁士的完整。特别危险的是，拿破仑在策划建立莱茵同盟的同时，还任命了一些重要官员。这种任命只是对侵占一些国家来扩大法兰西帝国领土的蹩脚的掩饰。早在 1806 年 3 月 15 日，就任命缪拉元帅为克累弗和贝格(在西德意志)的大公爵，3 月 30 日，任命约瑟夫·波拿巴为那不勒斯国王，贝尔蒂埃元帅为纳夏泰尔大公；6 月 5 日，拿破仑的另一个兄弟路易·波拿巴被任命为荷兰国王，任命外交大臣塔列朗为贝涅维特大公，贝尔纳多特元帅为南意大利的本特·科尔诺的大公。这些人不是封臣，而是拿破仑的全权代理人和总督。整个欧洲都很清楚这一点。

同时，拿破仑又在准备战争。6 月，组成莱茵同盟以后，他就公开向立法院宣布，他有四十五万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这支军队，不用借贷，也不会发生赤字。拿破仑把将近二十万军队集中到莱茵河两岸的亚尔萨斯、洛林和新建立的莱茵同盟各国。流传着可怕的消息：法国皇帝正在准备进行新的侵略。

7 月 6 日，俄国外交官乌布里来到巴黎。亚历山大是借口进行关于卡塔罗海湾的特别谈判派他来巴黎的，但实际上是来观察和查明英法之间的和平究竟有多大可能。塔列朗使了一些巧妙的手腕终

于签订了对俄和约的初约。这是乌布里来巴黎两个星期以后的事。现在一切都要取决于塔列朗和亚尔默思公爵谈判的结果，因为亚历山大要根据他们谈判的结果，来决定批准或是不批准他的代表乌布里在巴黎签订的条约。

但对英和约是不可能签订的。英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与拿破仑对半个大陆的专制统治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而拿破仑在谈判中间实际上沒有作出任何让步，而且还一再提出新的条件，大谈其埃及、叙利亚……

突然欧洲传遍了一个消息：英国唯一的一个竭力主张同法国议和的外交大臣福克斯于 9 月 13 日逝世了。

在普鲁士，要求对拿破仑的侵略表示坚决反抗的一派人抬起了头；很明显，这时，不论是英国，还是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都不会同拿破仑签订和约。从 9 月初，弗里德里希·威廉就由狂怒变得胆怯起来，不知道怎样办好。但他很高兴地看到，又有可能成立联盟了。普鲁士国王在福克斯逝世的那一天，在还不知道他的死讯的时候，就决定把自己的军队调到他的邻国萨克森去。三个星期以后，西班牙表示很愿意加入又在策划中的联盟（如果这次联盟能够取得胜利的话)，于是西班牙王室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开始了秘密往来。

在普鲁士的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中间，不满和气愤的情绪非常厉害。他们责备国王是胆小鬼，谴责豪格维茨是叛徒。贵族仇恨拿破仑，只把他看成是破坏旧时的封建关系和地主农奴主生活的直接罪人；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不安地看到，拿破仑怎样大力筑高自己附庸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税壁垒以及其他壁垒，怎样有计划地进行着有利于法国工业而有损于其他各国工业的工作。普鲁士的军官和将军们热血沸腾，竭力要对自己遭受的侮辱、欺骗以及拿破仑到处公开表示的那种鄙视进行报复。路易莎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第三的妻子)是这一派贵族和军官的首领。英国和俄国(尽管它们在这个时期

都同拿破仑进行着毫无结果的谈判）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希望和向往……。促使普鲁士国王采取决定性步骤的主要原因就是，不管你对拿破仑作出怎样的让步，他都是要发动战争的。当时决定要拿破仑说明一下自己对普鲁士的打算。但法国皇帝什么也没有回答。

普鲁士军队向前推进。一个个团队高唱着爱国歌曲经过柏林和马德堡，再向西方开去，路易莎王后出来迎接，并成了示威的中心人物。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检阅了集中在马德堡及其西部地区的军队。他又给拿破仑送去一份照会，要求法军调离普鲁士边境。拿破仑对这个要求的回答是亲自率领自己的军队越过了驻有普鲁士军队的萨克森边境。

第九章　击溃普鲁士和完全征服德意志

（1806 — 1807 年）

一

1806 年 10 月 8 日，拿破仑下令进入普鲁士的盟国萨克森，从订立普莱斯堡和约以后就集中在巴伐利亚的大军，分三路越境。走在中路前面的是缪拉及其骑兵队，接着是拿破仑所率领的主力。当时作战的大军有十九万五千人，只比拿破仑全部军队的一半稍多一些，因为他要把七万军队留在意大利的占领地，在其余的广大占领地也几乎驻有同样数量的军队。当然，这十九万五千军队必须用后方正在大力募集的新兵来补充。普鲁士用来同拿破仑军队作战的士兵的人数稍微少一些，约为十七万五千至十八万人。

要了解几天之内所发生的空前迅速的闪电般的无法挽救的灾难，指出大军对普鲁士军队的这种微不足道的数量上的优势当然是不够的，甚至提到法军统帅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以及他所选拔的卓越的元帅和将军也是不够的。这里发生冲突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两种由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军事策略和两种不同的军事组织。这是典型农奴制的、封建专制的、工业落后的、只有十分原始的技术的国家，同经历了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关于拿破仑军队的组织状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普鲁士军队则确实是反映自己国家的农奴制度的一面镜子。士兵就是过去挨地主皮鞭的农奴；他们被军官用马刀的刀背砍，用皮鞭抽打，听凭任

何一个比他职位高的人(从司务长开始)拳打脚踢，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士兵们坚信,不管他们作战多么勇敢,多么努力,都根本不会改善自己的命运。军官之所以是军官,只因为他是贵族,有些军官常常夸耀自己对待士兵如何残忍，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纪律。一些人成为将军,或者是因为年纪大,或者是因为有显要的保护人,或者是出身高贵。

18世纪中叶，当这种旧制度不仅在普鲁士军队、而且在所有的军队中都存在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可以在七年战争中战胜法军、俄军、奥军,尽管他有时也遭到惨重的失败。弗里德里希二世了解到,只有用空前残酷的手段,才能迫使被压迫的激愤的士兵投入战斗。他有一次对一位亲信的将军说:“使我最担心的是我和你在我们军营中的安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而普鲁士一切照旧,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弗里德里希本人去逝了,代替他指挥军队的是平庸无能的不伦瑞克公爵和其他一些头脑迟钝的有爵位的将军。

普鲁士的上层统治集团在1806年夏末秋初这个对他们有着决定意义的时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既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一年以前同英国、奥国、俄国结成联盟的时候,还不敢起来反抗可怕的皇帝，那末为什么现在就敢起来反抗了呢？这主要是由于他因绝望而产生了勇气:他确信,不管他怎样卑躬屈膝,拿破仑还是要进攻的。但军官、将军以及所有上层贵族都欢欣若狂,公开吹嘘要给科西嘉暴发户、杀害当甘公爵的凶手、长裤汉的首领一个教训。他们问,拿破仑到目前为止打败了些什么人？还不是胆小的多民族的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埃及近卫骑兵这种野蛮人,软弱的意大利人,以及同土耳其人和近卫骑兵几乎一样野蛮的俄国人。如果拿破仑同弗里德里希二世建立起来的军队交锋,他的荣誉不就会烟消云散了吗？

宫廷官员、军事长官、将军、上流社会人士、路易莎王后及其仆

从，所有这些人的轻率、幻想和大言不惭的情绪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们不愿考虑到，拿破仑不仅可以从法国，而且可以从他已经征服的几个富足的大国索取资财；他们以为，只要普鲁士军队给拿破仑以勇敢的一击，拿破仑就会垮台，保王党就可以在后方举行暴动，把拿破仑推翻，使波旁王朝复辟。年老的总司令，1792 年曾领导对法进行军事干涉、以自己荒唐的威胁性的宣言反而加速了法国君主制度的崩溃的不伦瑞克公爵，他一直是一个旧制度下的反动的农奴主，对法国鲁莽的革命暴徒满怀着仇恨。但是他害怕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对路易莎王后和路易亲王周围的那种乐观的、胜利的情绪不很同意。柏林和外省的教堂的牧师毫不费力地保证说，很久以来，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一直对霍亨索伦王朝表示友好态度的上帝，一定会给以大力的支持。他们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着战场上最初的消息。谁也不知道，是哪一方越过国境……。

拿破仑军队分成三路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奔向易北河，直入普鲁士军队的后方，以便切断它的交通。

10 月 9 日，即拿破仑进入普鲁士盟国萨克森的第二天，进行了第一次战斗（在什列茨）。缪拉和贝尔纳多特元帅率领的先头部队接近了普鲁士军队，并且按照拿破仑的命令，向它展开进攻。战斗的规模不大。普军被击败，损失约七百人（其中三百人被击毙）。第二天，10 月 10 日，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一次规模较大。拉纳元帅逼近扎尔费尔特城；王室主战派首领路易亲王率领九千军队驻在那里。这次战斗又以法军的胜利告终。普军进行顽抗之后，四散逃窜，将近一千五百人阵亡和被俘。战斗快结束时，路易亲王也被用刺刀刺死。

从扎尔费尔特城逃走的残余部队投奔了驻在耶拿城附近的由霍亨洛厄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部队。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另一部分主力部队，则向北方——纳乌堡退却，但他们未能到达目的地。

当什列茨和扎尔费尔特的战斗和路易亲王阵亡的消息接连传到

柏林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看来也很奇怪，最初两次虽然遭到失败但规模较小的战斗竟使社会上的气氛发生了这样彻底的变化。不仅过分的自吹自擂消失了，而且很快就为张皇失措、胆战心惊的心情所代替。只有路易莎王后沒有灰心丧气，而是同自己亲信一道为路易亲王的英勇牺牲所鼓舞，坚信即将开始的决战会把局面完全扭转过来。

拿破仑预计到，普鲁士主力部队正向魏玛地区集中，以便继续向柏林撤退，决战将于 10 月 15 日在魏玛展开。他派达乌元帅去纳乌堡并进一步深入到普军后方；贝尔纳多特奉命和达乌会合，但他未能完成这个使命。拿破仑率领苏尔特、内伊、缪拉三位元帅向耶拿推进。10 月 13 日晚，拿破仑进入耶拿城，在城的四周山上高地了望，看到大批军队正向魏玛撤退。霍亨洛厄公爵知道法军已经进入耶拿，但他沒有想到拿破仑本人带着几个军团驻在那里。13 日夜，霍亨洛厄在半路上忽然停下来，他出乎拿破仑的预料，决定投入战斗。

拿破仑还在拂晓之前就已巡视了一下自己的军队。他向士兵们说，法军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可以把整个普鲁士拿过来，皇帝希望他们拿出平日的勇敢精神，并和往常一样，他把第二天战斗计划的主要内容向士兵们做了大体的说明。

天终于亮了。1806 年 10 月 14 日，决定普鲁士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战斗在拂晓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就开始了；这次战斗，时间很长，也很激烈，但一开始法军就占了上风，以致对方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把败北的局面扭转过来。起初普鲁士军队和萨克森军队一面慢慢地撤退，一面进行顽强的自卫。但拿破仑巧妙地把苏尔特、拉纳、奥热罗、内伊等元帅的军团的精锐部队和缪拉的骑兵集中起来，投入战斗，从而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当普军吓得发抖、开始逃跑的时候，遭到了比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更致命的追击。普军残余部队被缪拉的骑兵一直追到魏玛城里。在这里，普军伤亡特别大，士气高涨的

法军骑兵大肆屠杀，不听求饶的呼喊，也不抓俘虏。普军全军覆没了。少数残余部队幸免于难，保存了士兵的外貌，其余的全部被打死或被俘，或者（大多数）下落不明。

霍亨洛厄和一群逃命者想逃到纳乌堡，依靠那里没有动用的唯一可以指望的主力部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本人也在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这第二部分军队里。晚上，完全出乎意外地，又有一批士兵逃到这些从耶拿逃出来的人们这里来，说普鲁士又遭到了新的不幸。事情是这样的：不伦瑞克公爵尚未到达纳乌堡，就在离耶拿二十多公里的奥埃尔施泰特附近停了下来，在这里同达乌元帅遭遇了。在战斗中间，他们老是听到很远的地方有炮弹发射的声音，当时还不清楚这些炮声意味着在耶拿的普军的全面溃败。尽管法军力量不够（达乌总共只有一个军团，因为他没有得到贝尔纳多特的支援），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力部队还是被打得丢盔弃甲。不伦瑞克公爵本人在战斗最激烈时身受重伤，终于身亡。正象前面讲过的，这支军队的残余部队在逃跑时就这样同从耶拿和魏玛逃出来的第一支军队的逃命者会合在一起了。

这样，国王就由从耶拿逃出来的人那里知道，在 10 月 14 日这一天，普鲁士军队在两次战斗中被拿破仑和达乌元帅击溃，几乎全军覆没。欧洲任何一个人，甚至普鲁士的死敌，都根本没有预料到结局会这末快就到来了，这只是拿破仑入侵后六天的事情。

当逃命者奔走相告得到的消息，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军队也不存在了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从未经受过的惊惶心情。

二

普鲁士军队的残余部队跑得更乱了。法军继续追击，并且沿路收集了满载粮食的辎重车、马车、马匹和完全能够使用的大炮，以及

逃命者沿路抛弃的一切东西。拿破仑长驱直入柏林。在路上他就下令占领黑森-卡塞尔公国，宣布那里的王朝已被推翻，占领了不伦瑞克，占领了魏玛、埃尔富特、纳乌堡、哈勒、维腾堡。霍亨洛厄公爵往北逃跑避开拿破仑，把各个军团的将近两万名士兵聚集起来由自己指挥，这些士兵几乎都赤手空拳，垂头丧气，不再服从长官的命令。

军队往北逃跑，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因为缪拉带着骑兵在后面追赶。在普伦茨劳附近，在通往什切青的道路上，霍亨洛厄被四面包围了，不得不投降。在此之前几天，拥有大量军事物资的坚固堡垒斯潘达，在拉纳元帅向他们提出投降的要求时，就毫不抵抗地投降了。而在霍亨洛厄投降以后几天，拉沙尔将军率领骠骑兵直奔什切青，这是一个驻有优良的炮队和大批守卫部队(六千多人)的威力强大的城堡，同时城堡里还有丰富的食粮。这个由很多大炮保卫着的坚强的堡垒，在拉沙尔将军一提出要求后，也不发一枪地向一门大炮都没有的骠骑兵将军投降了。各处普鲁士军队残余部队的将军、军官和士兵立即充满了最绝望的惊慌心情。称颂一时的纪律荡然无存，普鲁士士兵成千地向法军投降。将军和军官们是那样的泄气，连胜利者都觉得这种泄气现象是空前未有的。似乎这些人不是两个星期以前十分傲慢而自信地要消灭拿破仑的那些人了。

1806 年 10 月27日，即战争开始后十九天，耶拿战役和奥埃尔施泰特战役后十三天，拿破仑随同四位元帅、骑兵掷弹兵、近卫轻骑兵得意洋洋地进入柏林。市长把首都的钥匙交给拿破仑，并且请求他赦免柏林。拿破仑下令要商店继续营业，生活照常进行。市民们怀着恐惧和尊敬的心情迎接皇帝，表现了绝对的服从。

拿破仑在柏林住下来以后，首先是消灭四处逃散的普鲁士军队的最后残余。其实，就只剩下布呂歇尔将军的部队了，他是普鲁士军事长官中最有毅力的人，布呂歇尔从四散逃命的被击溃的部队中集

合了将近两万名士兵和军官，带领他们逃往北方，一路上受到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和缪拉三位元帅的追击。他进入卢卑克。再往前走就是丹麦国界，但是丹麦非常害怕拿破仑，坚决不准布吕歇尔入境。即使他进入丹麦国境也无济于事，因为元帅们也可以跟着他立即越过国境。11月7日元帅们进入卢卑克，在街道上向布吕歇尔的队伍进攻。一场激烈的战斗发生了：将近六千名普鲁士士兵被法军击毙或俘获。布吕歇尔带着一万四千人冲出城去，但是傍晚时分在卢卑克近郊的平原上被元帅们赶上和包围了，布吕歇尔率领一万四千名士兵、军官和将军带着大炮和物资投降了。

同时，法军进逼奥得河上的丘士林城堡。现在，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利用在耶拿战役后笼罩着整个普鲁士的空前未有的、难以形容的完全沮丧的士气。开到丘士林城堡的只有四个步兵连，没有大炮，这支小小的队伍的指挥官要求（甚至连装样子的包围动作也没有做）城堡投降。丘士林城堡在法军指挥官提出要求后，尽管有着四千名装备齐全的守军、优良的大炮和大批粮食，还是立即投降了。在军事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这一系列强大城堡没有任何抵抗就惊惶万状地投降的情况，以马德堡的投降而告终，当人们向拿破仑报告马德堡投降奇闻的时候，他最初都不相信。

马德堡是当时唯一尚未投降的、非常强大的第一流的要塞，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富足的商业中心，储藏着大量作战物资和粮食，有很多大炮。在马德堡驻有一支很大的、装备十分精良的守卫部队，共两万二千人，由克莱斯特将军指挥。这两万二千人和马德堡要塞，是布吕歇尔投降以后普鲁士武装力量的最后一个据点。前往马德堡的是内伊元帅。由于匆忙和对胜利的自信，内伊甚至不携带攻城大炮，而只带了三、四门轻臼炮。他要求克莱斯特立刻投降。克莱斯特拒绝了。于是内伊元帅下令发射轻臼炮。射击没有（也不可能）使城市遭受任何损害，但是这样做已经够了：克莱斯特将军带领全部守军于

11 月 8 日向内伊投降。内伊元帅入城后，发现城里有大量军用物资和各种极其丰富的商品。克莱斯特后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说，当法军发射臼炮时，居民十分惊慌，要求他这位要塞司令不要失掉时间立即投降。他向这种愿望让了步，于是投降了。

得知关于马德堡的消息以后，拿破仑、法国和整个欧洲都完全了解到，普鲁士是完蛋了。全部军队或者被消灭，或者当了俘虏；所有要塞，除了但泽（它是完全能用的，并且储有大批物资）以外，都在法军手里；首都和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法国当局的管理下，各地居民都是绝对顺从的。

普鲁士国王、路易莎王后以及他们的儿女和朝廷（很小的朝廷）极可怜地在其他地方流浪以后，躲藏到普鲁士王国的边境小城美默尔城里。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想停战和签订和约的一切希望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拿破仑提出了最苛刻的条件。拿破仑命令在法国报纸上刊登文章，尽情地讽刺和恶毒地嘲笑路易莎王后，称她为使普鲁士遭到不幸的罪魁祸首。

胜利者的这些恶毒的敌对行为并未妨碍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写一封充满敬意的信给拿破仑，国王在这封信中，表示他希望，拿破仑皇帝陛下会满意波茨坦王宫中舒适的设备，会满意那里的一切。拿破仑对于这封信不作任何回答。

拿破仑在其整个长期的胜利的经历中，无论在以前和以后，都从未获得过象 1806 年秋天所获得的东西。如果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天（10 月 8 日）起算到马德堡投降那一天（11 月 8 日）止，那末他在一个月之内就完全消灭了他一直要加以考虑的当时欧洲四大国之一。他这一次的胜利，是从未有过的绝对优势的全胜。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将军们的惊慌失措，一遭受打击就完全放弃抵抗，居民和一切地方当局忽然表现出的并且最终保证的绝对顺从态度，——所有这一切达到了如此的地步，拿破仑还是第一次看见。埃及的近卫骑兵

进行抵抗，奥国人进行抵抗，意大利人进行抵抗，俄国人战斗得非常勇敢，甚至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个别部队也表现得十分顽强，以致后来得到了拿破仑的赞扬。然而这个夸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传统的军队，有着最完善的行政机构的国家，就一般的文化水平说来不低于当时欧洲任何一国人的居民，突然变成了一堆废物。整个欧洲都极为震惊。德意志各国就更不用说了：赶忙相继派人到波茨坦宫向拿破仑表明自己是完全顺从的。

在 10 月和 11 月的这些日子里，拿破仑生活在幸福愉快的气氛中，每天都有关于要塞投降和普鲁士残余部队投降的消息传到柏林和波茨坦宫来，很多人在他面前跪拜，祈求宽恕和庇护，选侯、公爵和国王向他阿谀谄媚，保证自己有一片忠诚之心，因此，十分自然，拿破仑决定给予自己主要的敌人英国以致命的打击，他认为正是现在，在占领了普鲁士之后，这种打击是可能实现的。马德堡向内伊元帅投降还不到两个星期，拿破仑就在 1806 年 11 月 21 日签署了著名的封锁大陆的柏林法令。

三

大陆封锁在拿破仑帝国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在整个欧洲史上而且在美洲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陆封锁成为整个帝国史诗中全部经济斗争的中心，因而也是政治斗争的中心。

关于封锁大陆的柏林法令的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要知道，在革命时期就已经禁止与英国人进行贸易，例如，革命第五年(1796 年)雾月 10 日的法令就非常清楚地说明和论证了这一点。而在拿破仑时期这个法令不仅重行颁布和确认过，而且就在 1806 年这一年的 2 月 22 日，皇帝禁止从任何地方输入棉布和棉纱，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旨在维护法国工业利益的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的观点。1806 年

11 月 21 日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他不仅继续和加强对帝国 国内市场的垄断以利于法国工业，而且狠狠地打击整个英国经济，力图使英国经济完全被窒息，全国破产、挨饿和投降。他的目的是想在这一次把英国人不仅从法兰西帝国赶出去，而且从整个欧洲赶出去，使英国人在经济上软弱无力，夺去他们在欧洲的一切销售市场。法令的第一节写道："不列颠群岛被宣布处于封锁状态"，第二节写道："禁止与不列颠群岛的任何贸易和任何关系"。后来又禁止与英国人的邮政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并且下令立即在各处逮捕所有的英国人和没收他们的商品和财产。

即使没有拿破仑不惜精力作出的关于大陆封锁的丰富的文献性的注释，只要研究一下柏林法令的条文就完全可以了解这个法令真正的历史意义了：对英国的经济封锁要想取得重大的成果，只有使整个欧洲直接由拿破仑统治或者由他进行严格的、绝对的监督。不然的话，只要有一个国家不服从命令，继续与英国通商，那末整个关于封锁的法令就等于一张废纸，因为英国商品(用其他国家的商标)会从这个不服从命令的国家迅速而容易地运往欧洲各地。

结论十分明显：为了战胜英国，欧洲一切国家必须严格实行大陆封锁，整个欧洲一定要服从拿破仑的意志，首先必须占领全部欧洲的海岸，使法国的税吏和宪兵能够在那里为所欲为，真正消灭走私行为。不必具有拿破仑那样的管理国家的智慧就可以了解，封锁不仅使英国感到很困难，也使欧洲所有消费大众感到很困难。由于实行封锁，他们失去了英国的工业品和从棉花到咖啡、白糖等英国殖民地的商品。拿破仑早就知道，英国商人走私获利甚多，因此非常活跃，法国商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原料卖给英国人，因此也非常热中于搞走私活动。所有这一切拿破仑一开始就已预料到。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必须继续实行一开始就做得很成功的对欧洲大陆的征服，以便用这种办法实际封锁大陆。

他很快就会相信，整个欧洲只有一个居民阶层即工业资产阶级会欢迎摆脱英国的竞争。当普军被粉碎之后，萨克森立即背叛了与普鲁士的联盟而转向拿破仑，答应完全服从大陆封锁的法令，萨克森的工业家非常高兴这一点，为此雀跃不已，但是商人、地主、广大的消费群众却惴惴不安，心情沉重。拿破仑可能早就知道，只有用强力，只有靠威吓和强制的办法才能使欧洲一切政府和各国人民接受和准确地执行封锁的命令。

从 1806 年 11 月 21 日法令颁布之日起，在拿破仑确定与英国作斗争的经济政策之下，建立“查理大帝的帝国”，并且把这个帝国扩大和巩固，已经成为直接的要求和逻辑的必然了。

外交大臣塔列朗被召往波茨坦宫谒见皇帝，并且受命立即向一切附庸国家或半附庸国家发出拿破仑的关于封锁的命令。

同时皇帝命令元帅们尽可能逐步完全占领北海(德国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方。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他准备施行的是一个多末骇人听闻的措施。“使个人的利益取决于君主们的爭吵，并且在过了这么多年的文明生活之后回复到原始时期的野蛮的原则上去，这对我们来说，代价是昂贵的。但是我们被迫以敌人所使用的武器来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拿破仑在他给法兰西帝国议院的通知实行大陆封锁的正式咨文中这样写道。咨文上所注明的日期与法令的日期相同(“柏林，1806 年 11 月 21 日”)。

欧洲以沉默的、恐惧的顺从态度接受了封锁法令。在普鲁士被击溃以后，还沒有谁苏醒过来，很多人都惶恐地计算着自己的日子，等待灭亡的到来。英国知道，现在的斗爭是殊死的搏斗。于是它又去找它在 1798 年和 1805 年两次找过的那个大国。它又答应亚历山大一世说，如果他再恢复同拿破仑的斗爭并且企图拯救普鲁士的话，它就给他财政上的支持。英国内阁也去找奥国，但是奥国还沒有从可怕的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惨败中恢复过来，并且幸灾乐祸地看着

普鲁士的毁灭，因为普鲁士在 1805 年沒有参加第三次联盟。尽管这样，而在彼得堡，发动战爭的工作还是充分准备就绪了。拿破仑在各个国家和各国首都，特别是在彼得堡，拥有一大批间谍和侦探，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人，从伯爵、公爵、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妇女，到商船船长、商店老板、仆役、邮政官、医生和信差。拿破仑通过他们知道了英国和俄国的谈判，知道了亚历山大的情绪和准备情况，知道了英国答应在俄国发动进攻后给沙皇以新的黄金补助。拿破仑在柏林组织了一个临时管理巨大帝国的中心机构之后，就立即着手解决两个困难的任务：第一，制订实现刚刚宣布的大陆封锁的措施；第二，准备军队在最近的将来同俄国军队进行战斗，因为俄国军队一定会去援助被击溃的普鲁士。

拿破仑下令占领古老的沿海的商业城市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法军沿着德国海和波罗的海海岸前进，占领了城市和沿海的村庄，逮捕了遇见的英国人，沒收了英国商品，在各处设立守卫的岗哨和骑兵侦察队，以便破获英国的走私活动。在此以前，普鲁士、萨克森和其他德意志国家必须出钱供给驻扎在被占领国家内的法国大军的费用。现在汉撒同盟各城市还必须出钱来供养设立在德国海沿岸的防止英国货走私的稅吏和海岸警备兵。同时拿破仑大力准备侵入波兰，并向已经开到东普鲁士边境的俄国军队发动进攻。

四

亚历山大这一次发动进攻，比 1805 年有着更重要的原因。第一，这一次拿破仑已经相当明显地威胁到俄国的边境：他的军队已经从柏林开往东方。第二，波兰人的代表团接二连三地到波茨坦宫去见拿破仑，请求他恢复波兰的独立，而法国皇帝、意大利国王、莱茵同盟的保护者显然同意在自己已有的三个称号之上，再加上与波兰有关

的第四个称号。而这就有从俄国夺去立陶宛、白俄罗斯、也许还有德涅泊河右岸的乌克兰的危险。第三，很明显，拿破仑在颁布了大陆封锁法令之后，在还没有使俄国也居于执行这个法令的大国之列以前，还是会感到不安的，但是与英国断绝贸易，对于俄国农业原料销往英国，以及稳定当时动荡着的俄国通货，都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一句话，甚至不谈想为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惨败雪耻的愿望，就已经可以找到足够的对拿破仑作战的原因了。准备工作远比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准备工作多得多。俄国人怀着惊恐的心情注意到了普鲁士的空前迅速的灭亡，意识到面临着的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同时他们不可能指望得到谁的眞正的援助：因为这时，1806 年年底，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彼得堡决定首先派出十万人和大批炮队以及若干哥萨克团队去与拿破仑作战。近卫队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从彼得堡出动。

拿破仑决定先发制人。还在 11 月，法军就开进了波兰。波兰贵族和人数不多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资产阶级欢欣若狂地迎接法军的到来，他们事先就在欢呼拿破仑，说他恢复了波兰在 18 世纪末被三次瓜分中失去的独立。但是拿破仑对于波兰独立的思想是相当冷淡的。他需要波兰在他的大规模的战爭中充当前哨，或者在他同俄国和奥国（他已经根本不把普鲁士放在心上了）在欧洲东部发生冲突时充当缓冲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拿破仑在其对外政策中必须彻底奉行资产阶级法国的革命的传统。但是他从未给自己提出过这个任务，他当时也沒有打算要消灭沙皇的帝国。在目前这个时候，他需要波兰作为补充和供应军队的来源。他利用在波兰小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当中普遍流传的认为法国是民族自由思想的代表者的同情心理，达到了补充军队的目的。借助于严格实行的征集制度，他从波兰榨取了相当多的本地的资源。

后来，拿破仑用提尔西特和约解决了“波兰问题”，又把波兰分割

了，把普鲁士占领的波兰领土的大部分，以所谓华沙大公国的名称，交给自己的新的同盟者萨克森国王。这是按人种志学划分的波兰北半部，除去割与亚历山大的比亚威斯托克区。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的不确定的情况下，拿破仑在波兰显贵当中建立了亲法派，这些显贵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害怕俄国迫害他们的亲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地主。波兰临时政府的军事大臣、后来获得法国元帅称号的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也没有立即宣称自己是拥护拿破仑的。

拿破仑在波兰施行的对内政策意味着波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他所颁布的华沙大公国宪法的第一节写道："废除奴隶制。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这只是空谈而已，因为"自由的农民"离开他所在的农村，就必须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地主。在法军士兵这些自由公民的影响下，在普鲁士波兰的农奴中开始出现了反对地主的运动的迹象。但是这个运动在这里没有得到发展。形式上"解放"农民并没有使地主失去权力。

由于对波兰从普鲁士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又有了希望，而将来还可以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使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并"到本国版图里来），所以波兰人异常亲热地欢迎法国军队。在波兹南为达乌元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这个省的各处地方，甚至法国军队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都把普鲁士的当局撤换了，用波兰人来代替。从法国回来的参加过柯斯丘西科起义的韦比茨基，在反对普鲁士的运动的初期起了领导作用。

波兰国内反对普鲁士人的运动逐渐高涨。人们着手组织军队，起初军队中大多数都是贵族武装，但是在 1807 年 1 月底在去但泽前线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由意大利回来的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的正规团队"列基亚"。1807 年 2 月已经有三万正规部队，其骨干是由拿破仑在 1796 年至 1797 年意大利战争时所建立的"波兰荣誉军团"中的

下级军官和军官们担任的。

但是，一般说来，并未发生全国性的帮助法军的武装运动，拉纳元帅从波兰写信给在柏林的拿破仑说，不可能希望从波兰人那里得到特别的好处，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状态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巩固的东西。

11月末，拿破仑得到消息说，俄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华沙。拿破仑命令缪拉和达乌立即前往华沙。11月28日缪拉率领骑兵进入华沙，这个城市是普鲁士人在头一天晚上放弃的，他们跑过维斯杜拉河，并且把大桥烧掉了。最后，拿破仑本人也到了波兰，起先在波兹南，后来在华沙。他对前来向他致意的贵族说，首先必须取得恢复波兰的权利。他曾经想从巴黎写信给当时波兰的民族英雄、叶卡德琳娜时代反对瓜分波兰的斗士、著名的塔杰乌歇·柯斯丘西科。但是柯斯丘西科提出了条件，其目的是要保卫波兰未来的自由，不受拿破仑的侵犯，因为柯斯丘西科认为拿破仑是一个专制魔王。同波兰爱国者进行谈判的富歇十分尊敬地问皇帝，给柯斯丘西科说些什么。皇帝回答说："告诉他，他是个笨蛋！"皇帝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指望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反对沙皇俄国的总起义了。

同俄国人进行的战斗开始了。拿破仑刚一离开华沙就向俄军进攻。经过几次小接触后，1806年12月26日发生了普图斯克（在那累夫河上）战役。俄军是由本尼格森指挥的。亚历山大对他既反感，又害怕，正如对所有杀害保罗的凶手一样（虽然他们在这次暗杀中只不过是他的同谋者而已），但是由于缺少更合适的人，也就任命了他。法国军队是由拉纳元帅指挥的。战斗的结局没有明显的胜负，但是象出现这种情况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双方都向自己的主子报告自己获得胜利。拉纳向拿破仑报告说，俄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被从普图斯克击退；本尼格森向亚历山大报告说，他已经把拿破仑本人打伤了（拿破仑根本就没有在普图斯克，甚至也没有到过普图斯克周

围的地方)。

但是,法国人从这次战斗中已经看出,他们必须与之作战的不是已经心灰意懒的普鲁士军队，而是生气勃勃的、顽强战斗的俄国军队。

拿破仑在波兰设立了冬季军营，从法国调来了增援部队。俄军也从国内各省得到了一些新的力量。

拿破仑在波兰共有十万零五千人左右，其中将近三万人是驻扎在城市里的警卫部队和驻扎在托尔恩与格拉乌顿茨之间的后备队，这种后备队是供紧急之需的,为了防备来自梅默尔的可能的进攻,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几乎已没有任何力量。本尼格森有八、九万人。双方都在寻找战机。

1807 年 2 月 8 日，战斗在东普鲁士的艾劳城(准确些说，是普鲁士-艾劳)开始了。拿破仑亲自指挥法军。

艾劳一役是当时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在这方面说来,它几乎超过了拿破仑在此之前所进行的一切战役。这次战斗的结果双方不分胜负。本尼格森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拿破仑也有很大的损失。在这次战斗中，俄国炮兵的人数比法国炮兵多得多。拿破仑的元帅们也没有能够全都及时到达预定的战斗地点。奥热罗元帅的军团几乎全部被俄国炮兵消灭了。拿破仑本人带领步兵团队停留在艾劳墓地(战斗的中心地点)，几乎被俄军发射的落在他附近的炮弹打死。被飞过的炮弹和子弹打断的树枝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拿破仑始终认为,不是在最必要的时候,总司令不应该冒生命的危险。但是他认为在艾劳,又象在洛迪、在阿尔科拉桥时一样,这种最必要的时候又到来了。但是在洛迪或者在阿尔科拉的时候,他必须首先跑上桥去,以便用这种冲动和姿态吸引犹豫不决的掷弹兵跟上来；而在艾劳则要求自己的步兵在俄军炮弹的射击下耐心地停留几小时，不从炮火下跑开。

拿破仑及其随从人员都看出，只有皇帝亲自出马，才能使步兵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皇帝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通过很少数的副官（这些副官在接近被若干步兵连护卫着的拿破仑所站的可怕的地方时，还侥幸活着），不断发布新的命令。拿破仑的脚下躺着一些军官和士兵的尸首。起先留在皇帝周围的步兵连逐渐被俄军炮火消灭了，由前来的轻骑兵、近卫军掷弹兵和甲骑兵所代替。拿破仑很冷静地发布命令，最后终于等待到了全部法国骑兵对俄军主力展开胜利的进攻。这次进攻使整个形势改观。艾劳墓地仍在法军手里，战斗的中心转到另外更广阔的地方，那里战斗正在进行。

当夜色笼罩战场的时候，法军认为自己打胜了，因为本尼格森已经逃走。拿破仑在通告中也说打胜了。但是，他当然第一个知道，他在这个流血的日子里并没有获得任何眞正的胜利，虽然损失了很多人。他知道，俄军的损失比他大得多（但是根本不是法国人所说的军队的半数）。但是拿破仑懂得，本尼格森还保持着威力强大的、十分善战的军队，根本不认为自己被打败了，相反地，他也在吹嘘自己的胜利。

“在四个月当中，我们还未能对俄军取得任何结果，上帝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惩罚他们！”——维琴察公爵科兰古这样写道，一般说来，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垂头丧气的人。在艾劳之战以后，巴黎交易所里的一切国家债券立即跌价。拿破仑远离法国与俄军作战，俄军给他的惨重的打击一点也不比他给俄军的打击轻，他必须准备进行决战。失败，甚至一个新的类似艾劳战役那样的不分胜负的战役，都可能成为全欧洲发动反对征服者的起义的开端。

五

寒冷的、多雾的冬季到来了。必须在彻底破产的波兰和东普鲁

士扎营。在艾劳战役之战后，医院里住满了重伤员。在战场四周好几公里以内，在空气中传布着由数万名未收走的腐烂了的尸体中散发出来的病菌，必须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拿破仑决定等到春天再恢复军事行动。他不断地去检查和巡视广大地区中最遥远的地点，他到医院去访问，关心粮食的运输，用法国来的新兵补充军队中减少了的兵员。皇帝注意到，俄军几乎是在自己的家里，离自己的国界只有几步远，而他却离法国很远，中间隔着很多国家，诚然，这是些战败的国家，几乎是卑躬屈膝的国家，但却是暗中仇恨他的欧洲国家。生活用品要从遥远的地方取得。本地的居民被军队抢劫一空，他们饿得要死，带着妻子儿女到法军军营去乞求施舍。

拿破仑不想在他所占领的哪个城市，无论是波兹南、布莱斯劳或者是奢华的华沙宫里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冬天。他想亲自做出榜样来激励艰苦进军中的士兵。“在十五天中我没有脱过一次鞋……我们生活在雪和污秽之中，没有葡萄酒，没有烧酒，没有面包，我们吃马铃薯和肉，长途行军和后撤，没有一点舒服的地方，作战通常是进行白刃战，或者冒着枪林弹雨，受伤的人被放在敞篷的雪橇里，运到五十里路(法里，每法里合四点五公里。——编者注)之外……我们尽全力作战，也受尽战争的折磨”。——皇帝从这个冬季扎营地在给他任命为那不勒斯国王的兄弟约瑟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几个月强制性的军事上的沉寂，对于拿破仑说来，是活动最紧张的时期。几乎每隔三天到四天，就有从巴黎、阿姆斯特丹、米兰、那不勒斯和柏林来的信使，带来了大臣们的报告，元帅和地方长官的战斗报告，大使们的汇报。拿破仑专制地统治着几个大国，始终把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留给自己。他有时住在谷仓中（在沃斯特鲁达），有时住在农舍中，在那里阅读文件，口述命令和决定。在一天当中，他草拟关于加强税关检查的命令，签署和修改为军官的儿女设立的学

院的章程，申斥自己的另一个兄弟荷兰国王路易，或者要求巴伐利亚国王加强在提罗尔的监督。他命令西班牙的波旁王族增强海岸的守卫，同时他又注意文学，对于他认为荒谬的«法兰西水星»(Mercure de France) 杂志上的文学观点非常生气，命令警察总监富歇立即改变这个杂志的全部文学见解，顺便挑选新的编辑，让新的编辑放聪明一些。他也熟悉里昂丝业的生产，知道巴黎国家剧院的演员们为什么彼此钩心斗角，从而损害了事业。他命令把斯塔埃尔夫人赶出巴黎，因为她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他审查财政部的表报和报告，发现其中的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他任免意大利的官吏，发出关于密切注意奥地利及其军事准备活动的指令，规定要在普鲁士城市和乡村中进行人口调查。

所有这些难以胜数的、性质不同的事情，拿破仑都明确而迅速地解决了，他不仅解决大臣们、将军们和使节们请求他解决的事情，他自己也提出新问题，并且及时地命令拟定相应的报告。信使们拚命地跑到指定的地方，命令也就执行了。所有这一切，拿破仑是在进行他的主要活动——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准备即将到来的春季战役——时同时做成的。

拿破仑光辉地取得了他在 1806 年底就企图取得的东西：他迫使向俄国宣战的土耳其苏丹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他写信给苏丹(1807 年 3 月)，信写得很圆滑机巧，而在此以前他已很巧妙地唆使塞利姆苏丹与英国不睦，于是塞利姆的行动也就更加坚决了。这迫使俄军把一部分力量调离了决定战斗命运的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拿破仑也和躲藏在哥尼斯堡的普鲁士宫廷进行了一段谈判。在艾劳之战以后精神已稍振作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觉得拿破仑的条件太苛刻了。由于亚历山大的再三恳求，普鲁士国王把谈判中断了。4 月 26 日国王在巴滕施泰因亲自会见亚历山大，并且变得完全不妥协了：他提出了条件，这些条件即使拿破仑遭到惨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拿破仑不承认在战争中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他对一切东西都权衡轻重，预先考虑，他知道，有时在决定性的时候，战争的结局是由一些小事决定的。帝国军营中新调来了许多士兵、炮队、弹药，由拿破仑分给各军团。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决定，签订了不少的条约，按照这些决定和条约，现在他的军队中补充了不少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荷兰人。

欧洲这时吓得失魂落魄，因为拿破仑坚决去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甚至对那些既未与他作战、也未与其他任何人作战的国家都是如此。例如在考虑补充兵员去迎接即将来到的与俄军的新的冲突的时候，拿破仑规定，可以从西班牙要来大约一万五千人(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利或理由这样做，况且西班牙根本就没有参加对普鲁士或者俄国的战争)。一个文件很快就送到了马德里，在这个文件里，拿破仑提醒西班牙的大臣戈多伊先生注意，他认为这一万五千人本身是“绝对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对于他拿破仑却是十分有用的。这个论据(没有其他论据，确实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论据)对于西班牙政府是这样有说服力，以致立即就把拿破仑所要的一万五千名西班牙人送到东普鲁士拿破仑那里去了，其中一部分送到德国北部。1807 年 5 月，拿破仑手下共有八位元帅，这八位元帅的军团中共有二十二万八千人，此外，还有将近十七万人驻在被占领的普鲁士，他们暂时还未参加已经开始的春季战役。粮食问题在春天已经好转了。5 月 26 日，但泽守军在经过相当长久的围困后向勒费弗尔元帅投降了，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粮食和各种物质。

战斗即将开始了。俄军在这几个月内(艾劳之战以后)在兵员上也有所补充，但是在供应方面比拿破仑的大军差得多。当然，法军中也有贪污行为；拿破仑也逮捕强盗和贪污分子、投机商和包工头、不诚实的财务工作人员和包买主，但是他在这场斗争中始终没有能够根绝这批盗窃分子。在法国甚至有这种说法：当别人当着这些盗窃

分子的面说皇帝是“不可战胜的”的时候，这些盗窃分子只是笑而不答。刚刚谈过，1807 年冬季法军在这个破了产的国家里生活得多么困难，而俄军的生活则更加困难，简直不能相比。俄军士兵常因饥寒交迫而死去。

亚历山大一世害怕发生新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在俄国统治集团和宫廷集团之中，早已产生了这种想法：不仅必须集中俄国人民的物质力量，而且必需集中他们的一切精神力量，鼓励他们去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想法造成了最可笑的后果。他们把宗教会议作为鼓舞人民的东西。不知道是由于外界的感化还是内心涌出的思想的启示，宗教会议决定采取奇怪的行动，使当时很多人都大惑莫解。牧师们发出告一切正教教徒书，其中谈到，拿破仑是恶魔的先驱，是基督教信仰的历来的敌人，是犹太人的最高评议会的创立者，他曾经拒绝信奉基督教，却顶礼膜拜穆罕默德（这是暗示埃及和叙利亚），他图谋发起对俄战争，而他对俄作战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摧毁正教教会。

这就是在俄国一切教会的教席上曾宣读的那个令人惊奇的文献的主要内容。当这个从思想上动员俄国去同反基督教的军人作斗争的准备工作还未以应有的规模展开时，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从 5 月开始，所有停留在城市和乡村的部队都必须回到营房，不久军队就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本尼格森不知道这个情况，决定在 6 月初开始进攻。亚历山大一世亲自来到军队催促本尼格森采取行动，他是根据本尼格森自己的夸大汇报才这样做的。本尼格森在关于艾劳战役的最初的报告中大事吹嘘，最后使沙皇认为，似乎拿破仑在 2 月 8 日已经遭到可怕的打击，而现在冬季已经结束，道路通行无阻，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

6 月 5 日俄军开始进攻了：根据本尼格森的命令，巴格拉吉昂进攻离俄军驻地最近的内伊元帅的军团，而哥萨克的将领普拉托夫则

渡过阿勒河。内伊且战且退，同他作战的，以及威胁着他的，共达三万人，比他的人数多得多。同时，俄军在其他据点也展开了进攻。

拿破仑打算在6月10日向俄军展开进攻。俄军的突然进攻使他立即草拟了一个新的计划。他马上赶到现场，很惊奇地看到，俄军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突然按兵不动，不再追击内伊的军团了，停留了不到两昼夜，又出乎意料之外地撤回去了。拿破仑迅速集中了六个军团的兵力，再加上自己的近卫军（共有十二万五千人以上），向元帅们发出了向俄军实行总反攻的命令。这时本尼格森的能够作战的士兵的人数，根据一种计算是八万五千人，根据另一种计算是将近十万人。在盖尔斯堡的近郊，本尼格森固守在加强了的阵地上，6月10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延续数小时的战斗。法军先头部队伤亡将近八千人，俄军伤亡将近一万人。拿破仑把两个军团调往科尼希斯贝格的大道上，由于这一行动，本尼格森就往东北向巴滕斯泰因撤退。本尼格森在战斗中受了伤。本尼格森以为盖尔斯堡的战斗应该可以稍微阻挡一下拿破仑，但是皇帝却把自己的主力经由艾劳直接调往科尼希斯贝格。他预料到，本尼格森将力图拯救东普鲁士的这个主要城市。确实，6月14日凌晨三点钟，拉纳元帅发现，在头天夜晚进入弗里德兰阵地的俄军准备从那里渡过阿勒河到西岸，向科尼希斯贝格前进。拉纳元帅立即下令开火。

1807年6月14日，结束这次战争的大规模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拉纳派遣副官通知拿破仑。皇帝马上下令全军投入战斗，他自己也奔往战场。他发现了本尼格森的致命的错误：本尼格森急于渡河，把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阿勒河湾，于是被挤压在这里。内伊元帅接到一个危险的任务——冲入俄军之中。俄军（特别是科洛格里沃夫指挥下的近卫骑兵）非常勇敢地进行自卫，为了进攻而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的内伊军团，在进攻的时候有一部分被消灭了。法军攻入弗里德兰，破坏了阿勒河上的桥梁。拿破仑亲自指挥这场战斗。当炮弹从他头上

飞过，与他站在一起的一个士兵赶忙弯身的时候，他对这位惊慌失措的士兵说："如果这颗炮弹是命定要击中你的，那末甚至你躲在地底下一百英尺，它也会找到你的。"尽管俄军非常勇敢，总司令本尼格森的致命的错误使他们完全毁灭了：俄军必须跑入河中，以躲避法军炮兵的炮火。俄军一部分人沿着河岸逃跑，一部分人被俘，但是被俘的人数比较少，被淹死的人多得多。几乎俄军的全部炮队都落入拿破仑之手。本尼格森在丧失了自己的炮队和遭到惨重的损失后（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打死、打伤和被俘），又遭到法军的紧逼，便迅速向普列格里河撤退。避免全军覆灭的唯一机会就是逃跑。在弗里德兰战斗之后，苏尔特元帅立即进入科尼希斯贝格，在那里获得大量作战物资、粮食、衣服——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英国人刚刚才从海上运来的，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么快就会一败涂地。6 月 19 日，弗里德兰战斗之后过了五天，拿破仑的军队直奔涅曼河。俄军残余部队渡过了河。拿破仑在俄罗斯帝国的边境提尔西特停了下来。

6 月 19 日夜晚，涅曼河岸法军骑兵师的前哨阵地上，出现了巴格拉吉昂部队里的一位俄国军官，他手持军使的白旗，请求把俄军总司令本尼格森的信转交给缪拉元帅。本尼格森建议休战。缪拉立即把这封信转交给皇帝。拿破仑表示同意。流血的斗争停止了。

六

直到最后一分钟，亚历山大还不认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失败了。早在 6 月 12 日，当提尔西特已经得到俄军在盖尔斯堡战斗中遭到惨重损失而后退的消息以后，沙皇的兄弟康斯坦丁·巴夫洛维奇用很尖锐的措词，固执地劝亚历山大立即与拿破仑休战。康斯坦丁大叫道："陛下，如果您不希望和平，那末，最好给每个俄国士兵一枝实弹手枪，命令他们全体自杀。当前的这次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战斗

将带给您同样的结果。这次新的战斗必然会为法军打开进入您的帝国的大门。”亚历山大坚决反对。6 月 14 日夜晚，他离开提尔西特去迎接俄国后备部队，那时正是俄军在弗里德兰附近的阿勒河的波涛中被淹死的时候，而从 15 日早上起，提尔西特已经开始流传关于遭到惨败的初步消息：俄国近卫军的三分之一在弗里德兰附近被消灭了，英勇战斗的军队由于太疲劳而不愿作战，本尼格森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流言被准确的消息代替了：俄军在弗里德兰遭到的可怕的毁灭，几乎与 1805 年在奥斯特里茨的遭遇差不多；拿破仑率领大军可以立即侵入俄国。在俄军高级人员中间充满着一片恐惧气氛。

后来成为著名游击队员的丹尼斯·达维多夫，亲眼见到刚刚经历了弗里德兰战役的军队，他写道：“6 月 18 日，我骑马跑到大本营，那里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有英国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国保王党人、俄国的军人和文官、不愿当文官武将的平民知识分子、寄食者和阴谋家，——总之，这是自己的希望、计划、想法已经破产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投机家的市场……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似乎再过半小时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本尼格森请求亚历山大同意签订和约。这一次亚历山大顺从了……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拿破仑收到俄国的建议后马上就同意了。再同俄国作战对他已经毫无意义；要作类似的事情需要做另外的准备工作。普鲁士已经被完全粉碎，而俄国可能同意接受大陆封锁，从而进入拿破仑所领导的政治体系。暂时他对于亚历山大已经别无所求了。

6 月 22 日，亚历山大派了一位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到提尔西特去见拿破仑，在弗里德兰战斗之后法国皇帝就住在提尔西特。拿破仑开始同洛巴诺夫谈话的时候，走到一张放着地图的桌子前面，指着维斯杜拉河说道：“这就是两个帝国的边界；在边界的

一边应该由你的君主来统治，而在另一边则由我来统治。”拿破仑的这句话，表明他打算把普鲁士消灭掉，并且瓜分波兰。

亚历山大暂时呆在沙弗里。在洛巴诺夫公爵还没有签订停战协定回来的这些严酷的日子里，亚历山大的心情比奥斯特里茨战斗之后的心情还要坏。拿破仑可能过一个半星期以后到维尔纳去。亚历山大承认：“我们损失了多得惊人的军官和士兵；所有我们的将军，特别是优秀的将军，不是受了伤就是得了病。当然，普鲁士会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主要应该想到保存自己，想到自身，并且只以国家的幸福这一条准则为行动的归依。”亚历山大同库拉金公爵在沙弗里的谈话中所说的保存自己（sa propre conservation），使他在得知弗里德兰情况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急剧地改变了自己的全部政策，决定签订和约，如果需要的话，甚至与拿破仑结成同盟。由于俄国这种突然的转变，普鲁士是否就彻底垮了，或者它只留下一块领土，这是次要的事情。

在沙弗里聚集在沙皇周围的宫廷人员，都象白杨树叶似的在那里发抖，害怕拿破仑先头部队攻来。

当亚历山大及其随从人员知道拿破仑同意停战和签订和约的时候，都欢欣若狂。亚历山大一世马上命令告诉法国皇帝，他亚历山大热烈地希望和拿破仑订立亲密的联盟，并且只有法俄联盟才能给全世界带来幸福与和平。在批准停战条款后，他通知说，他想与拿破仑亲自会见。

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再也不能拖延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进行解释，威廉三世在最后一分钟还在指望自己的朋友。沙皇向他解释了发生的一切事情。国王请求拿破仑停战。他想把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大臣哈登贝格派到提尔西特法国皇帝的大本营去。但是拿破仑对于人们胆敢提起这个名字，发出疯狂的叫喊，并且大跺其脚，说再也不准谈起哈登贝格。并且让国王知道，他不会得到赦免。

1807 年 6 月 25 日下午两点钟，两国皇帝举行了第一次会见。为了使亚历山大皇帝不必走到法军所占的涅曼河岸，而拿破仑不必走到俄国的涅曼河岸，在河中心安置了一座木筏，上面设有两个富丽堂皇的亭子。在法军占领的岸边，排列着拿破仑的全部近卫军，而在俄国的岸边，排列着亚历山大的为数不多的侍从人员。

那位后来享有盛名的俄国游击队员丹尼斯·达维多夫是这个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的描述使我们对于提尔西特会见目击者的一切感受具有十分深刻的体会，这是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是会见最伟大的统帅、政治家、立法家、行政官和征服者，他打败了……全欧洲的军队，并且已经两次打败了我国的军队，现在陈兵于俄国边境。这是会见一个具有绝对统治一切与他有关的东西的才能的人，一个具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人……

“……我们走近岸边，看见在自己老卫队排列成的两行人中间飞驰过去的拿破仑。热情的欢呼声和喊叫声在他周围震响，我们站在对岸的人也感到震耳欲聋；他的警卫队和随从人员至少有四百名骑士……在这一分钟，盛大的场面战胜了一切情感……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河的对岸，投射到一只船上，这只船载着一位奇人，一位从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的)和朱理·恺撒以来空前的统帅，他的多种多样的才能和征服文明国家的光荣使他大大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①

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丹尼斯·达维多夫不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这一天不仅他自己而且还有大多数俄国军官所看到的亚历山大的情况，据他说，亚历山大“用故意装出来的安静来掩饰”自己的激动。即使我们没有达维多夫所写的回忆，也可以从后来的大量证据中知道这种情况。

① 《丹尼斯·达维多夫全集》第一卷，1893 年圣彼得堡版，第 306—308 页。

在俄国军界中对于提尔西特和约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它是比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的失败更可耻得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自由主义的贵族青年与这几次战争的直接参加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普希金的一首诗篇(1823 年)中，描写了在亚历山大一世面前出现的拿破仑的形象：

他，在奥斯特里茨平原上
用手赶走了北方的民兵，
俄国人第一次在死亡面前逃命，
他，在提尔西特
带着胜利的条约
　也带着和平与耻辱
站在年青的沙皇面前……

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我国才正确地印出了这首诗的原文；几乎在所有的旧版中都有说得委婉一些的地方（“带着和平或者耻辱”），这歪曲了普希金的意思。

不管怎样，亚历山大要喝下的那杯酒，毕竟不象他所设想的那么苦涩。当两位皇帝同时登上木筏以后，拿破仑就拥抱亚历山大，他们一起进入亭子，立刻开始了几乎长达两小时的谈话。无论这位或那位皇帝都没有留下关于这次谈话的系统的记述，但是其中某些话后来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次谈话的总的意思当然表现在几天以后所签订的和约条款中。拿破仑问道：“我们为什么打仗呢？”亚历山大说：“我和你一样地憎恨英国人，在你反对英国人的一切活动中，我将成为你的助手。”拿破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可以妥善安排，和约也可以签订。”

两位皇帝在木筏上的亭子里停留了一小时五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内，等在俄军所在的涅曼河岸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始终抱着希

望，以为他也会被召去。拿破仑只是在第二天才允许同他会见，并且以十分鄙视的态度对待他。分别的时候，法国皇帝邀请亚历山大共进午餐，没有邀请普鲁士国王，只是勉勉强强地对他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转过身来。6 月 26 日，亚历山大接受拿破仑的邀请，到了提尔西特，从此时起，两位皇帝每天见面。起初拿破仑不让自己的任何一位大臣参加谈判。他对亚历山大说："我当你的秘书，你当我的秘书。"拿破仑的最初几句话，就使普鲁士处于真正绝望的境地。拿破仑干脆主张把它瓜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地方归亚历山大，以西的地方归拿破仑。他根本不愿与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谈话，在他允许威廉国王来见他的很少几次中也不大谈到正事，而大多是申斥和痛骂威廉。"卑下的国王，卑下的民族，卑下的军队，这个国家欺骗所有的人，它不值得存在下去"，——拿破仑这样对亚历山大谈论他的朋友，俄国沙皇曾经十分动人地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灵前向这位朋友起过誓，要同他结成永久的联盟和永远友好。亚历山大对于拿破仑说的这些话，报以亲热的、文雅的微笑，只是请求法国皇帝多少给普鲁士留下点东西，尽管它有这些应该受到惩罚的毛病。

吓得失魂落魄的普鲁士国王决定使用一切手段。他决定利用自己妻子的美色，于是特别写信叫路易莎王后这位著名的美人到提尔西特来。在对普鲁士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拿破仑正是把她看做是自己的敌人，命令在报上大肆辱骂她。但是在普鲁士宫廷中，却希望这位严厉的胜利者在与美人会见和进行信任的谈话后会减轻自己的愤怒。很快就有人提示路易莎，应该请求什么东西；所抱的希望并不大，因为人们知道甚至拿破仑所迷恋的那些女人，对他的影响也很少。会见是安排在提尔西特宫中的。有人向路易莎提示，她哪怕只请求归还马德堡城和其他一些领土也好。拿破仑是在骑马蹓躂之后就直接到宫中来会见的，他身穿普通的轻骑兵的制服，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子，而王后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盛装出迎。他们的会见由他们两

人单独地进行了很久。最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再也忍受不住他自己在注视着他的群臣面前的可耻的处境，大胆地走了进去，皇帝和王后的亲密的谈话被打断了，路易莎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如果普鲁士国王再迟一点走进房间来，我就会不得不让出马德堡”。——拿破仑后来对自己的元帅们开玩笑说。

给普鲁士留下了“旧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所有其他东部和西部的领土都被割去了。同时，拿破仑还力图完全践踏普鲁士的民族自尊心，在提尔西特条约第四条中补充说，他之所以归还上述四个省，也就是说，没有把普鲁士完全消灭掉，是“由于对俄国皇帝陛下的尊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普鲁士领土都并入新成立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拿破仑还把赫逊大公国并进去，不久汉诺威也并进去了。拿破仑把这个新的王国交给热罗姆·波拿巴。把从普鲁士夺来的波兰土地（波兹南省和华沙省）建立了华沙大公国，拿破仑任命萨克森国王为大公。亚历山大一世（由于拿破仑的坚持）从波兰领土得到不大的比亚威斯托克区。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签订了秘密的（暂时）攻守同盟。从而俄国必须执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的法令。

1807 年 7 月 8 日，终于签订了使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感到屈辱的提尔西特条约。

在提尔西特举行的庆祝和阅兵典礼一直继续到 7 月 8 日的夜晚。

在整个这个时期，两位皇帝形影不离，拿破仑竭力强调自己对过去的敌人、现在的朋友的充分的好意。7 月 9 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起检阅法国和俄国的近卫部队，后来，当着军队和聚集在涅曼河旁的很多人的面吻别了。这时，除了两位皇帝及其亲近的大臣以外，谁也不知道在提尔西特签订条约的这几天中，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十章　从提尔西特到瓦格拉姆

(1807—1809 年)

一

拿破仑离开提尔西特，德意志各地的人们奴隶似地卑躬屈膝地向他表示欢迎，最后他回到了巴黎。看来，他现在达到了历史上任何一位主宰从未达到过的高不可攀的权力的顶峰。拿破仑是包括比利时、西德、皮埃蒙特、热那亚的巨大的法兰西帝国的专制皇帝，意大利的国王，莱茵同盟(现在萨克森也参加进来了)的大部分德意志土地的保护者(也就是实际上的独裁者)，瑞士的统治者。他象在自己帝国中一样独裁地在下面这些地方发号施令：在荷兰和那不勒斯王国，他委派自己的兄弟路易和约瑟夫为那里的国王；在德意志的整个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他把这块地方取名为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交给自己的第三个兄弟热罗姆；在奥地利的过去的大片土地，那是他从奥地利夺来后交给自己的附庸巴伐利亚国王的；在欧洲北部沿海地区，那里的汉堡、不来梅、卢卑克、但泽、科尼希斯贝克都被他的军队占领；在波兰，那里新建立的军队是受达乌元帅管辖的，那里的统治者是拿破仑的附庸和奴仆萨克森国王，拿破仑任命他为波兰的大公。

此外，爱奥尼亚群岛、卡塔罗城、巴尔干半岛亚德里亚海沿岸的一部分地方也属于拿破仑。普鲁士只剩下很少的领土，被剥夺了保持军队的权利，被所承担的各式各样的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它对拿破仑的每一句话都胆战心惊；奥地利沉默不语，表示顺从；俄罗斯与法兰西帝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只有一个英国还在继续进行斗争。

拿破仑从提尔西特回到巴黎，就在财政大臣戈丹和国库长莫利

安的帮助下，对于财政、直接税和间接税等等都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其结果是：从法国人民和被奴役的人民那里残酷地榨取来的帝国的收入(七亿五千万到七亿七千万法郎)，完全能够抵偿支出，这里甚至已经预先把战时军费支出包括在内。这是拿破仑财政的特点：他认为军费是“日常的”开支，根本不是特别的支出。国家信贷十分稳固，以致在拿破仑时代建立的法兰西银行(现在这个银行还在，仍叫这个名字)对存款支付的利息，已经不象 1804 年和 1805 年那样为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四。意大利算是不依附于法国的“独立”王国，它每年要交给法国三千六百万金法郎。慷慨的“意大利国王”拿破仑每年都十分大方地把这笔款项送给法国皇帝拿破仑。至于管理意大利的费用，则由意大利的收入中特别拨款来开销。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是意大利的地方长官，称号是副王。驻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更不用说，是由意大利出钱维持的。拿破仑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其他国家也付出这一类费用，也要出钱来维持法国军队。拿破仑用取得赔款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的办法从被他征服的国家榨取了大量黄金，于是在法国铸造了正式的金币，这些金币都被投入商业流通中。他在执政时代就已开始进行的调整财政的工作，于 1807 年从提尔西特回来以后完成了。

他希望同时采取一系列发展法国工业的措施，但是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他所预定的措施，只有和实行大陆封锁保持不断的、最紧密的联系才能实现。从提尔西特回来后不久，拿破仑开始考虑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他认为不做这件事，要实现对英国的封锁是不能设想的。而只有开始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才能在经济方面展开广泛的活动。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了解这件新的事情的开端，即企图征服比利牛斯半岛，然后再来分析大陆封锁对帝国社会各个阶级以及对拿破仑的整个政策所发生的后果。

应当指出，在 1807 年秋季几个月和 1808 年的冬天，皇帝同他的

元帅、大臣和最接近他的官员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当时还很隐秘，对于局外人说来是不明显的。拿破仑的朝廷沉溺在奢华的生活中，旧贵族和新贵族、旧的和新的大资产阶级互相比赛宴会、筵席、舞会上的阔气；人们挥金如土，外国的亲王、附庸国国王来朝见皇帝，长期住在世界的首都，花掉大量的金钱。这是一个永不间断的光辉的节日，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森林、圣克卢、马尔梅松装饰得如同童话里的仙境。在旧制度下，从来没有这种金碧辉煌的景象，从来没有这么一大群满身珠光宝气的男男女女的廷臣。但是他们大家也知道，在欢乐的声音达不到的幽静的宫廷内室中，他们的君主经常站在桌旁，俯身查看比利牛斯半岛的地图，而逍遥自在地跳舞的人们当中的很多人，由于皇帝的命令，会突然与他们所过的奢侈生活分开，重新去冒枪林弹雨的危险。这到底为了什么呢？

还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的很多战友都觉得，必须最后停止下来了，因为法国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空前强大的地步。当然，帝国的全体居民是甘心顺从拿破仑的；农民暂时还要被征去当新兵，商人（除了沿海城市的商人）、特别是工业家非常高兴销售市场的扩大和贸易机会的增多。但是，大臣们和元帅们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后开始思索了，他们并不害怕国内革命对国家制度的威胁。他们都知道，郊区工人已被拿破仑的铁掌紧紧压制着。他们害怕另外一件事：拿破仑的领土大得惊人，这一点使他们提心吊胆。

皇帝对于由无数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一个大集合体的无拘束的、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开始使亲信们困惑不解了，这个大集合体从科尼西斯贝克到比利牛斯山（实际上已经越过了比利牛斯山），从华沙和但泽到那不勒斯和布林迪西，从安特卫普到巴尔干西北部的群山，从汉堡到科孚岛。甚至最肤浅的历史知识，甚至被人为地压抑着的本能的声音都向他们说，类似的世界王国的寿命都是十分短促的，并且不仅十分罕见，而且是历史力量的游戏的十分易毁的产物。他们意

识到(后来也谈到),拿破仑从他投身军旅到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为止的所作所为,象是奇怪的童话,而不大象是历史的现实。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仅是塔列朗)都认为,还要在史册中写进新的童话将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

拿破仑对于自己左右的文武官员是十分慷慨的。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他赏给达乌元帅一百万金法郎,赏给内伊元帅将近三十万金法郎终身的年金;赏给贝尔蒂埃元帅五十万金法郎和四十万零五千年金;对其他元帅和许多将军和军官也大加犒赏。戈丹、莫利安、富歇、塔列朗等大臣得到的赏赐比元帅少,但也是够丰厚的。近卫军和军队中所有实际参加战斗的军官,都得到了奖赏,很多人还得到了优厚的年金,负伤的比未负伤的多得两倍。但是这种慷慨行为并未使法国国库花费一个法郎,因为除了战败国要向战胜国法国偿付大量赔款之外,拿破仑还对这些国家(往往是个别的城市和团体)征收特别的苛捐杂税,数量达到几千万(从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征收四千万,从汉诺威得到的土地金两千万,从波兰征收三千万至三千五百万等等),这些款项都由他个人任意支配。拿破仑从这些款项当中拿出很多钱来犒赏自己的亲信,把剩下的钱储存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里,据他自己说,1812 年他在那里存有三亿金法郎。他的宫廷的费用即他的正式的皇室费(二千五百万)——同完全不是靠国家预算而来的、由他支配的无限制的款项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战败国真是痛苦万分!拿破仑说:"战争应该以战养战。"在第一帝国时期,这个原则是被严格遵循的。

因此,在拿破仑的手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每年都要由被征服国家交给他支配使用的几千万收入。他把这些钱很慷慨地分送给自己的军队和大臣们。但是元帅们和将军们得到所有这些巨额的赏赐,就使他们产生了追求荣华富贵的安闲生活的愿望。因为他们整个的一生都是在和将在几乎不间断的战争中度过!

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刚从提尔西特回来就开始准备派军队通过西班牙去远征葡萄牙。如果不是所有的人，也是很多的人，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还应该再一次提到大陆封锁，因为从今以后，如果有一分钟忘记了大陆封锁，那就不会了解拿破仑的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

拿破仑抱定的目的是要靠大陆封锁从经济上窒息英国。他是贯彻始终的：他既不能信任葡萄牙布拉甘兹王朝，也不能信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他不相信这两个王朝真正会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国家完全破产，也就是禁止农民和地主把细绵羊毛卖给英国人，严禁便宜的英国机器工业品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显然，他们虽然不容抗辩地接受了拿破仑的关于封锁的柏林法令，但是将会秘密地、顺便地对走私采取默许和宽容的态度，用成千上万种别的方法来破坏这个法令。而比利牛斯半岛有漫长的海岸线，英国舰队完全控制了比斯开湾，控制了整个大西洋和地中海，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有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在这种情况下，当拿破仑没有完全占领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前，是根本谈不到实际进行封锁的。对于他说来，原则性的问题是已经坚定不移地决定了：欧洲的全部海岸，南部的、北部的和西部的海岸，必须由法国的海关人员直接进行监督。谁不想这样做，就把他赶开。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对他卑躬屈膝，并且对他说谎，因为他们不可能也不希望赶走英国人和真正妨碍英国的贸易。葡萄牙的布拉甘兹王朝也如法炮制，也是对拿破仑奴颜婢膝，简直到了完全忘记人类尊严的地步，而对于封锁却力图假装看不见。

但是，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没有了同盟者的英国，坚定不移地决定加强斗争。1807 年 9 月初，英国舰队炮轰哥本哈根，因为有消息说，丹麦将参加大陆封锁。拿破仑知道这个事件后大发雷霆。这加快了他占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决定。1807 年 10 月，朱诺元帅指挥的一支两万七千人的军队，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经过西班牙的领土

向葡萄牙挺进。在派出这支军队之后，紧跟着又派了另一支两万四千人的军队，由杜邦将军指挥。此外，拿破仑还派出了将近五千名骑兵(龙骑兵、骠骑兵、轻骑兵)。葡萄牙的摄政王向英国请求保护。他害怕拿破仑，也同样害怕英国人，因为英国人能够很容易地从海上毁灭里斯本，就象他们在此以前毁灭哥本哈根一样。拿破仑把西班牙放在第二轮上，他想等把葡萄牙完全解决以后再来解决西班牙；那时征服西班牙就比较容易，因为有了两个基地，一个是法国南部，一个是葡萄牙。皇帝甚至不必费功夫通过外交途径告诉西班牙，说他的军队将要通过西班牙的领土。他只是命令朱诺元帅越过国境，把这个消息带到马德里。马德里顺从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在拿破仑的宫廷里，帝国大宰相康巴塞雷斯鼓起勇气用最尊敬的口吻反对已经开始的事情。相反地，塔列朗则极表赞同。塔列朗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已于 1807 年 8 月退职。他退职的理由，是因为拿破仑说他贪污和勒索贿赂，而退职的原因，则是他早已感到拿破仑的世界政策将要崩溃，决定逐渐摆脱主要角色的身分。但是他仍然留在宫里，有很高的官阶和地位。现在，他又希望以逢迎来博得拿破仑的青睐，只要拿破仑一提起什么，他就随声附和，虽然他自己当时已经认识到进军西班牙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和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

朱诺率领的法军经过西班牙的领土直趋葡萄牙。士兵们经过的道路崎岖难行，沿途荒无人烟，没有粮食。法军抢劫农民，农民也进行报复，把掉队的人干掉。在长达六个星期以上的行军之后，朱诺于 1807 年 11 月 29 日进入里斯本。王室已在两天前坐上英国军舰逃出了自己的首都。

现在该轮到西班牙了。

二

西班牙的情形是这样的：国王查理四世是一个意志薄弱、愚笨糊涂的人，完全受自己妻子和她的宠臣戈多伊的影响。国王、王后和戈多伊与王位继承人斐迪南有着不可调和的仇恨，在这几年中（1805、1806、1807 年），西班牙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斐迪南抱着很大的希望。财政和行政的混乱，国内各方面政策的杂乱无章（这妨碍了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曾经一度发达而现在衰落了的工业，所有这些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他们认为，只有打倒旧朝廷中的宠臣戈多伊才能使西班牙“复兴”。当时普遍流行的想法就是，让西班牙王位继承者斐迪南同拿破仑的一位亲戚通婚，因为与强大的皇帝结成亲戚，就能够（他们以为）得到巨大的支持来进行改革，并且既能保持独立，又能在对外政策的一切问题上有恃无恐。斐迪南正式向拿破仑的侄女求婚。拿破仑拒绝了。

法国皇帝有另外的想法：他想推翻王朝，让自己的一位兄弟或元帅坐上王位。1807 年冬天和 1808 年春天，拿破仑的军队源源不断地经过比利牛斯山涌入西班牙。还在 3 月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集中了十万人。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决定开始行动。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西班牙王室纠纷的尖锐化。缪拉元帅率领八万法军向马德里前进。起先查理四世、他的妻子和戈多伊都决定逃出首都，但是还在阿兰瑞兹他们就被愤怒的人民阻挡住了。戈多伊被捕，挨了一顿痛打，后来被关进监狱，而国王被迫让位给斐迪南。这是 1808 年 3 月 17 日的事情，而六天之后，3 月 23 日，缪拉进入了西班牙首都。但是拿破仑并不承认斐迪南，他要求新国王、旧国王和西班牙波旁王朝全体家族都到法国巴荣纳城他那里去。他自己充当最高法官的角色来最后裁判和决定谁是谁非。1808 年 4 月 30 日，西班牙国王查理四

世、他的妻子、新国王斐迪南七世、戈多伊都到了巴荣纳。但是拿破仑要求王室的所有亲王也到巴荣纳来见他。马德里群情大哗：拿破仑的企图昭然若揭，那就是阴险地把西班牙波旁王室全体成员引诱到巴荣纳，宣布王朝被推翻，加以逮捕，然后在这种或那种借口下把西班牙并入法国。5月2日，马德里爆发了反对占领该城法军的起义。缪拉用流血的办法把这次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这只是西班牙人民战争可怕的熊熊烈火刚刚开始点燃而已。

拿破仑得到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消息，他是与西班牙王室同时到达巴荣纳的，当他亲眼看见查理四世用棍子去打斐迪南这样激烈的场面之后，突然说明了自己的意志：他要求查理四世和斐迪南都放弃西班牙的王位，而正式让他拿破仑有自由支配西班牙的权利。这一点做到了，因为他们全体——查理四世、斐迪南以及王后都在宪兵和军队的手中。在此之后，拿破仑对他们宣布，为了他们个人的幸福和安宁，他已经决定不放他们回西班牙，把国王和王后送到枫丹白露，把斐迪南和西班牙波旁王室的其他亲王送到瓦朗斯塔列朗公爵的城堡去。这也立即执行了。过了几天后，1808年5月10日，拿破仑命令自己的兄弟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到马德里去，从此他就是西班牙的国王了。而在此之前被他任命为克累弗-贝格（在西德）公爵的缪拉元帅，则接到命令前往那不勒斯，从此就是那不勒斯的国王了。

皇帝非常满意这些办法：看来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利，西班牙波旁王族这么天真，自投罗网，使他不损一兵一卒就得到了比利牛斯半岛。

突然，不仅完全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而且也出乎默默无言地、恐惧地注视着侵略者的新的残暴行为的整个欧洲的意料之外，西班牙燃起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猛烈的、扑不灭的农民游击战争的火焰。

在这里，拿破仑第一次碰到了完全不同的敌人，他以前从未与这样的敌人打过交道，只是不久之前在埃及和叙利亚有机会看见过。在

他面前的，是用砍刀武装起来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是身穿破烂衣服、手拿生锈枪枝的摩林纳山上的牧人，是手拿铁棍和长剑的卡塔洛尼亚的手工业工人。拿破仑用鄙视的口吻说他们是“流氓”他是欧洲的主宰，他把拥有炮队和骑兵、皇帝和元帅的俄国、奥国和普鲁士的军队都打得大败而逃，他的话能够毁灭旧的国家和建立新的国家，难道他还怕“西班牙的败类”吗？

但是，无论是他自己，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人，当时都不知道，正是这些“流氓”最先开始挖掘深渊，拿破仑的大帝国注定要崩塌到这个深渊里去。

1808年，拿破仑开始而且实现了自己在西班牙的事业，他始终注意到直接的历史上的先例，这个例子看来是会引起极大的乐观情绪的。事实上，正好在拿破仑之前一百年，法国王位上他的前辈之一，国王路易十四让自己的孙子菲利普坐上西班牙的王位，这样，就在西班牙留下了波旁王朝的苗裔。菲利普是“西班牙的波旁王族”的祖宗。西班牙人当时接受了新的国王和新的朝代，并且让他们一直坐在王位上，虽然当时半个欧洲都在对路易十四作战，目的是要把菲利普赶走。为什么现在这位比路易十四不知强多少倍的拿破仑用同样的策略却不能成功呢？为什么他不能在西班牙建立“西班牙的波拿巴”王朝呢？何况他根本用不着象路易十四那样跟欧洲作战，因为欧洲已经被征服了、顺从了，而同俄国则结成了同盟。

拿破仑的错误在于他迷惑于纯粹表面上的相似。他不想明白菲利普·波旁 1700 年在西班牙的统治与约瑟夫·波拿巴 1808 年在西班牙的统治的根本区别。法国商人、法国船主和法国贵族中的冒险家兴高彩烈地欢呼菲利普登上王位，认为(路易十四本人也是这样想)从今以后，西班牙广大的殖民地将成为法国的财产。但是他们当时大错特错了：西班牙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一致反对法国资本渗入西班牙殖民地。菲利普五世必须违心地拒绝自己的法国同胞在权利上与

西班牙人相等。西班牙在经济方面并未成为法国的朝贡国，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菲利普五世和西班牙波旁王族才保持住自己的王位。而现在穿着西班牙国王的华丽服饰的约瑟夫·波拿巴，只是拿破仑的一个地方长官，只是他在比利牛斯半岛实行大陆封锁和完全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有计划地把西班牙变成全面受剥削对象的执行人。在西班牙很多人都知道，从 1799 年雾月政变以来，制造呢绒和亚麻布的厂主以及法国其他工业家向拿破仑诉了不少苦，请愿过好几次，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拿破仑完全接受了这个计划：一、西班牙必须成为法国产品的垄断的销售市场；二、西班牙必须把贵重的、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细绵羊毛专供给法国的工厂；三、西班牙（特别是安达鲁希亚）必须种植法国纺织厂所需要的、而拿破仑禁止向英国人购买的各种棉花。这个计划与完全禁止西班牙同英国贸易的计划是紧密联系着的。而西班牙一直是以高价在英国大量销售羊毛，而向英国购进大量廉价的消费商品的。

因此，对于畜牧者、弹毛工人、呢绒制造者，对于所有西班牙的从事工业的人，对于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与羊毛和呢绒的生产有关系的全体农民，而在封建关系还存在、特别是在封建关系已经削弱的地方，对于与英国、与殖民地种植园的经济有联系的所有土地贵族，服从拿破仑几乎就意味着完全破产。特别是马上就不能与当时西班牙在美洲的最富庶的领地，以及它在海外的一切领地进行联系了（例如，不能再与印度洋东部的菲律宾发生联系），因为只要那个欧洲国家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拿破仑政策的范围，英国就立即对它宣战，并且把它的海外殖民地都夺去。被拿破仑的入侵粗暴地破坏了的国内各阶级的所有这些经济利益，也成为反对威震一时的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烈火燃烧起来的经济基础。西班牙的起义农民和手工业者表明，他们能够坚持住乍看起来似乎不能胜任的斗争。但是暂时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被逮捕的西班牙波旁王族在警察的监视下前往指

定的流放地——枫丹白露和瓦朗斯，而约瑟夫·波拿巴则到了马德里。

诚然，已经向皇帝报告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西班牙的农民胆敢几个人结成一伙，在夜晚悄悄地跑到法军军营来开枪射击，当抓到他们、要枪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临刑前沉默不语，或者以鄙视的口吻谩骂。也向皇帝报告了这样的事情：5月2日，在镇压马德里的起义的时候，缪拉元帅向人群开枪射击，人群并不马上逃得无影无踪，而是躲到屋里，从窗户内继续向法军射击；当法军进入屋内逮捕射击者的时候，子弹已经用完的西班牙人就用刀砍，用拳头打，用嘴咬，只要一息尚存就拚命挣扎，法军只是经过了殊死的搏斗后，才把西班牙人从窗户抛到大街上去，抛到法军的枪尖上去。法军从进入西班牙的最初时候起，就遇到无数的、几乎每天都要发生的对侵略者的最激烈、最疯狂的仇恨的表现。法军进入乡村。乡村中空无所有，居民都藏到森林中去了。在一个村庄中遇见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孩子，还发现一些存粮。军官怀疑是否有人捣鬼，在让士兵吃这些东西以前，先问这个女人，存粮里面是否下了毒药。军官得到使人安心的回答以后，命令她自己先吃一些。这位农妇毫不犹豫地吃了。军官对此还不满足，他命令农妇拿这些食物喂她的小孩。母亲马上执行了这个要求。于是一些士兵就吃了，经过短短的时间，母亲、孩子和进食的士兵都痛苦地死去了。上了圈套了。

起初，这样的事情还使法军吃惊，后来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谁也不对西班牙战争中的什么东西表示惊奇了。这些奇怪的事情暂时也没有使拿破仑感到困惑。他不是很快就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的。

但是，从仲夏开始，一些战败国就开始抱着很大的希望注视着比利牛斯山那边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传来了奥地利在武装的流言……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的三年中间，奥地利已经休息过来，恢复了元

气。在维也纳的宫廷中，在贵族和商人中，都增长着可能最后从拿破仑的铁蹄下挣脱出来的希望。我们将会看到，在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贵族最害怕拿破仑继续统治下去，因为害怕拿破仑法典会这样或那样地强加在奥国身上，而旧的封建制度也就会崩溃了。

拿破仑觉得必须显示一下法俄同盟的巩固，以便在消灭比利牛斯的“叛乱者”之前，保证自己不受来自奥国的一切意外事件的干扰。

“皇帝陛下很快就会使野蛮的西班牙流氓恢复理智”。——欧洲的报纸尊敬地写道。“看来，这个强盗最后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普鲁士、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汉撒同盟各城市、威斯特法利亚王国、莱茵同盟各国报纸的很多读者在读了有关报道后却这样窃窃私议，但是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的指望能够实现。正在这种情绪之下，突然宣布，法国皇帝与俄国皇帝秋天(1808 年)将在埃尔富特会见。

三

拿破仑早就想显示一下法俄同盟的巩固。但是在 1808 年 7 月中旬发生了意外的事件，使拿破仑加快了与亚历山大的会见。去攻占西班牙南部的杜邦将军已经进入安达鲁希亚，占领了科尔多瓦城并继续向前推进，到了烈日炎炎的大平原，粮食断绝，陷入农民组成的无数游击队的包围中，遭到游击队从四面八方的进攻。7 月 20 日，在离拜楞不远的地方，杜邦带着他的队伍投降了。当然，这还并不标志着西班牙已从法军占领下解放出来，但是这次投降对欧洲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法兰西帝国的常胜不败的军队虽然只遭到部分的失败，但却是不可争辩的失败。拿破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大发雷霆，把杜邦交军事法庭受审。拿破仑对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la plus grande des immoralités)，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如果一位没有才干的

将军去担任军事指挥，那末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已经直接变为滔天罪行了。他认为杜邦已经永远完蛋了。

拿破仑马上就感觉到拜楞溃败的严重政治意义。他虽然故作镇静，强调说拜楞的损失与他的帝国的资源比起来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事件一定会对加紧进行武装的奥国发生影响。奥国看见，拿破仑突然不是在一条战线而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这条新的在南方的西班牙战线今后将大大削弱拿破仑在多瑙河流域的兵力。为了使奥国不致参加战爭，必须使奥国了解，亚历山大一世将从东方侵入奥国的领土，而拿破仑，作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同盟者，将从西方进攻维也纳。主要是为了这个缘故，在埃尔富特举行了显示两位皇帝的友谊的会见。

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经历了困难的时期。与拿破仑结成同盟，以及结成这个同盟的必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与英国决裂，大大触犯了贵族和商人的经济利益。弗里德兰之战和提尔西特和约不仅被认为是不幸，而且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亚历山大相信了拿破仑的诺言，他希望由于法俄同盟的缘故将来能够得到土耳其的一部分，并且以此来说服宫廷、近卫军和全体贵族中的反对派。时间过去了，但是拿破仑在这方面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步骤；并且有流言传到彼得堡，说拿破仑怂恿土耳其人在他们当时进行的反俄战爭中继续抵抗。在埃尔富特，法俄同盟的双方都希望更清楚地看看对方有什么好牌，以便借此来玩弄自己外交上的把戏。两位同盟者互相欺骗，彼此都知道这一点，虽然暂时还不是完全知道。双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互不信任的，而同时又互相需要。亚历山大认为拿破仑是最聪明的人，拿破仑承认亚历山大在外交上是敏锐而狡猾的。法国皇帝谈到俄国沙皇时说道：“这是眞正的拜占庭人。”因此，1808年9月27日，他们在埃尔富特第一次见面时就热烈拥抱，当众接吻，并且接连两周之内都不断重复这些动作，每天一起去检

阅、阅兵、出席舞会、宴会、看戏、打猎、骑马蹓躂。这些拥抱和接吻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拥抱和接吻：对于拿破仑说来，如果奥国人不知道他们接吻的话，这些接吻会失去全部愉快的感觉，对于亚历山大说来，如果土耳其人不知道他们接吻的话，这些接吻也会失去其全部愉快的感觉。

从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到埃尔富特会见的一年中，亚历山大确认，拿破仑只是以答应给他“东方”、自己要“西方”的诺言来诱惑他；已经十分明显，拿破仑不仅不让他占领君士坦丁堡，甚至宁愿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留在土耳其人的手里。从另一方面说来，沙皇看见，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的整整一年中，甚至没有把自己的军队从他归还给普鲁士国王的那部分普鲁士土地上撤走。至于拿破仑，那末对于他说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还没有结束西班牙的激烈的游击战争以前，应使奥地利不致进攻法国。而要做到这一点，亚历山大就必须在奥国决定进攻的时候积极地反对奥国。而亚历山大既不想承担、也不想履行这一直接的义务。拿破仑同意事先就把加利西亚、甚至卡尔帕特附近的领地给亚历山大，作为俄国的军事援助的报酬。后来，俄国历史编纂学上的斯拉夫派和民族爱国派的最杰出的代表都痛责亚历山大，说他没有同意拿破仑的这些建议，放过了永不再来的机会。但是亚历山大在稍作反对之后，终于服从了俄国贵族中强有力的一派，他们认为与两次击溃了俄国军队（在 1805 年和 1807 年）的拿破仑结成同盟，不仅是一种耻辱（这还不去管它），而且就是毁灭。有人写匿名信提醒亚历山大说，他的父亲保罗也是与拿破仑保持友好关系的，结果如何呢，这些匿名信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但是亚历山大还是害怕拿破仑，无论如何不愿与他决裂。拿破仑想惩罚瑞典，因为它与英国结成同盟，亚历山大根据拿破仑的指示和请求，在 1808 年 2 月向瑞典开战，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把直到托尔

涅奥河的整个芬兰从瑞典割去，把它并入俄国。亚历山大知道，甚至这样做也不能平息俄国地主的愤怒和不安，因为对于他们说来，自己钱袋的利益远比国家向不毛之地的北方扩张领土要重要得多。无论如何，得到芬兰也是亚历山大的一种论据，它有助于说明现在同拿破仑决裂是危险而不利的。

在埃尔富特，塔列朗第一次出卖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秘密勾结，劝告亚历山大抗拒拿破仑的霸权。塔列朗后来以对法国的关心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拿破仑对权力的疯狂爱好会使法国灭亡。“俄国的君主是文明的，而俄国的人民不文明，法国的君主不文明，而法国的人民是文明的。必须使俄国的君主与法国的人民结成联盟”，——老奸巨滑的阴谋家就是用这样谄媚的话开始了自己与沙皇的秘密谈判。

人们谈到塔列朗的时候都说，他整个一生“都在出卖那些收买了他的人”。当时他把执政府出卖给拿破仑，现在在埃尔富特把拿破仑出卖给亚历山大。后来他又把亚历山大出卖给英国人。他只是没有把英国人出卖，因为只有英国人没有收买他（虽然他自己好几次向英国人自荐，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在这里不宜于深究塔列朗的动机（他后来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一些钱，虽然数目并不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多）。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指出两点：第一，塔列朗早在1808年就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看到了那种或多或少模糊地使许多元帅和大臣深感不安（象前面已经谈到的）的东西；第二，亚历山大了解，拿破仑的帝国并不象所显示出来的那样牢不可破。他开始反对拿破仑硬要俄国在新的法奥战争开始时对奥作战的勒索。在一次这样的争论中，拿破仑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疯狂地踩它。亚历山大对这种狂妄行为说道：“你太暴躁，而我又固执……我们还是来商谈、来讨论吧，不然我就走开。”

同盟在形式上仍然有效，但是今后拿破仑不可能指靠它了。俄

国非常耽心地等待着，埃尔富特会见是否会平安度过：拿破仑是否会把亚历山大逮捕，就象他在四个月前对待西班牙波旁王室那样，把他们诱到巴荣纳去。当亚历山大从埃尔富特回来以后，一位年老的普鲁士将军坦率地(这使亚历山大很尴尬)说出这样的话："谁也不再存希望他会把陛下放回来。"从外表看来，一切都很好：在埃尔富特的整个会见期间，附属国的国王和其他一些君主(他们都是拿破仑的随从人员）一直被拿破仑与沙皇彼此之间的真心友爱所感动。但是陪伴亚历山大的拿破仑本人却是闷闷不乐的。他知道，附属国的国王都不相信这个同盟是巩固的，奥国也不相信。必须尽快解决西班牙问题。

四

拿破仑在西班牙有十万人。他命令再派十五万人迅速开往西班牙。农民起义一个月比一个月激烈。西班牙名词"游击队"、"小型战争"不正确地表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这场与农民、手工业者、牧羊人、骡夫的战争比其他大规模的战争更使皇帝感到不安。在普鲁士奴隶似地屈从之后，西班牙的猛烈的抵抗特别显得奇怪和出乎意料。但是拿破仑甚至没有担心过这场西班牙的烈火会烧到什么程度。这场战争也许还能使作为将军的波拿巴清醒一下，但是，对于拿破仑皇帝，欧洲的征服者来说，这种"贫穷的流氓的骚乱"是不能发生任何影响的。

拿破仑不相信亚历山大的帮助，并且几乎确信奥国会反对他，他在 1808 年深秋到西班牙去了。他非常愤恨不屈的、肮脏的、不识字的西班牙"农夫"。在这个时期，英国人已经登陆，并且把法军赶出了里斯本。葡萄牙不再是法国人的基地而是英国人的基地了。法军只占领了艾布罗河以北的北部西班牙，在其他地方几乎已经没有法国

军队了。西班牙人已经有了用英国武器装备的军队。拿破仑转而进攻西班牙的军队。1808 年 11 月 10 日，拿破仑在布尔哥什大败西班牙军队；几天之内又发生了两次战斗，西班牙军队几乎全军覆没。11 月 30 日，拿破仑进攻由强大的守卫部队保卫的马德里。有趣的是：为了征服西班牙，拿破仑动用了（作为自己军队的骨干）“波兰荣誉军团”，这个军团还是 1807 年他占领波兰后下令建立的。按照他的命令，波兰人异常勇敢地屠杀西班牙人，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镇压西班牙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是扮演了可耻的角色。拿破仑对波兰人说，如果要他复兴波兰的话，他们就应该将功折罪，——于是，波兰人得到了自己的祖国，却夺去了西班牙人的祖国。1808 年 12 月 4 日，拿破仑进入马德里。京城以死一般的沉寂来迎接侵略者。拿破仑立即宣布西班牙和京城处于戒严状态，并且建立了战地军事法庭。然后，皇帝就进攻英国军队。穆尔将军在法军追击英军残余部队的时候受伤死去。

看来，西班牙的事业又毁灭了。但是，起义人民的事业越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反抗越加猛烈。

萨拉戈萨城被法军包围，该城坚守了几个月。最后，拉纳元帅占领了它的外围工事，于 1809 年 1 月 27 日攻入该城。但是，那里发生了任何被围城市从未有过的情况：每一栋房屋都变成了堡垒，每一间茅舍、马棚、地下室、顶楼都必须经过战斗才能占领。这种激烈的战斗，在这个已经被占领、但是继续抵抗的城市里进行了整整三个星期。拉纳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一切人，甚至杀死妇女和儿童，但是，只要士兵稍一疏忽，妇女和儿童也会杀死他们。法军屠杀了两万名守卫部队和三万两千多名城市居民。拉纳元帅是一位慓悍的骠骑兵，世界上的一切他都无所畏惧，他参加过拿破仑所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他不知道“神经”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而他却被无数并排躺在屋内外的尸首、那些漂浮在血泊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尸体的景

象所震动。当他和随从人员沿着死寂的城市的血流成河的街道走过的时候，他对随从人员说："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我们被迫要杀死这样勇敢的人们，即使他们甚至是疯狂的人们！这场胜利只能使人感到忧伤！"

萨拉戈萨城的被围和失守，对欧洲、尤其是对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产生了震动人心的印象。西班牙人的行为和德国人的奴隶般的屈从的对比，使人感到激动、困惑和羞耻。

但是，被征服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拿破仑帝国的侵略和掠夺不可能长久地容忍下去。被征服的欧洲的资产阶级被拿破仑唤醒投入生活，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被推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舞台，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道路，以便也摆脱拿破仑的政策对他们经济上的压制。

随着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些道路也就开辟出来了。民族解放运动在 1803 年、1809 年和 1810 年曾经单独地爆发过，而到 1813 年则在拿破仑统治压迫下的一切国家中燃烧成熊熊烈火。

拿破仑在 1806 年和击溃普鲁士之前曾经表示过，他将怎样对待德意志人民恢复民族抵抗精神的任何最微小的尝试。现在，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拿破仑认为可能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了，这不仅在巴伐利亚或者是在莱茵同盟的国家内，而且在汉堡、但泽、莱比锡、哥尼斯堡、布莱斯劳以及整个德意志国家内。

拿破仑不知道，在柏林，费希特在自己的讲课中作出了隐晦的爱国主义的暗示，他不知道在德国的大学中组成了学生社团，这些社团虽然还不敢直接谈论反对共同的征服者的起义，但是却隐藏着对他的深刻的仇恨。他没有仔细考虑到，附属国家的德意志资产阶级虽然对拿破仑法典的实施和封建主义的崩溃感到高兴，但却会认识到和"血税"、即征召新兵以补充法兰西大军的义务相联系的法国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压迫是太沉重、太高昂的代价。所有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或者不想知道。据一个目击者说，在埃尔富特，许多德意志国家的君主、男女贵族的行为，就象仆役侍候一位脾气暴躁的老爷一样，但是，如果能够即时吻一吻皇帝的手，他有时也会慷慨赏赐的。德国的第一位诗人歌德力求谒见拿破仑，最后，拿破仑在埃尔富特接见了他（但是忘记了请这位老诗人坐下），并且好意地称赞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使歌德心花怒放。总之，德国的上层人物（拿破仑也只与他们发生直接关系）当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反抗的暗示。人民沉默不语、俯首屈从。但是，从奥地利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使人感到惊惶不安了。

奥地利认为，这一次拿破仑只能用一只手来作战了，因为另外的一只手已经被拖住了：承担了可怕的西班牙的重负。奥地利知道，拿破仑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西班牙的，因为对他说来，这已经不只是暴君的心血来潮，而有另外的某种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才长期陷在那里。奥地利不仅知道这一点，并且也了解其原因。法国皇帝用新的补充法令、新的警察措施和新的政治条例加强了大陆封锁。现在，当比利牛斯半岛已经出现了英国人的时候，放弃这个半岛就等于放弃大陆封锁，也就是放弃拿破仑整个政策的基本动机。

五

拿破仑认为贪污者塔列朗和间谍富歇是下贱的流氓，当然，他们的叛卖或者叛卖的嫌疑，并不象正在准备中的对奥地利的战争那样分他的心。但是他把前者和后者都考虑到了。1809 年 1 月，拿破仑把西班牙交给元帅们去处理（没有他这些元帅的军事价值就失去了一半）；也交给自己的兄弟西班牙国王约瑟夫任意裁夺（不管拿破仑在或不在，这位国王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拿破仑回到巴黎后，命令大臣们都到宫廷里去，1809 年 1 月 28 日，他在宫廷中气势汹汹地

对着塔列朗叫喊。下面就是他以叫喊来开始自己对塔列朗的谈话的著名场面："你是强盗，无赖，寡廉鲜耻的人，你连你的亲父都会出卖！"，这次谈话的最后几句话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沒有把你吊在卡鲁色尔广场的栅栏上呢？但是还有时间来做！你是阔人里面的败类！"他已经知道关于塔列朗（还在 1807 年就已被撤职）叛卖的一些情况，当然，他并不全都知道，不然，他会马上把塔列朗枪毙的。但是他并未查明老贪污者的阴谋。对奥战爭在他面前是一个不断的威胁。

刚刚遭到军队大屠杀的西班牙，又爆发了遍及全国的、扑不灭的城乡起义的火焰。勇敢无畏的、神出鬼沒的人民继续把拿破仑的三十万人的精锐部队即大军的一半牵制在西班牙。但是另外一半人则由皇帝急忙准备用于新的艰苦的对奥战爭。他下令在法国提前进行新的征兵，这使他又得到了十万人。此外，他命令屈从于他的德意志各国再提供十万士兵，供他作战之用。这个命令被绝对地执行了。然后他分出十一万多名可以特别信赖的老兵，从老兵当中派七万人到意大利去，因为那里也会遭到奥军的进攻。

这样，在 1809 年春天，他手中共有三十万多一点的士兵可以用来对抗奥军。但是奥地利也集结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奥国宫廷、贵族、中等贵族是这次战爭的发动者，他们是同心同德的，甚至匈牙利贵族这一次也完全忠于"王室"：必须保卫和巩固他们共同的神圣的幸福——农奴制度，这个制度在 1796 年至 1797 年、1800 年和 1805 年的三次战爭中曾遭受到那样可怕的打击，并且在政治上已摇摇欲坠（军队被击溃，哈布斯堡王朝的肥沃土地被割与法国）。从大陆封锁中得到好处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奥国王朝中的数量还相当小（如果不算捷克）；商业资产阶级和全体消费群众都身受封锁之害。奥国王室在 1809 年发动的战爭，比以往三次对拿破仑战爭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得人心。"阳光终于从西班牙闪耀出来了"。——这句话在奥地利

和德意志以各种方式传述着……

全世界都默不作声地在等待。拿破仑及其三名最优秀的元帅达乌、马塞纳和拉纳已经作好战斗准备。他期待着奥地利首先“进攻”，因为这会给他与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开始的、但未结束的一次重要争论提供更多的论据：他还希望俄国进攻奥地利。

1809 年 4 月 14 日，奥国大公查理这位奥国名将侵入巴伐利亚。“两个月以后我要让奥地利放下武器，那时如果需要的话，我将重新完成在西班牙的旅行”，——拿破仑去作战时这样说。

他当然很少依赖十万名被奴役的德国人，他们在人数上占了他现在的军队的三分之一，他知道，强大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军团还留在西班牙，那里的法国军队损失了多少老兵。知道这一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v]。奥军这一次作战异乎寻常地勇敢和坚强。第一次大的战斗是在巴伐利亚的阿本斯贝格进行的。奥军被击退了，损失了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他们作战时非常勇敢，这比在阿尔科拉、马伦哥和奥斯特里茨打得出色。第二次战斗是 4 月 22 日在艾克缪尔发生的，这场战斗又是拿破仑取得胜利。查理大公遭受惨重损失，被赶过多瑙河。后来拉纳元帅在完成迂回之后，以强攻占领了莱根堡。指挥围攻的拿破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脚部受伤。皇帝的靴子被脱下来了，受伤的地方迅速被包扎起来，皇帝立即命令把他扶到马上去，严格禁止谈到他受伤的事情，以免扰乱军心。他在进入被占领的莱根堡时，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微笑着向那些对他欢呼的士兵还礼。在艾克缪尔和莱根堡的战斗中，奥军又损失了将近五万人，其中有打死的、受伤的、被俘的和失踪的。五天当中，拿破仑赢得了五次血战的胜利。

拿破仑渡过多瑙河继续追击败退的查理，他在艾别尔斯堡追上了查理，在这里他又把查理击败和赶跑了。拿破仑还放火把城市烧掉，并且把一部分居民（奥国人断定说有一半居民）活活烧死。“我们踏着烤焦了的人肉前进”，——罗维戈公爵萨瓦里将军谈到法国骑兵

经过艾别尔斯堡的废墟时这样说。在满街的人肉当中甚至可以拾到马蹄子。这是5月3日的事情。5月8日，拿破仑已经又象1805年时那样，在肯恩布鲁恩的奥国皇帝的宫廷中过夜。5月13日，维也纳的市长把奥国首都的钥匙呈献给皇帝。看来，战斗是快要结束了。但是查理救出了军队，使军队经过维也纳的桥梁到达多瑙河左岸，然后马上把桥烧掉。拿破仑决定采取异常困难的行动。在多瑙河上离维也纳的岸边(右岸)大约半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浅滩，这个浅滩一直伸延到洛博岛。拿破仑决定架设浮桥到这个浅滩，把自己军队（这支军队的人数由于作战和沿途留下守卫部队而减少了）的主力送到那里去，然后就可以不费力气地从这个岛渡过狭窄的支流而到达多瑙河的左岸（北岸）。5月17日渡河前往洛博的行动完成了。然后，拿破仑下令架设越过狭窄的支流直达左岸的浮桥。拉纳的军团最先渡过河，其次是马塞纳的军团。这两位元帅占领了附近的两个村庄阿斯佩恩和埃斯林。在这里，已经渡河的军团和跟随在它们后面的其他法军部队遭到了查理大公的袭击。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拉纳率领骑兵去砍杀很有秩序地撤退的奥军的时候，连接右岸(维也纳岸）与洛博岛的桥梁突然断了，法军也就突然失去了弹药供应。拿破仑命令拉纳立即撤退。撤退是在且战且退和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战斗的时候，拉纳元帅中弹受伤，他的双脚几乎被炸断。他是在拿破仑的怀中死去的，人们在拿破仑的眼睛里第二次看见了眼泪。法军又回到洛博岛，不管拿破仑怎样安慰自己说，在这次战斗中法军只损失一万人(实际上要多得多)，而查理大公损失了三万五千人(实际上将近两万七千人)，但是这一次确实遭到了失败，并且作了退却。这是5月21日和22日的事情。

从维也纳逃出的奥国王室和政府欢欣若狂，准备回到首都。查理大公是一位有才能的、严肃的人，他自己不但不夸耀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且对所有这些夸大之词十分气愤。但是，无论如何，这已经不

是 1799 年阿克尔的解围了，甚至也不是 1807 年的艾劳之战了。拿破仑的第三次失败是比较大一些、比较明显一些的失败。拿破仑知道：在德意志、普鲁士的席尔少校突然带领自己的骠骑兵团开始以类似游击战的方式反对法军；提罗耳的农民安德列·霍弗尔在提罗耳的群山中进行同样的游击战争；意大利十分不平静；在西班牙，虽然他留下了将近三十万名士兵，留下了大军中的精锐部队，但是激烈的战斗又重新以新的力量爆发了。关于艾斯林战斗的消息，关于皇帝似乎已被抓到，正关在洛博岛上（欧洲人都这样说，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实际情况了）的传闻，一定会给所有在各地揭竿而起的斗士增加新的力量。

但是，拿破仑并未失去冷静态度和勇敢精神。看来，在这些危难的日子里只有一件事情使他难过，那就是拉纳元帅的死，而决不是战斗的失败。他知道，奥军在艾斯林的损失是巨大的，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在维也纳之前，奥军损失了五万人以上，比法军的损失大得多。他估量着一切，加强军队，制定以后的作战计划，同时仔细阅读每天从他的庞大的帝国的各个地方送来的报告。他很有兴味地获悉，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红衣主教都在宣传，似乎艾斯林的战斗是上帝对世界的压迫者、暴君、欺凌和迫害教会者的惩罚。尽管拿破仑非常忙碌，仍然牢牢记住和注意这位上帝的正式的全权代理人的行动。在 1809 年的整个夏天，令人惊惶不安的消息不断从英国传到拿破仑的耳里。英国正在装备一支远征队，其目的是要在比利时北部进行破坏活动。四万名士兵和三万名水兵参加了这次向瓦尔赫伦岛前进的远征。在一个短时期中，英国人占领了弗里辛根，但是这次远征最后毫无结果，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英国人坐船返回本国去了。

拿破仑有时去维也纳、肖恩布鲁恩，有时回到洛博岛。他迅速地向士兵们灌输即将取得胜利的信心；6 月中旬，军队得到休息和增援，洛博岛大大加强了。现在皇帝已经最后查明，一直无所作为的

查理大公事实上已经不能发动攻势，现在只是取决于他拿破仑什么时候发动决战了。

拿破仑在做完了这些紧急的军事工作之后，有几天时间休息，他首先去注意罗马的教皇。庇护七世痛悔自己不该那样敏锐地、特别是急躁地把艾斯林战斗看成是神的公正的惩罚。1809 年 5 月 17 日，也就是在这次战斗之前，拿破仑颁布了法令，宣布罗马城和教皇的一切领地从今以后完全并入法兰西帝国。

“切切此令，维也纳皇帝行辕，拿破仑”。法令的结尾就是这样，它把罗马教皇的领地夺去了，根据著名的、然而是中世纪教皇伪造的文献，似乎领地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早在 4 世纪初“赠送”给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的。

现在，法令颁布以后，法国人于 6 月 10 日完全占领了罗马，教皇掌握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所有的一切全都失去了。教皇被监禁，被解往法国南部的萨沃纳。

制伏了教皇以后，拿破仑就着手进行最后的军事准备工作。7 月 2 日、3 日、4 日，皇帝把新的军团调往洛博岛，并且下令调派五百五十多门大炮到那里去。7 月 5 日拿破仑下令开始从洛博岛渡河前往左岸。除了先前补充的军队之外，现在他还有从意大利调来的麦克唐纳军团。战斗是在 1809 年 7 月 5 日开始的，但并不象查理大公所预料的那样开始，也不是在他认为有很大可能开始的地方开始的。拿破仑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原则：不做敌人可能预料到的事情。法军有将近五百五十门至五百六十门大炮，奥军的大炮只比五百门多一点。双方的炮队都有充分的弹药供应。大批军队有条不紊地渡过了多瑙河。战斗异常激烈，7 月 5 日，特别是 6 日，对拿破仑说来是很危险的日子。他处于战斗的中心，达乌元帅、麦克唐纳元帅、马塞纳元帅、炮兵司令德鲁奥将军的行动都十分准确，这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中是很少见的。在激烈的炮轰之后，“麦克唐纳纵队”的二十六营人排

成“方阵”，方阵的每边长达一公里，在遭受重大损失后，突破了奥军的中心。后备队随之而来。其次，皇帝派往北部高地上的瓦格拉姆村的达乌元帅，也在激战中进入该村，接着全歼了奥国军队。到 1809 年 7 月 6 日傍晚，一切都完结了。奥军被击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四散逃命，其中一部分队伍还保持了队形。奥军在瓦格拉姆所遭到的惨败是令人吃惊的，并不下于在奥斯特里茨的惨败。奥军在这第二天被打死、打伤和被俘的将近三万七千人。但是法军的损失也十分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胜利是花了高的代价取得的。几乎在以后整整一个星期之内，都在继续追击被击溃的奥军。拿破仑跟在消灭了一些奥国部队的骑兵后面前进。7 月 11 日，当他进入兹奈姆城的时候，他得到报告说，弗兰茨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列支敦士登公爵，刚刚来到这里，请求拿破仑接见他。弗兰茨请求停战。拿破仑同意了，但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在停战的时候，哪怕只有一小队法军到达的所有奥国地方，奥军必须撤走，并且在最后的和约签订之前留在法军手里作为担保。列支敦士登公爵同意了所有的条件。

谈判开始了。泄了气的弗兰茨皇帝准备忍受一切。他现在开始咒骂那些一年半以前促使他进行这场可怕的战争的人。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 17 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奥国所进行的一切战争。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回忆起，还在瓦格拉姆战斗之前拿破仑是怎样惩罚教皇的。那末在瓦格拉姆战斗之后他将怎样对待奥地利呢？

拿破仑的要求比奥斯特里茨战役后的要求多得多。他要求割让新的奥国的领土：卡林西亚、克拉纳、伊斯的利亚、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省、奥国西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加利西亚的一部分，赔款一亿三千四百万金弗洛林。奥国人长期讨价还价，恳求，施展诡计。胜利者却是铁面无情的。他只是减少了赔款的数目，同意只要八千五百万金弗洛林，并且在要求割让的领土上作了小小的让步。

在整个谈判期间他都住在肖恩布鲁恩。维也纳和整个被占领的奥地利，都是俯首贴耳的。在艾斯林战斗之后燃起的希望，现在在奥国和德国都熄灭了。拿破仑在草拟的和约条款中还禁止奥国军队超过十五万人。这一点弗兰茨也同意了。

10 月 12 日，拿破仑在肖恩布鲁恩自己的宫前检阅近卫部队。在进行这一类检阅的时候，往往有很多人(特别是在节日里)来瞻仰拿破仑的风采，他到处都引起了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这一次拿破仑也允许群众来观看检阅；一般说来，他很满意维也纳的完全顺从的态度。10 月 12 日的检阅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穿着整齐的年青人穿过随从人员乘坐的马匹，左手拿着请求书向骑在马上的皇帝走去。当他还未来得及抽出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匕首的时候就被逮捕了。

检阅完毕后，拿破仑想看看被逮捕的刺客。这是从纳乌堡来的萨克森大学生斯塔普斯。“你为什么要刺杀我？”“陛下，我认为只要你活着，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就得不到自由和安宁。”“是谁唆使你干的？”“没有人唆使我。”“是你们的大学教你这样做的吗？”“没有，皇上。”“你想当布鲁都吗？”这位学生没有回答，拿破仑后来说，看来斯塔普斯似乎并不十分知道布鲁都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我现在马上把你释放了，你将去做什么呢？你还会想来刺杀我吗？”斯塔普斯沉默了很久才回答说：“还会的，陛下。”拿破仑同样也沉默了，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战地军事法庭在夜晚集会。第二天斯塔普斯就被枪毙了。

拿破仑禁止谈论和报道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过了两天以后，1809 年 10 月 14 日，奥国皇帝弗兰茨就决定签订大大减少了他的领土、无比加强了全欧洲的独裁者的肖恩布鲁恩和约。

奥地利帝国想推翻拿破仑压迫的大胆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付出了如下的代价：数万人的死亡，国家的破坏，几千万赔款，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一最美好的领土和几百万居民，加深了对战胜者的从属地位。

第十一章　皇帝和极盛时的帝国

(1810—1811 年)

一

在肖恩布鲁恩和约签定之后，拿破仑马上离开维也纳，几天以后，就象他在埃及、马伦哥、奥斯特里茨、提尔西特等地战斗结束之后一样，得意洋洋地返回自己的首都。

庞大的帝国更庞大了；忠实的附庸国得到了重赏；不顺从者的反叛遭到残酷的处罚；教皇失去了领地；提罗耳的起义者被驱散；席尔少校的游击队员被普鲁士军事法庭按照拿破仑的命令枪杀了；从英国传来了百业萧条、工商业者自杀和破产以及人民不满的消息。这就说明，大陆封锁似乎实现了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

看来，世界帝国正处于光辉、强大、富足和光荣的顶点。

拿破仑知道，他只是用武力征服欧洲的，并且只是靠恐怖来统治它的。但是英国沒有投降；俄国皇帝很明显地在玩弄手腕，在刚刚结束的那场战爭中一点也沒有帮拿破仑的忙，只是装模作样，似乎是在和奥地利作战；西班牙人被消灭、被大批屠杀，但是他们继续抵抗，并且十分顽强勇猛地战斗着，和以往一样，任何瓦格拉姆的战斗，皇帝的任何新的胜利，世界胜利者任何新增添的、日益加强的威势，都不能对他们有丝毫影响。

在拿破仑周围的，是象朱诺这样忠于他的元帅；或者是象贝尔纳多特这样聪明的野心家；或者是象塔列朗这样机敏的贵族出身的叛徒；或者是象萨瓦里这样的执法者，只要拿破仑一有指示他就会枪杀自己的亲父；或者是象达乌这样的地方总督和豪吏，他能够不加思索

地放火烧掉巴黎，如果他觉得这对他的差事有利的话；或者是皇帝的一些野心的、自傲的、没有才能的、喜欢吵架的兄弟姊妹，他封他们为国王和女王，但是他们仍然抱怨不已，吵吵闹闹，只是给皇帝带来了麻烦，引他发怒。

以后还要发生很多次战争，这一点拿破仑并不怀疑，正如法国任何人都不怀疑一样，而一颗将会杀死他的子弹已经铸造出来，这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情。拿破仑把他作为法国的君主而在法国所做的一切和为法国、为“旧省份”所做的一切，与他作为西方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莱茵同盟的保护者等等所做的一切，很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是永远的，具有长久的生命，后者是他活着的时候才能维持的。需要传宗接代，需要一个继承人，但是约瑟芬还没有生下这位继承人；因此，必须改娶一位妻子。

现在，拉蒂斯邦的枪伤和斯塔普斯的锋利匕首十分强烈地使人想到，拿破仑所创建的一切是系在多末细小的一条线上，因而传代的问题对他说来就特别重要。法国的历史学家写了不少的书来谈论约瑟芬、她的生活和轶事、她的离婚，谈论当拿破仑第一次突然对她说，他必须和她离婚而另娶一位妻子时，她昏迷不省人事，以及谈论皇帝自身的激动。这段插曲只是作为瓦格拉姆战役后展开的政治事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才使我们感到兴趣。因此，我们来简短地谈谈这些事件。

如果说，拿破仑曾经在什么时候热情地、痴心地爱过女人的话，那末，这当然是在约瑟芬嫁给比她年轻六岁的拿破仑之后头几年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任何人，甚至连瓦莱夫斯基伯爵夫人在内，更不必说和他有短期接触或者较长时期接触的其他女人了。但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是 1796 年和 1797 年，他在远征意大利的时候给约瑟芬写了一些热烈的、充满激情的信。当拿破仑知道当他不在的时候她有过情人，他并没有和她分开，虽然失掉了以前火热

的、热烈的情感，但仍然是爱她的。几年过去了，她十分害怕自己的丈夫。他甚至坚决禁止她在他面前为任何人说情，并且在拒绝她的时候不会忘记加上这样一句话："很明显，如果是皇后为他说情的话，他将一事无成。"他甚至憎恨这种由妇女干预国家事务以及一般事务的形式。

约瑟芬是十分平凡的，除了衣饰、钻石、舞会和拿破仑所不反对的其他娱乐外，她什么也不想。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有人说，拿破仑千方百计地迫害斯塔埃尔夫人，不仅是因为她具有自由的思想方式和反抗的精神，这些他还能够原谅，而且还因为她是聪明而饱学的，他认为这种品性对妇女说来是不成体统的，他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这种品性。从这个观点看来，约瑟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他生气的。原始材料和传记都一致认为，拿破仑不是轻松愉快地决定离婚的，这无疑是正确的。

1809 年 11 月，当他们准备正式离婚的时候，他对约瑟芬说："在政治上是没有良心而只有头脑的。"他仍然爱她，他们整天在一起。1809 年 12 月 15 日，在帝国所有的大臣和皇帝全家的面前，离婚证书签写了。他们分开了，但是在最初几天拿破仑每天都写有充满爱情的信送到马尔梅松去给她，在那里，她住在赠送给她的宫殿里。

当时曾向罗马教皇建议，以天主教会的名义来证明离婚是对的。天主教会对这一类的事总是很拖拉和固执的，但是这一次别人却替庇护七世把这件事情很快就办妥了，因为请求者是这样一位威震天下的人物。

不久就召开了盛大的大臣会议，大臣们经过讨论，决定请求陛下为了帝国的幸福而另娶一位妻子。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真诚地同情皇帝的愿望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物质福利是和帝国紧密联系着的，他们希望拿破仑帝国继续存在，害怕波旁王朝复辟，认为帝位的直接继承人的降生才能巩固"新法兰西"。另一方面，

他们大家，甚至失宠前的叛徒塔列朗，一直都在幻想拿破仑和奥国或俄国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政治上结合在一起，而且在皇室关系上也结亲。这将使大家从接连不断的战争和永远存在的危险中喘过一口气来。一部分人（以富歇为首）希望拿破仑娶亚历山大皇帝的妹妹，俄国的女公爵安娜·巴夫洛夫娜，另外的人宁愿选择奥皇帝弗兰茨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公主作为新娘。刚刚正式离婚的拿破仑立即着手挑选新娘。

他很快就想好了，因为挑选新娘的时间只能很短，事实上长期挑选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除了法兰西大帝国以外，还有英、俄、奥三个大国值得谈谈。但是和英国的关系，是进行生死的战争。还有俄国和奥国；俄国毫无疑问比奥国强大，奥国刚刚才在拿破仑同它进行的第四次战争（在十三年）中遭到惨败。这意味着，必须从俄国开始，俄国有两位女公爵，她们是亚历山大的姊妹。至于选择那一个，那是十分次要的事情，因为拿破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她们两个中间的任何一个。但是，叶卡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嫁给了格奥尔格·奥尔登堡。驻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奉命非正式地去向沙皇询问有关尚未出嫁的安娜的事情。

1809 年 12 月和 1810 年 1 月，俄国宫廷中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在彼得堡，亚历山大一世一直用奉承讨好的言词向法国大使科兰古说，他个人是非常希望看见自己的妹妹成为拿破仑的妻子的，但是母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意见，认为安娜还太年青，她还只有十六岁等等。而在巴夫洛夫斯克的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却全力反对这种婚姻，而且宫廷中相当多的人都支持她。所有的贵族特别是大地主贵族对拿破仑的仇恨是逐年增长的，是随着大陆封锁的加强而增长的。

1810 年 1 月 28 日，拿破仑在宫中召开了盛大的大臣会议，讨论离婚和新婚的问题。以大宰相康巴塞雷斯、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和警察

总长富歇为首的一部分大臣主张选择女公爵安娜·巴夫洛夫娜，另外的大臣主张选择奥国的公主玛丽亚·路易莎，弗兰茨一世皇帝的女儿。拿破仑本人显然是被俄国宫廷的回避态度所激怒，于是明显地表示，他是喜欢奥国的新娘的。会议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

九天以后，从彼得堡传来消息，女公爵的母亲希望稍微推迟自己女儿和拿破仑结婚的日期，因为安娜·巴夫洛夫娜还太年青。在同一天，驻巴黎的奥国大使梅特涅被召垂询，奥国皇帝是否同意把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嫁给拿破仑做妻子？梅特涅马上不加思索地（关于所有的一切，在向俄国求婚的时候就已经仔细考虑过了）说，奥国同意出嫁年青的公主，虽然在此以前根本没有进行（也不可能进行）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正式谈判。而现在，2 月 6 日的晚上，在杜伊勒里宫召开了新的大臣会议，会议一致主张和奥国联姻。

在第二天，1810 年 2 月 7 日，已经准备了婚约。草拟婚约内容用不着花很多功夫：从档案中把法国王位上的拿破仑的前辈路易十六皇帝与另一位奥国公主玛丽亚·安东尼特（她是拿破仑现在的未婚妻玛丽亚·路易莎的亲姑妈）结婚时所定的婚约拿来重抄一份就行了。

婚约一拟好，他马上去要求奥皇批准。弗兰茨一世立刻就批准了，关于批准的消息是在 2 月 21 日传到巴黎的，而在 2 月 22 日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已经到维也纳去了，并带着一个奇怪的使命：在将在维也纳举行的盛大结婚仪式中，代表拿破仑扮演新郎的角色。

维也纳非常愉快地迎接拿破仑突然作出决定的消息。在 1809 年的惨重失败和损失之后，这场婚姻好象是一种拯救。人们闭口不谈恰好在维也纳这几天的狂欢中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小事情。例如，正当婚礼举行前的欢乐气氛达于顶点的时候，拿破仑下令枪毙终于被俘的提罗耳叛乱者的首领。安德列·霍弗尔在枪响之前（他在曼图亚城被枪毙）高呼："我仁慈的皇帝弗兰茨万岁！"但是霍弗尔为

其献出生命的仁慈的弗兰茨皇帝，却禁止提起这个愚昧的提罗耳农民的名字，这位农民的过度的忠诚和不适当的爱国心会招致拿破仑对全奥国的不满。

1810 年 3 月 11 日，在维也纳一座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教堂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整个奥皇皇室、整个宫廷、所有外交使团、大臣和将军们都出席了，这是十八岁的公主玛丽亚·路易莎和拿破仑皇帝举行婚礼。新娘从来没有见过新郎，甚至在结婚的这一天也没有见到他，因为据说他认为即使是象自己结婚这种特殊的情况，自己亲自去一趟维也纳也是多余的庸人自扰。但是维也纳容忍了这种现象。贝尔蒂埃元帅和查理大公两人共同完美无缺地做了新郎应该做的一切仪式。读者一定会有些惊异并且问道：怎么可能由两个人来代替缺席的新郎呢？当时不熟悉皇帝婚礼的细节的人们也感到惊异。贝尔蒂埃被拿破仑派往维也纳去代替他，正式向玛丽亚·路易莎求婚。按照拿破仑的请求和直接邀请，查理大公应该在教堂出现，在这里贝尔蒂埃把玛丽亚·路易莎交给他，他（和此时以前的贝尔蒂埃一样，——扮演拿破仑）就把她引到祭坛，在祝福的时候和她并排站在一起，然后，这位法国新皇后带着应有的光荣和侍从去法国。在她路经附属国（例如巴伐利亚）的时候，到处都使她感觉到，她是欧洲主宰者的妻子。拿破仑在离巴黎不远的去康边的路上迎接她。在这里，这对夫妇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

这次事件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议论。“现在，战争要结束了，欧洲取得了均势，孕育着幸福的时代”。——汉撒同盟各城市的商人这样说，他们相信英国已经最终丧失了在大陆上的支柱奥国，一定会前来表示和解的。“几年之后，他一定会同两个大国中没有立刻给他新娘的那个大国作战”。——在法国大臣第一次会议后外交家们就这样说。

在不稳固的世界形势下可以看得很清楚，拿破仑与俄国的联盟

的任何加强都威胁着奥国王朝本身的存在，而拿破仑与奥地利的任何接近都会使他在对俄关系上放手大干。某些奥国贵族，如年老的梅特涅公爵（在巴黎的奥国大使的父亲），当他们知道正在准备中的婚礼时，高兴得哭起来了；梅特涅公爵的儿子，当时已经著名的克里门特·梅特涅并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奥国得救了”，——肖恩布鲁恩皇宫中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在彼得堡笼罩着慌乱不安的气氛。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欢欣若狂，因为投给“人身牛首怪兽”去吃的，不是她的女儿，而是奥皇的女儿。但是亚历山大一世、鲁勉切夫、库拉金，甚至深恨法兰西联盟的敌人都有些惶惑不安。他们觉得，奥国完全追随了拿破仑的政策，在大陆上，俄国单独一国面对着可恨的欧洲征服者。

拿破仑结婚以后立即更有系统地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

二

不了解拿破仑的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对帝国靠什么支持这一点有十分清楚的概念，也不可能对帝国为什么崩溃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大陆封锁只是拿破仑所创立的经济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是完全适合于他的总的政策的。由于侵略战争，他从法国人的皇帝变成西方的皇帝，他力图把自己的领土扩大到埃及、叙利亚、印度，他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坚决地使这些“新省份”服从“旧省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服从他在雾月十八日成为专制者时的法国的利益。巨大帝国的“旧省份”和“新省份”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很大的。“旧省份”被拿破仑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置于剥削者的地位，而“新省份”则被置于被剥削者的地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强力延缓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拿破仑统治的第一年开始，他就有了一个仔细制定的主义，这

个主义毫无变动地一直实行到他的统治的结束。这就是：有“本国的”经济利益，也有其余人类的利益，后者的利益不仅应该服从“本国的”利益，而且简直应该成为本国利益的牺牲品。“本国”的界限在哪里呢？北至比利时，在东方甚至不是莱茵河，而是把旧法兰西与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分开来的旧法兰西的边界，西至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南至比利牛斯山。拿破仑一方面竭力想扩大自己国家统治的界限，另一方面，他同样竭力想缩小“本国”利益这个概念的范围，限制“旧法兰西”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在地理上的界限，因为这关系到经济利益。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法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中这两种愿望是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拿破仑在他对别国实行的掠夺政策中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这种利益即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他称为“本国”的利益。

而被法国牢固占领的，与法国不可分割地合并在一起的、分为各个省的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则是“非本国的”，也就是说，只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竞争者，他们可能而且一定被击溃，而他们的土地则成为法国资本活动的场所。更不必谈后来合并的皮埃蒙特、荷兰、参加汉撒同盟各城市、伊利里亚各省。整个征服得来的帝国，——既是自己的，因为可以从它取得新兵、征收捐税、取得军队的给养等等，但又是外国的，因为必须力求使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冶金专家、纺织厂和酒厂的老板，无论在旧法国或者在自己本土，也就是被拿破仑占领的祖国，都不能和法国人竞争。

更不用说拿破仑认为仍具有离开法国而单独生存的作用的那些占领区：意大利，拿破仑是那里的国王；瑞士，他是那里的“调停者”；莱茵同盟（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巴登等），他是那里的“保护者”；威斯特法利亚王国，这是中德和北德各国集合而成的，拿破仑派自己的兄弟热罗姆当了那里的国王；在波兰他也派去了自己的附庸萨克森国王，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应该成为法国工业的销售市

场或原料市场。凡是企图把意大利工业所需要的任何技术发明偷偷运入意大利的人，都被投入监牢；这是“意大利国王”拿破仑为了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保护下的法国工业家的利益而严格禁止的。拿破仑敏锐地注视着自己政策的准确执行：不让左林根的刀子输入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禁止萨克森的呢绒运进威斯特法利亚；对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出口的生丝课以禁止性的重税，因为必须保证里昂的工厂主有原料；对不是经过直接隶属于拿破仑的国家、而是经过附属国而来的伊利里亚的商品，课以特别税。这些命令、禁令、指示、申斥象乌云似的，每天从皇帝的办公室里飞出来飞遍整个欧洲。这种政策使法国大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力量大为增强了，并且也巩固了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但是，当然也使广大帝国的除“旧省份”以外的一切地区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全体消费者发怒了，使他们破产和受到压迫。拿破仑建立了西方帝国，但在经济方面还是一个狭隘民族的法国皇帝，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继承者，是科尔培的很多思想的实行者。为了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他接连几年扩建了世界君主国的大厦。十分清楚，在用强力限制他所奴役的国家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巨大的建筑不可能不倒坍，甚至即使不发生西班牙人民的起义，莫斯科的大火，马尔蒙在巴黎近郊的叛变，格鲁希在滑铁卢附近的迟延，——一句话，甚至即使拿破仑最后几年的斗争（他一生都在进行这种巨大的斗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情景另是一个样子，他所建立的这个巨大的帝国大厦也不能不覆灭。

如果认为拿破仑只是顺从地执行使他取得政权并且基本上保证了他的专政的大资产阶级的意志，那是不正确的。当然，他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首位。但他也力图使资产阶级服从自己的意志，迫使他们为国家服务，他认为国家是“目的本身”；而我们刚才所谈的对欧洲的经济掠夺，拿破仑是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而进行的。资产阶级中的个别阶层当然不能容忍这

种情况，他们进行了沉默的、实际的斗争，他们破坏束缚他们的决议，进行非法的收购等活动，人为地哄抬物价，等等。

在这里不能不记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作的精辟的说明，不看这个说明，对于摧毁拿破仑大帝国的原因的分析就不会太清楚。

马克思写道："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俘获物决不象批判所设想的那样……是革命运动；拿破仑的俘获物是自由资产阶级。"① "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眞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结果把这次进攻推到了年底。"②

① 《马克思恩洛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158页。

在马克思关于拿破仑的很多言论中，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这个地方对拿破仑的政策及其本人所作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这样。马克思在这里作出了精辟的指示，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一政策由以产生的阶级基础时，同时不应该忘记这个政策的具体指导人，他们的性格，他们个人的特点。当马克思谈到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的"自由资产阶级"时，他是指拿破仑消灭了认为君主立宪是国家的理想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是指独裁者拿破仑攫取了全部国家政权，是指消灭了任何"自由"，而 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开始的。马克思强调说，体现在 1791 年宪法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起先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被治安委员会的恐怖的专政压下去了，后来，在督政府时期，想恢复和巩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尝试也同样坚决地被拿破仑雾月 18 日的政变消灭了。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做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事情；资产阶级暂时支持为彻底消灭封建秩序所必需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也支持拿破仑的专政，因为这是一种能够巩固资本的统治和最适合进行侵略战争的政权形式。

拿破仑事实上正是象大资产阶级利益所要求的那样来实行统治的，但是他一点也不尊重大资产阶级，他称财阀是"一切贵族中最蹩脚的"，并且经常重复自己的警句："现代的财富——这是偷窃和掠夺的果实"(le fruit du vol et de la rapine)。

拿破仑的专政是为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它力图牺牲邻国来扩展本国的实力，为此，它的所作所为往往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个别阶层的愿望和要求相违背。这个专政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无底的钱袋，这个钱袋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为迫切的政治目的服务。政治上不开展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大箱子，不止一次地反对拿破仑。马克思指出，在开始进攻俄国以前，拿破仑与法国资产阶级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歧，顺便指出，这个分歧表明，不

仅在拿破仑帝国中，而且在他保护下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致命的裂缝。因此，在谈到拿破仑帝国瓦解的原因时必须提到这些情况。

二

远在历史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之前，当大家还在万能的主宰者面前颤抖和默默无语的时候，在他的脚下有帝王们的尸体，在整个大陆上继续与他作战的只有西班牙的衣衫褴褛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未来风暴的第一阵风吹向帝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是1811年发生的，而当时似乎是站在世界事件中心的人们，却不能理解这阵风暴的真正意义。这次危机是在大陆封锁已经尖锐化的第二阶段爆发的，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阶段。

1810年至1811年的封锁不复是1806年颁布第一个柏林法令时期的封锁了，实行封锁的人同样也不完全是1806年11月21日在波茨坦宫签署法令的那个人了。

从1809年下半年起，在瓦格拉姆之战和肖恩布鲁恩和约之后，拿破仑皇帝的两个信念大大加强了，这两个信念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开始在他身上形成的，在耶拿战役和攻占柏林之后就十分明确地呈现出来了，而在弗里德兰战斗和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就决定了他的一切行动：第一个信念就是可以使英国“屈膝”，特别是用大陆封锁的办法使它破产；第二个信念可用“我什么都能做”这句话来表示，这句话在逻辑上的补充意思就是：“因此，我能够实行大陆封锁，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整个大陆变成法兰西帝国。”胜利者做了他所想做的事情。第5世纪的阿提拉，只要他在半野蛮的日耳曼部落的为数众多的小公爵当中看中了谁的女儿，就用强力霸占为自己的妻子；而拿破仑呢，他一要求，奥国皇帝的女儿，最傲慢的、以历

史悠久而自豪的王室的公主马上就被送到巴黎去，而大家还认为这是已被拿破仑从哈布斯堡强国变成七零八碎的领土的那个国家的最大幸福。

在大陆的这种奴隶似的顺从下，要征服剩下的敌人英国，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不必提起其他的敌人：被拿破仑称为“穷鬼”的西班牙不予考虑，也就是说，他不想使他们享有成为他的敌人的光荣。他故意做这样的姿态：在 1809 年至 1810 年他已把他们彻底击溃，现在他不同他们作战，他只是命令捉拿和枪毙他们。他没有用这个幻想安慰自己很久，因为游击战仍在继续着。但是，在这里，皇帝也认为罪恶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人，他们不仅用武器援助西班牙，而且派来了队伍。

英国，只是英国，拦挡在路上。拿破仑与英国之间的殊死的决斗只能以对手中任何一个的死亡告终。但是拿破仑徒劳无益地企图把自己的决斗变成整个欧洲大陆反对英国的斗争。封锁沉重地（越往后越沉重地）打击着英国，也打击了大陆。拿破仑知道这一点，但是，正是这一点已经不是使他困惑不安，象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前那样，而是使他变得难以抑制地疯狂起来。

这几年来他的愤怒首先是针对大陆封锁的秘密破坏者，——在整个欧洲大陆，明目张胆的、公开违抗命令的人是没有的，如果不算比利牛斯半岛最南端的西班牙起义政府的话。惩罚是十分干脆的。走私者一律枪毙，没收的英国商品则烧毁，纵容走私的君王被拿破仑永远罢黜。

1806 年拿破仑任命自己的弟弟路易为荷兰国王。新国王懂得，如果完全割断和英国的商业联系，荷兰的商业资产阶级、农业、海上商运就会遭到彻底的破产，而且这种经济上的大灾难在荷兰发生得远比其他地方为早，因为自从英国把荷兰所有的殖民地抢走（这正是在确立了法国对荷兰的统治以后）以来，荷兰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向英国销售酒类、干酪、薄麻布和从英国得到殖民地的商品。所有这些情况使得路易·波拿巴对于荷兰沿海与英国人进行的走私买卖不闻不问。

在几次严厉警告之后,拿破仑废去了自己弟弟的王位。他宣布荷兰的王位已经废除,并于 1810 年颁布一个特别法令把荷兰并入法兰西帝国,并且把它分为若干省份,各派地方长官治理。

有人向他报告,参加汉撒同盟的城市——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没有大力反对走私,他的驻汉堡的代表布尔里埃纳接受贿赂,纵容走私。拿破仑立即撤销布尔里埃纳的职务,并且也把参加汉撒同盟的城市合并到法兰西帝国里来。

他把在沿海地方有领地的德意志各个小专制君主赶走,这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过,而是因为他只相信自己。他赶走了奥尔登堡公爵,并且把奥尔登堡与自己的领土合并,虽然这引起了与奥尔登堡公爵有亲戚关系的亚历山大皇帝的极大不满。

大陆封锁严重地影响到整个中部欧洲的消费群众,此外,最终使得参加汉撒同盟的各城市和德意志北部整个沿海地区的商业资产阶级和船主破产。甚至在这些顺从的国家受到严格书报检查的刊物上,有时也转弯抹角地暗示出这方面的情况。“德国出版的政治论文始终要求法国政府注意”,① ——这是 1810 年给警察总长的报告。德国人喜欢议论政治,他们贪婪地读着本国的很多报纸、月刊、文集和历书,更不必说小册子、戏剧集和长篇小说,在这些东西里面,狡猾的作者善于把莱茵同盟说成是奴役,把法国和奥国的联盟说成是互相耗损的产物,把英国说成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把俄国人说成是世界帝国的继承人。从书报检查机关的观点看来,终于被大陆封锁搞得破产的荷兰(因为荷兰可以说主要是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的情况也不

① 国家档案,$F^7$3458. 巴黎,1810 年 8 月 29 日。

大稳当。在荷兰也存在着与德意志北部同样的弊病:“荷兰的报纸太多”,① ——我们在另一个警察工作报告中读到这样的话。

但是,拿破仑对付报纸是很容易的,——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感到困难。更复杂、更难解决的是在实际上完全实行封锁。

困难从四面八方向拿破仑袭来:看来,要为整个漫长的欧洲海岸线安置几万名税吏、宪兵、警官和各级各类官员,要他们正直廉洁、热心勤勉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远比惩办纵容走私的国王和狡诈的总督困难得多。欧洲消费者买咖啡、可可、糖、胡椒、香料等,要付出相当于封锁前五倍、八倍、十二倍的价钱,他们总算弄到了这些商品,虽然数量没有以前多。染色的靛蓝和棉花是工场必备的,缺少这些东西,工场就得停工,法国、萨克森、比利时、捷克、普里林的纺棉者和印染工付出了相当于过去五倍和十倍的价钱,——他们也得到了这些商品,虽然数量同样没有以前多。这种人为的暴利到那里去了呢?第一,进了英国船主和走私者的口袋;第二,进了拿破仑的税吏和宪兵的口袋。走私者向值勤的哨兵或者税官建议,如果他们同意在一个晚上安静地睡觉,就把相当于他们五年薪俸的款项给他们;或者向宪兵建议,如果他在三个钟头之内远离某一地点的话,就给他价值五百法郎的薄呢和价值五百法郎的砂糖,这是十分巨大的诱惑。

拿破仑知道这种情况,并且也看到,他在这条战线上要取得胜利,将比在奥斯特里茨、耶拿或者瓦格拉姆取得胜利困难得多。他委派了常驻的和临时的巡按和视察,但是这些人也被收买。他马上把他们撤职,并且交付审判,但是代替的人仍然继续他们的勾当,只是力求更加小心而已。于是皇帝想出了新的办法。不仅在沿岸的城市和乡村挨戶搜查,而且远在欧洲中部,在商店、仓库和办公室中挨戶搜查。所有“英国制造”的商品都被没收,同时,商品的所有者有责任

① 国家档案,F⁷3458. 关于荷兰的刊物的报告。

证明他的商品不是英国货。在惊慌的心情下，一些破了产的、握有当时最被怀疑为殖民地产品的货物的人，力图证明这些商品是美国货而不是英国货。确实，这时美国人交了好运，他们用美国国旗作掩饰，销售用他们的船只运来的英国商品。

1810年，拿破仑在特里阿农宫制定的禁止性的税率，使不管来自何地的殖民地商品都不能公开买卖。于是，在欧洲各地燃起了大大小小的火堆：拿破仑不相信税吏、警察、宪兵、以及从国王、总督到夜巡队和骑兵警备队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当局。他命令当众烧毁所有被没收的商品。据目击者说，人群黯然地、默默无语地注视着堆积如山的印花布、薄呢、开士米、大桶的糖、咖啡、可可、大箱茶叶、大绷棉花和棉织品、大箱的靛蓝、胡椒、肉桂，这些东西被放上易燃物当众烧毁①。“皇帝发疯了”，——听到这种情况的英国报纸这样写道。拿破仑决定，只有毁掉所有一切偷运进来的货物，才能真正使走私成为蚀本生意，并且不仅使那些深夜在偏僻地方、在悬崖下的荒凉的海岸运进私货的人感到危险，而且也使莱比锡、汉堡、斯特拉斯堡、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热那亚、慕尼黑、华沙、米兰、的里雅斯特、威尼斯等地的富商感到危险，在此以前，他们很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第三手或第四手转买这些私货。

法兰西帝国和附属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巨额利润，总的说来，他们继续赞扬大陆封锁，并且赞成皇帝所采取的一切禁止秘密偷运英国货物的办法。钢铁界人士特别满意。但是在纺织厂厂主当中，已经有人在赞扬之外还有些抱怨：没有棉花，无论如何做不成印花布，没有靛蓝，无论如何不能使料子染上颜色。

至于谈到商业资产阶级和从事奢侈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那末他们的牢骚就更厉害了；他们带着忧伤的心情回忆起1802年至1803

① 确实，不久以后就只限于烧毁工业品了，而殖民地的产品则加以没收，以利国库。

年亚眠和约签订后的短促的几个月，当时成千上万有钱的英国人涌入巴黎，一下子几乎把首都的一切珠宝首饰和里昂仓库中的天鹅绒和丝绸买光了。他们抱怨无休止的战争把他们以前的欧洲顾客都弄得破产了。整个消费者的怨言就更多了，他们以高价购买咖啡、糖以及工业制造品，工业制造品因为没有英国的竞争，而变得昂贵了。

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 1811 年的工商业危机。

四

1810 年深秋已经开始看出法国商品的销售量的缩减，而这种现象迅速发展，波及整个帝国，特别是“旧省份”，换言之，也就是法国本土。工商业者以恭敬的口吻抱怨说，封锁不仅影响了英国人的钱袋，也开始影响他们，他们没有原料，陛下对战败的国家的剥削（获有专利权的人说得更温和、更文雅些），降低了全欧洲消费者的购买力，而皇帝让军事当局和税务当局任意没收商品存货，让他们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他们完全不是这样说的，而要婉转得多），就会破坏正常信贷的可能性，而没有信贷，无论工业或商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危机一个月比一个月厉害了。在很多棉织厂、纺纱厂和印花布厂的厂主当中，有一个叫做里夏尔·列努阿尔的厂主，他在 1811 年危机之前有三千六百个男女纺纱工，八千八百二十二个织布工，四百个印花工，共达一万二千人以上，而在 1811 年，如果不是拿破仑下令给他一百五十万金法郎的特别补助金，剩下的人数就会降低到这个数目的五分之一以下。但是破产紧跟着破产。1811 年 3 月，拿破仑命令给亚眠的工厂主一百万补助金，并且马上以二百万法郎购买鲁安、圣·康汀和甘特三处的货物。拨出了一大笔补助金给里昂。但是所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

本书作者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说明危机巨大发展的文献当

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总结性的文献。1811 年 4 月 19 日，内政大臣向拿破仑报告："大多数手工业工人都抱怨他们没有工作。据说，很多工人不断逃向国外。"在鲁安，失业现象是这样可怕，工厂主的破产是这样明显，以致拿破仑不得不拨付一千五百万法郎来维持快倒闭的工厂。

大臣们的胆子大起来了。1811 年 5 月 7 日，法兰西银行总裁直接报告皇帝说：被征服的国家百业凋敝，法国货物在它们投降以前比投降以后销售得多些；巴黎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者在挨饿；国内国外的消费都大大缩减了……。拿破仑拨给补助金，但是丝毫也不放松封锁。英国商品（一切殖民地商品都当作英国商品）还是象以前那样被没收。1811 年波喀尔的夏季市场被警察的突然袭击捣毁了，警察没收了"整整一条街"储存的糖、香料、靛蓝等等。

除了发放几千万贷款和补助金给工厂主以外，1811 年拿破仑又以国库的款项订购大量货物：他为军队订购了大量丝织品，为宫廷向里昂的丝厂和天鹅绒厂订购大量货物，他命令他统治下的欧洲所有的王室向里昂定货，并且取得了以下收获：1811 年 6 月，里昂缫丝工业中只有五千六百三十架机床在工作，而在 11 月就有八千架机床在工作。冬季是困难的。在这个时期，不满的暗潮已经在巴黎工人区和其他工业中心出现了。警察局的暗探并不能偷听到所有的谈话，挑拨者在城郊工人区也不能掏出工人的全部心里话。无论如何，1811 年在工人中间完全不象当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平静无事。拿破仑经常说，唯一危险的革命就是"饥肠辘辘的革命"。拿破仑的内阁大臣夏普塔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拿破仑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害怕因没有工作而引起的人民的暴动。"① "工人没有工作……他就会暴动；我害怕这种因缺乏面包而发生的暴动；我不大怕与二十万人

① 《我对拿破仑的回忆》，1893 年版，第 283 页。

的军作队战”①，——拿破仑重复说。

首都和外省都没有发生工人群众的大规模的行动．虽然警方和私家暗探都看出了愤怒、焦急、灰心、有时是绝望的迹象。

如果说在 1811 年的经济危机中包含着教训，那末拿破仑是赶快就十分确定地接受了这个教训的；当大陆封锁还没有粉碎英国以前，当海洋还没有为法国人开放以前，当无休止的战争还没有停止以前，法国工商业的地位始终是不稳定的，危机始终是可能重新出现的。这就是说，必须实行封锁到底，如果为了实行封锁而必须占领莫斯科的话，那就占领它。

拿破仑记得很清楚，里昂的丝厂主经常向他说，销售危机是由俄国“突然”停止订货引起的，而这是因为 1810 年 12 月亚历山大皇帝签署了新的俄国关税率，他对奢侈品即丝、天鹅绒、贵重的酒征收重税，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法国输入俄国的。

拿破仑把这一点也算在亚历山大的帐上，这本帐从埃尔富特起就在增加。在 1811 年全年中，拿破仑都坚信这笔帐将在也只可能在莫斯科勾消。

拿破仑怎样对待帝国这种不正常的经济状况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呢？

危机早就成熟了，皇帝注视着它的迫近。在此以前，拿破仑曾经遇到过国家财政所处的危险境地，“通货膨胀”，必须发行没有黄金保证的纸币，最后还有大金融家玩弄狡诈的奸谋，他们力图要国库接受各种不可靠的债券和高利贷。这些情况发生在他的统治的初期（1799 年至 1800 年），也发生在 1805 年和 1806 年初。但是这些困难拿破仑都克服了。他或者从战争中得到千百万黄金的赔款；或者，除了战败国政府付出的赔款外，在各种借口下向战败国人民征收重

① 《我对拿破仑的回忆》，1893 年版，第 285 页。

税;或者,干脆从金融家的所得中拿来大批款项。例如 1806 年时就是这样。 1806 年 1 月底,拿破仑刚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回到巴黎,就要求得到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他看出了著名的百万富翁和吸血鬼乌弗拉尔以及在他周围的、以"联合贸易商行"为名进行活动的金融集团,用非常狡猾的策略和巧妙的、法律上很圆滑的方法来对付国库,使国库遭到巨大损失。拿破仑命令乌弗拉尔和"联合贸易商行"的代表到宫中去,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们把最近抢劫到的一切交出来。乌弗拉尔试图提出新的"对国库有益"的建议来讨好拿破仑,这些建议大概陛下是会接受的,但是陛下并不掩饰,对国库最有益的措施是立刻把乌弗拉尔及其同伙关在维森城堡中,并且交付刑事法庭审讯。"联合贸易商行"对皇帝的这个意见十分注意,他们知道皇帝的脾气,认为他的论据是很充分的,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付了八千七百万金法郎给国库,并且在这个使他们受到侮辱的行为上不坚持在财务计算方面或法律方面的正确无误。"我迫使十几个财神爷把他们掠夺的东西交了出来"。——拿破仑在给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后任西班牙国王的兄弟约瑟夫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币制稳定,国库中有充足的黄金,看来,在财政和济经上剥削帝国一切被征服部分和整个附属的欧洲以利于"旧省份"即法国本土的制度,在接连很多年当中都证明是有效的。

突然,在大厦上空响起了可怕的雷声:拿破仑根据 1811 年的经验,懂得了克服一般的经济危机要比克服财政上暂时的困窘困难得多,消除国库的毛病比发现、主要是消除一个大国经济制度上和全部经济生活中的毛病要容易得多。在这方面,无论是赔款,或者是抓住财政吸血鬼的咽喉,或者是典型的准确而严格的监督,或者是拿破仑所创造的官僚机器的完善,都无济于事。 1811 年爆发的危机首先是(但远非只是)那些使法国发财致富的工业品和商业品的销售危机。巴黎作坊中的著名的珠宝首饰卖给谁呢?圣安杜安近郊几乎四分之

三的居民所从事制造的贵重家具卖给谁呢？圣马赛近郊和巨大的姆弗塔尔工人区所制造的贵重皮货（该地的工人靠生产皮货来维持生活）卖给谁呢？世界首都的无数裁缝店铺制造和出售的富丽堂皇的妇女服饰和男子服装卖给谁呢？怎么能使里昂的丝和天鹅绒，色当的高级呢绒，里尔、亚眠和鲁布制造的薄如蝉翼的夏布衬衫以及瓦兰森的花边保持高价而不跌呢？

所有这些法国奢侈品不仅是为国内市场制造，而且是为全世界制造的，而对于法国商品说来，整个世界已经大大缩小了：英国不能算了，南北美洲都不能算了，安的列斯群岛和马斯卡连群岛的有钱的种植园主也不能算了。一般说来，“咸水”使其与欧洲大陆隔开的一切国家的所有买主（他们很有钱，人数也多）都不能算了，因为“咸水”被英国人独霸了。但是欧洲大陆的情况也不妙。拿破仑征服的国家彻底破产了，被击败的国家，即使它们没有被直接征服的，也被强加给它们的大陆封锁弄得民穷财尽，丧失了购买力。自从俄国地主不能把农产原料销售到英国以来，他们用来支付巴黎商品的英国黄金也无影无踪了：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俄国一卢布的价值只值过去的二十六戈比。波兰人、奥国人、意大利贵族都碰到同样的情况。在德意志西部、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各个国家中，发生了封建地主阶级物质上迅速枯竭的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生，不仅是由于屈从了大陆封锁，而且也由于震撼了农奴制度，而在很多地方是消灭了农奴制度。

问题不仅在于欧洲封建农奴主阶级的贫困。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资产阶级走着自己的道路，在拿破仑征服的国家和完全依赖或半依赖他的欧洲，新的资产阶级成长、巩固和加强了，而无论怎样的计谋都不能压制德国整个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波希米亚（那时叫做奥国的捷克部分）、比利时、西里西亚的一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这些地方是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这种竞争（更不必谈大力发展着的英国的走私）甚至排斥了那些无论如何不

能叫做奢侈品的法国商品。丝类、劣等的夏布制品、钢铁、日用品，仍然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保持了“旧省份”的国内市场，法国皇帝不允许自己的其他臣民，无论是比利时人、德国人、意大利的丝厂主或任何人到这里来。但是，那里也有一个早就受到拿破仑特别保护的大的生产部门，它不仅(与其说是)苦于销售量的缩减，而且更加(毋宁说是)受到奇昂的原料价格的损害，这就是纺织工业。由于禁止殖民地商品的输入，棉花差不多要以黄金论价。发生了可怕的原料危机，它在 1811 年使厂主们大大缩减了生产。在危机面前，在首都、里昂、鲁安的工业区的日益增多的失业和饥饿的威胁面前，以及在南部各省酿酒地区的破产面前，拿破仑也在封锁的规定方面作了某些让步。他允许签发让一定数量的“禁运货物”输入法国的许可证(许可证的数目有限)、记名签证，并规定(该持证人)在国外出售同样数目的法国货物。这些输入许可证的价格十分昂贵，这是因为发签证的警务人员滥用权力的缘故，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这些签证对于买者是特别有利的。

这个让步表明，拿破仑对于 1810 年至 1811 年的危机是多么不放心。确实，法国的输入许可证并未给英国人带来特别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这毕竟是对于原则的一定的让步。作为对付危机的一种办法，输入许可证只是稍稍增多了销售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拿破仑向他的宫廷和大臣们提出的要求的意义就更小了：他要求在宫廷中尽量穿得奢侈和讲究，尽可能频繁地换装打扮等。皇帝的这些命令并不能保证巨大的奢侈品生产部门多销，虽然拿破仑时代的宫廷生活甚至在 1811 年以前就是非常富丽堂皇的，但是在皇帝下了这些命令以后，下面这些行为就成为好的品行了：向巴黎的珠宝首饰商人和里昂的丝厂主一掷千金，举行数以千人计的宴会，在宴会席上香槟酒和其他贵重的酒象河水一样地流着，把家具换成更贵重、更讲究的，不仅给自己而且给仆人穿上镶有贵重的花边的衣服，定做奢华的四

轮轿式马车等。拿破仑自己于 1811 年也为国库的大厦和宫廷向巴黎和里昂的工业家和手工业者定了大批昂贵的货物。

现在，1811 年也和从前 1806 年(那时工商业问题远不象现在这样尖锐、货物也远没有象现在这样长期积压)一样，拿破仑坚信他早就说过的原则:“我的目的不在于预防商人的破产，这是国家财政所不能做到的，而是在于不让任何一家工厂关门。”如果内务大臣实行救济，那末拿破仑就要求他这样说明支出该项费用的理由:“我借钱给这家工厂(它有若干工人)，因为它受到无工可做的威胁。”

1811 年底到 1812 年初的那个冬天，危机逐渐减轻了。但是拿破仑知道，造成 1811 年危机的任何一个原因都没有消失，危机将会以隐蔽的、停滞的状态继续下去;他还懂得，正是同英国进行战争和对它实行的大陆封锁妨碍了帝国经济的根本改善。要解除封锁，必须首先使英国放下武器。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认为尽快战胜英国是从内部和外部巩固自己帝国的主要手段。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英国人已经在封锁上打开了一个大洞，因为亚历山大对他耍手段，欺骗他，英国货从俄国沿着广阔的西部边界，经过普鲁士、波兰、奥国，经过成千上万的细孔流入欧洲，而这就使得大陆封锁形同虚设，也就是说，消灭了“使英国屈膝”的唯一希望。到处都有人告诉和警告拿破仑说，英国的走私不但侵入从属于他的欧洲，也侵入法国，也就是他的庞大帝国的“旧省份”，这个偷偷潜入内地的走私活动是从欧洲大陆的“北方海岸”来的。①

在他一生中，他的注视着伦敦的视线，经常转移到阿尔卑斯山、维也纳、柏林、马德里，而只要在大陆上的战争中一有短暂的喘息时间，他的视线又固执地重新移向伦敦，现在又开始从伦敦移向最遥远的一个欧洲的首都。

---

① 国家档案 AN IV 1318, № 62, 1810 年 5 月 7 日内务大臣的报告。

“北方的海岸”是在狡猾的拜占庭人俄国沙皇的管辖之下……是放弃同英国的斗争，放弃快要取得的胜利，放弃摧毁英国的经济力量，还是扼住亚历山大的喉咙，迫使他记起提尔西特和约的义务？早在 1810 年拿破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早在 1810 年拿破仑就命令把有关俄国、它的历史和特点的知识的书籍拿给他。

根据皇帝的片言只语和他周围的人所提供的少量材料来看，拿破仑从 1810 年秋天起已经开始认为，英国这个敌人是顽强的、难以捕捉的、以逸待劳的，无论在开罗、米兰、维也纳、柏林或马德里都不能战胜它，只有在莫斯科才能给它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想法在拿破仑心中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加巩固了。

大军占领莫斯科——这意味着亚历山大的恭顺，这是完全的、不折不扣的实行大陆封锁，因而这是对英国的胜利，这是战争的结束，危机的结束，失业现象的结束，世界帝国在国内国外的巩固。1811 年的危机使皇帝的思想完全转到这一方面。后来在威特斯克，已经开始向莫斯科进军的时候，达律伯爵坦率地对拿破仑说，军队，甚至皇帝周围的很多人都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这场艰难的对俄国的战争，因为由于买卖英国货物而要在亚历山大的领土上作战是不值得的。但是拿破仑不能接受这种议论。他认为在经济上彻底扼杀英国是根本保证他所创造的伟大的君主国家万世长存的唯一手段。同时，他清楚地看到，与俄国订立的联盟的遭到破坏，不仅是由于波兰的纠纷，不仅是由于使亚历山大感到不安和愤怒的对一部分普鲁士领土的占领和对德国北部的夺取，而首先是因为俄国把自己的很多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未来上，正如英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一样。但是他不能直接打击英国。这就是说，必须打击俄国。

新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的血腥的阴影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第十二章　与俄国决裂

（1811—1812 年）

一

在埃尔富特会见以后，亚历山大在回到彼得堡的时候还打算支持法俄联盟，并且不离开拿破仑政策的方向，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这样。当未来的研究者要写一部科学的、详尽的 19 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并且花很多篇幅来谈论从埃尔富特会见到 1812 年拿破仑侵俄这几个有意义的年头。在这四年当中，我们看见了敌对的社会力量和派别的复杂的斗争，这些社会力量和派别决定了斯彼兰斯基这位人物的出现及其沒落的历史必然性。

看来，对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实行某些改革的问题，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相当坚决地提出来的。促进必须改革的意识的推动力是足够的：奥斯特里茨之战、弗里德兰之战、提尔西特和约。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俄国在 1805 年至 1807 年的两次反对拿破仑的大战中的可怕的失败，除了提尔西特的耻辱不谈，其结果是同世界的征服者缔结了相当有利的联盟，并且随后在很快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巨大的芬兰。这意味着 对于必须进行非常深刻的、根本的改革的原因，甚至连普鲁士在耶拿溃败后都已看出的那些原因，俄国的沙皇却沒有看出来。这时，斯彼兰斯基突然接近宫廷。他是一个聪明、灵活、谨慎的平民知识分子，曾作为亚历山大的随行人员到过埃尔富特，在那里他对拿破仑赞扬备至，然后又从那里回到宫廷。斯彼兰斯基绝不愿哪怕稍稍触动一下农奴制度，相反地，他肯定地证明说，农奴制度不

是一种奴役。他也不想触动教会，相反地，却在一切适当的场合说了很多恭维教会的话。他不仅不愿对专制制度作任何限制，而且反而认为沙皇的专制制度是他开始进行的改革的主要杠杆。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则是要把腐朽的半东方式的专制政体，把霍尔斯坦—荷托尔蒲家族(这个家族后来取得了已断种绝代的罗曼诺夫世家的贵族名姓)的世袭领地，变成现代的欧洲式的国家，这个国家有正规活动的官僚制度，有正式的法律制度，对财政、行政和全体有教养的、能干的官吏进行有组织的监督，把省长从专横的官吏变成地方长官，——总之，他希望在俄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把法国变成世界上头等强国的那种秩序。这个纲领本身丝毫不与亚历山大的思想、情感和愿望相矛盾，而沙皇也接连好几年支持自己的宠臣。但是亚历山大和斯彼兰斯基是在一厢情愿地考虑问题。名门显贵和他们领导下的中等贵族阶层已经认出了敌人，尽管敌人用温和与好意作掩饰。他们本能地认识到，斯彼兰斯基力图把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国家，并且建立一种实质上与俄国存在的封建农奴制结构和贵族政治社会制度不相容的形式。

他们结成一伙，同心协力地来反对斯彼兰斯基。在他们看来，斯彼兰斯基的改革工作同朝廷重臣坚决主张法俄联盟、主张同法国和欧洲的军事独裁者保持友谊的做法不是偶然地而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在俄国贵族的心目中，斯彼兰斯基这位僧侣的儿子和法国征服者不是偶然地而是有机地联合在一起的，僧侣的儿子对官吏们进行考试，并且希望把贵族从国家机器中排挤出去，以便把这个机器转交给平民知识分子、小僧侣和商人，而法国征服者则用大陆封锁使俄国贵族破产，并且要沙皇及其宠臣到“埃尔富特汗国”去向这位征服者匐伏跪拜。这就是 1808 年至 1812 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宫廷、贵族反对派的坚定路线，这个反对派同样坚决地反对沙皇及其大臣的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这种情况已经使法俄联盟失去了应有的巩固性。在俄国贵族的沙龙中，斥责从瑞典夺取了芬兰，因为这种做法是符合拿破仑的心愿的，并且甚至不希望获得加利西亚，如果为此需要在 1809 年帮助可恨的拿破仑来反对奥国的话。俄国贵族用各种办法尽量对驻彼得堡的法国大使科兰古表示冷淡，并且沙皇越是对这位大使表示亲切和亲热，"新"彼得堡、特别是旧莫斯科的贵族集团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憎恶。

但是，从 1810 年年底起，亚历山大就不再反对这一获得胜利的派别了。第一，拿破仑在提尔西特所作的让俄国向东方和土耳其扩大势力的谈话只是说说而已，这使亚历山大感到失望；第二，拿破仑仍然未从普鲁士撤兵，主要是在和波兰人玩弄某种把戏，还没有抛弃恢复波兰的想法，这就产生了夺取立陶宛而破坏俄国疆界的完整性的威胁；第三，拿破仑对没有切实执行大陆封锁条件一事提出的抗议和不满是带有很大侮辱性的；第四，1810 年至 1811 年拿破仑任意大笔一挥就吞并整个国家的做法，使亚历山大深感不安，并且也激怒了他。拿破仑的无比强大的本身，就是对他的附庸国的永远的威胁，而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都只把亚历山大看成是拿破仑的附庸（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人们都在嘲笑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小恩小惠，1807 年他把普鲁士的别洛什托克"送给"亚历山大，1809 年把东部（加利西亚）边境的一个奥国边区送给沙皇；据说，拿破仑对待亚历山大，就象从前俄国的沙皇对待自己宫廷中忠实的奴才一样，送若干"奴隶"给他们，以奖励他们的服务。

当拿破仑与安娜·巴夫洛夫娜女公爵的亲事未获成功的时候，整个欧洲第一次谈起即将临近的这两位皇帝的激烈争执。拿破仑与奥皇女儿的亲事被解释为法奥联盟代替了法俄联盟。

有确切的材料表明，从 1811 年 1 月拿破仑知道俄国新税率的时候起，他第一次不仅高声谈论对俄国的战争，而且认真地研究了这

个问题。新税率大大提高了输往俄国的酒、丝和天鹅绒及其他奢侈品的进口税，而这些商品正是法国输往俄国的主要物品。拿破仑对新税率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俄国财政的悲惨状况被迫采取这种措施。税率照旧。一些伪装中立国船只而实际上是英国的船只，很容易地就把殖民地商品运入俄国，对于这种状况，拿破仑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抱怨。拿破仑相信，俄国人秘密地让英国商品运入，并且从俄国大量流入德国、奥国和波兰，这样一来，对英国的封锁就形同虚设了。

亚历山大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在寻找同盟者，他与以前是拿破仑的元帅、现在是瑞典的王储和拿破仑的敌人的贝尔纳多特进行谈判。1811 年 8 月 15 日，在欢迎前来祝贺拿破仑命名日的外交使团的盛大招待会上，拿破仑皇帝站在俄国大使库拉金公爵的旁边，对大使说了一些带有威胁性的愤怒的话。他责备亚历山大不忠实于同盟，责备他的不友好的举动。拿破仑以威胁的口吻问道："你的君主希望什么？"后来拿破仑建议库拉金马上签订一个协议，来调解俄国与法兰西帝国之间的一切误解。库拉金感到又害怕又激动，他说，他没有受权签订这项协议。拿破仑就大叫道："没有受权？那你就要求授以全权吧！ ……我不希望战争，我不希望恢复波兰，但是你们自己想把华沙大公国和但泽与俄国合并……只要你们的宫廷的秘密意图不公开，我就不停止增加在德国的军队！"皇帝不听库拉金驳斥这些责备的理由和解释，而且是尽量讲述和重复自己的想法。

在这一幕之后，欧洲已经没有谁怀疑战争即将到来了。

拿破仑逐渐把整个附庸的德意志变成未来进行侵略的广大基地。

同时，他决定迫使普鲁士和奥地利与自己订立军事同盟，——这两个大陆上的强国还被算为独立国家，虽然普鲁士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完全屈从于拿破仑。这个军事同盟必须在进攻俄国之前成立。

二

当拿破仑的桎梏压在普鲁士身上的那些年头，普鲁士经历着极其艰辛的岁月，但是，甚至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的最初的时期，在1807年至1808年，那里也没有象瓦格拉姆之战和拿破仑与奥国联姻以后那样处于经常不断的恐惧中。在最初几年，在施泰因和"改革党"影响之下，普鲁士的农奴制度如果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话，也是大大摧毁了它的几乎全部的法律根据。还实行了某些改革。

但是这位十分公开地为西班牙的起义感到高兴的热烈的爱国者施泰因，引起了拿破仑警察的注意：截获了他的一封拿破仑认为是不怀好意的信，皇帝就命令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立即把施泰因赶出普鲁士。国王为了表示自己的热心，不仅马上执行了命令，而且把这位失宠的国务活动家的财产也没收了。

普鲁士的改革工作放慢了步调，但是并没有停止。陆军大臣沙恩霍斯特、格奈森诺以及他们的助手正在大力进行军队改组工作。根据拿破仑的要求，普鲁士军队的人数不能超过四万二千人，但是普鲁士政府想出各种狡猾的办法，在短期内使很大部分群众接受了军事训练。因此，虽然普鲁士卑下地执行拿破仑的意志，忠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但是仍然暗地里为遥远的未来准备着，并且没有丧失摆脱绝望的、难堪的处境的希望，这种处境是1806年遭到的可怕的溃灭和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造成的。

当1809年爆发了拿破仑与奥国的战争的时候，普鲁士方面产生了一种孤注一掷的、挣扎性的、引起个人冒险和恐惧心的摆脱压迫的企图：席尔少校和他指挥的骠骑兵团的一部分开始了游击战争。他被击溃并且被杀害了，他的伙伴们也被拿破仑下令由普鲁士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了。国王被席尔的冒险行为吓坏了而且怒不可遏，但是

拿破仑暂时满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这些制裁和屈辱的保证。在瓦格拉姆重新粉碎了奥国之后，在肖恩布鲁恩和约和拿破仑与玛丽亚·路易莎结婚之后，普鲁士得救的最后的希望也失掉了：奥国完全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拿破仑政策的轨道了。谁能给予帮助呢，能指望什么呢？指望已经开始的拿破仑与俄国的纠纷吗？但是这个纠纷发展得十分缓慢，现在，在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战役之后，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指望俄国的力量了。

1810 年一开始就流传着不祥的流言，说拿破仑打算不经过战争、只靠发布指令就毁灭普鲁士，或者把它分成几部分（分给法兰西帝国、热罗姆·波拿巴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和卑顺地依附着拿破仑的萨克森），或者把霍亨索伦王朝从那里赶走，以自己亲戚或元帅中的一个来代替它。当 1810 年 6 月 9 日拿破仑只下一道命令就把荷兰合并，并且后来把它变成法兰西帝国的九个新省份的时候，当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拉温堡公国、奥尔登堡公国、萨尔姆·萨尔姆、阿林堡和其他很多领土被用同样轻而易举的办法并入法国的时候，当占据了从荷兰到霍尔斯坦的整个德国北部沿海地方的达乌元帅，在对这些地区进行安抚的正式宣言中谈到“你们的独立只是想象的”的时候，——这时，普鲁士国王就在等待自己的统治的最后时刻了。他的独立本来也就只是“想象的”，他知道，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的时候就肯定说，他没有把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抹去，只是由于他对俄国沙皇的情谊。而现在，在 1810 年至 1811 年，拿破仑和沙皇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已经根本谈不到任何“情谊”了。1810 年年底，拿破仑在和平时期无缘无故地把奥尔登堡大公从其领地上赶走，把奥尔登堡合并到自己国家里来，虽然这位大公的儿子和继承人娶了亚历山大的亲姊妹叶卡德琳娜·巴夫洛夫娜为妻。

1810 年至 1811 年，普鲁士在等待自己的毁灭。不仅那位从来没有表现过勇敢精神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感到害怕，而且连道

德协会之类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团体（这些团体当时反映了一部分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想要摆脱外国压迫者和建立新的“自由”德国的愿望）也销声匿迹了。道德协会不是唯一的团体，而只是这些秘密团体中最著名的一个而已；它在 1810 年，特别是在 1811 年和 1812 年初也暂时沉默无声了。情势是非常没有希望的。曾经主张抵抗，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被拿破仑勒令离开普鲁士宫廷的内阁大臣哈登贝格，现在正式悔过了，并且写了一封信给法国大使圣马桑，谈到自己的信念已经完全转变。“只有拿破仑才是我们的救星。”——哈登堡对沙恩霍斯特将军写道。哈登堡在 1810 年 5 月对法国大使作了下列卑躬屈节的请求：“请皇帝陛下告诉我能参加什么部门的工作。这将充分证明皇帝对国王的重新信任和恩惠。”

拿破仑发了善心，让弗里德里希·威廉任命哈登堡为总理大臣。这是 1810 年 6 月 5 日的事情，而在 6 月 7 日，新任普鲁士总理大臣就写信给拿破仑：“君王，我衷心地相信，普鲁士只要忠实地遵循着您的制度，就能复兴，就能保证自己的完整和自己未来的幸福……我认为得到陛下的赞许和高度的信任是我最大的光荣。君王，我怀着最深刻的崇敬的心情，充当陛下的最温顺、最顺从的奴仆。普鲁士国王的总理大臣哈登堡男爵。”

赔款准时偿付了，大陆封锁是严格实行的，国王战栗发抖，曲意逢迎，哈登堡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但拿破仑仍然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普鲁士的各个要塞，并且不作出任何安定人心的诺言。在上述一切情况之后，拿破仑突然要求普鲁士以军队积极帮助他对俄宣战，这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普鲁士在经过极大的动摇之后，也照样做了。拿破仑一下子就打消了普鲁士的动摇。1811 年 11 月 14 日，他对达乌元帅发出指令：一有信号就进入普鲁士，并且以法国军队占领整个普鲁士。1812 年 2 月 24 日，在巴黎签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拿破仑进行的任何战争中，普鲁士必须参加拿破仑方面作战。

在此之后，拿破仑立即转向奥国。

在这里也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在瓦格拉姆战役和肖恩布鲁恩和约之后，奥国政府被吓坏了，而在拿破仑与玛丽亚·路易莎结婚以后，梅特涅和奥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决定，顺着拿破仑的方针政策办事是有利的，并且可以从胜利者那里得到某种弥补失去的省份的补偿。拿破仑能够从西方和北方（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从南方（从伊利里亚各省，即从卡尔尼俄里亚、卡林西亚、意大利王国）来攻击奥国；拿破仑也能够从东北方即波兰（从加利西亚）出现。他的帝国和他的附庸国从四面八方紧挤和包围着奥国。

对进攻的恐惧和以为全能的女婿会发慈悲心的希望使弗兰茨皇帝也象吓破了胆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样，成为拿破仑的顺从的奴仆。从维也纳那里，除了奴仆般的谄媚以外，拿破仑这几年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当皇后玛丽亚·路易莎在 1811 年生下一个儿子、拿破仑帝国的继承人的时候，维也纳出现了一张奇怪的图画，使宫廷受到感动，这张图画上画着一个有玛丽亚·路易莎面孔的圣母，抱着婴儿耶稣基督，这个婴儿的面孔是新出生的“罗马国王”的面孔，而在上面的云彩中的则是有拿破仑面孔的救世主上帝。总之，一切庸俗的、可笑的、荒诞的东西都出来了，为了再一次向巴黎的主宰表达自己的奴隶似的崇拜、宗教的虔诚和歇斯底里的狂喜等等感情。

本能和理智向那些具有较多的智力和政治敏感的人（例如梅特涅）说，拿破仑的大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 1810 年至 1812 年，甚至最会怀疑的人也开始意识到立刻进行胜利的反对拿破仑的斗争是完全不可能的。

拥有殖民地和海洋的英国还在撑持着，但是从那里也传出了更多的关于破产、凋敝、失业、有爆发革命危险的消息，——总之，是关于大陆封锁正开始在扼杀英国的消息。西班牙贫苦的牧民在法国军队出现的时候就跑到山谷里去，跑到森林里去，在那里继续进行斗

争。但是奥国不可能也不希望进行这类战争。俄国呢？它显然比拿破仑软弱；它原本打算帮助奥国，而在奥斯特里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之后，就在提尔西特出卖了普鲁士。不管以后如何，但现在它必须跟着拿破仑走。当拿破仑在 1812 年 2 月强迫普鲁士与他签订同盟条约来反对俄国的时候，他也要求奥国这样做，而维也纳丝毫没有犹豫，甚至也没有对以后的报酬作多大的讨价，就去迎合法国皇帝的愿望了。

1812 年 3 月 14 日在巴黎签订了法奥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国必须以三万名士兵帮助拿破仑。拿破仑保证从俄国夺取当时被俄军占领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此外，保证奥国人得到加利西亚或者价值相等的其他土地作补偿。

拿破仑之所以需要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结成“联盟”，与其说是为了补充大军，不如说是为了把俄国的一部分力量从科孚诺—维尔纳—威特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条大道引向北方和南方，因为他的进攻是要沿着这条大道前进的。

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普鲁士必须交出两万人、奥地利必须交出三万人供拿破仑支配。此外，普鲁士必须交给拿破仑两千万公斤裸麦、四千万公斤小麦、四万多只牛、七千万瓶各种酒供他的军队使用（这些东西是用来偿还欠法国皇帝的一部分债款的，这些债款普鲁士无论如何也还不清）。

外交上的战争准备还在早春的时候就结束了。有材料表明，1811 年的歉收使法国某些地方在冬末和 1812 年的春天发生饥荒，因此，在农村中有些地方发生了骚动，而另外一些地方也可能发生。有材料证明，这使拿破仑的进军延迟了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粮食的收购和投机加强了农村的惊慌和愤怒，而这种不安定的状况也延迟了拿破仑的进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了这种现象，并且正确地得出结论说，收购者的投机活动促进了拿破仑向俄国进军的失败和

对法兰西帝国的第一次震撼。这里必须指出，征兵在最近六年(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进行得十分迟缓，而这一次(1811 年全年和 1812 年初）逃避兵役的人数特别多。他们跑到森林里躲藏起来。不断的战争和苛捐杂税(特别是由于不间断的西班牙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开始激怒农民群众，这一点表现在逃避兵役的人数的增加上。甚至富裕农民也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抱怨不断的征兵使雇主失掉了廉价的雇农劳动力。

拿破仑被迫组织了特别搜巡队，到森林里去搜索躲藏起来的人，强迫他们到军队里去。由于采取了压制的办法，1812 年战争之前所征集到的人数总算达到了拿破仑要求的数目。

1812 年春末，拿破仑基本上(一部分是在细节上)结束了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准备工作。整个附庸的欧洲顺从地准备对俄作战。皇帝决定肢解西班牙：1811 年他从被他任命为西班牙国王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的领地中，划出了一个富足的、工业最发达的大省卡塔洛尼亚，直接并入法国，并分为四个省。这种使法国商业发财致富的行为，皇帝是当作对西班牙人的“叛乱”的惩罚的。但是“叛乱”仍然在法兰西帝国的新的卡塔洛尼亚各省进行，也在被法国军队占领的西班牙其他地方进行，虽然这些地方名义上仍被认为是在约瑟夫·波拿巴国王统治下的“独立的”西班牙。在西班牙，有苏尔特元帅、马尔蒙元帅、絮歇元帅和很多部队，拿破仑认为，这些部队足以击退威灵顿率领下在半岛上作战的英国人的进攻和已经继续了四年殊死斗争的西班牙游击队的进攻。

后方还有一个英国。但是看来那里也没有直接的危险，更不必谈到它危险的国内形势，因大陆封锁而造成的国内的凋敝、失业、工人反对机器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以及在很多工业区毁坏机器的事情)，——除了这些以外，由于实行一种对美国人提供很多商业特权和允许商业立法上的例外的巧妙的政策，拿破仑也促成了美英之间

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 1812 年 6 月 15 日由美国总统宣布的，这正是在拿破仑进攻俄国本土之前九天。英国在其反对法兰西帝国的斗争中，被对美战争削弱了。

后方已有保障，道路已经打开，拿破仑手中的兵力比以前各次战争中的兵力都要多好几倍；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敌人，他已经痛击过好几次了。

外交家们预见到将有一场大灾难。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最聪明的人如梅特涅　最谨慎的如哈登堡，最恨拿破仑的如约瑟夫·德·梅斯特起，都认为这场灾难将使俄国灭亡，因为它遭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从鞑靼人进攻以来在它的整个历史上从未遇见过的。

拿破仑进军所必需的军队当时定为五十万人，还不包括准备从奥国和普鲁士得到的五万人。在这五十万人当中，其他的附庸国家，如意大利、伊利里亚、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萨克森、莱茵同盟的其他一切国家、华沙大公国等，应该提供二十多万人；九万名波兰人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务。比利时、荷兰、汉撒同盟各城市不算在附庸国之列，而算在法兰西帝国之内。

在听了所有这些推测之后，巴伐利亚的将军符雷德仍然还是胆怯地向拿破仑指出，最好放弃对俄国的战争。“再过三年，我就要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拿破仑回答说。

三

1812 年 5 月 9 日早晨六点钟，拿破仑在玛丽亚·路易莎皇后的陪伴下走出圣克卢宫（在巴黎附近）到大军中去，大军已经分几路经过德意志各国，向波兰前进，并且逐渐向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集

中。5 月 16 日皇帝在萨克森国王的陪伴下进入德累斯顿，萨克森国王还在头一天就来迎接他。附庸国家的国王和大公在德累斯顿聚集起来来欢迎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在很多其他的君王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到了德累斯顿，奥国皇帝弗兰茨和皇后也到了这里。拿破仑在德累斯顿停留了十五天，被自己的奴仆般的附庸们包围着。在他的面前，他们大家(包括他的岳父奥国皇帝)都光着头：只有拿破仑一个人带着自己著名的三角帽。拿破仑对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具有好意的，也就是说，他好意地拉拉他们的耳朵，由于皇帝的爱抚，他们喜出望外，皇帝跟他们开开玩笑，有时对最喜欢的人还轻轻地拍拍背，有时又作严厉的、公开的申斥，但是在德累斯顿这种情况很少。这一次的阿谀奉承是如此没有分寸，如此没有节制，超出了一切范围，以致在德累斯顿的庆祝会最热烈欢腾的时候，已经有人大声地谈到诸如这位世界征服者是天神降世一类荒谬不经的话题了。拿破仑把在德累斯顿跟随他的一切人，无论是有王位的和没有王位的，德国人和不是德国人，都看成是十分怕他的奴隶和奴仆，但他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忠诚；然而在德累斯顿的随从们的行为向他证明，他们深信他在正在开始的战争中会战胜俄国的。

这种信心在这时笼罩各处：在欧洲、在美洲、在宫廷、在大工业家的办公室里、在商店柜台后面。只有英国象以前一样地等待着自己的时刻，只有西班牙的农民象以前一样，什么也不管，既不想知道什么六十万军队，也不承认法国的皇帝，继续猛烈地战斗着，而西班牙的城市贫民，当他们双手被捆绑在背后，被带出去枪决的时候，他们把口水吐在拿破仑军官的脸上。只有英国和西班牙没有出席德累斯顿的这些豪华的盛会、检阅和接待，没有出席这次十分奇怪的人的奴性、谄媚和胆怯的展览会。

这种普遍的对拿破仑胜利的信心似乎是有十分坚实的根据的。向俄国进攻的是组织得很好的无坚不摧的团队；这支军队的统帅的

军事天才被认为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汉尼巴、恺撒的天才高出很多，他在 1812 年以前所取得的大大小小的胜利已经比世界历史上所有这些英雄取得的还要多。拿破仑与奥国和普鲁士的“联盟”，他对欧洲的统治，增加了他的军队的人数，保障了后方。而俄国的军队只有拿破仑军队的三分之一，指挥这支军队的将军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拿破仑和他的元帅痛击过。拿破仑认为，除了巴格拉吉昂公爵以外，俄国人没有一个能干的统帅，而在整个欧洲都一致同意这种见解。

这时拿破仑信心十足。必须指出，他的言论在 1812 年一年内有着明显的改变。在斯摩棱斯克他说的是一回事，在克里姆林宫看莫斯科大火时说的是另一回事，在大军撤退的时候说得又不同。但是，在进军之初，在从德累斯顿到渡过涅曼河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想到自己梦想中最喜爱的东西——想到东方，征服印度，想到 1799 年 5 月 20 日他放弃的那些计划，当时他命令自己的军队撤除了阿克尔要塞之围，从叙利亚回到埃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莫斯科这样十分遥远的地方出发到达了恒河……假定说，莫斯科被占领了，俄罗斯屈服了，沙皇在某一次宫廷阴谋中妥协或死去了，那末你告诉我，难道法国军队及其友军真不可能到达恒河吗，恒河是会被法国的剑刺个够的，而这座商业势力的大山(英国)便会倒塌了。”

他对一位亲信纳尔博纳这样说，他有时和他相当坦率地交谈。如果要从回忆作品中寻找不容争辩的文献的话，那末这个供述是可以相信的。拿破仑在土耳其、波斯、埃及的外交活动很少有象 1811 年至 1812 年这样活跃的。正是在这几年法国领事涅尔西亚带着官方的使命和拿破仑的秘密的托付走遍了叙利亚和埃及，他必须为法国将来对这些地方进行新的远征作必要的侦查。当时也规定了从埃及和叙利亚开始向印度作辅助性的进攻，这个进攻 1799 年在阿克尔中断了。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拿破仑似乎是作最后一次维护和

平的尝试，他从德累斯顿派纳尔博纳伯爵（他向这位伯爵谈到了将来战胜俄国后就进军印度的想法）到维尔纳去见亚历山大（«从莫斯科到恒河»）。并且，纳尔博纳十分懂得自己得到的指令——用空洞的谈判来阻止俄国人可能对华沙的进攻。当然，纳尔博纳的使命一无所获，也不可能有任何收获。战争已经由拿破仑坚定不移地决定了。四十万军队已经穿过东普鲁士向涅曼河进发，只是等待进攻俄国的号令。

拿破仑从德累斯顿到了波兹南，在那里停留了几天。这一次波兰贵族比 1807 年更热烈地欢迎他，这是因为：第一，事实上波兰人这一次可以希望恢复波兰的旧疆界，或者至少可以从俄国取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第二，他们已经一点也不害怕农民分土地的问题了。关于波兰农民状况根本就没有人谈起过（农民已经在 1807 年失去土地而获得“解放”了）。也没有人谈起解放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农民。这就是说，波兰贵族对拿破仑的热情可以全心全意地表现出来。

但是没有耐心的、易怒的、完全为军事操心的、从清晨至深夜都在工作的皇帝，并不十分满意这些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忠诚和敬仰的、盛装的、卷发的、油头粉面的波兰贵族。“先生们，我宁可看见你们穿着带有马刺的靴子，腰间佩剑，以你们的祖先对付鞑靼人和哥萨克人入侵的时候的表现为榜样；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应该从脚到头都武装起来，并且手握剑柄”。——1812年 5 月 28 日，他这样对那些在波兹南主教哥尔热夫斯基率领下前来欢迎他的贵族说道。波兰的贵族赶忙把皇帝的这篇演说当作祝辞。拿破仑从来不讲究礼节教养，特别是在行军的时候。

拿破仑从波兹南到了托尔恩，从托尔恩到了但泽，在那里停留了四天，让一列列的兵车从那里通过；从但泽到了科尼希斯贝格，在那里停留了五天（从 6 月 12 日至 17 日），接连不断地进行管理军队和组织军队的给养工作。6 月 20 日他已经到了古比宁，而 6 月 22 日到了立陶宛，到了维尔科韦息卡，在那里签署了对大军的命令：

“士兵们，第二次波兰战争开始了。第一次波兰战争是在弗里德兰和提尔西特结束的。在提尔西特，俄国发誓与法国结成永久联盟，并且发誓与英国作战。现在，它破坏了自己的誓言。当法国的雄鹰没有再度飞过莱茵河而让我们的盟国听凭俄国去支配的时候，俄国对自己奇特的行为竟不作任何解释。俄国在数难逃：它的命运应该完结了。它是否认为我们已经蜕化了？难道我们已经不是奥斯特里茨战场上的士兵了吗？它让我们选择：耻辱或者战争。我们的选择是不会引起怀疑的。所以，前进吧，渡过涅曼河，把战争带到俄国领土上。对法国的军队说来，第二次波兰战争将成为光荣的战争，正如第一次波兰战争一样。但是我们将签订的和约应该得到保证，并且将要结束五十年来俄国对欧洲事务的毁灭性的影响。”

拿破仑的宣言被认为是正式的宣战书。

这篇宣言发表后过了两天，1812 年 6 月 24 日(旧历 6 月 12 日)夜晚，拿破仑下令开始渡过涅曼河，第十三团的三百名波兰人首先渡河到达对岸。在当天以及那几天，全部老近卫军和新近卫军，接着是缪拉的骑兵，以及各个元帅的军团，接二连三地到达涅曼河的东岸。还在 6 月 24 日清晨，前哨的哥萨克人就藏了起来，在涅曼河这边整个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直到地平线的尽头，法国人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我们面前是一片褐色的、黄色的土地和枯萎的植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树林”，——一位参加进军的人回忆说，而这幅图画当时已经显出“不祥之兆”。

拿破仑没有看出任何不祥的征兆。正如以往作战时一样，他显得更有生气、更兴奋。他所进行的迄今为止的最大一次战斗开始了，根据他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来判断。他自己对这一点是十分了解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这场战争是他最后一次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又是他第一次在亚洲进行的战争；情况也可能是这样：首先在斯摩棱斯克结束进军，把继续进军(也就是攻打莫斯科和彼得堡)推迟到下一年。

这两个假设他都预先看到了：他和纳尔博纳谈到恒河和印度，和元帅们谈到停留在斯摩棱斯克。

拿破仑带领着元帅们和一大群随从人员，以全部骑兵为前导，一直奔向维尔纳，到处都没有看见进行抵抗的迹象。

第十三章　拿破仑进攻俄国

(1812 年)

一

在不断的许多次战爭中，当开始任何一次战爭的时候，拿破仑总是首先注意两件事情：一、敌军的统帅，二、敌军指挥的组织。总司令是强有力的吗？他的活动是否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这两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使拿破仑感到兴趣。

在目前的情况下，拿破仑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最满意的回答。俄国人只有一个眞正的好将军巴格拉吉昂，但是他处于第二等角色的地位。次于巴格拉吉昂的是本尼格森，拿破仑说他是“沒有能力的”，本尼格森在弗里德兰被打得落花流水，但仍然是一个顽强、坚决的人，这个人不是以曾经扼杀了保罗，而是以在艾劳的浴血奋战证明了自己的坚定性。但是本尼格森也是处于副手的地位。库图佐夫呢？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击溃了库图佐夫，但从不轻视库图佐夫，认为他是一个狡猾的、谨慎的领袖。但是库图佐夫沒有被起用。拿破仑沒有材料来判断国防大臣、总司令巴克莱·德·托利，但他倾向于认为巴克莱·德·托利并不大大超过俄国将军的一般水平，拿破仑对大多数俄国将军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更加乐观的。俄国军队中沒有任何眞正的一长制，指挥的组织不值一评。确实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因为亚历山大驻跸在军队中，并且干预巴克莱的命令。这一点拿破仑还在向维尔纳推进时就知道得很清楚，他在维尔纳对亚历山大派来向他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媾和建议的侍从武官长巴拉索夫嘲讽地谈到这一点：“他们大家在做

什么呢？法尔提出建议，阿姆弗尔特进行反对，本尼格森观望，而负责执行的巴克莱不知道该做怎样的结论，他们的时间就是在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的情况下过去的！”

巴拉索夫所叙述的他同拿破仑谈话的这一情节，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其他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俄国警察总监巴拉索夫将军是在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刚一传来，就被亚历山大派往拿破仑那里去建议媾和的，他的笔记由梯也尔按手稿刊登在其《执政府及帝国史》第十四卷中，并且几乎是按梯也尔的全文逐字地再现在《战争与和平》的著名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场面中。但是，总的说来，对他的笔记是不应该轻信的，特别是巴拉索夫似乎对拿破仑暗示过西班牙和提到波尔塔瓦的那些情节。俄国警察总监从未以无可指责的诚实著称，更可能的是，他编造这些自己的英雄行为是以后的事情。历史学家对这一点始终都应该考虑到。有一本叫做《历史中楼梯上的机智》（Der Treppenwitz der Geschichte）的书（作者是格尔斯特涅特），专门谈论这种事后编造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机智言行的事例，其实这些言行根本没有发生过，只是后来才想到的，那时他已经与谈话者告别，“从楼梯上走下来”，心里想着，还谈些这个那个该多么好。无论如何，拿破仑在渡过涅曼河的第四天没有遭受任何抵抗就进入维尔纳，受到本地波兰贵族的最忠顺的尊敬，并且知道自己的力量居于压倒的优势，他就完全拒绝了巴拉索夫，更可能的是，拒绝时的腔调确实是尖锐的、带侮辱性的。

拿破仑在维尔纳住了整整十八天，后来军事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拿破仑的致命的错误之一。但是，在维尔纳，和先前在德累斯顿时一样，拿破仑在等待着新的后援部队。拿破仑一共调遣了六十八万五千人对俄国作战，其中二十三万五千人必须暂时留在法国和附属国德国，经过国境渡河的只有四十二万人。但是，就是这四十二万人也只是逐步地开来和渡河的。还在维尔纳的时候，拿破仑就得到第一

个严重的不愉快的消息：由于饲料不够，马匹大量死亡。还有另外的不愉快的消息：波兰人没有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配置足够的兵力。还在维尔纳，拿破仑就比在越过国境的时候，更比在德累斯顿的时候，了解到正在开始的事情的特点和困难。而这一点马上就影响到他的政策：他使波兰人大失所望，没有把立陶宛(这里所说的立陶宛当时是指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并入波兰，而是在立陶宛设立了特别的临时行政管理机关。这意味着，他不想采取任何当时会妨碍他与亚历山大议和的措施。这里已经开始表露出拿破仑对他所进行的进军的结局的情绪和计划的双重性。看来，他认为战争的结局是亚历山大完全屈服，俄国变成忠顺的附庸国，这是他以后在欧洲(也许是在亚洲）与英国进行斗争所需要的。随着事件的发展，他更多地认为，这场战争将变成“政治性的战争”(稍后不久他是这样谈到它的)，内阁的战争，象 18 世纪那样，变成类似外交辩论的东西，这种辩论是靠一些“大炮所作出的姿态”而继续下去的，在此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共同的协定。当然，他的所有的错误当中的根本性的错误，是他完全不知道、不了解俄国人民。不仅是他，可以说欧洲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当俄国人民要保卫祖国，击退无耻的、毫无理由的进攻的时候，他们的英雄主义的精神能够达到多么崇高的程度。谁也没有预料到，俄国农民会把自己国家的整个中心变成烧得精光的废墟，但决不向侵略者屈服。所有这一切拿破仑知道得太晚了。

已经开始的进军的困难日益显露出来，拿破仑头脑中对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看法明显地暗淡下去了，出现了第二个看法。统帅知道，虽然他手下有四十二万人，俄军不到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是他的军队远非各个部分都是同等的。他知道，他只能依赖自己军队中的法国部队(大军中共有三十五万五千名法兰西帝国的臣民，但是其中远非所有的人都是纯粹的法国人)，也不能依赖全体，因为新征募来的年青士兵不能同参加过他的各次进军的久经征战的军士相提并论。至于

威斯特法利亚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莱茵和汉撒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更不用说被强迫的“同盟者”——奥国人和普鲁士人，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他把他们拖来送到俄国去当炮灰，他们当中很多人所仇恨的，根本不是俄国人，而是皇帝本人，所以他们未必能够奋不顾身地作战。拿破仑很熟悉军事史，他记得，在古代波斯军队中有被波斯皇帝所征服的民族的无数人，当薛西斯驱使他们去打希腊人的时候，他们在队伍中不是很热心地作战的。拿破仑对于波兰人抱有较大的希望，因为波兰人是在保卫自己的事业。但是，正如上面所说，他在这方面所抱的希望有的也落了空(他本来希望在军队的数量上给他提供更大的帮助)。

拿破仑知道俄军司令部中的慌乱的情况。还在维尔纳的时候，他就得到消息说，俄军最初想依靠德里萨的牢固营房在德维纳固守的想法已经放弃了，因为巴克莱害怕敌军绕过这个军营而迫使自己投降。俄军已经分两路退入俄国内地。巴克莱的一路退到威特斯克，退得比较快，巴格拉吉昂的一路退到明斯克，退得比较慢。拿破仑率领主力向巴克莱猛追。但是巴克莱加快了转移的速度，并且命令自己后卫部队的长官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尽力阻止进攻的法军。这一点7月25日和26日在俄斯特洛夫诺近郊的战斗中执行了。因此，拿破仑进入威特斯克的时候，沒有能够赶上巴克莱，而巴克莱此时已向斯摩棱斯克迅速后撤了。在这7月的日子里，达乌元帅从维尔纳赶向明斯克，他接到任务要切断巴格拉吉昂的退路，并且在巴格拉吉昂与巴克莱会合之前就把前者消灭掉。但巴格拉吉昂很幸运，拿破仑的在军事方面(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毫无才能的弟弟、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沿着从格洛德诺到明斯克的道路追击巴格拉吉昂，但却一点也不能完成命令他做的事情，带着自己的兵团来迟了。当7月23日达乌与巴格拉吉昂在摩基略夫南面发生战斗的时候，巴格拉吉昂很顺利地击退了一系列的进攻，掉师直奔斯摩棱斯

克，继续后退，已经几乎不怕敌人的追击了。

巴克莱听到巴格拉吉昂在得到摩基略夫近郊战斗和在新贝霍夫渡过德涅泊河的消息后，决定与巴格拉吉昂在斯摩棱斯克会师，并从那里经过鲁特尼亚继续转进。拿破仑已经作了一切准备，要在威特斯克附近进行大战，他想在这场战斗中消灭巴克莱。突然，在7月28日，当他来到阵地以后，才知道俄军已经向东方撤走了。这使皇帝大失所望。在他想象中，威特斯克附近的新的奥斯特里茨之战会一下子就结束战争，迫使亚历山大缔结和约。士兵们被可怕的炎热天气和艰苦的转移弄得疲乏不堪。天气是十分炎热的，那些到过埃及和叙利亚的老兵只好以埃及的天气更热这样的话来安慰年青的新兵。饲料也不够。在某些连队里，从维尔纳开出来以后，有半数以上的马匹死亡了。同时，在军队中出现了瓦解的征兆，抢劫行为已经成风。

二

必须继续往前追击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他们从不同的道路奔向斯摩棱斯克。必须调遣两个兵团到德维纳，配置在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军队的最左翼(即北线)，朝彼得堡的方向前进，在那里活动的是维特根施泰因的兵团。同时必须分出几个师到右翼(即南线)，以便击退因突然签订俄土和约而能匆忙从土耳其赶来的俄国军队。尽管这样，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战斗中能够使用的军队仍然比俄国军队多得多。8月14日，拿破仑的大军在克拉斯诺同涅维洛夫斯基的师团接了火，该师团十分坚强地经受住内伊和缪拉的优势兵力的进攻，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在此之后，拿破仑逼近斯摩棱斯克。巴格拉吉昂责成拉耶夫斯基阻挡法军，而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拉耶夫斯基军团战斗得非常顽强，内伊元帅几乎被俘。巴格拉吉昂坚持认为，

不应该不经过一场大战就放弃斯摩棱斯克。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大战”。俄军主力起初开往斯摩棱斯克，后来则开往东方。但是，巴克莱并不敢不战而放弃城市，虽然他认为这场战斗是不必要的。8月16日早晨六点钟，拿破仑下令对斯摩棱斯克进行总的轰击和进攻。爆发了一场猛烈的战斗，这场战斗一直延续到下午六点钟。法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的近郊，但未占领市中心。保卫该城的多赫土洛夫军团与科诺夫尼岑和符腾堡亲王的师团战斗得十分勇敢、顽强，使法国人大为吃惊。晚上，拿破仑召见达乌元帅，坚决命令他在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占领斯摩棱斯克。他早就有一个希望，现在这个希望更加巩固了，那就是：这一场似乎全部俄国军队都参加的斯摩棱斯克战斗(他知道巴克莱与巴格拉吉昂已经会师)，将会是一场决战，这场决战是俄国人迄今不战而退、给了他大部分土地而一直避免进行的。8月17日激战又起。俄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只有用请求的办法或者直接用威胁的办法才能把士兵撤往后方，因为士兵们不愿意执行撤退的命令。①

在血腥的一天之后，夜晚降临了。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继续炮轰该城。突然，在黑夜中，发出了一声接着一声的震撼大地的可怕的爆炸声；火焰遍及全城。这是俄国人在炸毁军火库和放火烧城，因为巴克莱下令撤退。拂晓时候法国侦察兵报告说，俄军已撤离该城，于是达乌不战而进入斯摩棱斯克。

各条街道上都堆满了人和马的尸体。几千名伤员的呻吟声和呼叫声响彻全城：他们被交与命运支配。城市的一部分还在燃烧。拿破仑及其随从人员在斯摩棱斯克的街道上慢慢地巡视，下令扑灭火焰，运走开始腐烂的尸体和大声地呻吟的伤员，统计找到的物资。据目击者说，拿破仑抑郁不乐，不与随行人员讲话。拿破仑在骑马巡行

① 我写了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拿破仑进攻俄国》，1938年莫斯科版)来谈论俄国人的英勇的卫国战争。

全城之后，进入很快就为他准备好的一座房屋，把自己的佩刀扔在桌子上说道："1812 年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拿破仑的下列想法：停留在斯摩棱斯克，巩固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后方，从欧洲调来增援部队，以便 1813 年春天再向莫斯科或彼得堡进攻，——即把对俄战争分成两次进军，所有这些想法在斯摩棱斯克却不得不放弃了。因为俄军又逃走了。拿破仑不知道巴克莱每次下令撤退都会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不知道有人大声控告俄军总司令叛国，不知道俄国宫廷的惊慌和狼狈。他只看见一件事：还没有发生决战，必须向东方、向莫斯科前进。但是，他愈是深入东方，他就愈难用媾和、外交协定来结束这场斗争。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已经不想对俄国取得完全的、绝对的胜利了。现在，很多情况在他看来，已经与三个月前他渡过涅曼河时完全不同了。

问题不仅在于他的军队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这是由于必须留下守卫部队来保护漫长的交通线和大量的仓库和进行小规模的、局部的、但是顽强的、激烈的战斗以及可怕的炎热、疲劳和疾病造成减员的结果。他也看见别的东西。俄军士兵作战时丝毫不比在艾劳时差。俄国的许多将军，不仅巴格拉吉昂一人，完全不象他在维尔纳同巴拉索夫谈话时所想的那样没有才能。一般说来，拿破仑能够十分正确地估计人们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才能。他不能不承认，例如拉耶夫斯基、多赫土洛夫、图其科夫、科诺夫尼岑、涅维洛夫斯基、普拉托夫等人，他们在受命进行个别极其困难的战斗时的表现，会使他的任何一个元帅在进行同样的战斗时感到羞愧。最后，战争所带有的总的性质，早就使他和周围的人感到不安了。

俄军不断地后退，把一切地方都变为废墟。在斯摩棱斯克已经作了尝试，不仅把大小村庄付之一炬，而且也烧掉整个城市、大的商业和行政中心。这表明了与征服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决心。拿破仑还记得，在以前的战争中，从维也纳逃出的奥国皇帝命令城市当

局绝对执行法国的一切命令，而从柏林逃出的普鲁士国王则在自己私人的信件中，希望皇帝陛下在波茨坦宫中能够过得十分舒服。

而这里的农民却离开了久居之地，烧掉了自己的房舍和存粮；整个城市被付之一炬；各种迹象表明，人民群众，国防大臣巴克莱，巴格拉吉昂公爵以及支持他们并居于他们之上的亚历山大，都认为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生死的斗争……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度过的那些日子里，经常作几小时的默默无语的沉思。拿破仑没有立即动用全部停留在斯摩棱斯克的军队，他派缪拉率领骑兵军团紧追现在指挥全部俄军(巴格拉吉昂在他们两人会合时起就成为巴克莱的部下了)向莫斯科撤退的巴克莱。然后，内伊和达乌也往同一方向前进。8月18日和19日，在瓦卢迪诺和卢宾发生了战斗，结果，由于朱诺没有才能，在攻击巴克莱军队的侧翼时迷了路，巴克莱的军队得以退往东方，损失了七千人，但比法军的损失小。

8月23日夜间，拿破仑带领自己的近卫军离开斯摩棱斯克前往多洛哥布什。但是巴克莱拔营再往东走。现在他离开了多洛哥布什，甚至不希望发生后卫的冲突，因为地形条件非常不利。他退往韦雅兹姆、格查斯克、查列沃—热米息，而拿破仑带着从斯摩棱斯克调出来的全部军队，沿着被俄军破坏的道路，紧追不舍。

每当俄军在某处稍微停息一下的时候，拿破仑就想到决战……在多洛哥布什、韦雅兹姆、格查斯克时都是这样。巴格拉吉昂司令部中有人带着恶意地写了封信给彼得堡："国防大臣(巴克莱)把客人直接带往莫斯科。"

恐惧，无法克服的和日益加剧的恐惧逐渐笼罩了俄国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人。难道一切都毁灭了吗？难道不加抵抗就交出俄国吗？为什么斯摩棱斯克的战斗不进行到底呢？为什么要撤退？德国人巴克莱是不是叛徒？

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尽量破坏巴克莱的威信。他以明显的赞同的

态度，亲自把斯摩棱斯克撤退后哥萨克军队将领普拉托夫对巴克莱说的话，转告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罗伯特·威尔逊将军："你看见的，——我只披了一件斗篷。我再也不穿俄国的军装了，因为现在这已成为可耻的事情。"①

亚历山大一世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宫廷人士处于惊慌之中。张皇失措的心理大为增加。市民们和农民对于沙皇和拿破仑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拿破仑的情况早就是不清楚的。1807年6月以前，在教堂的读经台上，他被宣布为基督之敌的先驱，而在人们的谈话中，他就是基督之敌和基督教的消灭者；从这一年的6月起，基督之敌突然不经过任何转变和解释就成为俄国沙皇的朋友和同盟者。现在，他又成为基督之敌，几乎没有遇见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半个俄国。斯摩棱斯克的毁灭带来了悲伤。"沙皇和沙皇的兄弟康斯坦丁激怒了生气的农夫"，——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人民这样说。但是，"生气的农夫"想要什么，却是一个谜。但是，从最初几天起，俄国人民心中愈来愈充满了敌意和受侮辱的感觉，渴望复仇，热烈希望对侵入的残暴者和劫掠者加以报复。所有这些情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抵抗，终于消灭了征服者的大军。贵族中的害怕心理比"普通"老百姓的害怕心理更有意识些，更明确些，更强烈些。在他们眼中看来，拿破仑的胜利不仅带来继续实行和加强封锁的危险，而且会摇撼农奴制的基础。虽然，事实上拿破仑不仅不想在他占领的地方消灭农奴制，而且还用武力无情地镇压农民打算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地主的压迫的每一次企图。但是，沙皇和贵族仍然认为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莫斯科是绝对不行的，并且士兵也不十分了解撤退的意义。当俄军从格查斯克撤退，到达查列沃—热米息的时候（8月29日），俄军换了一位新的总司令。亚历山大撤换了巴克莱，

① 威尔逊：《侵略俄国时期发生的事件》，1860年伦敦版，第115页。

任命库图佐夫。亚历山大是早就不能忍受库图佐夫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将军。他对巴格拉吉昂也不很信赖，而且巴格拉吉昂的姓名也和巴克莱一样，不是俄国人的姓名。

当然，库图佐夫知道巴克莱是做得对的。远离基地，不可能在一个离开法国几千公里的、荒芜的、贫穷的、充满敌意的大国中进行成年累月的长期战争，缺少粮食，不习惯俄国的天气，这一切都会毁灭拿破仑(如果一般说来有什么东西会毁灭他的话)。但是库图佐夫知道得更清楚，尽管他有俄国人的姓名，还是不会让他不进行决战就放弃莫斯科的，正如以前不让巴克莱这样做一样。于是他决定进行这场他坚信是不必要的战斗，正如当时他也是违背自己的信念，进行了奥斯特里茨战斗一样。这场战斗在战略意义上说来是多余的，但从道义和政治上说来是必要的。拿破仑认为，撤换巴克莱(这件事情他马上就从间谍那里知道了)是一个信号，表明俄军最后决定进行决战了。

9月4日早晨，他命令缪拉和内伊从格查斯克开往格里涅沃。俄军撤退的速度降低了，并且停了下来。俄军的后卫部队凭靠着几个防御工事。进攻的法军最先碰见的是俄军在谢瓦金诺村附近修建的多面堡。拿破仑带领自己的近卫军到了格里涅沃村，马上就研究了他面前的这片平原，俄军最后在这片平原上停下来了。他得到报告说，谢瓦金诺的多面堡有很多兵力。从望远镜中可以远远地看见在半干涸的科洛奇小河那边的俄军阵地。9月4日晚上，侦探向皇帝的大本营报告说，俄军已经驻扎下来了，在此之前两天已经占领了自己的阵地，并且在远处的那个村庄的附近也修筑了工事。在回答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时，侦探回答说："博罗迪诺"。

三

博罗迪诺之战多次吸引了历史学家、军事专家、伟大的文学家和

画家的注意。拿破仑帝国的命运不是在博罗迪诺战场上改变的，而是在向俄国进军的整个过程中改变的；博罗迪诺只是悲剧的一幕，而不是全部悲剧。甚至整个向俄国的进军还不是结尾，而只是不太久以后的结尾的开始。

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想象总是集中在博罗迪诺战场和战场上好几个月都沒有人搬移的成千上万具尸体上。拿破仑还在德累斯顿的时候，后来在涅曼河、在维尔纳、威特斯克、斯摩棱斯克、韦雅兹姆、格查斯克的时候一直在等待和想望的时刻临近了。拿破仑走近了将要爆发迄今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大战斗的地方，他直接指挥的兵力，比刚侵入俄国时的兵力大约要少七分之五。

疾病和行军中的困难，开小差，抢劫行为，必须增强遥远的侧翼和后方（一方面是里加和彼得堡一线，另一方面是在南方对付从土耳其来的军队），必须越来越严密地以守卫部队保证从涅曼河到谢瓦金诺的漫长的交通线，——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大军。拿破仑在接近谢瓦金诺多面堡的时候有十三万五千士兵和五百八十七门大炮。俄军有十万零三千正规部队和六百四十门大炮，七千名哥萨克兵，将近一万名民兵。俄军的炮兵的素质并不低于法军炮兵，而在数量上则超过法军炮兵。拿破仑军中的马匹死伤过多，以致不能把全部大炮都从摩基略夫、威特斯克和斯摩棱斯克调往莫斯科大道上来。

在博罗迪诺战役进行时，拿破仑的大本营设在瓦卢耶沃村。

拿破仑完全相信会获得胜利，事情的开端只是巩固了他的信心。9月5日他下令进攻谢瓦金诺多面堡。缪拉击退了一部分俄国骑兵，而孔潘将军在炮兵作好准备以后带领五个步兵团冲击谢瓦金诺，经过一场顽强的白刃战，占领了多面堡。夜深时分，法军怀着惊奇的心情谈论着，当进攻部队攻入多面堡时，俄军炮手虽有机会逃走，却沒有跑开，而顽强战斗，被就地刺死。9月6日拂晓时分，拿破仑骑上马，几乎整天都沒有下马。他害怕离谢瓦金诺几公里远的俄军在

这个多面堡失守之后会撤走。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库图佐夫仍然守在以前的阵地上。皇帝十分害怕俄军不进行决战而再度撤退，以致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拒绝了达乌提出的以重兵包抄俄军左翼(从乌奇查方面)的建议，因为这一迂回动作可能惊动库图佐夫，使他撤退。

在攻占斯摩棱斯克和最后决定不把战争拖长到两年，而是在一年之内结束以后，拿破仑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进入莫斯科，从莫斯科向沙皇建议媾和。但是，尽管拿破仑渴望占领莫斯科，他一点也不希望不经过战斗就得到莫斯科，因为消灭俄军，即在莫斯科城下进行决战，——这才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要追击库图佐夫，如果库图佐夫想逃出莫斯科，前往弗拉基米尔，或者前往梁赞或更远的地方。正是因为拿破仑急于想要战斗，巴克莱和库图佐夫才不愿意进行战斗。但是巴克莱现在沉默了，在查列沃一热米息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必须绝对服从库图佐夫，而库图佐夫同样也沉默了，他没有力量承担可怕的责任，不战而退，让莫斯科由命运去支配，虽然这样一来会拯救了军队。

9月6日，即占领谢瓦金诺多面堡之后的第一天，拿破仑整天都没有开始战斗。他命令让士兵充分休息，发给丰富的口粮，详细编制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复核给元帅们和将军们个人的命令，他们是在皇帝巡行时成群地跟随着皇帝的。他自己、他们和普通的士兵都不断地向着远处俄军阵地的方向了望：库图佐夫是否逃走了。但是一切都毫无变动：俄军停留在原地。拿破仑感冒了，但是在这忙碌的一天当中，没有表现出一点疲倦的样子。

夜晚降临了。军队很早就睡觉了，因为知道拂晓时刻战斗就要开始。拿破仑几乎没有睡觉，尽管他在一天当中体力和精神都很紧张。他掩饰自己的激动，但是这一次他做得很不成功：他和副官们谈话，但是他们看见他并不在听他们的话。他不时走出帐篷去看俄军军营

中是否有灯火。太阳刚一升起，拿破仑就下令向俄军进攻，意大利副王欧仁·博阿尔内根据皇帝的作战命令带领自己的军团从左翼进攻博罗迪诺村。达乌、内伊、缪拉一个跟着一个地带领自己的军团从中央进攻谢苗诺夫村附近的巴格拉吉昂的钝角堡。双方的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接连不断的轰鸣声，甚至参加过艾劳战役和瓦格拉姆战役的人，也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据目击者谈，在这个漫长的、还暖和的9月的整整一天中，拿破仑经历了两种情绪的转变。在拂晓时刻，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高兴地叫道："这是奥斯特里茨的太阳！"整个早晨他都怀着这种心情。仿佛他们正开始逐渐地、不断地把俄军赶出他们的阵地。但是，就是在法军对谢瓦金诺多面堡进行最初的、强大的攻击的时刻，已经开始有相当令人不安的消息和令人高兴的胜利的消息混杂在一起传到皇帝观战的大本营来了。例如，在清晨皇帝接到报告说，他的优秀的将军之一，第一百零六常备团的指挥官普洛松带领团队冲入博罗迪诺村，赶跑了那里的俄国轻骑兵，而俄国轻骑兵把他的团队的一部分完全消灭了，把普洛松和他的很多军官打死了。诚然，援兵赶来了，法军占领了博罗迪诺。但是普洛松被打死这一情况表明，俄军在这一天是进行了残酷的战斗的。后来，副官骑马送来消息说，达乌元帅的进攻正在顺利开展，但是在这位副官之后又来了另一位副官，他报告说，达乌军团的最优秀的一个师团即孔潘将军的师团已陷于猛烈炮火之下，孔潘受伤，他的军官受伤或被击毙，达乌元帅本人赶去增援，攻击向孔潘射击的俄军炮兵连，把炮兵连俘虏了，而俄军的炮手（正如在谢瓦金诺之前两天的情况一样）被打死在自己的大炮阵地上，因为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发炮，其中一颗炮弹击中了达乌元帅的坐骑，元帅本人被震伤，跌下马来，失去了知觉。

皇帝还未听完报告和下达新的命令的时候，又接到报告说，内伊元帅带领三个师团冲入俄军掷弹兵所保卫的钝角堡，虽然攻下了巴

格拉吉昂的这些钝角堡，但是俄军不断发起猛烈的进攻。又有副官带来消息说，涅维洛夫斯基的师团把内伊击退了。经过一些时候，内伊恢复了自己的阵地，但是巴格拉吉昂公爵继续对这一地区发动最猛烈的进攻。被法军(涅儒将军)攻占的最重要的钝角堡之一遭到了最激烈的白刃冲锋，同时法军被击退，受到很大的损失。最后，缪拉夺回了这个钝角堡，受到很大的损失。

各个阵地都向拿破仑报告说，俄军的损失大大超过法军，俄军不投降，而是在他们力图恢复阵地的反攻中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为了展开骑兵的行动，必须花很大的努力来占领横贯在几乎整个巨大战场的中央的高地和丘陵地带。这些自然的障碍使法军付出很大代价。拉耶夫斯基的军团遭受了很大损失，他也使内伊和缪拉遭到很大的损失，以致两位元帅把能够调动的部队全部调到这里来了。谢苗诺夫凹地和凹地附近的地方曾经几度易手。最后，元帅们派副官向拿破仑请求增援，他们保证说，如果能够及时从巴格拉吉昂手里夺过谢苗诺夫凹地和谢苗诺夫村的话，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

拿破仑派了一个师去增援他们，但是拒绝派更多的增援部队。他从战斗的空前激烈的程度看到，内伊和缪拉犯了错误，他们认为俄国的军团会退出战场，可是没有退出，而法军的后备力量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就会消耗尽净。而决定性的时刻始终没有到来。在白天的时候，莫南将军的师团以猛攻攻下了位于博罗迪诺村与谢苗诺夫村之间的拉耶夫斯基的炮兵阵地，但是俄军部队以白刃冲锋击退了法军，重新占领了这个阵地。俄军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炮兵阵地从莫南手中夺回，而莫南本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关于俄军重新占领巨大的炮兵阵地的消息，拿破仑几乎是与另一个消息同时接到的，另一个消息是：巴格拉吉昂作了极大的努力从内伊和缪拉手里夺回了三个钝角堡，这三个钝角堡是他们花了同样的力气夺来的。

由于争夺谢苗诺夫钝角堡而展开了对巴格拉吉昂的激烈的战斗。在几小时之内，钝角堡几度易手。在这样一个地区有七百门以上大炮在轰击，其中四百门是拿破仑下令调来的，三百多门是俄军方面的。俄军和法军在这里不止一次地进行肉搏，混战成一团的士兵有时被榴弹炮不加区别地轰击，因为来不及及时地判定情况。

活过这一天的元帅们在自己一生中都兴奋地谈起俄军士兵在谢苗诺夫钝角堡的表现。法军士兵也不比他们表现得差。正在这时，迎击端着枪在弹雨之下冲锋的法军掷弹兵的巴格拉吉昂，并不回击，他发出了临死前的叫声："好极了！好极了！"几分钟之后，巴格拉吉昂公爵本人（拿破仑认为他是俄军中优秀的将军）受了致命伤，人们冒着弹雨花了很大劲才把他抬出了博罗迪诺战场。

中午到了。拿破仑的情绪迅速地完全变了。问题不在于他伤风感冒（这是他的旧的传记作者所十分强调的），而是在于内伊和缪拉向他提出派遣增援部队以及最后派遣近卫部队的不断的和坚决的请求之后，他认为不可能这样做，这不仅因为象他当时所说的，不能在离法国几千公里之外让近卫军去冒险，而且还有另外较近的原因：俄国骑兵以及在乌瓦诺夫和普拉托夫指挥下的哥萨克，为了声东击西的目的，突然攻击輜重队和早晨就已参加夺取博罗迪诺村的师团。俄军骑兵被击退了，但是这个企图使得他把全部近卫军投入战斗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样一来法军的纵深阵地就没有保障了。下午三点钟，拿破仑下令重新进攻拉耶夫斯基的炮兵阵地。多面堡在法军的反复猛攻之后被占领了。拿破仑能够比自己所有的元帅更清楚地权衡和估计可怕的损失，关于损失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他那里。

皇帝是在快到晚上的时候知道下面的重要消息的：巴格拉吉昂公爵受了致命伤，两位图其科夫被打死，拉耶夫斯基军团几乎被消灭，进行顽强抵抗的俄军最后终于撤离了谢苗诺夫村。拿破仑接近

了谢苗诺夫村。所有到他那里去和他谈话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说，他们认不出皇帝来。他闷闷不乐，沉默不语，看着堆积如山的人和马的尸体，他没有回答那些除了他之外谁也不能回答的最迫切的问题。人们第一次看见他表现出一种阴沉的冷淡的态度，似乎是犹豫不决。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将近三百门法军大炮开始向缓慢地、井井有条地撤退的俄军射击。但是这并未产生预期的最后的效果：士兵们倒下去了，但是并未逃散。“他们还想要，再给他们一些吧。”——拿破仑下令在晚上加强炮火时这样说。俄军撤走，但是进行回击。这就是夜晚时双方的情况。

晚上，人们向库图佐夫报告最初的统计情况，他看见俄军的一半在9月7日这一天被消灭了，他坚决地决定拯救另一半俄军，并且不战而放弃莫斯科。这并不妨碍他宣布博罗迪诺是一次胜利，虽然他心头很沉重。精神上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以后的事件可以肯定说，即使在战略方面，俄军在博罗迪诺的胜利始终大于法军的胜利。

晚上，在战斗以后，拿破仑得到报告说，他的四十七位将军被打死或者受了重伤，他的几万名士兵躺在战场上，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伤，他自己也确信，他直到现在为止所进行的任何一次大的战斗，无论就激烈程度和死伤人数来说，都不能与博罗迪诺之战相提并论，这时（虽然这也同样不妨碍他宣称博罗迪诺是自己的一次胜利），他这个在自己的一生中获得如此之多真正的、毫无疑问的胜利的人，当然不能不了解，如果洛迪或者利沃里，或者金字塔附近的战斗，或者在阿布基尔附近消灭土耳其军队，或者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拿、弗里德兰、瓦格拉姆等各次战斗可以称为胜利的话，那末对于博罗迪诺来说，可以想出另外一种评语。他以为库图佐夫在莫斯科的城墙底下会进行新的战斗的，但是这一次库图佐夫坚持自己的意见。拿破

仑不知道在费尼亚举行的军事会议，但是在博罗迪诺战役结束两天之后，他根据一系列正确无误的迹象了解到，俄国决定不战而放弃这个城市了。

缪拉及其骑兵对后退的库图佐夫紧追不舍。9月9日拿破仑进入莫日艾斯克；第二天意大利副王欧仁亲王进入鲁查。9月1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拿破仑和他的随行人员登上了波克隆山，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欢喜：他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被美丽的景色震惊了。在他面前的这个巨大的、在太阳光下闪耀发光的城市，是他让自己军队休息的地方，而首先是一定能迫使亚历山大缔结和约的保证。博罗迪诺的可怕的情景立刻被这些景色和这些展望遮掩了。

四

9月14日这一天，俄军不断地经过莫斯科，走上通往科洛明和梁赞的道路。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带领骑兵紧紧在后追赶。先锋部队的司令米洛拉多维奇取得了缪拉的允诺，让俄军安静地通过城市。拉耶夫斯基指挥下的俄军后卫部队傍晚在韦雅佐夫克村离科洛明关卡六俄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法军骑兵通过该城前往阿尔巴特，其前哨已经到达卡拉恰洛夫村。

9月16日，通过莫斯科的库图佐夫的军队沿着去梁赞的大道继续前进，在库拉科夫村扎营过夜。第二天，在拿破仑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库图佐夫的军队突然向右转，沿着巴赫拉河往上走，19日在巴赫拉河左岸旧卡卢加大道上的红色巴赫拉村一带设下了阵地。拿破仑的唯一的交通要道——斯摩棱斯克大道被俄国骑兵截断了。

还在多洛哥米洛夫关卡附近，拿破仑就听到了近卫军中传出来的奇怪的流言：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迁出了莫斯科，它已经是一座空城，皇帝所希望的带着城门的钥匙的城市代表团是不会有的了。流

言被证实了。

9月15日拿破仑进入克里姆林宫。在头一天的深夜就已燃烧起最初的火焰。但是，刚刚开始的事情的规模和意义，都还不能预先大致地猜出。

从9月16日清晨起，火势更厉害了。白天的时候，火焰还不是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从16日夜晚到17日，刮了大风，这阵风一直刮了一昼夜以上。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中心地带、莫斯科河南岸一带、索良卡等地成了一片火海；火舌几乎一下子就把相距甚远的地方联在一起了。

拿破仑得到最初的火警消息的时候，并不特别注意，但是当他9月17日早晨巡视克里姆林宫，从窗户中往四处环顾，到处都是一片狂暴的火海的时候，据塞久尔伯爵、梅其叶医生和其他很多目击者说，这时皇帝面色苍白，久久沉默地望着大火，后来才说道："多么可怕的景象！这是他们自己放的火……多大的决心！怎样的人啊！这是野蛮人！"同时，大火不仅威胁着克里姆林宫，而且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特洛伊茨塔)已经烧起来了，有些大门已经不能通过，因为风把火舌往这些门那边吹去。元帅们开始坚决请求皇帝立即迁往城外的彼得罗夫宫。拿破仑没有马上同意，而这几乎要了他的命。最后，当他和随从人员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火星落在他和随从人员的身上，使人呼吸也感到困难。拿破仑的一位侍从人员说："我们在燃烧着的天空之下，在燃烧着的地上，穿过两旁的火墙走。"

可怕的大火在9月17日和18日仍然很猛烈，但在黄昏时分开始减弱了。风停了，下了雨。大火在以后几天中还在继续，但这已经不是9月15日至17日那种把城市大部分烧光的猛烈的大火灾了。

拿破仑丝毫不怀疑这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灾难的原因：俄国人放火烧城，不让征服者得到它。而下面这些情况使他更相信这一点了：罗斯托普钦把一切消防水龙和灭火器具运走了；各处同时起

火；某些因纵火嫌疑被捕的人的口供；似乎看见手持火把的纵火犯的某些士兵的证明。大家都知道，后来罗斯托普钦时而夸耀自己参加了放火焚烧莫斯科，时而又否认说没有参加，时而又夸耀和卖弄自己的强烈的爱国热诚，时而又加以否认（甚至在专为此事而写的小册子中）。从本书的性质来说，我们感到兴趣的当然不是起火的客观的真正的原因（关于这场大火，有许许多多的推论和猜测），而只是大火对拿破仑的思想和对以后事件的发展的影响。

根据人们一致的说法，拿破仑在彼得罗夫宫时，以及当大火开始熄灭，他回到克里姆林宫之后，他经历了最难过的焦躁不安的日子。他有时大发其疯，这时周围的人就要大吃苦头了；有时他又几个钟头保持死寂般的沉默。他仍然精力充沛。他从莫斯科继续管理自己的庞大的帝国，签署法令和命令，以及决定对官员们的任命、调动、奖励和撤职；在莫斯科，象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他力图考查一切，并且研究主要的、次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记得一个奇怪的例证：一个主要的法国国家剧院（“法兰西喜剧院”）到现在还是丝毫不变地根据拿破仑在莫斯科签署的详细的法规进行活动和管理的，而这个法规到现在还称为“莫斯科法令”。

但是重要的、可怕的忧虑固执地压在皇帝的心上。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大火并未使他失去在莫斯科的所有物资，他还有留下来的完整的仓库。但是在城外征集粮食并未成功。士兵们进行抢劫，失踪了；纪律显然发生了动摇。留在莫斯科过冬当然是可能的，他的元帅和将军当中也有人劝他这样做，但是拿破仑凭着正确的本能感觉到，他的大帝国并不是那样地巩固，他的“同盟者”不是那样地可靠，以致他可以长久地离开欧洲而住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之中。追击带着自己的军队的、没有露出任何形迹的库图佐夫？但是库图佐夫可能退到西伯利亚和更远的地方去了。马匹已经不是死去几千匹，而是几乎几万匹。漫长的交通线并不能得到牢固的保证，虽然拿

破仑沿路都留下了不少的队伍，并且因此而减损了自己大军的力量。而主要的是——莫斯科的大火是拿破仑从涅曼河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博罗迪诺追击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时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用来对付征服者而放的一系列大火的顶点，旧首都几乎全体居民的难以理解的、谜样的撤离；博罗迪诺战斗的情景，这场战争（拿破仑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承认）是他所进行的一切战斗中最可怕的一次——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这一次他的敌人决定继续进行殊死的斗爭。

只剩下一条出路——让亚历山大知道，拿破仑同意缔结最宽大的、最轻松的、最光荣的、最不侮辱人的和约。缔结和约，留在莫斯科，还保持胜利者的姿态，带着军队顺利地撤出俄国——这就是他现在所能预计的；他准备满足于亚历山大的谈话和诺言，准备让步。已经根本谈不到使亚历山大屈服和成为附庸。但是怎样才能告诉亚历山大呢？拿破仑在维尔纳通过巴拉索夫将军对沙皇作了侮辱性的拒绝之后，已经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拿破仑曾经作了三次尝试，企图把自己的热爱和平的愿望通知沙皇。

在莫斯科还住着一位陆军少将图托尔明，他是教养院院长。他请求法军当局保护教养院房屋和留在莫斯科的养育者。拿破仑命令召见他，并且十分热情地同他谈了很多话，谈到奇怪的莫斯科大火，罗斯托普钦的犯罪的野蛮行为，谈到他这位皇帝不会对莫斯科与和平的居民施加任何的侮辱。图托尔明请求允许他写一份关于教养院的报告给皇后玛丽亚，拿破仑不但允许了，而且突然出乎意料地加上一句话："我请你还给亚历山大皇帝写一点，我正是象以前那样尊敬他，说我希望媾和。"就在这一天，9 月 18 日，拿破仑下令让图托尔明派遣的送自己报告的官员通过法军的岗哨。

拿破仑沒有得到回答。但是他在还能得到回答之前就已迫不及待地决定作第二次尝试。比遇见图托尔明将军更偶然的，是一位叫

做雅柯夫列夫的有钱的贵族，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的父亲，他违背自己愿望，留在莫斯科。他请求法军的保护，有人向莫蒂埃元帅报告了，莫蒂埃元帅以前在巴黎与雅柯夫列夫会见过，就向拿破仑谈起雅柯夫列夫了。皇帝命令让雅柯夫列夫来见他。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描述了皇帝与他的父亲的谈话："……拿破仑为大火的事情痛骂罗斯托普钦，说这是野蛮行为，象以前一样吹嘘自己的不可抑制的对和平的热爱，并且解释说，他要进行的战争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俄国，他夸耀他派兵保护教养院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他抱怨亚历山大，说亚历山大被一些坏人包围着，皇帝不知道他的和平愿望。"隔了几句话之后是："拿破仑在思索，并且突然问道：'你能替我带一封信给皇帝吗？在这种条件下，我允许你和你们的全家通行无阻。'——'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但是我很难保证。'"拿破仑写了一封建议媾和的信给亚历山大，并且亲自把信交给雅柯夫列夫，雅柯夫列夫诚恳地说，他一定尽量想法把这封信转交给亚历山大。在这封措词委婉的信中，有一句话对于拿破仑说来是很奇怪的、典型的："我与陛下作战，但对陛下毫无怨恨。"看来，拿破仑认为，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是他引起了别人怨恨的感情，而是他本人有权去怨恨别人！这封信也沒有得到回答。于是拿破仑作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建议媾和的尝试。

10 月 4 日他派遣战争开始之前的驻俄大使洛里斯顿侯爵到设在塔鲁金诺村的库图佐夫的兵营去。拿破仑本来想派维琴察公爵科兰古将军去，他是在洛里斯顿之前的驻俄大使，但是科兰古坚决劝阻拿破仑不要这样做，并且指出说，这种尝试只会告诉俄军，法军的信心不足。拿破仑大发雷霆，这和他往常与人爭论发现别人的论据正确时的表现一样；而且，他已经与好爭论的人十分疏远了。洛里斯顿重复科兰古的论据，但是皇帝打断了谈话，直接下命令说："我需要和平；只要荣誉能够挽回。立即出发到俄军兵营去。"

洛里斯顿到达俄军前哨阵地，这在库图佐夫的大本营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库图佐夫想到前哨阵地去与洛里斯顿谈话，但是立即发现，在库图佐夫的大本营中，有些俄国爱国者，他们比库图佐夫本人更激动，更为丧失莫斯科而感到屈辱。这些人就是英国在俄军中的官方代表威尔逊、从莱茵同盟中跑出来的溫青格罗德伯爵、符腾堡公爵、奥尔登堡公爵和其他许多嫉妒地注视着库图佐夫的每一动作的外国人。其中包括仇恨库图佐夫的本尼格森，他曾经向沙皇打过报告，说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是根本不必要的。威尔逊代表俄国人民和俄国军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上述这些人就代表俄国军队)去见库图佐夫，并且用很严厉的措词对总司令说道，如果他库图佐夫胆敢到前哨阵地与洛里斯顿当面谈话，那末军队就拒绝服从他。库图佐夫听完这个声明以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库图佐夫在大本营中接见洛里斯顿，拒绝与他进行关于媾和或休战的谈判，只答应把拿破仑的建议转交亚历山大。沙皇沒有回答。拿破仑还有一个办法：在俄国发动农民革命。但是他沒有敢这样做。而且，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拿破仑在立陶宛用法国军队残酷镇压了农民(这些农民并非试图起义，只不过对地主政权表现出一点点不顺从罢了)，他怎么能够忽然变成俄国农民的解放者呢。

拿破仑占领莫斯科之后，上层贵族十分不安，亚历山大得到报告说，不但农民中间传布着关于解放的流言，而且士兵中间也有人在说，似乎是亚历山大本人秘密地邀请拿破仑到俄国来解放农民的，因为十分明显，沙皇本人就害怕地主。而在彼得堡已经有人在说(而且有个叫做谢巴金的人甚至因此被控告）拿破仑是叶卡德琳娜二世的儿子，他来是要从亚历山大那里夺回自己合法的全俄国皇帝的位置，然后解放农民。1812 年发生了许多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有些地方农民的骚动很严重，——我们从文献上知道这一点。

拿破仑在一个时期中有明显的动摇。一会儿突然命令在莫斯科

的档案中寻找关于普加乔夫的材料(沒有找到)，一会儿皇帝的随从人员又在起草对农民的宣言，一会儿他自己又写信给欧仁·博阿尔內，谈到最好发动农民起义，一会儿又询问一位在莫斯科开设商店的女店主法国人沃贝一沙尔梅，问她对解放农民有什么看法，一会儿又根本不谈这件事，开始问到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的情况。

拿破仑仍然命令把普加乔夫运动的历史告诉他。这些关于普加乔夫的想法表明，他曾经十分认眞地设想过他自己作为农民的解放者而采取坚决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说，俄国贵族自发地、“从心眼里”害怕什么东西的话，那末，与其说它是大陆封锁，倒不如说正是拿破仑得胜后会动摇农奴制度，同时，贵族们所设想的对农奴制度的动摇，或者是斯泰因和哈登堡在普鲁士对他们作出的例子(在耶拿之战粉碎了普鲁士的君主制之后)，即在已经缔结和约之后“从上面”进行改革，这对俄国贵族说来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拿破仑在战爭时期以全民性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普加乔夫运动，起义的目的是要以公开的、革命的办法推翻奴役制度。

拿破仑还不希望开始着手实现最后的计划。对于新的资产阶级欧洲的皇帝说来，即使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的斗爭中，即使是在农民革命是他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机会的时候，农民革命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在克里姆林宫中也曾很快地想过在乌克兰的起义，想过可能在鞑靼人中间发动运动。而所有这些计划也被他推翻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在法国，最新的历史编纂学者赞扬拿破仑在莫斯科大火灾场中所抱的这种坚决的保守情绪。

最新的八大卷专门论述拿破仑对外政策的研究著作的作者艾杜阿尔·德里奥说：“他想发动喀山的鞑靼人；他想到乌克兰的存在……他想到马热普……在俄国发动革命——这是太严重的事情！在这森严奥秘的大草原面前，拿破仑不无胆怯地停步了。……他不是革命的

创造者，而是革命的摧残者；他有建立秩序的愿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象他那样具有皇帝权力感，这似乎是一种本能，他对人民运动具有一种类似生理上的厌恶……他仍然是皇帝，不妥协，不低头。”① 这位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在充满了热爱法国的爱国心之下，特别热情地赞扬了自己的英雄的下列行为：拿破仑在 1812 年宁愿忍受任何艰难困苦，而不号召举行革命。这位资产阶级右派、拿破仑的崇拜者在 1927 年正是这样着重地强调这一思想的。顺便说一句，这个人在 1937 年至 1938 年投效了最无耻的反动势力。

在这十月的日子里，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城堡中犹豫不决，到底是发布解放农奴的法令呢，还是不发布，他的思想斗争得很激烈。对于刚刚制伏了反革命的土伦的二十五岁的将军说来，对于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的朋友说来，对于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拥护者说来，甚至后来对于拿破仑法典的作者说来，在是否把农民留在男男女女的沙尔台其赫的手中的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动摇的。拿破仑十分清楚地知道，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对黑人的奴役相近的程度，远远超过他所击溃的任何一个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的农奴制度；他在俄国派有大批间谍，有十分完全的、各式各样的情报。但是，他早已不是革命的将军了，被值日副官偷偷地看见的、在彼得罗夫城堡的大厅中沉想地走来走去的，是拿破仑一世陛下，是天意决定的法国人的专制皇帝，是意大利的国王，是整个欧洲大陆实际上的君主和主人，是奥国皇帝的女婿，他把很多人送上断头台、关进监狱或加以流放，这些人当时也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和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并且有勇气一直忠于自己的信仰。

如果拿破仑公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并且在他的军队所占领的各个省份中加以实施，让完全是由刑棍纪律维持的农奴组成的俄国

---

① 艾·德里奥：《帝国的崩溃》，1927 年巴黎版，第 27 — 28 页。

军队知道,——那末,正象拿破仑周围的某些人所设想的,这个法令就会煽动起千百万农民,使沙皇军队的纪律解体,并且首先是会掀起一个与普加乔夫起义相类似的起义。要知道俄国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国家,在那里,在拿破仑到来之前的三十五、六年当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继续了很久,胜利与失败交替着,并且占领了一些大城市(起义者在某一个时期中所拥有的大炮,比沙皇军队的大炮还好得多),这场战争在广大的土地上胜利地进行着,在接着的几个月内震撼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大厦。关于德国的农民起义,拿破仑只是从文件中才能知道,这些文件已经是将近三百年前的东西了,而关于俄国普加乔夫起义的情况,甚至一些不太老的人也能凭个人的回忆告诉他。而俄国农民的农奴生活无论在主要方面或者在一些细微末节上到现在都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代替把农民扔到烧红的煤炭上的沙尔台其赫的,是设立刑讯室和带着三妻四妾的伊日迈洛夫家族和卡明斯基家族,甚至那种可以单个地或成批地购买农奴、可以分别购买父母或子女的全俄的奴隶市场也和叶卡德琳娜时代一样:北方的下新城和南方的克列明楚格。区别只在于:农民起义的支柱,这一次是驻扎在俄国心脏中的法国军队。

现在已经准确地知道,1812 年时俄国贵族是多么惧怕农民起义。我们刚才谈过,流言在乡村中传布着,到处都已发生了骚动,当局对已经到来的国内的风暴感到束手无策;我们知道,当亚历山大在彼得堡得到关于博罗迪诺之战的损失和法国皇帝进入莫斯科的消息之后,立刻就到喀山大教堂去,人民群众用死寂般的沉默来迎接这位面如死灰的亚历山大。

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拿破仑的行动?为什么他甚至不敢试图把几百万农奴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用不着猜来猜去,他自己已经作了解释。他后来声明说,他不想"纵容人民的自发的暴动",不想造成一种"不能和任何人"签订和约的局面。一句话,新的、资产阶级的

君主制的皇帝觉得自己对农奴制的、半封建的罗曼诺夫国家的主人，终究还是比对农民起义的自发力量更为亲近。他与前者会很快就达成协议，即使不是现在，以后也会达成，他根据提尔西特的经验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同后者他甚至不想与它进行谈判。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 1789 年的夏天和初秋害怕法国的农民运动，害怕这个运动的深入，那末资产阶级的皇帝在 1812 年不想把普加乔夫的幽灵召上舞台又有什么奇怪呢？

五

拿破仑摒弃了发动俄国农民运动的想法，同时拒绝在莫斯科过冬，他需要立刻决定从莫斯科往哪里去。至于亚历山大不会同意进行任何谈判，这一点在沙皇对他先通过图托尔明、后来通过雅柯夫列夫、最后通过洛里斯顿提出的建议拒不回答之后，已经十分清楚了。

去彼得堡吗？拿破仑首先产生了这个想法。莫斯科失守之后，彼得堡笼罩着惊慌情绪：那里已在收拾东西准备逃难了。比所有的人都着急和害怕的，是亚历山大的母亲玛丽亚·费道洛夫娜，她非常仇恨拿破仑。她希望赶快缔结和约。康斯坦丁也希望这样做。阿拉克切夫很胆小，他也很希望缔结和约。拿破仑向彼得堡前进当然会加强这种恐惧心理，但是向彼得堡前进是不可能的。确实，士兵在莫斯科稍稍休息过来，也吃饱了，但是马匹是那样少，以致有几位元帅甚至建议扔掉一部分大炮。

在莫斯科既找不到干草，也找不到燕麦，而在附近已经完全破产的地方征集粮秣又遇到了农民最激烈的反抗，一无所获。此外，整个法国军队的情绪十分低落，不能进行新的往北方的远征。驻扎在切尔里息列河上塔鲁金诺（库图佐夫在那里）附近的瞭望站的缪拉的部队，遭到库图佐夫军队的突然袭击，这迫使拿破仑赶快作出决定。这

次进攻是 10 月 18 日发生的，后来扩大为战役，结果缪拉被赶出了什巴什—库普利亚村。的确，这只是次要的冲突，但是这次冲突表明，在博罗迪诺之后，库图佐夫加强了，而且以后他会掌握主动。实际上，塔鲁金诺战役是违反库图佐夫的愿望发动的，当时本尼格森还对总司令大发雷霆，因为总司令没有给他必要的兵力。

拿破仑最后作出了决定。既然不向彼得堡进军，那末这个决定一点也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而是十分自然的。皇帝决定，让莫尔特元帅和一万名守卫部队留在莫斯科，自己带领其余全部军队沿着旧卡卢加大道去进攻库图佐夫。他知道，库图佐夫补充了自己的军队，但是他自己在这个时期中也得到一些增援，他有十万多人，其中包括两万两千名精选的近卫军士兵和军官。拿破仑发出了命令，10 月 19日，除了莫蒂埃元帅的军团以外，全部法军从莫斯科沿着旧卡卢加大道前进。

装载着粮食和在莫斯科抢劫到的财物的数不尽的马车和货车的行列跟在军队的后面。纪律已经十分松弛，甚至达乌元帅对于一些违抗命令的人也不枪毙了，这些人用各种借口和各种诡计力图把在城里抢劫到的贵重东西放到车上去，虽然连运大炮的马匹都不够。已经出发的军队和这个数不尽的车队成为一条铺展得很长的线。只要举出经常引用的目击者的观察就够了：在一整天的不断的行军之后，10 月 19 日夜晚，沿着最宽阔的卡卢加大道分成八行毫无阻碍地并排行进的军队和辎重队还没有完全走出城来。

拿破仑用自己的军事眼光立刻看出这个辎重队对于军队的全部危险性，看出了保护这条漫长的行列不受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的全部困难，可是又不敢下决心发出必要的命令，虽然最初想这样做。军队已经不是以前的军队了。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军队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地位，懂得往后还要碰见十分困难的时刻，军队与其说是由纪律维持的，不如说是由一种想在敌国保存自己的感情维持

的。如果说，拿破仑的个人的感化力在老的法国士兵的心目中并未减弱，那么，被征服国家的士兵就会做出很坏的例子，因为对于拿破仑的任何情感都不能控制他们。

军队和辎重队拖成很长一条线，这是拿破仑最初的、最强烈的印象。也许，更强烈的是他意识到纪律的松弛。

于是，他突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全部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几小时才拟定的。

他决定不进攻库图佐夫。新的博罗迪诺之战即使获得胜利，也已经不能改变最主要的东西，也就是当时他认为的主要的东西：放弃莫斯科。他预见到退出莫斯科将在欧洲产生的印象，他害怕这个印象。但是，拿破仑既然决定不同库图佐夫作战，就立即执行新的计划：从旧卡卢加大道往右转，绕过俄军阵地，走上波洛夫斯克大道，通过卡卢加省的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往西南方直奔斯摩棱斯克。拿破仑还没有放弃以后的作战的打算：安静地通过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卡卢加到达斯摩棱斯克，可能在斯摩棱斯克或维尔纳过冬，或者还采取一些措施。但是首先必须完全放弃莫斯科。10 月 20 日晚上，拿破仑从自己在特洛依茨村的大本营派人把命令送给莫蒂埃元帅：立即带领自己的军团与大军会合，在动身出发之前炸毁克里姆林宫。

炸毁克里姆林宫的命令只是部分地执行了。在突然开拔的慌乱当中，莫蒂埃没有时间来很好地做这件事情。“我从来不做没有好处的事情”——拿破仑关于别人说他下令在狱中扼死皮什格鲁的污蔑曾经这样说过。但是在这一次，炸毁克里姆林宫不但毫无疑问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事情。这似乎是因亚历山大对三次和平建议保持沉默而作的回答。

大军执行拿破仑的命令，突然从旧卡卢加大道转上新卡卢加大道，10 月 23 日大部分军队已经到了波洛夫斯克。马洛雅罗斯拉维茨被德尔松将军的师团的部队所占领。库图佐夫猜中了拿破仑的计

划，决定截断新卡卢加大道。10 月 24 日拂晓，多赫土洛夫将军以及跟在他后面的拉耶夫斯基向头天夜晚被德尔松占领的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发动了进攻。由于双方逐渐聚集力量，发生了一场血战，这场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马洛雅罗斯拉维茨八易其手。第八次是被法军占领了，到夜晚的时候还在法军手中，但是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法军光是被击毙的就有五千人。还在战斗进行时就已燃烧起来的城市被烧光了，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和法国人在街上被火烧死，很多伤员被活活烧死。

第二天清晨，拿破仑带着少数随从人员从戈洛德尼村出发去观察俄军阵地，突然端着枪的哥萨克人向着这群骑马的人冲来。与拿破仑在一起的两位元帅(缪拉和贝西埃)、拉普将军和几位军官围住拿破仑，进行抵抗。波兰骑兵（轻骑兵）和赶来的近卫轻骑兵救出了皇帝和围住皇帝的这群人。当时真是千钧一发，死亡或被俘的危险极大，所以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拿破仑嘴角上的微笑未必是真的。但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的微笑，在这一天和后来大家都很高兴地谈起他的微笑：在这样的事件面前皇帝也是微笑着的。夜晚，他命令近卫军医生尤万给他一小瓶毒性猛烈的毒药，以便在有被俘的危险时应用。

拿破仑观看了阵地之后，在戈洛德尼召开了军事会议。马洛雅罗斯拉维茨的战斗表明，如果拿破仑不想进行新的博罗迪诺之战的话，那末俄国人自己在寻找这场战争，而不发生一次新的博罗迪诺之战皇帝就不能进入卡卢加。

整个军事会议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拿破仑自己在最后也终于同意了这个意见)：必须放弃进行决战的想法，因此，只有沿着被彻底破坏的斯摩棱斯克大道向斯摩棱斯克前进，并且趁着俄军还没有占领未设防的莫日艾斯克和截断退路的时候，要尽快地前进。拿破仑听了将军们和元帅们的话以后，对他们说，他暂不作出自己的决定，但

他觉得与库图佐夫进行决战并且冲入卡卢加是最好的。10 月 26 日，当拿破仑知道俄军把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骑兵赶出梅地尼之后，他就不再犹豫了。

但是，库图佐夫不想作战，也不寻求战机。

在马洛雅罗斯拉维茨的战斗之后，库图佐夫坚决地决定让拿破仑撤退，不对他施加任何厉害的压力。当按照亚历山大的意志在库图佐夫大本营中充当监视总司令的侦探的外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开始过于讨厌地纠缠老元帅、责备他缺少魄力的时候，这位老元帅突然加以反抗，并且让他们知道，他是十分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勾当的，并且明显地认识到，为什么他们那样害怕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的“为时尚早的”结束。

六

拿破仑下令往斯摩棱斯克撤退。10 月 27 日开始从波洛夫斯克往维列亚、莫日艾斯克、多洛哥布什、斯摩棱斯克撤退。军队拖得很长，并且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把沿途的一切乡村、庄园都放火烧掉。但是，从莫日艾斯克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烧了，因为这些地区在博罗迪诺之战以前的战争时期中就被惨重地破坏了。莫日艾斯克成了一片焦土。当军队通过博罗迪诺战场的时候，那里成千上万具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尸体扔然象以前一样，没有谁去触动或掩埋起来，都腐烂了。拿破仑下令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可怕的景象对士兵产生失望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当他们觉得战争已经打败了的时候。

当军队到了格查斯克(这是 10 月 30 日的事情)的时候，开始了最初的严寒。这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根据侵入俄国以前拿破仑所查明的情况，俄国这个地带在 1811 年的严寒是从 12 月底开始的。18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特别寒冷。库图佐夫跟踪追击着后退的

敌军。哥萨克的攻击对法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在韦雅兹姆，俄国的正规骑兵也在向法军发动进攻，但是库图佐夫明显地避免大的战斗，虽然很多人都催促他这样做。对于库图佐夫说来，全部问题在于要拿破仑退出俄国，但是对于英国代表威尔逊和很多德国人和流亡的法国人说来，拿破仑退出俄国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事情的开始；他们认为重要的是摆脱拿破仑的压迫，这一点只有在拿破仑完全失败、被俘或者阵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不然的话——在他们看来——在欧洲一切仍然和以前一样，而拿破仑仍然统治着涅曼河以西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库图佐夫沒有让步。随着严寒的加剧，辎重队损失的增加，各处被哥萨克和俄国游击队（由费格涅尔、塞什拉文、达维多夫等人领导的）打死的人数的增多，法国军队灾难性地迅速瓦解了。

11 月 6 日军队到了多洛哥布什，能够作战的人数只剩下将近五万人。

拿破仑忍受了行军中的一切艰难困苦，他象以往一样，力图作出榜样来鼓励士兵。他接连几小时在雪堆上和崩雪下走过，扶着一根枴杖，与幷肩行进的士兵交谈。当时他还不知道，是不是要在斯摩棱斯克过冬，或者是否要在那里停留很久。但是拿破仑进入多洛哥布什的时候，就得到从法国来的消息，这个消息促进了他放弃斯摩棱斯克的决定。

来自巴黎的信使把惊人的消息带到在多洛哥布什的拿破仑那里。一位叫做马莱的将军，是老的共和派人，在巴黎的监狱中关了很久，他想法逃出了监狱，伪造了议院的命令，到一个连队里去，宣布拿破仑已在俄国阵亡，宣读了伪造的议院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法令，幷且逮捕了警察总监萨瓦里，打伤了陆军部长。骚扰进行了两小时。马莱被识破了，被逮捕后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幷且与十一个人同时被枪决，这十一个人除了相信了这个法令是眞的以外，根本沒有任何罪

过，所有这一切都是马莱一个人在狱中策划的。

但是这件事情(尽管十分荒唐)对拿破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觉得他必须回巴黎去。在多洛哥布什，后来在斯摩棱斯克（他于 11 月 9 日到达该地)，他知道了奇恰果夫带领南俄军队从土耳其直趋别列金纳。他也得知了副王欧仁的军团在与哥萨克战斗时遭到了惨重损失。最后，他也知道了威特斯克已被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所占领。停留在斯摩棱斯克是不可思议的：必须在俄军截断渡口之前通过别列金纳，不然的话，拿破仑及其残余部队都有被俘的危险。

严寒更加厉害了。在撤出斯摩棱斯克的时候人们已经十分软弱无力，以致跌倒之后就再也不能站立起来而冻死了。整条道路上都布满了尸体。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没有携带保暖的过冬的物品：这是进军开始时就存在的致命的疏忽。不得不丢掉大部分的輜重和一部分大炮，整队的骑兵连必须下马步行，因为马匹的死亡日益增多了。

游击队和哥萨克越来越勇敢地对先头部队和掉队的敌人展开攻击。在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拿破仑有将近十万人，11 月 14 日离开斯摩棱斯克的时候，他的军队的人数，排列成队的共有三万六千人，还有几千名掉队的和逐渐赶上的人。现在他做了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下决心做的事情：他下令烧掉一切车辆，以便能够拖带大炮。11 月 16 日，俄军在克拉斯诺耶攻击欧仁·博阿尔内的军团，法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天战斗重起。法军被击退，两天之内损失了将近一万四千人，其中将近五千人被打死和打伤，其余的人投降被俘。但是克拉斯诺耶之战并未就此结束。与其余的军队失去联系的内伊，在遭受惨重损失(七千人当中损失了四千人)之后，和他的剩下的三千人被库图佐夫的大部队逼到河边。晚上，他渡过克拉斯诺耶北边的德涅泊河，但是因为冰层还不厚，很多人掉到水里淹死了。内伊和几百名士兵得了救，逃往沃尔夏。

拿破仑费了很大力气来整顿纪律，组织供应，但是对于明斯克方

面的交通线注意不够。还在杜布洛夫克的时候他就知道，波兰部队不执行自己的任务，这支部队是他还在进军开始的时候就下令要它保护摩基略夫和明斯克的；东布罗夫斯基将军接到向波里索夫前进的命令以后，并不援助布洛里科夫斯基将军，而明斯克在 11 月 16 日被奇恰果夫占领了。在明斯克，大批粮食落到俄国人的手里，这些粮食是巴萨诺公爵(马勒)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储藏的，也是拿破仑所指望的。解冻开始了。

已经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已经从北面，从德维纳向拿破仑必须通过的别列金纳逼进；乌迪诺元帅和维克托元帅不能阻挡他。奇恰果夫从南方向别列金纳河上的波里索夫袭来。11 月 22 日奇恰果夫进入波里索夫，把东布罗夫斯基从城里赶走。

当拿破仑接到这个消息时，脸都变白了。库图佐夫的先头部队——普拉托夫和叶尔莫洛夫的队伍离法军只有两昼夜甚至一昼夜的路程。有遭到包围和投降的危险。拿破仑立即命令寻找别的可以架桥的地方。

在波里索夫有一座永久性的桥，当皇帝大本营知道这个渡口失守之后，最勇敢的人也大惊失色了。拿破仑很快就克制住自己。听了科比诺将军的报告之后，拿破仑决定在波里索夫北面的斯土江喀渡河，波兰的枪骑兵在那里找到了浅滩。在这个地方，别列金纳河还不到二十五公尺宽，但是河的两岸的大片土地上都是淤泥，因此一般说来必须架设相当于河的宽度的三倍的桥梁。拿破仑用巧计骗过了奇恰果夫。他故意装出仍然想在波里索夫渡河的样子。11 月 23 日，乌迪诺元帅在波里索夫附近击退了奇恰果夫的先头部队的指挥官巴连伯爵，并且乘胜追击，迫使奇恰果夫退出刚刚才占领的波里索夫。但是奇恰果夫停留在附近一带，而维特根施泰因则从北方急忙赶来。拿破仑并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渡河。拿破仑的一套巧妙计谋使奇恰果夫以为拿破仑将在波里索夫或下游附近渡河，而拿破仑已经在 11 月 26 日拂

晓到了斯土江喀。法国的工兵立即站在水深齐腰的飘着浮冰的水中工作，开始架设两座浮桥，很快，在半天之后，乌迪诺的军团就开始渡河。11 月 26 日和 27 日都在渡河。右岸的俄军企图在离开渡河地点不远的地方攻击已经渡河的部队，但是法军的近卫军骑兵进行反攻，击退了恰普里茨将军。维特根施泰因赶到战斗的地方时已经迟了，奇恰果夫被拿破仑骗了，法军残余部队因而免于被俘。俄国的军事历史学家阿普赫金说："很难责备奇恰果夫和维特根施泰因这两位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统帅，说他们沒有勇气与拿破仑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渡河是有秩序地进行的，当法国军队几乎全部都顺利地渡过了河的时候，突然有将近一万四千名掉队的被哥萨克追击的士兵赶到桥边。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不听指挥都冲到桥上，于是还未渡过河的维克托元帅军团的最后一批正规部队就用武力把这群人击退。库图佐夫得到哥萨克关于法军在斯土江喀渡河的报告之后，立即通知奇恰果夫。这时，炮队正在通过的一座桥梁断了，很快把它修好以后又断了。如果奇恰果夫能够及时赶来的话，法军将被彻底毁灭。但是不知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来迟了，拿破仑及其残部到了右岸。由于维克托的正规军团不让过桥，大部分掉队的士兵（一万四千人当中将近有一万人）仍然留在左岸，他们一部分被哥萨克人砍死，一部分被俘。拿破仑在渡河之后立即下令烧掉桥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末掉队的人也会得救。但是从军事眼光看，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决不能让俄军渡河，而一万名掉队的、不能通过桥梁渡河的人的死亡并不能阻止皇帝这样做。他认为只有仍然留在队伍中的人才是需要的人，而一切掉队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是因病，是因冻坏了手或冻坏了脚，都不配当一名战士，他们以后的命运如何，并不使皇帝怎么关心。拿破仑只是在他的关心不会损害具有战斗力的士兵的地方，才关心病人和伤员。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尽快地烧掉桥梁，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桥梁烧掉了。

拿破仑自己、他的元帅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很多军事历史学家都认为，作为一种军事行动，渡过别列金纳河是拿破仑的杰出成就。另外有人认为这一成就的获得，主要是由于奇恰果夫和维特根施泰因所犯的错误和束手无策，由于亚历山大造成的混乱，亚历山大越过库图佐夫，直接从彼得堡把包围拿破仑的计划分发给将军们，而库图佐夫认为这个计划是荒谬的。1894 年出版了俄国军事历史学家哈尔喀维奇的专门研究著作《别列金纳》，这本著作到现在仍被认为是典范的作品。哈尔喀维奇认为，库图佐夫甚至不想执行亚历山大的计划，故意不赶到别列金纳，当时他是有可能及时赶到那里的。仔细研究奇恰果夫、叶尔莫洛夫、丹尼斯·达维多夫以及库图佐夫所提供的一切文件，使我不得不承认哈尔喀维奇的意见是很难推翻的。和阿普赫金一样，哈尔喀维奇也认为，对拿破仑的恐惧，惊惶失措的恐惧，使维特根施泰因和奇恰果夫心虚胆怯，束手无策，以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哈尔喀维奇认为拿破仑的行动是完全适当的。

总之，法军残部得救了，并且前往维尔诺。但是暂时的解冻（由于解冻的缘故而不得不在别列金纳河上架桥）突然被可怕的严寒所代替。温度降低了十五度（列氏表），然后降低了二十度、二十六度、二十八度，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几十个、几百个人死去。队伍越过这些死去的、半死的、软弱无力的人又聚拢在一起而向前进。在这次艰难的撤退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怕的了。直到最后的这些日子之前，从未有过这样难以忍受的严寒。库图佐夫几乎是紧跟在后面。他的军队也遭到寒冷的可怕的袭击，虽然士兵们的装备比法军的装备好得多。只须指出，在博罗迪诺之战后补充了自己的军队的库图佐夫在 10 月从塔鲁金诺先到马洛雅罗斯拉维茨，然后紧紧跟着拿破仑的时候，他有九万七千多人，而在 12 月中他进入维尔诺时，队伍的人数不到两万七千五百人。并且他离开塔鲁金诺时所带的六百六十二门大炮，沿路失去了四百二十五门，所以他只剩下将近二百门大炮。

在这个特别寒冷的冬季，这种无尽头的冬季行军就是这样悲惨，这样艰难。

这里应该加上一句，拿破仑只是十分害怕库图佐夫的主力的攻击。哥萨克当然也使撤退的法军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攻击辎重队，威胁后卫部队，但是哥萨克自然不能与法军部队进行独立的战斗。在克拉斯诺耶附近的战斗中，哥萨克起了重大的作用，但那是辅助的作用，而不是主要的作用；至于游击队，那末法军怕它的程度还不如害怕哥萨克。游击队的队伍有好几支：达维多夫的，费格涅尔的，多洛霍夫的，塞什拉文的，瓦德波尔斯基的，库达谢夫的，此外还有两三支。法军不承认他们是正规军队，并且几乎不抓俘虏而经常把它们杀死。但是游击队也很少抓俘虏，而宁愿杀死敌人。费格涅尔以特别不讲情面著称。充当游击队员的，有上级允许离开队伍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志愿人员。法国人在其回忆录中根本不谈游击队，而对哥萨克则谈得很多，并且一致承认流动的、神出鬼没的哥萨克骑兵使后退的法军遭受很大的损失，这些骑兵进行突袭之后，转眼就不见了。游击队攻击完全瓦解了的队伍，并且使它完蛋。

下面就是著名的游击队员丹尼斯·达维多夫所作的写生画："最后，老卫队来了，拿破仑本人在老卫队的中间……我们跨上了马，又出现在大道附近。敌人看见了我们的喧哗的队伍，举起枪，扳上枪机，高傲地继续前进，并不放大脚步。尽管我们多么想从这个靠在一起的队伍中拉出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他们象花岗石一样，忽视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是不可触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被各种各样的死亡考验过的士兵的轻快的步伐和威武的举止。他们头戴很高的熊皮帽，身穿蓝色的制服，背着白色的皮带，红色的羽饰和肩章，他们象是雪地上的罂粟花……我们的一切亚洲式的攻击，对于密集的欧洲队形不发生任何作用……队伍仍然一个跟着一个地前进，开枪把我们赶走，并且嘲笑我们在他们周围的无益的袭击。这一天当中，我们

还抓住了一位将军，俘获了很多车辆和七百个俘虏，但是近卫队和拿破仑在我们的哥萨克当中通过，就象一百只炮舰在小渔船面前驶过一样。”

应该指出，这一天游击队和哥萨克会合，只是因为他们捉住了七百人。但是他们是很好的侦探，他们时常给库图佐夫和他的将军带来很宝贵的情报。在这里也应该谈谈 1812 年俄国的人民战争。

在俄国，“人民战争”的形式与西班牙的稍微有些不同，虽然从激烈程度来说，它使拿破仑想起了西班牙人。

在俄国，人民反抗入侵的敌人的激烈程度一个月比一个月厉害。还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俄国人民说来，只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清楚的：一个残忍的、狡猾的敌人进入了俄国，他蹂躏国家，掠夺居民。祖国遭受凌辱，城市和乡村遭到破坏和焚烧，莫斯科被毁灭并劫掠一空，必须为这一切复仇，必须为侵略者带来的一切苦难复仇！这种复仇的渴望，保卫俄国和惩罚傲慢的、残忍的征服者的愿望，——所有这些感情逐渐在全体人民心中燃烧起来。农民集合成小小的一队，捉拿掉队的法国人，并且无情地打死他们。当法国士兵来要粮食或草料的时候，农民几乎总是进行猛烈的武装反抗，如果他们觉得法军队伍实在很厉害，他们就跑进森林，而在跑走以前就把粮食和草料烧掉。这一点对敌人说来，比其他一切更可怕。

在俄国，农民有时编成队伍，进攻个别的士兵队伍，特别是当拿破仑军队撤退的时候，虽然这里不象在西班牙发生的那种情况，在那里，农民沒有军队的帮助就自己包围了法军团队，迫使他们投降。但是在俄国，农民情愿自动加入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全力帮助游击队，充当引路人，把粮食和必要的消息送给俄国军队。

但是，俄国人民在斯摩棱斯克、克拉斯诺耶、博罗迪诺、马洛雅罗斯拉维茨的激烈的战斗中，在规模较小的战斗和接触中所显示出来的不可遏止的勇敢精神，表现了自己保卫祖国的坚决愿望。如果说，

法国人在俄国沒有看到象西班牙那样的反对他们的人民战爭，那末这首先是因为西班牙的军队被拿破仑彻底消灭了，只是在经过好几个月之后，农民志愿军才能作战，而在俄国沒有一天俄军被完全消灭。人民仇恨征服者的感情和想把征服者赶出俄国的愿望在正规军的队伍里能够更有组织地表现出来。我们从文献中知道，唐波夫省的农民在 1812 年被征入伍的时候，他们高兴得跳起舞来，而在平时被征服役被认为是最重的徭役。

这些在被召入伍充当士兵时高兴得跳起舞来的人，后来在血战中战斗和牺牲时都是眞正的英雄。

在法军撤离莫斯科之后，在马洛雅罗斯拉维茨的战斗之后，在严寒到来、被库图佐夫的军队紧紧追赶的法军的瓦解加剧之后，出现了起初被当代人称为“游击队行动”，后来被叫做“人民战爭”的现象。游击队员费格涅尔、达维多夫、塞什拉文、库达谢夫、瓦德波尔斯基等人是俄国正规军的军官，他们被允许并且受委托组织志愿兵义勇队（由正规军士兵和志愿人员组成），对敌人的辎重队和掉在后面的队伍进行突袭，一般说来，凡是他们的“队伍”（只有几百人的小队伍）能够获胜的地方，他们都对敌人发起突袭，使得敌人惊慌不安。在这些游击队的队伍里，有士兵，有哥萨克，有在战时被征召的民兵，有志愿参加的农民。

关于所有这一切，我在拙作《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略》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渡过别列金纳河之后，法国军队人数减少了，这不仅是因为可怕的严寒的缘故，而且因为拿破仑为了转移奇恰果夫视线而命其留在波里索夫的巴尔土诺师团遭到了库图佐夫主力的攻击，经过两天战斗之后，巴尔土诺的四千名士兵只剩下一半多一点，他们四面被围，投降了。

在维尔纳，法军残部算是虎口余生，逃脫了覆灭的命运。他们到

达该城的时候狼狈不堪，受尽寒冷与疲倦的折磨。某些部队还保持着战斗力：离维尔纳不远，内伊和梅松发出了猛烈的炮火攻击迫近的俄军，俄军的追击在几天之内削弱了。

在进入维尔纳城的时候，各部队士兵之间发生了一些骚乱，甚至冲突，他们到处寻找住处和饮食，并且立即开始抢劫仓库和商店。从12月10日至12日军队进入科孚诺，它把追击它的哥萨克赶走了。库图佐夫带领的主力离维尔纳还有几昼夜的路程。法军残部没有在科孚诺耽搁就渡过了冻结的涅曼河，可怕的莫斯科进军结束了。1812年6月越过国境的四十二万人和后来逐渐从欧洲增援来的十五万人当中，现在，在同年的12月，只剩下一些不大的零零散散的队伍，七零八落地渡过了涅曼河往回走。后来在普鲁士和波兰从这些人当中组成了总人数将近三万人的队伍（主要是由这半年内停在侧翼的、未去莫斯科的队伍组成的）。其余的人或者被俘，或者死亡。但是被俘的人数，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十万人。其余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但更多的是在撤退时死于寒冷、饥饿、疲倦和疾病。

在法军离开俄国边境之前的一个星期，即1812年12月6日，在斯莫尔冈地方，拿破仑在科兰古、迪罗克、洛巴和波兰军官冯索维奇的伴随下离开了军队，把指挥权交给了缪拉。

拿破仑在离开之前曾经向元帅们说明，元帅们起先试图以尊敬的口吻表示不同意，但是拿破仑对他们说，他认为军队现在已经没有被俘的危险，在渡过别列金纳河之前存在着这种危险，他认为他不在这里元帅们也会把军队带到盟国普鲁士，也就是到达涅曼河。他必须去巴黎，因为那里没有他在的话，谁也不能采取紧急的征兵办法组织至少三十万人的新军，以便用这支新军在春天迎击可能进犯的敌人。反对他离开的理由是害怕他走了以后，历尽千辛万苦的后退的军队会完全垮掉，因为只有皇帝在这里还能给军队一些力量。

拿破仑十分安静地向元帅们解释。他不是由于胆怯才离开军

队，他个人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在他们的面前经历过很多次眞正的、直接的危险而沒有眨过眼睛，——所有这些，元帅们都是知道的。当他与元帅们谈起这场由他策划的可怕的、失败的战爭和遭到毁灭的大军的时候，他幷沒有激动；当然，有些悲伤，但这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不幸；天气十分作弄人，等等。然而他情愿承认他也有一些错误：例如，在莫斯科停留得太久。一般说来，在这次谈话中，拿破仑沒有流露出一点不安和泄气的情绪。他坚决要求元帅们暫时对他的离去保守秘密。重要的是，不仅要防止士兵们在到达涅曼河之前的这几天当中完全泄气，更重要的是，要在德意志知道大军覆灭的眞象和皇帝沒有卫队就离去这两件事情之前，就使法军通过德意志。

元帅们对一件事情是不怀疑的：皇帝去建立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新的军队，他很快就会做成这件事情，他还会多次地领着他们和这支未来的军队在枪林弹雨之下出生入死。

元帅们来送他，眼看他和科兰古坐上雪橇；他就象四个月以后，当他已经是从法国带领新的军团去镇压起义的欧洲的时候那样镇靜。在送行的元帅当中，有些人参加过拿破仑进行的数不胜数的各次战役，从第一次征服意大利起，到进军俄国结束为止，他们认为，在此以前他们还沒有看见过比博罗迪诺之战更激烈的战斗。他们沒有预见到莱比锡的战斗。 雪橇在十二月傍晚的朦胧雪雾中消失了，坐在上面的那个人毅然决定，不经过激烈的战斗，决不让出被他征服的欧洲的任何一寸土地。

第十四章　附庸的欧洲起义反对拿破仑和“民族战争”。“大帝国”崩溃的开始（1813 年）

一

在十二个昼夜中，拿破仑先是坐在雪橇上，后来是坐在轻便马车上，跑过了波兰、德意志和法国，于 1812 年 12 月 18 日早晨到了杜伊勒里宫。他沿途严格地不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了解在这些紧急的日子里是十分危险的：他完全了解德国人对自己的眞正感情，沒有受骗。沿路陪伴他的科兰古说拿破仑是十分平静的，也谈到他的勇气、毅力和准备东山再起的决心。皇帝也对科兰古谈到刚刚结束的 1812 年的战爭。“我错了，但不是错在这个战爭的目的及其在政治上是否恰合时宜上面，而是错在进行战爭的方法上。应该停留在威特斯克。如果这样做的话，亚历山大现在已经拜倒在我的脚下了。”但是他与科兰古谈话的整个声调，就象是一位输了棋的象棋大师的声调，他输了棋，他在刚刚输了的这局棋和他力图取胜的下一局棋之间的休息时间內，分析自己的错误。在这些谈话中，不但丝毫沒有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痛苦，感到自己负有绝大部分责任，甚至也沒有丝毫不愉快的心情，而在 1810 年至 1811 年期间，当他正处于强盛和胜利的顶峰时，这种心情是时常在他身上出现的。战爭已经是他的一种天性，当他准备战爭或者进行战爭的时候，他总是给人这种印象，使人觉得他是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人，当他和科兰古坐上雪橇的时候起，他的全部注意力已经放在未来的战爭上，以及如何在外交和技术

方面准备这场战争。光是与俄国人继续作战吗？欧洲会暴动吗？哪一个国家开始暴动，能否(采取什么办法)预防暴动呢？建立新的军队需要多少个月？

途中他在华沙停留过，并召见了派往萨克森国王的使节普拉特神父。他的镇静也使普拉特大为吃惊。皇帝正是在与他会见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从伟大到荒谬只差一步，让后代去评论吧。"但是马上又加了一句，说他很快就要带三十万军队回到维斯杜拉河，"俄国人将为自己的胜利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得到这些胜利不是靠自己，而应该感谢造化"。谁又没有失败的时候呢！"诚然，谁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它们必须与我的幸福成比例，确实，它们很快就会得到补偿的。"

前面说过，拿破仑于 12 月 18 日到了巴黎，他立刻就发现人们很泄气。早就流传着的不祥的流言正是在拿破仑回到首都的前两天被著名的第二十九号公告证实了，在公告里，皇帝相当坦白地谈到向俄国进军及其结束的情况。成千上万的家庭对死者的哀悼，使社会气氛变得特别低沉。

在最初的几天里拿破仑接见了自己的内阁大臣、国务院人员和议员们。他严厉地、鄙视地谈到行政当局在马莱将军制造的十月事件中张惶失措的表现，要求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报告，但是关于进军俄国却只顺便谈到，没有作详细的解释。

大臣们和宫中人员仍然象以前那样对他谄媚，俯首屈膝。议院议长拉塞比以自己极其忠诚的热心请求完成一岁半的储君的加冕典礼，"象征国运久长。"并且，议院全体议员向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三鞠躬。拿破仑在自己的报告中谈到对俄国的战争，在报告时也清楚地表明，他还在以幻想安慰自己，而在他命令莫蒂埃炸毁克里姆林宫时，看来他是完全摆脱了下面这个幻想的：似乎是不分胜负，现在还可以与亚历山大签订和约。

"我所进行的战争是政治性的战争。我预先发动它是没有包含敌意的，我想使俄国摆脱它自身的那些缺点。我可以武装俄国一部分居民来反对俄国，那就是宣布解放农民……很多农村请求我这样做，但是我拒绝了注定会使成千上万个家庭遭到毁灭的办法。"拿破仑通过对自己议员的谈话，实际上对俄国的地主和俄国的"头号"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兄弟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后来这样称呼俄国的沙皇）说了这些话。拿破仑要求沙皇和地主现在感谢他，因为他使他们不致受到普加乔夫领导的那种农民运动的威胁，似乎他曾经想使用这种武器。所有这些对大臣和高级机关人员的接见，整个这场虚伪的闹剧——一方面是群臣的卑躬屈节的虚伪表演，另一方面是从皇帝宝座上发出来的高傲急躁的虚伪回答，所有这些，当然只是为了转移法国和欧洲的视线而做出来的冠冕堂皇的行为。皇帝认为两个主要任务是头等重要的：第一，建立军队；第二，保证奥地利能出一臂之力，至少是保持中立，尽量使普鲁士也这样做。

第一个任务很快就解决了。还在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就下令提前征召 1813 年的兵士入伍，而现在，1813 年春天，新兵的训练工作快要结束了。费了很大力气才征兵十四万人。早在 1812 年，拿破仑就命令组成"国民近卫队"，现在则把这些人全部编入军队（这被说成似乎是根据他们的愿望把他们编入的，虽然国民近卫队的组成，是为了维持国内的秩序的）。这又增加了十万人。1812 年 6 月，拿破仑留下了二十三万五千人在法国和附属国德意志。现在也可以把他们算进来。最后，从俄国还回来了几千人（后来查明，将近三万人），因为拿破仑留在北方战线（里加—彼得堡战线）和南方战线（格洛德诺战线）的军团所受到的损失，比参加博罗迪诺之战、后来又连续两个月从莫斯科退往涅曼河的那些部队的损失小得多。

所有这一切使皇帝产生了一种希望，在 1813 年春天，军队人数不是三十万人，而是四十万人至四十五万人。他预见到，计算可能是

太乐观了，但是无论如何，不久他将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一点他是不怀疑的。作战物资、大炮、工兵所需要的物资，一切物资，——所有这些，当然都必须加紧制造、准备、补充。拿破仑从早到晚都在研究装备和训练军队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1813 年的春天，亚历山大藐视拿破仑对议院演说中的热爱和平的口气，象他在 1812 年秋天藐视由图托尔明、雅科夫列夫、洛里斯顿转交的那些信件一样，那么，拿破仑现在完全相信，他将在维斯杜拉河与俄军会战，并且彻底击溃俄军。他知道，库图佐夫在 1812 年冬天花费的代价并不是很低的，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库图佐夫从塔鲁金诺到涅曼河的两个月的追逐敌军中，使自己的十万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炮队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拿破仑认为，由于道路很坏和农奴制度的缘故，库图佐夫不可能用能够作战的人迅速补充这些损失和恢复炮队。为了避免再犯侵入俄国的错误，可以安静地在维斯杜拉河与涅曼河等待俄军的到来，并且把俄军就地击溃。

但是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俄军是否只是孤军作战呢？早在 1812 年 12 月，麦克唐纳元帅麾下的普鲁士将军约克(因为普鲁士与拿破仑结成"同盟")突然转到俄军方面去了。确实，胆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赶忙与约克断绝关系，但是拿破仑知道国王所处的境地，如果他不转到俄国人方面，俄国人就会推翻他，正如他本国人会推翻他一样。拿破仑也知道，如果俄军进入普鲁士，而被他拿破仑摧毁的普鲁士不会企图起来摆脱他的统治，那是荒谬可笑的。

库图佐夫反对继续作战。这不仅由于他认为用本国人的鲜血解放普鲁士和德意志诸国对于俄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也由于一个更为简单明了的原因，那就是俄国军队已是一支不大的、精疲力尽的军队，与拿破仑作战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但是亚历山大是一点不让步的。他的理由是：给拿破仑喘息时间，就等于让整个欧洲象先前一样受他统治，而对涅曼河的威胁是经常不断和不可避免的。如果已

经进入普鲁士境界的俄军得到增援的话，那末很明显，普鲁士的国王将被迫拿起武器反对法国皇帝。

拿破仑也不再满意奥地利的行为了。他的岳父弗兰茨皇帝和当时已经是奥国政治的主要领导人梅特涅，与俄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而在 1812 年奥国(作为拿破仑的"同盟者")是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很明显，奥国皇帝不顾新的亲戚关系，认为他的女婿拿破仑所陷入的境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命运对他弗兰茨的微笑，是奥国即将摆脱在瓦格拉姆之战和肖恩布鲁恩和约之后所遭受的残酷压迫的保证。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法国皇帝记起，早在 1809 年，他占领罗马后，就把罗马教皇监禁了起来，送往萨沃纳，而在 1812 年他出发远征莫斯科时，又命令把他送回枫丹白露。同时，看守人是光荣的警卫队，教皇是住在枫丹白露的皇宫，这不是监禁，而是到法国皇帝陛下那里作客。教皇不断地抗议和反对夺去了他的罗马城（拿破仑把罗马城送给他新生下来的儿子"罗马国王"）并把他俘掳起来。想不到拿破仑也到自己的囚犯这里作客了。这是 1813 年 1 月 19 日的事情。必须与天主教徒妥协：从 1809 年起，他们就悄悄地埋怨皇帝。但是，从拿破仑与教皇的一切亲密的交谈中，没有得出半点实际的东西。

拿破仑强迫庇护七世签订新的条约，但是没有交出罗马(整个新的条约是重复 1802 年的条约)。拿破仑没有让步。他既不喜欢也不能作出让步。这种对教皇的毫无用处的玩弄在 1813 年 1 月结束了，那是因为他知道红衣主教德·皮特洛对教皇作了一些含有恶意的劝告，于是突然把德·皮特洛逮捕起来，把他赶出了枫丹白露。

皇帝关于这次不成功的与教皇的妥协说过一句富有特征意义的话："暂时把罗马放在一边吧……这个号牌放在箱子里，只有等我在易北河和维斯杜拉河上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才从箱子里取出来。"问

题也就在这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整个 1813 年和以后，拿破仑不断破坏与敌人的一切谈判，始终希望取得重大的胜利。幸运长久降临在他的头上。与他的一生比较起来，与他所完成的各种空前的业绩——从 1793 年攻占土伦起，到建立世界强国为止，他在 1812 年率领这个强国的军队渡过涅曼河——比较起来，1812 年的战争毕竟只是巨大胜利的画幅上的一个黑点而已。

普鲁士准备同法国脱离关系：国王向拿破仑请求，把法军驻扎的一些地方让出来，请求把法国国库为维持法军军费而欠他的九千四百万法郎归还给他，但是遭到了拒绝。英国人不能容忍法军占领西班牙，而拿破仑在 1813 年 2 月 14 日在立法院开会时直接宣称："法国皇朝统治着并将继续统治西班牙。"梅特涅希望知道（在 3 月）拿破仑同意签订普遍和约的条件，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所有这些，正好与对待教皇的情况相同：只要在维斯杜拉河或涅曼河上取得胜利，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拿破仑在 2 月 14 日的演说中保证说，帝国的全部领土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华沙大公国还是和从前一样。梅特涅这时还不想与拿破仑决裂，他对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奥托说，拿破仑的这个声明，使他与俄国、英国或普鲁士签订和约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奥国代表到伦敦去会见卡斯尔雷，也到卡利什去会见亚历山大。在这两个地方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如果拿破仑坚决不作任何一点让步，那就让战争来解决问题。最后，普鲁士国王正式向亚历山大靠拢，与他缔结同盟。拿破仑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抗，就是进行新的征兵。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还是俯首听命的。

二

1813 年 4 月 15 日，拿破仑到驻在埃尔富特的自己的军队里去，

并且调动军队攻打俄军和普鲁士军队。他的军队的装备非常精良。在1813年的头几个月里，拿破仑白天研究建立和组织军队的问题，抽出一部分晚上时间来改善财政，而现在，军队什么东西都不缺少了，并且可以用叮叮当当的硬币来买一切物品了，——重要的是，不要使德意志诸国的居民破产和不要激怒他们，因为他们暂时还是"同盟者"，也就是说，还是服从的。

他的二十万军队已经枕戈待旦，几乎同样数目的后备力量已经准备好或者正在形成。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库图佐夫逝世了，在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俄军和普鲁士军队事实上没有总司令。拿破仑旗开得胜。俄军被赶出了韦森非尔斯。接着，在5月1日和2日，在韦森非尔斯附近和吕岑近郊发生了战斗。拿破仑大获全胜。在韦森非尔斯附近的战斗中，拿破仑的随从人员贝西埃元帅和皇帝在一起，在老近卫军前面不远的地方，被炮弹打中胸部而阵亡。"死亡正在向我们逼近"，——拿破仑看见死去的元帅被包上斗篷要运出战场的时候这样说。吕岑的战斗是十分顽强和激烈的，死伤甚多。拿破仑亲自骑马从一翼到另一翼，指挥整个战斗。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离战场不远，但是没有参加战斗。俄军和普鲁士军队被赶出战场，联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但是法军损失的人数也相差不多。几天之后，拿破仑已经在德累斯顿了。

拿破仑在吕岑获胜后，梅特涅着手恢复拿破仑与联军之间的和平，同时保证拿破仑与奥地利在下列基础上结成同盟：拿破仑放弃华沙大公国，不再充当莱茵同盟的保护者，放弃汉撒同盟各城市和伊利里亚，所有其余地方（也就是整个帝国和比利时，整个意大利、荷兰、热罗姆·波拿巴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仍然和以前一样，归拿破仑所有。拿破仑拒绝了。拿破仑对维也纳宫廷的使节布勃纳将军说道："我不要你们的武装调停，你们想混水摸鱼。靠洒玫瑰水是不可能得到（新的）省份的。你们第一步是向我要伊利里亚，然后就要威尼斯

省，然后是米兰地方，然后是托斯卡纳。这终于会使我与你们作战的。最好是现在就开始吧。是的，如果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土地，那你们必须流血。”他决定继续打下去，不作丝毫让步。汉堡发生了反对拿破仑的运动。皇帝派达乌到那里去，以便惩罚汉撒同盟各城市，因为它们反对警察和法国的税吏（这些人由于非常严格地执行封锁命令而使当地的商业遭到破产）。拿破仑命令达乌元帅枪毙几个议员，枪毙几个反法运动的首领，枪毙几个军官，并且逮捕五百名不可靠的有影响的人物，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

拿破仑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带着近卫部队离开了德累斯顿，往东到包岑方向（在息普列）去的军队里。在从德累斯顿到布列斯拉夫里的路上，和拿破仑在一起的，有四个军团——内伊、马尔蒙、乌迪诺、贝尔特朗的军团。联军是由维特根施泰因、巴克莱·德·托利、米洛拉多维奇和布吕歇尔指挥的。包岑近郊的战斗是5月20日开始，21日晚上结束的。拿破仑派内伊从北面包抄敌军的右翼，但是内伊忽视参谋长若米尼的劝告，没有及时到达战场。联军井井有条地撤退了。

战斗几乎与在吕岑的战斗一样激烈。双方死伤人数一共将近三万人。胜利又为拿破仑所得，他打算在追击后退的俄军与普鲁士军队时，直接进入柏林。联军且战且退，阻击追兵。5月22日在格里茨附近，拿破仑进攻后退军队的后卫部队，并且把它击溃。战斗已经结束，敌人往后撤退。迪罗克在晚上到了拿破仑那里，和拿破仑谈话，然后去找科兰古，忧愁地对他说道："我的朋友，你注意皇帝了吗？他现在在失利之后又取得了胜利；这恰恰应该是吸取失败的教训的时机。但是你看，他并没有改变。他贪婪地寻求战斗……所有这一切的结局不可能是幸运的。”

这是元帅生命的最后一分钟。炮弹打中了拿破仑身边的树木，回跳过来打在迪罗克的身上。他还来得及对皇帝说，他希望皇帝取得胜利，签订和约。拿破仑回答说："再见吧，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见

面的。"

迪罗克是拿破仑所喜爱和信赖的少数几位元帅中的一个，他的死使拿破仑大受震动。拿破仑一动不动地坐在树桩上，普鲁士后卫部队发射的炮弹的碎片落在他的周围，但他沉思了很久，没有很快离开这个树桩。在 1813 年整个这次战役中，他经常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主要的是，没有任何必要，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并且是与他关于总司令在战斗中的地位的意见相矛盾的。甚至随从人员也有一种印象，认为 1813 年他是在悄悄地寻死，但是把这种意图掩饰起来。几乎在整个追击逃跑的、但是顽强回击的俄军和普鲁士军队的过程中，拿破仑都是在先头部队中，在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使他亲自到那里去。

在包岑战斗和追击后退的联军几天之后，敌对双方接受了由梅特涅策动的奥地利的调停建议，签订了停战协定。1813 年 6 月 4 日，在普列什维茨签订了停战条约。

无论是联军或者拿破仑，他们签订了停战条约，但并不希望实现和平，虽然双方都同意梅特涅的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布拉格去谈判。联军知道，拿破仑还在卢岑和包岑战斗之前，是不作任何让步的，现在获得了两次胜利，更不会作出任何让步了；从自己方面说来，如果说亚历山大同意停战，那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直截了当地说，军队在遭到失败以后需要恢复、整顿和得到增援。拿破仑同意停战，也是为了得到增援，以便最后击溃联军。他签署这个停战协定是犯了致命的错误的，因为停战有利于他的敌人，而不是对他有利，并且停战也成为使奥地利退出调停人的地位而倒向联军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联军根本不了解拿破仑所犯的这个致命的错误，虽然很多年以后联军的将军们（俄军、普鲁士军队中的将军以及瑞典的王位继承人贝尔纳多特太子）都肯定说，似乎从停战一开始，他们就巧妙地利用了停战，对停战感到非常满意。我们有弗拉基米尔·伊凡诺

维奇·列文斯顿中校的不容推翻的证据，他对联军司令部的情绪了解得最清楚，他说："在联军之中，在普鲁士，在德意志各国，在说德语的任何地方，人们都认为这次停战是最大的不幸而同声哀哭。"列文斯顿带着公正的讽刺口吻叹道："呵，人类的智慧！"他用德文写下的这些笔记（"*Denkwürdigkeiten eines Livländers*"［一个立窝尼亚人的回忆］），是关于 1813 年历史的最有价值的、最无偏见的文献，对于这一年的历史，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和瑞典的不少回忆录的作者曾经多次有意或者无心地说谎骗人。

总之，停战协定签订了。但是拿破仑不相信真能签订他所力图签订的那种条约。而另外的条约他是坚决不会签订的。

不全宁无。拿破仑就是带着这个口号开始伟大的 1813 年的斗争的，并且也是以这个口号继续斗争的。甚至当皇帝已经输掉一切，失去个人的自由，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时候，也从未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流露出半点后悔的意思，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根本不是错误。他嘲弄地说道："如果我不是我自己，而是我自己的孙子的话，我也可能是战败而归，在损兵折将之后再统治下去。"他还有几次阐明过自己的这个意思，说明自己与根据继承法而登王位的君主之间的区别。

在经历了几乎使全法国的居民都陷于失望境地的莫斯科进军的痛苦之后，巴黎以绝对服从的行动来迎接拿破仑。如果拿破仑在取得光辉胜利的 1813 年春季战役后回来的话，巴黎更会这样迎接他，当时他会保持住自己一切巨大的领地，只不过放弃了在遥远的巴尔干的、不必要的伊利里亚，牺牲了华沙大公国和莱茵同盟，在那些地方他甚至不是亲自进行统治，而是通过根本没有并入他的帝国版图的附庸国进行统治的。但是，他知道这些让步，这种放弃建立世界帝国的想法，就意味着英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完不成自己的任务，法国的商业和工业就仍然没有力量与英国的工商业进行斗争，1811 年的危机就会成为周期性的现象，失业

的现象就会依然如故，不害怕枪弹的"饥肠辘辘的革命"就会在工人集中地点、在首都和省里扎根，而他——资产阶级在反对英国的经济斗争中的可靠的、强有力的领袖，干脆就会被资产阶级所抛弃。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要再忍受他的空前未有的专制制度呢？但是要他用另外的方式进行统治，他是既不愿意，并且天生就不会的。就是这些理由，迫使拿破仑（正是在梅特涅竭力劝说他放弃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而费尽口舌的那几个月里）把达乌派到那里去，并且带有他的关于枪毙和没收的严厉的命令。就是这些理由促使他想到的不是和平和回到巴黎，而是重新进军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就是这些理由使他把在布拉格进行的谈判变成了一场喜剧。有人叫他让出汉堡，而他却想到涅曼河；有人建议他放弃伊利里亚，而他却仍然未从土耳其、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召回自己的间谍和侦探，这些人是他在进攻俄国之前派往那些地方去的。这种争论不是外交手腕所能解决的，只有大炮才能解决。

事实上，奥国外交界既不希望拿破仑彻底战胜联军，也不希望联军彻底战胜拿破仑，因为那样一来，会使俄国沙皇称霸欧洲。梅特涅希望说服拿破仑让步，于是到拿破仑所住的德累斯顿去，于 1813 年 6 月 28 日到了宫中。

拿破仑一开始就进行威胁，直接斥责奥地利在调停的借口下准备参加同盟。"你说一说吧：你是想同我作战吗？这就是说，都是些不可救药的人！教训对他们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俄国人和普鲁士人不顾惨痛的经验，胆敢在最近一个冬天所取得的胜利之后向我进攻，而我就痛击了他们。你们也想挨打吗？好的，你们也会挨打的。我决定十月在维也纳与你们见面！"

梅特涅很尊敬地、但却十分坚决地反驳道，奥国根本没有这种想法，而是希望巩固的和平。于是他就一五一十地述说条件：如果拿破仑让出伊利里亚、汉堡、不来梅、卢卑克、华沙大公国和放弃莱茵同盟

的保护者的称号，那末其他一切都仍归拿破仑所有。拿破仑大发雷霆。"我知道你们的秘密：你们奥地利人想要整个意大利，你们的俄国朋友想要波兰，普鲁士人想要萨克森，英国人想要比利时和荷兰……如果我今天让步的话，你们明天就会向我要求所有这一切；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你们就得动员千百万人，让几代人流尽鲜血，在蒙马尔特举行谈判！"

梅特涅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他要求这些东西，向他提出来的和平，是荣誉的、光荣的和平。拿破仑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论据：甚至最小的让步都会使他受到屈辱。"你们的君主生来就坐在王位上，不可能理解鼓舞着我的情感。他们战败回到首都的时候，对于他们说来是算不了什么的。而我是一个士兵，我需要荣誉和光荣，我不能以一个被侮辱者的姿态出现在我的人民的面前。我必须仍然是伟大的、光荣的，得到人民的称赞！"

梅特涅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而整个欧洲和法国现在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迫切需要和平。"君主，我刚才从你的团队旁边走过；你的兵士都是一些儿童。你几次提前征兵，把一些尚未发育成熟的人征入军队。当这一代人被现在的战争消灭了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提前征兵呢？是不是还要征召更年青的人入伍呢？"

梅特涅回忆说，拿破仑脸都气白了，把自己的三角帽扔到地上。"你不是一个军人，你们没有士兵的灵魂，我有士兵的灵魂，你们不是住在军营里，你们不习惯于轻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对我来说，二十万人算得了什么？"拿破仑勃然大怒了，当他说一些蛮横无耻的话，想侮辱对手的时候就是这样。"最后，法国人，也就是那些你在这里想保全他们鲜血的法国人，是不会十分抱怨我的。确实，我在俄国损失了二十万人，其中有十万人是优秀的法国士兵，我确实是非常惋惜他们的。至于其余的人，那都是意大利人、波兰

人，主要是德意志人！"他在说德意志人这几个字的时候，做出了鄙夷的手势。梅特涅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君主却要同意，这不是同德意志人谈话时应该举出来的论据。"

当然，在作出这样的声明之后，谈话不会有任何结果。拿破仑开始嘲笑奥国夸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于梅特涅提出的让他按照上述条件在外交上进行调解的要求，则大声叫喊道："啊，你还要坚持！你终究是想对我口述法律！啊，梅特涅！——皇帝愤怒地大叫道——你说说，英国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扮演这个角色来反对我？好吧，让战争爆发吧！再见吧，我们在维也纳再见吧！"

当梅特涅告辞出来走进大厅的时候，贝尔蒂埃元帅问他谈判的结果(贝尔蒂埃本人是迫切希望和平的，认为条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光荣的)，梅特涅说道："我向你发誓，你的君主丧失了理智！"

尽管发生了这场戏(并且拿破仑当时还说，他对奥地利是很宽大量的，娶了玛丽亚·路易莎作妻子，而这从他那一方面说来，是一个错误)，拿破仑在不正式承担任何义务的条件下，终于同意由奥地利进行调停。于是，应梅特涅的邀请，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于 1813 年 7 月 12 日到了布拉格，毫无结果的谈判一直拖下去。拿破仑的军队加强了，但是总的政治形势明显地变得不利了。同时，传来了一系列关于法军在西班牙失利的消息。英军和西班牙的游击队把法军逼退到比利牛斯山。维托利亚的战斗是以英军总司令威灵顿的大获全胜结束的。

拿破仑事先就知道，布拉格的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也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于是他把事情拖延下去。俄国和普鲁士的全权代表和梅特涅本人觉得这种拖延是对他们的侮辱，使他们很生气。他们从 7 月 12 日起就到了布拉格，而法国人却始终没有到来，并且用各种办法来阻挠谈判。

但是，在梅特涅与拿破仑的谈话之后，奥地利的动摇停止了。梅

特涅直截了当地对法国代表纳尔博纳说，如果布拉格会议在停战期限到期即 8 月 10 日以前还不召开的话，奥地利就要参加联军。

从所有这些毫无成果的谈判之中什么也没有得到。拿破仑事先就对纳尔博纳伯爵下了命令：一、把事情拖下去，不要开会；二、如果他们已经在开会的话，那就不作任何让步；遵循一句拉丁成语所表达的外交原则："谁占有什么，就让他留下什么。"

纳尔博纳、科兰古、富歇、萨瓦里、贝尔蒂埃，几乎所有的元帅都劝皇帝签订和约。但是一切都是枉然。被拿破仑封为罗维戈公爵的警务大臣萨瓦里大胆地对皇帝说，人民已经被连年不断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最后很可能甚至对自己所尊崇的君主发起脾气来。拿破仑作出的回答是，命令警务大臣闭咀，"不要干预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8 月 10 日停战期限满期了，而 8 月 11 日梅特涅就声明说，奥地利对拿破仑宣战。

伦敦和俄普联军欢欣若狂。联军方面的力量现在显然已超过了拿破仑的力量。

三

1813 年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了。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不断地征募新兵。调来了后备队伍，集中了一切力量。英国重新打开自己的金库，毫不吝惜黄金，用来支援联军，正如它不惜资金来加强威灵顿在西班牙的军队一样。现在，联军加上后备部队，人数几乎达八十五万人，而拿破仑的军队（也加上后备部队）将近五十五万人。

联军总司令是奥国元帅息瓦琴堡。拿破仑一点也不怕他。俄军已经没有库图佐夫，也没有巴格拉吉昂了，而对于其余很多俄国将军，拿破仑在 1812 年之后并不比以前更尊敬他们。他对于斯摩棱斯

克和博罗迪诺战斗的若干参加者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但是他对于俄军司令部的总评价却很低。例如，他认为他从莫斯科撤退时俄军的指挥是十分荒谬的。他坚决相信，并且一直到死都不断地重复说，只是广阔的领土、莫斯科大火、可怕的严寒、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占领莫斯科和长期停留在莫斯科，才使进军遭受失败，而俄国的将军、俄军的战略和战术，要想比较聪明地利用对他们最有利的形势，似乎是根本无能为力的。而现在，1813 年他对俄国士兵的评价，却比 1807 年艾劳之战后他对俄军士兵的评价高得多，也比对所有其他敌对国家的士兵的评价高得多。

至于谈到普鲁士军队，拿破仑认为他们同奥军和俄军一样，根本不是自己在军事艺术上的可怕的对手。但是，他知道：根据贝尔纳多特这位过去是拿破仑的元帅、现在 1813 年是瑞典王储、拿破仑的敌人的劝告，亚历山大一世和盟国的君主都请求莫罗将军来帮助他们。莫罗是一位有才能的将军，1804 年他被召回，被控参加反对拿破仑的阴谋，当时被拿破仑逐出法国。莫罗从那时起就流亡在美国。拿破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莫罗正是在预定于布拉格举行和平谈判的企图失败、军事行动再起的时候到达亚历山大的军营的。"不要进攻拿破仑本人所在的那部分军队，只去进攻元帅们"——这是莫罗将军对亚历山大及其同盟者的第一个劝告。应该说明，根据各种情况判定，莫罗将军的灵魂是不安宁的，虽然他安慰自己说，这不是为反对法国，而是为了反对法国的专制君主而战。俄国将军列普宁公爵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目击者。莫罗遇见了一个法国俘虏，是一个老兵，和他谈话。这位老兵知道了，莫罗是法国的将军，现在帮助法国的敌人。老兵从莫罗身边退后几步，大叫道："共和国万岁！"老兵认为过去的共和国的将军现在成了叛徒，他不愿意与叛徒谈话。亚历山大一世对莫罗将军表现了最大的关心和尊敬，他总是希望让他担任最主要的角色。俄国皇帝认为，第一，只有莫罗一个人在战略方面的才能，才

是拿破仑的旗鼓相当的对手，第二，莫罗投奔到联军的营垒中来，可能引起法军的一些动摇，因为到现在为止，莫罗还享有无可责难的共和国将军的声誉，他是无辜地被牵连到乔治·卡杜达尔的案件中而被拿破仑驱逐出法国的。但是对于法国的士兵群众说来，在现在，法国、皇帝、祖国这些字眼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与敌人、干涉者、保王党人、流亡者相对立的；而沙皇的打算是错误的。从道义上说来，当莫罗将军一投奔到敌人营垒中去，他对于拿破仑的士兵说来，已经不复存在了。亚历山大希望莫罗能够代替息瓦琴堡担任联军的总司令。而莫罗本人建议，由亚历山大担任总司令，他当参谋长，实际上是最高指挥官。但是结果完全不是这样。

战争恢复后的第一场大战是 1813 年 8 月 27 日在德累斯顿发生的。拿破仑在这里获得了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联军方面的死伤和被俘人数将近两万五千人，拿破仑的损失将近一万人。联军的一部分部队秩序井然地撤退，但是有些军团从战场上溃逃，被骑兵跟踪追击。双方都发射大炮，整个战斗是在一千二百门大炮的不停息的轰鸣中进行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联军的左翼已经完全被消灭，居于中心地位的拿破仑直接指挥大炮的发射。在一小块叫做龙尼克斯的高地上，他看见敌人阵地中有一群骑着马的人，他首先命令自己的一个炮兵连向这群人开炮。在这群骑马的人的中心是亚历山大皇帝，和他在一起的是第一次作为联军的指挥官出阵的莫罗将军。拿破仑下令朝这群人发射的最初的炮弹中的一枚，炸断了莫罗将军的双腿。几天之后他就死去了。在法军和联军当中流传着一种传说，似乎击毙莫罗的那枚炮弹，是拿破仑在望远镜中仔细看清楚了"叛徒"之后亲自到炮位那里去发射的。总之，在德累斯顿战斗中联军的部队全军覆没，并且马上又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战略家，这是盟国遭到的另一沉重打击。

在德累斯顿被击溃的联军分几路向鲁特山脉撤退。随后几天，

马尔蒙、维克托、缪拉、圣西尔四位元帅和旺达姆将军乘胜追击，又俘虏了几千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国人。但是旺达姆因太醉心于追击而脱离了先头部队的主力；8 月 29 日和 30 日，在库尔姆的战斗中，旺达姆被打败，受伤，和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一起被俘。

这件事情大大鼓舞了德累斯顿战斗后意气消沉的联军。遭到失败之后坚持不懈，不与拿破仑讲和，——这是莫罗在其突然死亡之前对联军所作的又一劝告。联军看到，如果说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末他的士兵已经不是从前的士兵了。十八、九岁的青年不可能代替那些百战百胜的、钢铁般的军团，他率领他们在埃及、叙利亚作战，他率领他们征服了欧洲；甚至也不能代替同他一起进入莫斯科，战死沙场的那些军队。拿破仑也知道这一点。他看见自己面前还有一个困难。后来一切战略和战术的教科书中都收入的拿破仑的一条经典性的规则是：军事艺术的秘密在于，在必要的地方和必要的时间，使自己的军力超过敌人。而现在，当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在萨克森的战役的时候，他自己却破坏了这个规则。他的最优秀的元帅之一达乌及其统率的一支大军在哪里呢？在汉堡枪毙商人。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对拿破仑非常有用的那些卓越的步兵、炮兵、骑兵的队伍在哪里呢？在但泽，在德国北部，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在西班牙。把这些军队召到自己这里来，就意味着大帝国的毁灭，因为大帝国现在只是靠这些驻军的力量维持的；不把这些军队调来也意味着帝国的毁灭，因为那必然会被联军击败，联军方面在莫罗死后，已经没有优秀的将军，但是士兵的人数却比拿破仑的士兵人数多一倍。

无法解决的深刻的矛盾苦恼着拿破仑。通向柏林的道路是艰难的。贝尔纳多特带领的瑞典军队和比洛带领的普鲁士军队击退了法军师团，在法军师团中有拿破仑的巴伐利亚的、萨克森的以及其他各地的很多附庸国家的士兵，他们一天比一天更不可靠，成百上千的

人临阵脱逃，根本不想为了他们不知道的拿破仑的目的而与其他德意志人作战。8 月 23 日乌迪诺元帅在格罗斯贝伦附近被从进攻柏林的道路上击退。麦克唐纳在卡茨巴克河和通向西里西亚的道路上遭到失败。9月 4 日缪拉进攻布吕歇尔，打得他大败而逃，但是并没有消灭他的军团。9 月 6 日内伊元帅在代纳维茨遭到失败。现在拿破仑对于自己军队中的德国士兵已经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了：内伊必须离职，那只是由于他队伍中的萨克森人没有任何借口就大量逃跑。拿破仑也不满意元帅们。"将军和军官都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他们缺少做出一番大事的那种积极性"。——1813 年 9 月 8 日他写信给军政大臣克拉尔克，命令他加强和供应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堡垒。

9 月没有发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但是拿破仑和盟国希望在冬季之前进行决战。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遍及德意志。道德协会和其他爱国团体组织的志愿的游击队出现了。普鲁士、萨克森、莱茵同盟各国、威斯特法利亚的年青的资产阶级和学生，现在都醉心于把德意志从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

拿破仑加紧准备秋季战役。但是他事先已经估计到，即使他成为胜利者，战争也不会马上结束，因为他坚决不作任何让步，并且了解到，拥有雄厚的后备力量的联军即使遭到失败，也不会自认失败的。于是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在帝国内再征召二十八万青年人，其中十六万人是 1815 年的服兵役者，也就是说，差不多完全是些少年。梅特涅的预言实现了：几乎小孩子也到军营中去了。

从 10 月最初几天起，就开始了敌对两军的复杂的运动，发生了个别的小接触，进攻和后退。拿破仑在这对他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每天策划和想出新的计谋和军事上的狡计的活动是令人吃惊的。

在这期间，俄军攻入热罗姆·波拿巴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国王逃跑了。巴伐利亚脱离与拿破仑的同盟，而加入了联军方面。拿破仑必须尽快进行决战，并且取得胜利。他说，他不能不知道，附庸国

不管未来战斗的结果就已经叛变他这件事情具有何等可怕的意义。

1813 年 10 月 16 日，在莱比锡附近的平原上开始了一场在整个拿破仑时代最大的战争，当时在德国把这场战争叫做"民族战争"。10 月 16 日、18 日、19 日三天，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场上同由俄军、奥军、普鲁士军和瑞典军组成的联军作战。在他的军队中，除了法国人以外，还有波兰人、萨克森人、荷兰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和莱茵同盟各国的德意志人。在战斗开始的时候，拿破仑有十五万五千人，联军有二十二万人。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总的说来，双方都沒有动摇，战斗幷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第一天，拿破仑损失了差不多三万人，联军损失了将近四万人。

人们都在等待第二天。整个夜晚，拿破仑和联军的增援部队都源源而来。但是在第二天战斗之前，拿破仑得到的增援部队人数是一万五千人，而联军得到的却是从北方来的贝尔纳多特和本尼格森的十一万军队。清晨，拿破仑在缪拉的陪伴下巡视昨天的战场。缪拉对拿破仑指出，从博罗迪诺战斗以来，还沒有过这么多战死的人。拿破仑在 10 月 17 日早晨这几小时想到撤退，但是最后决定留下来。他命令把昨夜俘掳的奥国将军梅韦尔德带到他这里来。他开始和梅韦尔德谈到与奥国媾和的问题。梅韦尔德说，他知道奥国现在还是希望媾和的，如果拿破仑"为了全世界和法国的幸福"而同意媾和的话，那末，和约马上就可以签订。

10 月 17 日整天都是在收拾伤员、准备继续战斗之中度过的。拿破仑经过长久的动摇之后决定撤退到萨尔河线上。但是他还沒有来得及把自己的意图付诸实现，在 10 月 18 日拂晓就爆发了新的战斗。力量对比大大改变了，变得有利于联军。联军在 10 月 16 日损失了将近四万人，但在 10 月 17 日和 17 日夜晚得到了大量援兵，在 18 日的战斗中，联军的人数比拿破仑军队的人数几乎多一倍。10 月 18 日的战斗比 16 日的战斗更激烈，幷且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突然全部

萨克森军队（是被迫在拿破仑的军队中作战的）都转到联军方面去了，并且马上掉转炮口，向他们刚才还在其队伍中作战的法军射击。但是拿破仑不顾所处的绝望的境地，以更加奋发的毅力继续战斗。

当黄昏到来的时候，战斗也沉寂下去了，双方又对峙起来，没有决定性的结局。但是 18 日夜晚，决定性的结局到来了。拿破仑在遭受了新的可怕的损失和萨克森人叛变之后已经再也不能支持。他决定撤退。撤退是在夜晚开始的，并且 10 月 19 日整天也在继续撤退。拿破仑且战且退，从莱比锡退出，在莱比锡城外受到联军的压力。战斗是特别激烈的，因为在城内和城郊的街道上以及在桥梁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一大群一大群撤退的军队。拿破仑下令在撤退的时候炸毁桥梁，但是工兵由于错误而把桥梁过早地炸毁了，将近两万八千名士兵没有来得及渡河，其中有波兰人。他们的首长，波兰军团指挥官波尼亚托夫斯基企图骑马渡过艾尔斯特河的时候受伤淹死了。但是，追击很快就停止了。拿破仑带领自己的军队撤出，向莱茵河前进。

10 月 16 日至 19 日，法军总共损失至少六万五千人，联军也损失将近六万人。过了好些日子，身受重伤的士兵的可怕的嚎叫声还响彻莱比锡战场，尸体的腐烂使整个地区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恶臭。清扫战场的人员和治疗断臂折腰的伤兵的医务人员都大大不够。

四

拿破仑从莱比锡退往法国边境，退往拿破仑侵略开始以前把法国和德意志各国分开来的那一条界线，即莱茵河线。在法国的绘画中，正是这个时刻和 1814 年初的事件，不止一次地成为画家的题材，同时，他们注意的中心是拿破仑。梅索涅的天才的画笔捉摸到了皇帝的情绪。他骑着战马在自己的掷弹兵中间走着，愁眉不展地凝视

着掷弹兵的眼睛所看不见的某种东西。在 1813 年 10 月末和 11 月初的这些日子里，在萨克森战役结束和法国战役开始之间，在这个人的心里展开了巨大的、无疑是痛苦的斗争，他没有把这场斗争告诉给那些走在人数日渐减少的老近卫军骑兵掷弹兵队伍中间的他的随从人员，但是这场斗争却反映在他的严峻的脸上和抑郁的眼睛里。

拿破仑初次必须了解到，大帝国崩溃了，各色各样的国家和民族的结合体已经瓦解了，这个结合体是他多少年来竭力用火与剑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缪拉与他诀别了，缪拉是他的元帅，他的骑兵司令，很多次战斗中的英雄，他亲自封他当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到那不勒斯去了，拿破仑知道，他到那里去的目的是叛变，并且已经秘密地转到盟国方面去了，以便保存自己的王位。他委派为西班牙国王的他的哥哥约瑟夫，被英国人和西班牙起义者赶出了比利牛斯半岛。他的另一个兄弟、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从卡塞尔出走。达乌在汉堡被俄军和普鲁士军围困。法国在荷兰的权力动摇了。在没有使法国领土缩小到从前的规模以前，英国、俄国、奥国和普鲁士是不能放心的。他所建立的大帝国即将寿终正寝，它已经在消失了。

他还有将近十万人，其中四万人是全副武装的，其余的人还需要加以装备和训练。他还有在但泽和汉堡的守卫部队，以及分散在还服从他的欧洲各地的部队，——共有十五万至十八万人。1813 年入伍的、本来应该在 1815 年应征的年青的新兵在军营中加紧训练。

拿破仑还没有放下武装。他想到即将到来的新的斗争阶段，并且打破自己的苦闷的沉默而和元帅们交谈，后来他这样做了，是为了发布新的命令。他决定现在把教皇放回罗马；他允许被他关了五年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七世回到西班牙去。

只是在双方在莱比锡战场损失十二万五千人，而主要的是从莱比锡撤退之后，拿破仑才不得不最后同意这种看法，那就是他已经不能靠挥戈一击的办法补救已发生的一切，既不能补救博罗迪诺，莫斯

科大火，大军在俄国冰雪中的覆灭，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脱离，也不能消灭莱比锡、西班牙的民族战争，也不能把威灵顿和英国赶到海里去。在可怕的 1813 年的 6 月、7 月和 8 月，他还能够对梅特涅大叫大嚷，对他顿足．问他从英国人那里拿到多少钱，侮辱奥国皇帝，挑拨奥国，撕毁和约，当有人提到在南方让出伊里利亚或者在北方让出汉撒同盟各城市时他就暴跳如雷，继续烧毁没收的英国货物，枪毙汉堡的议员们。——总之，他的所作所为，似乎 1812 年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俄国回来的，似乎现在 1813 年所谈的，只是惩罚发动暴乱的普鲁士。但是在莱比锡战斗之后，他已经接近了旧法国的边境，不可胜数的敌人团队尾追不舍，他必须改变自己所有这些政治思想上的习惯。问题已经是敌人要攻入法国，要保卫自己本国的领土。

在去莱茵河的路上，他在哈瑙（10 月 30 日）还必须手执武器冲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军队，当 1813 年 11 月 2 日皇帝进入美因兹的时候，他只有将近四万名能够战斗的士兵。其余许多进入美因兹的人，都是没有武器的、精疲力竭的、生病的人，这些人虽然还被算在军队内，其实完全可以大胆地不必计算了。

11 月中旬拿破仑到了巴黎。1813 年的战役结束了，1814 年的战役开始了。总结起来，法国可以看见，继 1812 年大军损失了五十万人(约数)之后，1813 年又损失了几十万士兵。

但是战争却越来越激烈，大炮已在法国的边境轰鸣。国内又发生了与 1811 年上半年帝国的经济危机相类似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一次没有、也不可能有以政府补助金减少失业现象的企图，也不存在迅速消除失业现象的希望。1813 年，当拿破仑还在德国作战的时候，巴黎的警察已经发现（并且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早在 1811 年就已经含蓄地在谈论的现象：工人们在明目张胆地发牢骚、发怒，据警察报告，他们开始在说"叛乱的话"了。

郊区的工人们由于受到长期的军事独裁制度的残酷压迫，几乎有十八年以上（从 1795 年的芽月和牧月起）没有进行过有组织的发动，但是随着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增加，他们也开始发牢骚了。但是，在 1813 年，事情终究没有发展到在首都工人区举行起义，没有发展到使人想起很久以前的芽月和牧月的行动，甚至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不仅是由于特务机构还在富歇手中就已组织得十分完善，后来又得到他的后继者罗维戈公爵萨瓦里的支持；这不仅是由于公开的警察人员为数甚多，骑兵巡逻队日以继夜地在全城各处巡行，特别是在市郊圣·安杜安和圣·马赛尔，在姆弗塔尔街，在汤普尔区巡行；这也不是由于缺少造成工人群众反对政府的最痛苦、最愤怒的感情的原因。这些原因是有的。拿破仑制定了使工人处于直接依赖地位的"工人手册"，这些手册使工人完全受主人的摆布；拿破仑每年都要求血税，起先是成年人的血税，后来是十八岁的青年的血税，他把几十万名成年人和青年埋葬在遥远的世界战场上；拿破仑甚至扼杀工人任何一点保卫自己不受主人剥削的可能，因此他没有任何权利得到工人群众对他的好感。

但是现在，当敌军象革命初期时候一样向法国边境逼近的时候，当敌军是想来恢复贵族的统治，让波旁王室重登王位的时候，工人中间笼罩着惘然若失和大惑莫解的情绪。嗜血的大权独揽的专制者的形象突然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可恨的保王党的妖魔鬼怪，这些流亡者叛徒又登上了舞台。他们躲藏在外国军队的车队里，重新回到法国和巴黎，他们事先就幻想着恢复革命前的制度，并且谴责革命所创造的一切。

怎末办呢？在拿破仑的后方举行起义吗？这会帮助敌人使法国屈服于它的意志，使波旁王室复辟。

1813 年末和 1814 年初工人群众都没有举行起义，虽然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工人群众从来不象在这个时期中那样受苦。

资产阶级的情绪就完全不同了。大部分工业家还是准备支持拿破仑。他们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英国希望什么，等待什么，如果拿破仑遭到失败的话，他们要与国内国外的英国货的走私进行斗争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家、交易所早就抱怨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制度中的专横现象使他们无法活下去、无法进行工作。国外市场早已大大缩小了；现在国内市场也同样急剧地缩小了。款项是有的，但是却"隐藏"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人都看见了这种现象。金融大王们对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会停止战争的希望已经消失了，而当大军在俄国惨败，特别是当布拉格和谈失败和莱比锡战役以后，皇帝必然失败的想法不允许再想到任何稳固的信贷、商业协定、大批的定货和成交了。焦急、痛苦、灰心和愤怒的感情笼罩着这（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拿破仑。

至于农村，拿破仑在那里还能找到支持。拿破仑的不断的征兵，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使法国农村荒芜了，然而私有者的农民（除了旺代的以外）特别害怕会使他们遭到侵袭的政治上的变动。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说来，波旁王室意味着封建制度的复辟，意味着领主的权力，土地的不自由，夺去资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时期所买的教会的以及流亡者的被没收的土地。农民害怕失去自己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的对自己土地的绝对的统治权，准备继续忍受拿破仑的侵略性的、掠夺性的对外政策的一切后果。对于农村说来，拿破仑比旧的封建制度要容易忍受些，因为封建制度要使波旁王室卷土重来。

最后，还有为数不多的，但是有影响的一伙人：旧的和新的贵族。当然，旧贵族（甚至为拿破仑服务的那部分旧贵族）对波旁王室的接近，始终是胜过对拿破仑的接近。新贵族——拿破仑所封的元帅、伯爵、公爵、男爵，皇帝厚赏给他们金银珠宝和各种恩赐，他们也远不是一致地支持皇帝的。他们根本厌倦了他们必须过的那种生活。他们渴望享受自己的物质财富，就象真正的贵族应该做的那样：受人尊

敬，过得很舒服，让自己不久前的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成为愉快的回忆。"你不希望再打仗，你想在巴黎散步！"——1813 年皇帝愤怒地对自己的一位将军说道。"是的，陛下，在我一生中我本来就很少在巴黎散步！"——这位将军痛苦地回答说。生活在野营中，永远处于危险中，冒着枪林弹雨，更主要的，是永远都要与死亡进行赌博，这种生活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和厌倦，甚至最勇敢、最坚强的，如麦克唐纳、内伊、奥热罗、塞巴斯蒂阿尼、维克托，最忠诚的，如科兰古或萨瓦里，都开始倾听塔列朗和富歇的暗示和诽谤，这两个人早已暗中不声不响地、耐心地、仔细地准备叛卖活动。

这就是 1813 年春季十分顺利地开始的战役于 10 月 16 日至 19 日在莱比锡遭到失败后的情况和情绪；拿破仑于 11 月到了巴黎，着手准备新的力量，以迎击向法国推进的欧洲各国的进攻。

五

"我们去打外祖父弗兰茨。"娇小的罗马国王带着三岁小孩的严肃神情重复地说道。这句话是非常宠爱自己儿子的拿破仑教他说的。皇帝听到这些话以后大笑不已，小孩象鹦鹉似地学舌，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同时，随着联军向莱茵河岸逼进，外祖父弗兰茨非常犹豫不决，并且越来越拿不定主意了。不仅是他，就连他的指导者和鼓舞者梅特涅大臣也是如此。

当然，问题不在于家族关系，不在于拿破仑娶了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子，而拿破仑的王位的继承人是弗兰茨一世的外孙。有另外的原因使奥国的外交界远不是那样直线地来看所希望的战争的后果，而英国人，或者亚历山大一世，或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是这样看的。在英国看来，拿破仑是英国所有的敌人中最不能和解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一千五百年历史中仅遇的敌人。只要

有他在，法国与英国之间就不能有比较长期的和平。在亚历山大看来，拿破仑是一个侮辱过他的人，但是除此以外，他又是唯一能够在最近适当的时期复兴波兰的君主。至于说如果拿破仑仍然留在皇位上，他就会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给自己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亚历山大对这一点是丝毫也不怀疑的。

普鲁士国王在更大(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持着这同一个理由。可以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被一种力量强迫在 1813 年 3 月对拿破仑作战的，威廉三世从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起，直到莱比锡的战斗止，一直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与亚历山大争吵，特别是在卢岑、包岑、德累斯顿的失败之后：“我又在维斯杜拉河上了！”——他绝望地重复着。莱比锡也沒有使他十分安下心来。这种近乎迷信的对拿破仑的万分恐惧，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甚至在莱比锡战役以后，在几乎全部占领的地方都失去以后，当法国后方已经精疲力尽，一部分地区已经表示不满的时候，拿破仑还是那样可怕，以至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不能不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一当战争结束，退出同盟的时候，他这位普鲁士国王又要与拿破仑这样的邻居住在一起了。

奥国沒有英国、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所持的理由，即认为如果这一次同盟让拿破仑留在皇位上，那末 1812 年和 1813 年所流的血全都是白流了。梅特涅根本不希望俄国在西方沒有一个应有的对抗力量。他希望在欧洲仍然能有拿破仑，他对于奥国已经不可怕了，但是对于俄国却很不愉快，因为他可能成为奥国的盟国。

梅特涅和弗兰茨一世又决定再与拿破仑谈判。梅特涅能够十分有力地以奥地利退出同盟的威胁来恐吓同盟者，于是他迫使英国、俄国和普鲁士同意再向拿破仑提出，就下列条件举行和谈的建议：他放弃占领的地方(本来就已失去了)并且停止战争；给他留下来的法国的疆界是法国根据 1801 年吕內维尔和约所有的疆界(只有很少的变动)。盟国的君王都聚集在弗兰克福。梅特涅把以前在弗兰克福

的现在被阻留在那里的法国外交官圣埃尼昂请来，出席的还有英国代表阿伯丁和俄国代表涅西利罗季耶(涅西利罗季耶当场宣称，他也代表普鲁士宰相哈登堡的意见)，他们委托这位法国外交官去见皇帝，向他转达同盟各国的和平建议。

1801 年的呂內维尔和约当时是战争取得胜利后签订的。因此，给拿破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国家，这是法军在马伦哥和戈根林顿战役中获胜后他在 1801 年建立的。在 1812 年和 1813 年的惨败之后，受到联军侵入法国的直接威胁，已经濒于深渊边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得救的机会。拿破仑仍然是头等强国的主宰者。

1813 年 11 月 14 日，圣埃尼昂到了巴黎，带来了同盟国家的建议。

拿破仑不想立即发表意见。他正忙于最紧张的、热火朝天的征召新兵和全面准备新战争的活动。他不大愿意地、带有保留条件地同意开始谈判，同时更加加紧准备新的军队。

他对谁也不讲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他说道："等着瞧吧，等着瞧吧，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和我的士兵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手艺！在易北河和莱茵河之间我们被打败了，由于叛变我们被打败了……但是，在莱茵河与巴黎之间不会有叛徒……"

这些话传遍了法国和欧洲。

在了解拿破仑的人当中，谁也不相信盟国的和平建议会获得成功。每天都有新的部队在皇帝的密切注视的眼光下开往东方，开往莱茵河。大悲剧的末尾临近了。

第十五章　在法国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次退位

(1814 年)

一

在 1814 年，象在 1813 年与欧洲进行斗争时一样，拿破仑完全指靠武器，而且只是指靠武器。但是他懂得，现在，在莱比锡战役以后，在敌人侵入法国之前，自己的行动根本不可能象在 1813 年 7 月、8 月那样，当时他完全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破坏了布拉格的谈判。那时，人家愿意让他不仅保留法国，而且保留除伊利里亚、汉撒同盟各城市、德意志的某些地方以外的全部征服地，保留除莱茵同盟的保护者这个头衔以外的一切权利和称号。他破坏了谈判，因为他想在一击之下就搞垮敌人的同盟。

现在，提出的条件当然更苛刻，但是他仍然知道，农民、工人、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他所建立的整个巨大的官僚社会阶层，以元帅们为首的军队的上层(这是很重要的)，总之，全体人民，人民中的各个阶级，除了个别的例外，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求和平。因此，拿破仑没有直接拒绝圣埃尼昂从弗兰克福带到巴黎来给他的条件，几乎在两个月当中，(从 1813 年 11 月 15 日把条件转达给他的时候起)装出似乎他也希望和平的姿态，但是却用尽一切办法来拖延。他希望(并且有充分的根据)同盟各国自己破坏这些条件，战争重起的罪名不会落在他的身上。他知道，除了奥地利之外，没有一个与他交战的国家希望看见他的统治继续下去，尤其是当安特卫普还留在拿破仑手中的时候，英国就不会认为自己已得到满足。但是根据圣埃尼

昂从弗兰克福带给他的条件，整个比利时(而不仅仅是一个安特卫普)都仍然留在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中。他也不能不知道，他把事情越拖下去，那末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爵士拒绝英国代表阿伯丁于 11 月初在梅特涅的压力下在弗兰克福所承认的那些条件的机会就越多。

但是，暂时还必须装装样子，这一次拿破仑一点也不反对和平谈判，如果需要再招新兵，那末，根本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和平愿望。1813 年 12 月 19 日，议员们听到了皇帝的敕语："从我这一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扰和平的恢复，我了解并且具有法国人的感情，——我是说的法国人——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以荣誉为代价而得到和平。我怀着遗憾的心情要求这个崇高的民族作出新的牺牲，但是这些牺牲是最高尚、最珍贵的民族利益所要求的。我不得不征集大批新兵来加强自己的军队：民族在进行谈判时，只有发挥自己所有一切力量，才能使自己得到安全。"显然，他是不希望和平的。"让后代不会这样谈到我们：他们牺牲了国家的最重要的利益，因为他们承认了英国过去枉费心机地妄图强加在法国头上的法律。"

这就是皇帝对一个月以前各国的和平建议的回答的最后一段话。

1813 年 12 月十一万新兵被召入伍。接着又开始进行新的征兵。拿破仑把议员派往法国各地，他们应该在下列两方面加强地方当局的力量：一、征募新兵，二、征收普通税和特别税来维持军队。

1814 年 1 月已经知道，敌军最后跨过了莱茵河，进攻正沿着亚尔萨斯和弗朗士一孔泰进行，在南方，威灵顿从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侵入法国南部……

拿破仑对他为了上述目的而派往法国各地的、集合在一起的议员说："我不怕承认，我打仗打得太多了；我拟好了一个庞大的计划，

我想保证法国对全世界的统治。我做错了。这些计划与我国的人力不相适应。我本来想使全民皆成为兵，但是我承认，社会生活的进步，风俗的敦厚不让我把整个民族都变成士兵。”如果议员们没有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忘掉了使用语言的才能，他们就会反驳皇帝，说他这些话是过于谦虚了，除了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他已经把整个民族变成了士兵。皇帝接着说：“我做错了，我应该受罚，法国没有一点罪过，它已经为我流了大量鲜血，它没有拒绝为我作任何牺牲。”他认为他自己所作的自我牺牲，就是签订和约，放弃“曾经有过的最大的荣誉”。“为了我的人民的幸福，我牺牲了伟大，这种伟大只有依靠我再也不想要求人民作出的努力才能实现。”

拿破仑很少象这一次那样坦率地谈话。但是他对议员们不大相信。看来，他对议员们的评论是，他们今天是奴隶，明天是卖国贼。他对塔列朗的叛卖已经确信无疑。还在莱比锡战役以后，在 1813 年 11 月，他刚回到巴黎在一次一般的接见中，他走到塔列朗旁边站下来，对塔列朗大叫道：“你来这里干什么？小心点，要想与我的威力作斗争是会一无所得的。我对你说，如果我害了重病，那末你会比我先死。”

但是他并没有枪毙塔列朗，而这位老外交家在一个时期中却提心吊胆，1814 年 1 月，拿破仑甚至要他与科兰古一起去进行谈判，当塔列朗拒绝去的时候，拿破仑甚至举起拳头来威胁。

他也不相信富歇。而在这个时候，他连元帅们也不再相信了。他只相信士兵，但不是相信那些在最近两年被他从家里拖出来的十分年青的小孩子，而是相信老兵。但是剩下的老兵已经不多了，他们的尸骨分布在罗马附近，马德里附近，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在莫斯科和别列金纳之间的地方，在莱比锡附近。他不得不赶忙从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召回还活着的老兵。他毕竟还是希望战斗，而不是和平谈判。

同时，现在在拖延了两个月之后，在已经攻入法国的时候，联军确信法国已经疲惫不堪了，知道法国新征入伍的士兵有很多开了小差，于是决定向拿破仑提出，法国现在的疆界应与 1790 年法国的疆界相同，也就是说，没有比利时、荷兰、萨伏伊，没有在革命战争时期合并的莱茵河左岸的地方。这比联军在 1813 年 11 月提出的疆界所包括的领土要少一些。同盟各国都同意这个新的和约，甚至亲自到联军大本营去的卡斯尔雷爵士也同意。

和谈会议在夏蒂荣召开。当然，在谈判中一无所获。

“我被你送来给我的卑劣的草案（和约草案）所激怒，我认为我已经被他们向我们提出的东西玷辱了，——拿破仑对他派去出席夏蒂荣会议的代表科兰古这样写道，科兰古向他报告说，这是保存皇位和预防波旁王朝在联军的帮助下复辟的最后希望，——你们大家都谈到波旁王室，但是我情愿在合理的条件（和约条件）下在法国看见波旁王室，而不愿意接受你给我送来的卑劣的条件！”

战争而且只有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夏蒂荣的会议毫无结果就散了。但这已经是在拿破仑反对联军的绝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了。

1814 年 1 月 24 日夜晚，拿破仑必须到军队里去。他任命自己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为帝国摄政王。如果拿破仑一旦死去，他的三岁的儿子罗马国王就应该在母亲继续摄政之下马上即位。拿破仑十分喜欢他的小宝贝，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象爱这个小宝贝那样爱过任何人。了解拿破仑的人甚至根本想不到他能那样地去眷恋别的任何一个人。拿破仑的一位私人秘书梅内瓦尔男爵说，不管皇帝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在忙什么，在写什么，在炉边看什么，——他的儿子总不离开他的膝前，不想离开他的办公室，却要求父亲与他一起做扮小兵的游戏。在整个皇宫中，只有他一个人一点不怕皇帝，并且觉得自己是父亲办公室里的最有权力的主人。1 月 24 日拿破仑整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一些紧急的事情，在出发去作这次决定性的战

斗之前，在去迎接起来反对他的整个欧洲的可怕的战斗之前，这些事情必须办妥。他的儿子象平常一样，骑着小木马在父亲的身边玩耍，也许因为他讨厌父亲忙于处理公文，就拉父亲的外衣的后襟，要父亲注意他。皇帝把他抱在手里，把他抛在空中再接住。小小的罗马国王欢喜如狂，不住地狂吻自己的父亲。但是夜晚到来了，他被带去睡觉了。在早上三点钟的时候，这一晚在儿童的寝室值夜的保姆看见拿破仑突然悄悄地(“à pas de loup”)进来了，他不知道别人已经看见他。他进来之后，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熟睡的孩子的床前，目不转睛地、长久地注视着他的儿子，然后走出去。一分钟之后，他已经坐上马车，到军队去了。此后，他再也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儿子。

二

新兵的训练工作尚未结束，招募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能够用来作战的士兵只有将近四万七千人，而入侵的联军人数将近二十三万人，并且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军队正从各路前来增援。元帅们(甚至内伊)差不多都泄了气。只有拿破仑仍然斗志昂扬，并且力图也为元帅们打气。目击者说：“他精力充沛，变得年轻了”。

到达维特里的第二天即 1 月 26 日，拿破仑把元帅们的兵力集中到自己这里来，把布呂歇尔赶出了圣·笛瑟。从这里，拿破仑探出了布呂歇尔军团的调动情况，派出自己的军队去进攻布呂歇尔和俄国沃斯汀·萨肯的军团，1 月 31 日在布里埃纳附近，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取得了新的胜利。这大大鼓舞了在拿破仑到来之前灰心丧气的士兵。

布呂歇尔战败之后立刻赶到奥布河岸的巴尔，在那里集中了施瓦岑堡的主力。联军在肖蒙与奥布河岸的巴尔之间共有十二万二

千人。

拿破仑这时的士兵人数只有三万多一点，但是他决定不后退，而是迎接战斗。拉洛特尔的战斗是2月1日清晨开始的，继续到上午十点钟。在这场战斗之后，拿破仑在并未受到任何人追击的情况下渡过了奥布河，2月3日进入特鲁阿城。

拉洛特尔的战斗给法国人留下了一个差不多打了胜仗的印象：拿破仑对人数上超过他的军队三四倍的力量进行了十分顺利的抵抗。但是情况毕竟是十分危急的，增援部队来得很少，同时他们来得很慢。内伊、麦克唐纳、贝尔蒂埃、马尔蒙都认为，皇帝宝座的唯一救星就是和平谈判，当夏蒂荣会议毫无结果而散的时候，元帅们都完全泄气了。

但是，随着危险的增加，拿破仑却更加精神抖擞了。还在1812年的时候，元帅们已经看见拿破仑有些发胖了，疲倦了，他的军事天才减弱了。但是现在，在1814年2月和3月，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波拿巴将军，征服意大利和埃及的年青的英雄。似乎没有进行过十五年的统治，没有发生接连不断的血战，没有对巨大的帝国和附属的欧洲进行专制的控制。他为元帅们打气，激励士气，安慰留在巴黎的大臣们。2月10日，在经过几天迅速的行军之后，他攻击驻扎在尚波贝尔附近的奥尔苏费夫的军团，并且把它击溃。一千五百多名俄军士兵被打死，将近三千名(包括奥尔苏费夫本人在内)被俘，其余的逃跑了。

拿破仑在晚上对自己的元帅们说："如果明天我同今天一样幸运的话，那末我在十五天当中就会把敌人赶到莱茵河，而从莱茵河到维斯杜拉河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天他从尚波贝尔转往蒙米赖，那里驻有俄军和普鲁士军队。蒙米赖的战斗是2月11日发生的，结果又以拿破仑取得辉煌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一天，在联军旗帜下作战的两万名敌军，损失了

将近八千人，而拿破仑的损失还不到一千人。联军赶忙退出战场。在这次战斗之后，拿破仑立即前往沙托切里，该处驻扎着将近一万八千名普鲁士军队和将近一万名俄军。“我又遇到了意大利战争中遇到的笨伯”。——拿破仑回想起自己在 1796 年取得的迅如闪电般的胜利而大叫。

军事评论家认为，从皇帝的战略造诣的观点来看，1814 年的战役是拿破仑史诗的最杰出的部分之一。

2 月 12 日的沙托切里的战斗的结果，又是拿破仑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如果不是由于麦克唐纳元帅的错误的行动和迟到，在沙托切里作战的联军就会全军覆没。2 月 13 日布呂歇尔击退了马尔蒙元帅。但是在 2 月 14 日，赶来增援马尔蒙的拿破仑在沃尚战斗中又把布呂歇尔击败了。布呂歇尔损失了将近九千人。增援拿破仑的部队赶来了，联军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可是皇帝的处境仍然是危急的；联军的兵力大大超过他的兵力。但是拿破仑的这些出乎意料的、每天都不断获得的胜利使联军十分不安，以致被任命为总司令的施瓦岑堡竟派副官到拿破仑的军营中去请求停战。两次新的战斗——摩尔曼之战和维尔纳夫之战，也是法军获得胜利，这促使联军采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步骤：请求停战。拿破仑不肯亲自接见施瓦岑堡派来的人，而把信收下了，却迟迟不作回答。

“我抓了三万名至四万名俘虏；我俘获了两千门大炮和大批将军”。——他写信给科兰古，同时还说，只有在让法国保有它的“自然疆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的基础上，才能与联军和解。他不同意停战。

2 月 18 日在蒙特罗发生了新的战斗，联军又有三千人伤亡，四千人被俘，并且被击退。

甚至根据敌人的观察家和回忆录作者的评述，拿破仑在 1814 年这次看来完全没有希望的战争中大显身手。但是士兵很少，而元帅

们(维克托,奥热罗)疲惫不堪,犯了很多错误;因此,拿破仑不能完全利用当时意外的辉煌的胜利。拿破仑愤怒地、急躁地责备元帅们,催促他们。“奥热罗,你向我举出的理由是多么可怜!我用刚穿上军装的新兵就消灭了八万名敌人……如果你以六十之身感到劳累不堪的话,那就交出指挥权吧!”“皇帝无论如何不想懂得,并不是所有他的部下都是大大小小的拿破仑”。——他的一位将军后来回忆起这个时期时这样说道。

施瓦岑堡召开军事会议,探问亚历山大皇帝的意见、普鲁士国王的意见、奥国皇帝的意见,并且决定再向拿破仑建议停战。

列支敦士登是奥国最有名的领主公爵之一,他带着关于停战的新建议被派往拿破仑那里去。十分明显,联军是非常不安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非常希望尽快结束,用和解的办法结束战争。

这一次拿破仑沒有拒绝接见联军派来的人。列支敦士登讲话的口气十分和缓,他对拿破仑说,联军确实希望和解,不想把波旁王室扶上法国皇位,但是这一次会见毫无结果。拿破仑正处在辉煌的胜利的顶点,并且正如他当时所设想的,在一系列的战斗中几乎消灭了联军的一半(二十万人之中的八万人),他指靠自己的最完善的军事艺术,依靠它来不断地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塔列朗和另一些人早就在巴黎积极进行与联军的秘密勾结,准备波旁王朝的复辟。联军在波旁王室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克制的,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例如,亚历山大)也会满意拿破仑的儿子、三岁的罗马国王的统治,只要拿破仑本人退位。但是,现在甚至关于皇帝退位的话也不提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法国贵族古沃男爵,他是特鲁阿城的人,向亚历山大一世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援助波旁王室。亚历山大回答说,关于以波旁王朝来代替拿破仑王朝的事情,联军根本还沒有作出什么决定,并且警告这些请愿者(不止古沃一个人)提防他们的请愿会带来危险。几天之后,拿破仑进入特鲁阿城,古

沃被逮捕交付战地军事法庭，并被枪决。

亚历山大一世后来有些惊异，他在法国农村中看不见有人想从拿破仑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相反地，弗日山的农民，洛林——在南方——的尤拉附近的农民，甚至开始攻击联军的掉队的士兵，并且对入侵的敌人表现出一定的仇恨。在这里有对敌军士兵抢劫农民财产的抗议，有对联军会“在自己的大货车中”带来波旁王朝的复辟和恢复革命前的领主制度的恐惧。拿破仑很快就觉察出这一点。他对元帅们写道：“必须以 1793 年的决心来作战”。

联军尽管遭到失败，但是并未泄气。这一次的赌注下得太大了。看来已经完全崩溃的拿破仑竟然取得了这些惊人的、接二连三的辉煌胜利，这迫使联军不安地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早就一致认为是世界史上第一位统帅的这个人仍然留在皇位上，生聚养息，集合新的力量，那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一两年之后，谁还能制伏他呢？

3 月初皇帝已经有七万五千多人，其中四万人是作为掩护队来进攻后退的施瓦岑堡，三万五千人是用来与布呂歇尔作战的，布呂歇尔在拿破仑追击他的时候几乎丧命，只是由于司令员苏瓦松的错误（他交出了城市）才得了救。

但是，布呂歇尔免于被俘之后，并未逃出战斗：3 月 7 日拿破仑在克拉纳赶上他，并且把他击败了；布呂歇尔在遭到惨重损失后，逃往拉昂城。拿破仑想把他从拉昂的阵地赶出（3 月 9 日和 10 日）的企图未能得逞。他暂时放开了布呂歇尔，沒有能够象自己预想的那样把他杀死。但是这时乌迪诺元帅和麦克唐纳元帅在普罗旺斯地区被击退了，拿破仑给了他们四万名士兵，命令他们追击奥军总司令施瓦岑堡。

3 月 9 日，各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在肖蒙城签订了新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第一，要求拿破仑把法国的疆界恢复到 1792 年以前的疆界，并且完全解放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一切德意志国家，在

它们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不放下武器；第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必须各提供十五万名士兵，而大不列颠从现在起必须每年给联军提供五百万英镑的作战补助金。

联军简直一点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粉碎拿破仑的绝望的抵抗，他仍然象以前一样地不愿听到向他建议的帝国的疆界。

然而他的元帅们却接连遭到了失败。在南方，威灵顿带领英国人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进攻波尔多，击退了苏尔特元帅和絮歇元帅。施瓦岑堡扩大了自己对麦克唐纳和乌迪诺的胜利。

在拉昂之战以后，拿破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而且也没有让自己的军队整休，就去进攻在俄军将军圣普里厄斯特伯爵（革命时期逃亡国外的法国人）指挥下的进入里姆斯的一万五千名俄军和普军队伍。里姆斯战斗（3 月 13 日）的结果，俄军与普军队伍被击溃，军队的一半被消灭，圣普里厄斯特伯爵本人被打死。

但是所有这些新的胜利已经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了，因为联军十分坚定地决不对自己的条件让步，而拿破仑也是同样坚定地决不接受这些条件：宁可失去一切，失去皇位，而不要一个只有旧的疆界的帝国。

根据拿破仑的命令，科兰古在夏蒂荣的和平大会的会议上对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说，拿破仑完全拒绝他们的条件，要求他的帝国仍然保有莱茵河左岸，科伦城和美因兹城，安特卫普和弗兰德里亚，萨伏依和尼斯。于是谈判中断了。

3 月 17 日，波旁王室的代表、塔列朗的密使维特洛尔伯爵到了联军军营，并被亚历山大接见。维特洛尔是从巴黎出发，穿过拿破仑的军队和俄军的前哨阵地到达联军军营的。他为联军带来了这样的消息：塔列朗认为，联军应该赶快进攻巴黎，而不是去追逐拿破仑，并且巴黎在等待联军的到来，只要联军在巴黎一出现，就会宣布拿破仑

被打倒，以路易十八(普罗旺斯伯爵、在革命时期被处死的路易十六的兄弟，早就预先这样称呼自己了)为代表的波旁王朝复辟了。

维特洛尔感到十分震惊，渴望打倒拿破仑的亚历山大竟然根本不认为联军应该干预关于继任者的问题，他这位俄国沙皇甚至认为共和国也不是坏的结局。维特洛尔听了这些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维特洛尔描述这次会见的情形时叫道:“天啊，我们等到了什么呀!”

看来，下面这个消息对亚历山大产生了极大的印象:战争开始具有保卫革命后的新法国不受外国人入侵的性质（这些外国人是想恢复以波旁王室为首的旧制度的)。亚历山大由于了解到这种情况将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仍然十分可怕的、接连取得胜利的拿破仑，所以想让法国、特别是巴黎的“贱民” (la vile populace)不是在拿破仑或者波旁王室这二者当中进行选择，而是在拿破仑或共和国这二者当中进行选择。这是一个巧妙的策略上的步骤。所有这些都是维特洛尔的狭隘的、王室的、正统主义的、流亡者的头脑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因此他也惊异于俄国专制者的法国共和主义。至于波旁王室及其大大小小的维特洛尔根本不了解法国的心情，这一点亚历山大始终是坚决相信的，但是塔列朗通过维特洛尔转送的建议及其未署名的、故意写得文理不通的便笺，亚历山大是十分乐意看见的。塔列朗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维特洛尔在路上可能被拿破仑的宪兵抓住，而根据便笺，尽管是别人的笔迹并且有不少文法上的错误，仍可追查出写便笺的人)，坚决劝告亚历山大和联军直接进攻巴黎，甚至让还未被击溃的拿破仑留在后面或者侧翼。冒险并不是塔列朗这个谨慎小心的叛国者素有的本性，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在巴黎内外，在城市和军队中笼罩着多么厉害的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

3 月 20 日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发生了拿破仑与联军之间的战斗。拿破仑这时在战场上有将近三万人，而联军(施瓦岑堡)在战斗

开始时有四万人，在战斗结束时有九万人。虽然拿破仑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并且确实在几个据点击退了敌军，但是实际上应该认为，从结果来说，这场战斗未分胜负：战斗之后拿破仑不能追击施瓦岑堡及其军队；拿破仑又回头渡过了奥布河，并且烧毁了桥梁。拿破仑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的战斗中损失了三千人，联军损失了九千人，但是拿破仑这一次当然未能把联军毁灭。

联军害怕人民战争，害怕象在英勇的法国革命时期拯救法国不受干涉者侵略和波旁王朝复辟的全民武装……

如果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法兰茨、施瓦岑堡、梅特涅听到拿破仑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之战结束后夜晚和塞巴斯蒂阿尼将军的谈话就会放心了。“喂，将军，你对于目前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我想说，陛下无疑还具有我们不知道的新的办法。”——“只有你眼前看见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但是陛下为什么不想到发动全民族？”——“幻想！这是从回忆西班牙和法国革命而产生的幻想。在革命消灭了贵族和僧侣而我自己又消灭了革命的国家里怎能发动全民族！”

拿破仑正确地了解到：他曾经如此长久地铲除任何关于革命的回忆，任何革命精神的标志，现在，他在绝望地为巴黎而战时，不可能（即使假定他想这样做）让那被他十分长久地和十分成功地践踏和窒息过的法国革命来帮助他。

拿破仑和塞巴斯蒂阿尼将军的这次谈话，正是在亚历山大和维特洛尔谈话后过了三天进行的：拿破仑认为以 1792 年的精神进行全民武装是幻想，当时全民武装的结果是宣布共和国的成立，而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亚历山大正是想使拿破仑在法国人民当中失去任何支持才提出了恢复共和国的主意的。

三

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之战以后，拿破仑企图进入联军的后方，进攻联军与莱茵河的交通线，但是联军已经决定直接进攻巴黎。从俄国哥萨克偶然截获的玛丽亚·路易莎皇后和警察总监萨瓦里给拿破仑的信件中，亚历山大确信巴黎的情绪是这样的：人民决不会进行抵抗，联军进入巴黎就会立刻决定战争全局，以推翻拿破仑来结束这场战争。

联军是在波佐·迪·博尔戈的影响下最后决定直接进攻巴黎的，波佐·迪·博尔戈是科西嘉人，早就是拿破仑的死敌，因此是亚历山大的朋友和亲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之战以后，当拿破仑想摧毁联军后方的消息传到联军军营的时候，波佐·迪·博尔戈说，“战争的目的是在巴黎。如果你们想战斗，你们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因为拿破仑打仗始终都比你们打得好，他的军队，虽然有不满的情绪，但是受荣誉感的支持，只要拿破仑还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会一直战到最后一个人。不管他的军事威力受到多大的震动，它还是强大的，十分强大的，超过你们的威力。但是他的政治威力已被消灭了。时代已经改变了。军事专制制度在革命后的第二天被当作好事情接受下来了，但现在已经在舆论中死亡了……应该力求不是用军事方法而是用政治方法来结束战争……只要你用手指头碰一下巴黎，拿破仑就会被推翻，这样，你就折断了你不能从他那里夺来的宝剑。”至于波旁王室早已被法国完全遗忘了，这一点波佐·迪·博尔戈是相信的，并且把它告诉了联军，而联军本来就是同意这种意见的。联军同意他的下列看法：拿破仑被推翻后波旁王室就成为“可能的”了。亚历山大已经不认为必须谈论共和国了：他知道，不必谈论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能打败拿破仑。于是做出了冒险的决定：利用拿破仑远离在外

的情况(他迂回到联军的后方,其目的正是要使联军远离巴黎),直接进攻巴黎,指望巴黎会发生叛变,这一叛变能在皇帝亲自赶到以前就把首都交给联军。

横挡在路上的,只是马尔蒙元帅和莫蒂埃元帅,以及巴克托德将军和阿美将军;他们总共有将近两万五千人。拿破仑和主力远在联军的后方。3月25日在费尔·山姆平奴阿捷发生了战斗,结果联军战胜了两位元帅。他们退往巴黎。联军的十万大军直趋首都。

3月29日,玛丽亚·路易莎皇后带着年幼的皇储——罗马国王,离开巴黎到不鲁阿去了。

保卫巴黎的法军将近四万名。巴黎一片惊慌恐惧的情绪,军队中也有泄气现象。亚历山大不想巴黎喋血,而是一般地装扮成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巴黎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人和自己伟大的领袖,沒有能力进行抵抗;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沙皇对奥尔洛夫这样说,并且授权他在巴黎出现和平投降的希望时,即予停止战争。残酷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小时,联军在这几小时当中损失了九千人,其中将近六千人是俄军,但是马尔蒙元帅被失败的恐惧所压倒,而且受了塔列朗的影响,在3月30日下午五点钟投降了。

拿破仑是在圣·笛瑟与奥布河岸的巴尔之间进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知道联军突袭巴黎的消息的。"这是很妙的一着,我永远不相信联军方面有哪一位将军能够做这件事情"。——拿破仑在3月27日知道发生的事情后称赞说。战略专家对这件事情的反映首先就是称赞。

他立即带领军队前往巴黎。

3月30日晚上他到了枫丹白露,在这里知道了刚刚结束的战斗和巴黎投降的消息。

他象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十分果断。知道发生的事情后,他沉默了一刻钟,然后对科兰古和他周围的将军讲述新的计划。科兰古

到巴黎去，以拿破仑的名义向亚历山大和联军建议，根据他们在夏蒂荣提出的那些条件签订和约。然后科兰古在各种借口之下，三天之中从巴黎到枫丹白露，然后又从枫丹白露去巴黎，在这三天内，拿破仑不久前留在联军后方的所有一切部队就会（从圣·笛瑟）赶来，那时联军就会被赶出巴黎。科兰古结结巴巴地说道：也许不是军事上的计谋，而是事实上根据在夏蒂荣提出的条件向联军建议签订和约？皇帝反驳说："不是，不是！犹豫动摇已经够了。宝剑会把一切都结束的。不要玷辱我！"

科兰古马上就出发去巴黎，而拿破仑又着手进行紧张的备战工作，这场战争一定会在三四天之后爆发。他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三四天之内，联军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政治措施，不会用这些措施扰乱人心，而使动摇的人加入他们的一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才想出了根据在夏蒂荣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他在两个星期以前十分鄙弃地加以拒绝的）建议签订和约的骗局的。

但是根本什么都不能预防了。保王党人举行欢天喜地的游行来迎接各同盟国家的君主进入巴黎，绝大多数人显出冷淡和顺从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首都会接受强加于它的那个政府。

同盟国家的君主发出宣言，不与拿破仑进行谈判，但是他们承认法兰西民族自己选择的政府和国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科兰古与联军的谈判一无所获。亚历山大直截了当地对科兰古说，法国已经不要拿破仑了，被他弄得精疲力竭了。施瓦岑堡带着悲哀的神情说，拿破仑接连十八年来把整个世界都搞翻了，只要有他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得不到安宁，也不可能得到安宁。人们过去不断地向拿破仑建议媾和，让他保留自己的帝国，而他不作任何让步，现在已经迟了。施瓦岑堡讲这些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就是现在拿破仑也不作任何让步，只是派科兰古作三天谈判，以便让军队赶来枫丹白露。

科兰古回到枫丹白露的时候看见了这样的情景：军队集结在皇帝的大本营前，皇帝预计4月5日就会拥有七万名士兵，并带领他们前往巴黎。

4月4日早晨，拿破仑检阅军队，并且对他们说："士兵们，敌人比你们早来三天，占领了巴黎。必须把他们赶出巴黎。卑鄙的法国流亡者（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饶恕他们，这已成为我们的嗜癖）与敌人联合起来，带上了白色的帽徽。下贱坯！他们会因这次新的罪行而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宣誓，胜利或者战死，要对祖国和我们的军队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我们宣誓！"——士兵们这样回答他。当拿破仑在检阅后回到枫丹白露宫的时候，他在这里遇到的是另外的一种情绪。元帅们愁眉不展，低头不语地站在一旁，谁也不想说话。他们是：乌迪诺、内伊、麦克唐纳、贝尔蒂埃、巴萨诺公爵。

拿破仑要他们说明原因，他们对他说，他们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整个巴黎都吓得发抖，等待皇帝进攻已进入巴黎的联军，因为这次进攻将标志着居民的死亡和首都的毁灭，联军会为莫斯科复仇而放火烧掉巴黎，很难让士兵们在巴黎的废墟上作战。"你们先离开一下，等我叫你们时再来，那时我将告诉你们我的决定"。——拿破仑说。他只让科兰古、贝尔蒂埃和巴萨诺公爵留在自己身边。他生气地抱怨元帅们的动摇和怯懦，缺少对他的忠心。几分钟后，他对自己的元帅们说，他想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年纪甚小的罗马国王，由玛丽亚·路易莎摄政，如果联军同意根据这些条件签订和约，那末战争就结束了，并说他要派科兰古带着这个建议到巴黎去与联军进行谈判。在此之后他马上向他们念了他刚刚拟就的一个文件，文件中谈到，因为同盟国家宣布，拿破仑皇帝是恢复欧洲和平的唯一的障碍，所以忠实于自己誓言的拿破仑皇帝宣布，为了祖国的福利，他准备退位，离开法国、甚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祖国的福利是与他的儿子的权利、皇后摄政的权利和帝国的法律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元帅们热烈地欢迎这个文件。皇帝念完这个文件，拿起笔来，可是在他签名之前突然说道："也许我们能够向他们进攻？我们会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但是元帅们沉默不语。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这些话。拿破仑签署了文件，把它交给他派往巴黎的代表团：科兰古、内伊、麦克唐纳。

在这些日子里巴黎发生了很多事情。塔列朗很快就召集了一部分他相信的议员，让他们投票表示要推翻拿破仑皇朝而承认波旁王朝，而主要的一件事情是，马尔蒙元帅背叛了拿破仑，带领自己的军队退往凡尔赛，这样就投入了塔列朗和由塔列朗领导的（根据联军的愿望组成的）"临时政府"的一边。

亚历山大起先动摇；他和奥国皇帝弗兰茨不十分反对三岁的"拿破仑二世"来统治，但是同盟国君主周围的保王党人坚决要求拒绝拿破仑的建议。当联军知道马尔蒙的叛变以后，他们的动摇停止了。现在，当拿破仑直接掌握的主力离开他之后，他要进攻巴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联军决定把王位给予波旁王室。亚历山大在与科兰古告别时说道："说服你们的统治者使他相信必须服从命运。为了（拿破仑的）荣誉，只要能够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会做的"，——他再次称拿破仑为"伟大的人"。

科兰古告别的时候，联军请他让拿破仑退位，没有提出条件；答应让皇帝保留他的称号，让他完全控制地中海的厄尔巴岛，坚决要求不要延期发出退位诏书。以塔列朗公爵（他已公开倒向联军和保王党）为首的联军和保王党，都有些怕内战和士兵群众，因为士兵群众仍然象以前那样完全服从拿破仑。拿破仑的正式退位能够防止引起混乱的危险。议院的决定这一次没有丝毫道义上的分量。议员们被认为是拿破仑的走狗，他们完全准备出卖自己的老爷，为新主子服务。内伊和亚历山大谈话时叫道："这个可鄙的议会过去总是急忙地服从它现在称之为暴君的那个人的意志！议院根据什么权利在现在

提高嗓门说话？当它必须说话的时候他沉默了：当现在一切都命令它沉默的时候，它怎能讲话呢？”

只有拿破仑本人的话才能结束所有一切令人痛心的不稳定的情况，使士兵、军官、将军和官吏们摆脱旧誓言的约束。各个派别的法国人和联军都这样认为。

四

4月5日晚上，科兰古、内伊和麦克唐纳从巴黎回到枫丹白露。拿破仑在听了他们叙述与亚历山大和联军会见的情形，以及他们关于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劝告之后，说道，他还有军队，士兵们对他是忠心耿耿的。“而且，不久就可见分晓。明天见”。他们走后，他又命令把科兰古叫回来。他在这个晚上的长谈中说到：“啊，人们，人们，科兰古！我的元帅们对马尔蒙那种做法是感到羞耻的，他们带着愤怒的表情谈到他，但是他们觉得很遗憾，因为他在地位方面超过了他们。他们希望（当然不使自己蒙受耻辱）获得波旁王室对他们的同样的好感……”他长久地谈论着在这个决定性时刻背叛他的马尔蒙。“倒霉的人不会知道什么在等着他。他的名字已经蒙受耻辱。请相信我，我不是在想着自己，我的生涯已经结束了，或者接近结束。然而，如果现在我能统治那些被我弄得疲惫不堪的、准备献与别人的心灵，我将会多么满足啊！……我想到法国……哎，如果这些傻瓜不出卖我，我将在四个钟头之内恢复它的伟大，因为，请相信我，联军呆在他们现在的位置上，即以巴黎为后方，面对着我，那是要毁灭的！如果他们退出巴黎以避免这一危险，那末他们就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了……这个倒霉的马尔蒙使这个美妙的结束成为不可能了……当然，也有继续作战和奋起的办法。各处都有消息传到我这里来，说在洛林，香巴尼和布尔戈尼厄，农民们消灭了一些单独的敌军队伍……如

果波旁王室的人出现的话，天知道什么东西会跟在他们的后面……波旁王室——这是外部的和平，内部的战争。请看他们一年后会把国家变成个什么样子！……然而，在目前，需要的不是我，而是另外的某种东西。我的名字，我的形象，我的剑，——所有这一切都引起恐惧。必须投降了。我去召见元帅们，你会看见，当我使他们脱离困难的境地，让他们象马尔蒙那样做，同时并不失去荣誉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

在这个晚上，他对科兰古所说的当然是他自己早就想到的。这时候首先使人看到的，是极度的、难以相信的疲惫不堪，造成这种现象的，是这种血腥的统治，这种不断的、永无终止的死亡的跳舞，这种尸骨成山的大规模的屠杀，这种为了显然不能达到的目的而使整整几代人遭到的牺牲。

“我曾希望法国统治全世界。”—— 1814 年拿破仑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当时不知道，在遥远的后代会产生一个由法国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组成的学派，这些历史学家力图证明，拿破仑一生从未进攻别人，只是进行自卫，实际上他进入维也纳、米兰、马德里、柏林、莫斯科，只是希望以此来保卫“天然的疆界”，在莫斯科河上“保卫”莱茵河。拿破仑自己还没有想到过作这样的解释。他比他们要坦率得多。

他也不知道现代的研究者阿尔培·米尼在不久之前根据一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档案材料所作的准确的统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所进行的战役和进军中，法国公民被打死和失踪的总数是一百多万人（四十七万一千人被打死，当时官方已经正式记载下来，五十三万人失踪，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这个数字当然没有包括那些因为受伤但没有马上在战场上死去，而是稍晚一些时候在军医院中死去的受重伤的和残废的人。

米尼的这些统计没有包括整个拿破仑帝国，而只是“旧法国”，

“旧的省份”，也就是说，甚至不包括拿破仑在 1799 年雾月 18 日掌握政权时的整个法国(因为比利时、皮埃蒙特和革命时期拿破仑在雾月 18 日以前所获得的其他占领地都沒有计算在內)，而只是指具有旧的、革命前的疆界的法国。并且，也沒有统计拿破仑的一切战爭，而只算他从 1800 年起进行的那些战爭(也就是说，上列数字不包括 1796 年—1797 年第一次征服意大利，征服埃及，进军叙利亚时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旧省份”中包括妇女儿童在內的两千六百万居民，在他所进行的战爭中被打死和消灭了一百多万成年男子，——这一点拿破仑可能并不知道得很准确，但是因抽壮丁而荒废的农村他是看见的，他进行的无数次战爭的战场他是看见的。他有时也力图安慰别人(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忧虑就大大减轻了)，在他进行的战爭中，加入他的军队的附庸国和“同盟国”的士兵，那些德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伊利里亚人等等，比法国人的牺牲大得多。

但是，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外国人死亡的有三四百万人，而“纯粹”的法国人死亡的只有一百万人，这并沒有什么值得聊以自慰的(他任何时候都沒有谈到过几百万被打死的、失踪的、残废的敌人)。

现在，在这个漫长的夜晚，他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华丽而沉郁的枫丹白露宫的庄严雄伟的大厅中走来走去地度过的，拿破仑在科兰古面前作了总结，只说出了一个主要的结论：他使法国疲惫不堪了，法国已经虛弱无力了；也许，波旁王朝也不好，也许波旁王室不会长久地坐在王位上，但是现在需要的不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在这 4 月的日子里，别人告诉他，巴黎的商人，巴黎的资产阶级虽然不象贵族、保王党人那样高兴地欢迎联军，但是商人们也大声说他们被战爭折磨够了，破产了。

这一夜他几乎沒有睡觉。1814 年 4 月 6 日早晨他命令召集元

帅，并且对他们说："先生们，放心吧！无论是你们或者军队都再也不用流血了。我同意退位。我多么希望为了你们，也为了我的家庭，让我的儿子继承皇位。我想，假若有这样的结局，这对于你们比对我更为有利，因为你们那时就会在一个与你们的出身、你们的感情、你们的利益相适应的政府的管辖下……这本来是可能的，但是卑鄙的叛变使你们失去了我想为你们保证的这种地位。如果不是第六军团(马尔蒙)的背叛，我们就会达到这一点和得到别的东西，我们就会振兴法国。但是发生了另外的情况。我屈从我的命运，你们也屈从你们的命运。容忍一些吧，在波旁王朝下面生活吧，并且忠实地服务。你们希望安宁，——你们会获得安宁的。但是，唉！即使我的预感错了，但是我们不是为安宁而诞生的一代人。你们所希望的和平在你们的柔软的床上从你们当中夺去的人数，将远比战争在野营中夺去的人数为多，并且也将夺去得更快些。"

拿破仑拿起一张文告，对他们念了下面的话："由于同盟国家宣布拿破仑皇帝是建立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所以忠实于自己誓言的拿破仑皇帝宣称，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都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王位，因为为了法国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任何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坐在桌旁签了字。元帅们都高兴得激动起来。他们吻他的手，尽量恭维奉承他，这在他统治时期是习以为常的。科兰古和两位元帅立刻把这个文告带到巴黎去。

亚历山大和联军带着很大的不安在等待结局。他们得到关于退位的文告后欢欣若狂。亚历山大确定说，厄尔巴岛将立即交与拿破仑完全支配，拿破仑的儿子罗马国王和玛丽亚·路易莎将得到在意大利的独立领地。

一切都结束了。

五

这时，拿破仑的思想又回到 1814 年战争时他无疑地已经多次想过的事情上去了，这次战争从战略的观点看来是十分辉煌的，而从政治上说来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还在 1813 年，元帅们、将军们、军官们、随从们甚至近卫军士兵们都看见，皇帝毫无必要地甘心去冒死亡的危险，并且不象在以前的多次战争（如 1796 年在阿尔科拉桥或 1807 年在艾劳城墓地的战斗）中那样，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军事上的原因必须这样做，而只是完全徒劳无益的举动。

例如，还在 1813 年已经看出，在迪罗克死后，皇帝坐在树桩上，有一个时间一动不动，似乎是四周爆炸的炮弹片的活靶子。1814 年这种奇怪的举动更多了，要错认这种举动的意义已经不可能了。例如，3 月 20 日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战斗中，拿破仑要到——仍然是毫无目的地——他命令士兵离开的战斗地点（因为该处不可能守住）去，埃格泽尔芒将军想阻止皇帝，而塞巴斯蒂阿尼元帅对埃格泽尔芒将军说了大家早就知道的话："让他去吧，你没有看见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吗？他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弹片和炮弹没有击中他。

拿破仑始终认为自杀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显然，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以及 1813 年和 1814 年的很多类似的情况下，他似乎是在同自己开玩笑，在寻死，但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在寻找一种掩饰起来的自杀。

但是，在 1814 年 4 月 11 日，即退位五天之后，当拿破仑已经在枫丹白露宫中整装待发，前往厄尔巴岛的时候，他与这些日子来很多时间都陪伴着他的科兰古道别，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正如后来所知道的，他拿出一个装满鸦片溶液的小瓶子，这个小瓶子放在一个行军用的化妆用品盒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盒子。我们已经知

道，还在 1812 年，在马洛雅罗斯拉维茨战役结束后，由于几乎被俘，就命令尤万医生给他一种强烈的毒药以防万一，他得到了这个装有鸦片溶液的瓶子，一年半以来，他从未把这个瓶子从盒子里拿出来过。

现在，在枫丹白露，他把这个小瓶子拿出来了，并且把里面装的鸦片溶液一饮而尽。

开始了痛苦的折磨。科兰古觉得情况不妙，就跑到拿破仑那里去，他以为这是突然得了急病，想跑去找宫中的医生。拿破仑请求不要去叫任何人，甚至愤怒地命令他不准这样做。痉挛的发作十分强烈，科兰古终于跑出了房间，叫醒了医生，这个医生就是在马洛雅罗斯拉维茨之战后拿鸦片给拿破仑的那个尤万医生。医生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小瓶子，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拿破仑开始抱怨毒药的药性不强或者是毒性减弱了，于是命令式地要求医生马上再给他一些鸦片。医生说，这种罪行他决不再犯第二次，于是跑出了房间。

拿破仑的痛苦继续了几小时，因为他拒绝服解毒剂。他坚决要求不让任何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要死去是多末困难啊！ 而在战场上死去是多末容易啊！ 为什么我没有在奥布河岸的阿尔西被打死！"——他在剧烈的抽搐中说出了这几句话。

毒药并未起到致命的作用，而拿破仑从此以后也再也没有作自杀的尝试，再也没有想起自己的自杀。

准备出发的工作逐渐结束了。根据与联军签订的条件，皇帝可以带领一营自己的近卫部队到厄尔巴岛去。

1814 年 4 月 20 日，准备工作结束了。为拿破仑、他的人数不多的随从以及要陪送他到厄尔巴岛去的同盟国委员们准备的马车，已经停在宫门口了。

拿破仑想同自己的近卫部队告别。近卫部队在宫中的正庭中列

队，这个庭就是现在参观枫丹白露宫的旅行者十分熟悉的那个大庭，它从此以后就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名称“告别庭”(La cour des adieux)。

前面站着老卫队和军官、将军们，后面站着新卫队。当皇帝出来的时候，士兵们举枪敬礼，旗手把老卫队的旗帜放到拿破仑的脚前。

“士兵们，你们是我的老战友，我始终同你们走着光荣的道路，现在我必须同你们分别了。我可能还会留在你们当中，但是那就需要继续残酷的斗争，也许，除了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之外，还要自相残杀，我不能够再去撕裂法国的胸脯了。享受你们应该得到的安宁吧，你们会幸福的。不要惋惜我。我负有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我同意活下去：这个使命就是向后代述说我和你们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想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还是让我吻这个代表你们全体的军旗吧……。”

拿破仑不能讲下去了。他的声音中断了。他拥抱和吻了旗手和军旗，然后与近卫队告别，迅速走出去，坐上马车。马车在近卫部队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声中离去。很多近卫士兵象小孩子一样哭了。

后来，英国的报纸这样描述这一天：“世界历史上最庄严的英勇的史诗结束了——他告别了自己的近卫部队”。

但是，从 1793 年 12 月在土伦开始的二十年来的史诗，实际上 1814 年 4 月在枫丹白露根本还没有结束。

拿破仑注定还要震惊世界，而二十年来使世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吃惊的正是拿破仑。

第十六章 “百日”

(1815 年)

一

在谈论拿破仑一生所有事件中最不平常的事件时，首先必须指出下面这些。不容争辩，拿破仑在初到厄尔巴岛的时候，沒有任何计划，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并且打算按照自己曾说过的那样，来写自己的统治的历史。至少，在他到达岛上后的头半年他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他是十分平静安宁的。拿破仑经过南方各省，那里保王党人以最敌视的方式来对待他，并且如果是在另外的时候，甚至他的生命都可能遭到危害。他于 1814 年 5 月 3 日到达厄尔巴岛。现在，他在孤岛之上了，在陌生的和平居民的中间，这些居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迎接自己的新的统治者。

正好在到达厄尔巴岛以前的三年，1811 年春天，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接见了巴伐利亚人符雷德将军，当时符雷德将军十分恭敬地谈到，最好取消几乎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的对俄国的进攻，拿破仑马上打断他的话，说道：“再过三年，我将是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在这次谈话过了三年之后，“伟大的帝国”已经消逝了，而在拿破仑面前的是一个面积为二百二十三平方公里、有三个小城市和几千居民的小岛。

命运使拿破仑与自己的诞生地离得很近：厄尔巴岛大约离科西嘉岛五十公里。1814年4月以前，厄尔巴岛属于托斯卡纳公国，托斯卡纳是拿破仑在意大利的领土。现在，在垮台以后，这个岛交给拿破仑完全掌管。

拿破仑熟悉了自己的领地，接见居民，发布命令，似乎要长期安顿下来了。时常有亲戚去看他，他的母亲列蒂契娅和他的妹妹波林娜·博尔盖泽公爵夫人都去过。瓦莱夫斯基伯爵夫人也去过，1807 年拿破仑在波兰时同她有过很亲密的关系，她一生中始终都爱着他。拿破仑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和小儿子沒有去，因为她的父亲奥皇不放她去，并且她本人也不急于想去看自己的丈夫。法国的拿破仑传记家往往因为皇后对丈夫的冷淡和变心而加以责备，却显然忘记了这件事情：当拿破仑在 1810 年要求娶她为妻的时候，无论是拿破仑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甚至连好奇地问她一声是否愿意举行这场婚事也沒有问过她。只要回想一下她在这次婚事之前，在 1810 年 1 月（从奥国的俄芬）给一位亲密的女友写的一封信就够了，她在这封信中写道：“从拿破仑离婚以后，我就翻阅《弗兰克福报》，总想从那上面找到他的新夫人的名字，并且觉得，他的婚事的推迟使我惴惴不安。我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天意……但是，如果我的不幸的命运希望这个的话，那末我准备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1810 年皇帝未来的新娘和妻子就是这样看待威胁着她的婚事的。十分显然，拿破仑的帝国的崩溃，对她个人说来，几乎等于从囚禁中得到解放。

拿破仑曾经十分热爱过、后来又抛弃了的第一个妻子也沒有到他那里去。约瑟芬是 1814 年 5 月 29 日拿破仑到了厄尔巴岛几星期以后在巴黎附近的马尔梅松宫中死去的。拿破仑听到这个消息后，接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沉默不语。

他到厄尔巴岛后的头几个月是十分平静和单调的。他沒有在任何人的面前、在任何事情上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往往几个钟头沉浸在深思之中。看来，从 1814 年的秋天，特别是 11 月、12 月起，拿破仑就注意地听取一切有关法国和当时刚开始的维也纳会议的报告。对他报告消息的人不少。从意大利（从意大利最近的皮昂比诺城到厄尔巴岛只有 12 公里）以及直接从法国，都向他传来了消息，

这些消息清楚地表明，复辟了的波旁王族及其周围的人的所作所为，比预料的情况更加轻率，更加荒唐。所有的人当中最聪明的人是塔列朗，他背叛了拿破仑并且在 1814 年帮助波旁王族复辟，他根据他们最初的一些行为评论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亚历山大一世在与科兰古的谈话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波旁王族没有改正，也是不能改正的。”

患年老痛风病的国王路易十八本人是一个谨慎的人，但是从他的兄弟查理·阿图瓦、随同波旁王族一齐回国的那些流亡者、以及这位查理·阿图瓦的儿子安古列姆公爵和别里公爵的行动看来，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从来也没有存在过拿破仑。他们十分仁慈地同意忘掉和宽恕法国的罪过，但是附有条件，那就是国家恢复以前的虔诚和旧日的秩序。尽管他们做出这些愚蠢行为，但是他们很快就确信了，要摧毁拿破仑设立的机构是绝对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机构都是不可触犯的：各省的地方长官，各部的组织，警察，财政税收的规章制度，拿破仑法典，法院，——一句话，拿破仑所创立的一切，甚至荣誉勋章也都保留下来，而整个官僚机构的结构，军队的组织，大学、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组织，与罗马教皇订的条约，——总之，拿破仑的国家机器保留下来了，只是由一位高高在上的“立宪的”国王代替了专制的皇帝。

要国王颁布宪法，这首先是亚历山大一世所坚持的，他相信，没有宪法，波旁王朝就根本不能维持。这个宪法只给一小撮非常有钱的人(两千八、九百万居民当中的十万人)选举权。

主张完全恢复旧制度的人，“极端保王党人”，对这个宪法恨之入骨。为什么篡夺王位的人这末多年能以独裁政权进行统治，而承受天命的合法的国王的权力却要受到限制呢？他们从最初起就不停地叫喊说，他们的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拍卖给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应该归还给他们。当然，谁也不敢这样做，但是这种议论已经使

农民感到强烈的不安，大大地激动了农村。

僧侣们完全站在从国外回来的贵族一边，他们甚至在教堂的讲台上宣扬，曾经购买被没收的土地的农民将遭天怒，他们会象圣经上的耶沙威一样地被狗吃掉。

回国的贵族们的行为是十分无耻的。他们有时鞭打农民，而被鞭打的农民不能在法院让这些欺凌者受到处罚。那些在路易十八在位时比较明白的人，怀着绝望的心情看到农村中发生的事情，看到剥夺土地的流言是多么激动了农村，但是却毫无办法。

至于说到资产阶级，那么情况是这样的。在帝国崩溃后的最初的时刻，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停止连年不断的战争、振兴商业、停止征兵的希望出现了（在帝国的最后几年中，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以雇佣的代理人来顶替自己的子弟，因为人力已经不够）；停止危害工商业的胡作非为的希望也出现了。甚至大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 1813 年、1814 年不再把帝国当做自己发财致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帝国崩溃和大陆封锁取消后过了几个月，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就怨声载道了：波旁王朝的政府一开始连想也不敢想进行坚决的关税斗争来反对大力促成拿破仑垮台的英国人。如果说，资产阶级当中有谁带着相当的同情心来迎接波旁王朝，并且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它抱有同情，那末这就是知识分子——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等。在拿破仑的铁的专制制度之后，路易十八提供的最温和的宪法对他们说来是不平常的福祉。报纸、小册子、书籍的数目增多了，而这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是根本谈不到的。但是这些受过 18 世纪启蒙文学和自由思想熏陶的有教养的人们，很快就不满于僧侣们在波旁王朝宫廷中、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强暴专横，从各方面对一切使人想起伏尔泰精神的东西进行迫害。狂热之徒特别在外省作了许多丧失理智的愚蠢的事，在

那里有的新官吏是由教会挑选和推荐的。

波旁王族及其亲信的地位日益发生动摇。由于他们无力恢复旧的制度，取消由革命和拿破仑制定的民法，甚至无力略微碰一碰拿破仑建立起来的大厦，他们就用言论、文章、狂暴的鼓动、傲慢的行为去挑唆农民和资产阶级。他们的恐吓和挑拨使整个政治形势更为动荡。农村特别感到不满。

还有一个情况具有很大的意义。几乎全体士兵群众和大部分军官，都认为波旁王朝是从外界强加到头上来的不能避免的祸害，必须默默无言地忍受。随着时间的消逝，可怕的创伤，长期不断的战争，从俄国撤退的痛苦都已成为过去。所有这些都已淡漠了、被人遗忘了，出现的是关于一位勇士的回忆，他领导他们取得空前未有的胜利，使他们永远光荣。对他们说来，他不仅是一位光荣的英雄、伟大的统帅和半个世界的主宰，——对他们说来，他同时也是士兵兄弟，小伍长，他记得他们的名字，拉拉他们的耳朵和胡须，以表示自己的好意。他们始终觉得，拿破仑爱他们，正如他们爱拿破仑一样。而皇帝总是非常成功地使他们保持和加深了他们的这种幻想。

军官们不象士兵那样仇恨波旁王族。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无疑是被战争弄得筋疲力竭了，也在寻求安宁。但是波旁王族，第一，在政治上不相信这些军官，第二，没有必要维持这么多的干部，立即让很多军官退休，只发给他们一半津贴。其余留在军中继续服役的军官带着恶意和鄙视的心情对待那些保王党贵族出身的年青的新军官，这些新军官往往被任命为旧军官的顶头上司。波旁王朝用白旗代替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三色旗，这也激怒了士兵和军官。对于拿破仑手下的士兵说来，白旗是流亡国外的叛徒的旗帜，在过去的年代，当必须击退干涉者进攻的时候，他们曾经遇见过这些叛徒并加以痛击。现在，在这面旗帜下，这些最反对革命的叛徒，借俄国、奥国和普鲁士的刺刀的帮助，又回来了并且长期定居下去，从乡村写来

的信说，他们并且还想剥夺农民的土地。……

“他在哪里呢？他什么时候再出现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军营和乡村中比在任何地方的其他居民阶层中都要早。

拿破仑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其他的情况。通过意大利，最后只是通过报纸，他得到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消息。他看到，君主们和外交家们要分他的巨大的财产，但是无论怎样分也分不成，并且从法国夺去的他征服的领土，引起了大家的贪欲，使过去的同盟者争吵不休。他看见英国和奥国在萨克森问题和波兰问题上坚决反对俄国和普鲁士。要想使这些欧洲列强，对在 1814 年告终的拿破仑大帝国，象以往那样行动一致，是不可能的了……

1814 年 12 月，拿破仑在波尔托费拉约（厄尔巴岛上的主要城市）自己宫殿附近散步的时候，突然在一个站岗的掷弹兵面前停下来。他是老近卫军的一个营里的兵士，得到同盟国的允许到厄尔巴岛来跟随皇帝的。“喂，老发牢骚的，你在这里不感觉无聊吗？”——“不，皇帝，不过我也不觉得十分有趣。”拿破仑把一个金币塞到他手里，在走开的时候低着嗓子说：“不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的。”

关于这件事情或者拿破仑说过两三次类似的话的消息是否传到谁那里去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梅特涅、路易十八和英国议会对于拿破仑住的地方离法国海岸太近是十分不安的。曾经有过把他迁到更远的地方去的商谈。甚至在小岛上，他仍然是可怕的。据传说，有人想暗地里派刺客去暗杀他。波旁王朝及其拥护者在法国所做的荒唐事越多，在维也纳的君主们和外交家们就更加不安。但是从厄尔巴岛同时也传出了与恐怖的流言相反的最令人放心的消息。皇帝几乎足不出戶，他非常安静，完全与自己的命运妥协了，他非常友好地与英国代表坎贝尔谈话，并且告诉他说，现在除了他的小岛之外，什么东西都不使他感到兴趣。

1815 年 3 月 7 日晚上，维也纳的皇宫中正举行舞会，这是奥皇

为招待欧洲各国的君王和代表而举行的，突然，当舞会正在欢乐的高潮时，客人们看见弗兰茨皇帝周围有些骚动：面色苍白的、受惊过度的大臣们急急忙忙地从正门的阶梯上跑下来，造成了这么一个印象：似乎宫中突然失火了。转瞬之间，宫中的各个大厅中都传遍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使到会的人立即惊慌失措地停止了舞会：刚刚到来的信使带来的消息说，拿破仑离开了厄尔巴岛，已经在法国登陆，并且赤手空拳地直奔巴黎。

二

还在 1815 年 2 月初拿破仑就开始决定回法国，恢复帝国。他从来也没有对谁说过他的这个决定。也许，只是在 1814 年年底和 1815 年 1 月，他心中的这个信念成熟了：整个军队而不只是他的近卫军仍然象以前一样地对待他，除了那些在 1814 年 4 月向他劝说必须退位的元帅之外，还有象达乌这样的元帅，埃格泽尔芒这样的将军，而军官们，无论是退职的和正在服役的，都鄙视和憎恨波旁王族，并且完全具有士兵大众的情感。他也确信，甚至在渴求安宁、被不断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且准备为波旁王族服务的元帅当中，现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满路易十八国王、他的兄弟和他的侄辈。他懂得并且很好地估计了农民的情绪，在农村中日益增长的惧怕心理。有一个消息加快了他的决定。

2 月中旬，他和一个年青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官吏弗勒里·德·夏布隆谈话，这个人带着住在法国的、过去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大臣巴萨诺公爵马勒的消息到厄尔巴岛来。巴萨诺公爵委托弗勒里·德·夏布隆对皇帝详细地讲述正在增长的普遍不满的情绪，从国外回到自己乡村的贵族们的无耻行为，以及军队几乎都认为只有拿破仑是自己合法的君王，根本不想知道路易十八国王和波旁王族的其

他成员。报告是十分详细的。况且拿破仑在巴萨诺公爵的这位使者到来以前就知道了很多事情。不管怎样，在这次谈话以后，他就决定了。

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列蒂契娅来看他。他的母亲是一个聪明、坚定、勇敢的妇女，在自己家庭成员中拿破仑最尊敬她。他把自己最初的决定告诉母亲。他对她说：“我不能死在这个小岛上，也不能把自己的事业结束在安宁中，这是我所不应受的。军队在期待我。一切都促使我产生这样的希望：军队一看见我，就赶快投奔到我这里来。当然，我会碰见忠于波旁王朝的军官，他们会制止军队的发动，那时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死去。这种结束比住在这个小岛上好得多……我希望出发，并且再一次尝试得到幸福。妈妈，你的意见如何？”列蒂契娅被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大震动了，以致不能马上回答：“让我暂时做一个母亲吧，我过一会儿再回答你。”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她回答说：“出发吧，我的儿子，遵循着你的使命。也许，你会遭到失败而马上丧失你的生命。但是你不能留在这里，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十分悲哀。我们希望，在这么多次战斗中都保佑你的上帝再一次保佑你。”她说完这些话就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

在和母亲谈话之后，拿破仑立刻召见了当时在厄尔巴岛上始终跟随他的将军贝尔特朗、德鲁奥和康布罗纳。贝尔特朗和康布罗纳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德鲁奥则怀疑能否成功，但是拿破仑告诉他，他现在不是想打仗，也不是想实行专制的统治，他希望使法国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这是他的新的政治纲领的特点，拿破仑就是以这个纲领来开始自己的事业的，如果说他不是想实现它，那也是想作为一种策略利用它。

他立刻给将军们发出命令和指示。他不是以武器去征服法国，而只是想在法国出现，在海岸上登陆，宣布自己的目的，要求恢复自己的皇位。他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名字的号召力的；他认为整个国家一定

会不经过战争，不试图抵抗就马上拜倒在他的脚下。因此，他没有武装力量不能成为一种障碍。但是为了防止在有人知道他到来以前，在哪怕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看见他以前就遭到逮捕和杀害，他手下应该有一些人。第一，他有七百二十四个人，这对于近身保护他个人是完全足够的，而这只在最初的时候才需要；其中六百人是老部队中的掷弹兵和步兵，一百多人是骑兵。其次，在他支配下的，还有三百多个早就驻扎在这里的第 35 团的兵士，他们是当时拿破仑派来保卫这个小岛的。拿破仑决定把所有近一千一百名士兵带走。为了渡海，他准备了若干只小船。

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十分秘密地进行的。拿破仑命令自己的三位将军在 2 月 26 日把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下午在波尔托费拉约城，一千一百名士兵突然全副武装向港口开去，并且登上了小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上船，准备开到什么地方去，事先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一句话，当然，在上船以前他们已经猜到了，并且当皇帝在三位将军和老卫队的若干军官的陪伴下出现在港口的时候，他们欢欣若狂地向皇帝致敬。

拿破仑的母亲大哭不已，与自己的儿子告别。

士兵、军官、将军和拿破仑在小船上各就各位，在夜晚 7 点钟，小船队一路顺风地开往北方。

第一个危险就是可能碰见经常包围着厄尔巴岛的英国和法国的皇家军舰。这些船只留在那里是为了以防万一，监视厄尔巴岛。一只法国军舰很近地驶过，船上的军官甚至用话筒和拿破仑所乘的横帆二桅船上的船长互通了几句话。军官问道：“皇帝的健康如何？”船长回答说：“很好。”这次相遇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士兵们都躲藏起来，皇家军舰上的人，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很幸运，根本没有碰见英国人。航行几乎继续了三昼夜，因为顺风有时减弱的缘故。

1815 年 3 月 1 日凌晨三点钟，小船队靠拢法国海岸，停在离昂

蒂布海角不远的港口儒安；皇帝上了岸，并且马上下令开始登陆。奔跑的海关卫兵看见拿破仑，就脱帽向他大声致敬。拿破仑派康布罗纳带领若干士兵到卡恩城去取军火。军火很快就取到了，然后，拿破仑带着自己的队伍向北方挺进，经过多芬省，预先把从波尔托费拉约带来的四门炮扔在海岸上。他决定沿着山路走。同时，他命令在格腊斯城的印刷所里印刷自己对法国军民的宣言。卡恩和格腊斯没有任何抵抗的企图就由他掌握了。他毫不停留地继续前进，经过色尔隆村，经过迪涅和加普，向格勒诺布尔前进。

格勒诺布尔是这个省的主要城市，该城驻军的指挥官决定进行抵抗，但是士兵们毫不隐讳地高声说，他们决不和皇帝作战。格勒诺布尔的资产阶级惊慌失措，一部分贵族包围当局，要求抵抗，而另一部分则纷纷从城里往外逃。

3月7日，急速派来对付拿破仑的军队开到了格勒诺布尔——配备有大炮的两个半常备步兵团和一个骠骑兵团。

拿破仑已经接近格勒诺布尔。最危急的时刻临近了。要和这些配备有大炮的团队打仗是根本谈不到的。王室的军队可以从远处向拿破仑和他的士兵射击，而自己甚至不损失一个人，因为拿破仑一门大炮也没有。

3月7日早晨，拿破仑到了拉米尔村。在前面远处可以看见军队排成了战斗行列，截断了道路，他们负有炸断彭果的桥梁的任务。拿破仑从望远镜里长久地观看派来对付他的军队。然后他命令自己的士兵左手持枪，枪口朝下。“前进！”——他下命令，并且冒着用来对付他的王室军队的前锋营的炮火，领头向前走去。

这个营的营长看看自己的士兵，找着警卫队指挥官的副官，指着自己的士兵对他说道：“我该做什么呢？你看看他们吧，他们面色苍白，象死人一样，只要一想到必须打死这个人就全身颤抖。”他命令全营撤退，但是没有来得及。拿破仑命令自己的五十名骑兵阻止准备

撤退的营队。骑兵们大叫:“朋友们,不要开枪,这是皇帝!”营队停留下来了。于是拿破仑一直走到士兵面前,士兵们端着枪呆住不动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以坚定的步子向他们走近的穿着灰上衣、戴着三角帽的人。“第五团的士兵!”皇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发出了声音,“你们看出是我吗?”“是的,是的,是的!”——队伍中叫起来了。拿破仑解开上衣,露出胸脯。“你们当中谁想打死自己的皇帝?那就开枪吧!”目击者至死都不能忘记士兵们怎样打乱了队形,蜂涌着奔向拿破仑,并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士兵们紧紧把他包围起来,吻他的手,吻他的膝,高兴得哭起来了,象是群众性的癫狂症的发作。很难使他们安静下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把他们带回格勒诺布尔去。

所有派来保卫格勒诺布尔的军队,都一团一团地跑到拿破仑那边去了。拉贝杜瓦耶上校是从3月7日起就驻扎在格勒诺布尔的团队的指挥官,他不希望等待拿破仑的到来,而是把自己的团队集合在主要的广场上,在战线的前面大叫:“皇帝万岁!”带着自己的团队去迎接拿破仑。拉贝杜瓦耶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在拉米尔村发生的事情。拿破仑是在转到他这方面来的团队和用叉子与旧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陪伴下进入格勒诺布尔的。本地的手工业者马车工匠帮助他进入城内。

在格勒诺布尔,除了少数逃出城的人以外,地方当局和各机关的首脑人物都来看他。在接见的时候拿破仑不断重复说,他完全决定给人民以自由与和平,他以前确实太“爱好不朽和战功”,现在他已经实行另外一种政策。他强调说,过去“他曾不得不醉心于使法国成为一切民族的统治者的慾望”。他以同样坚定的语气重复说出下面这些更有代表意义的话:他要拯救农民摆脱来自波旁王朝恢复封建制度的威胁,他保证农民的土地不被回国的贵族所侵占。他坚决声称,他希望重新审查自己所规定的国家体制,使帝国成为立宪君主国,眞

正的有议员参加管理的君主国，这样，他就坦白地承认了在他统治时期存在的立法机关只是别的任何东西，而完全不是真正的代议机关。他答应完全原宥所有站到他这一边来的人，并且肯定说，他自己退位后劝告自己亲近的人为波旁王朝服务，并且撤消他们对他这个皇帝的誓言。“但是波旁王朝表明”，他们“与新法国不相容”。

他命令在市郊的团队到格勒诺布尔来，并在检阅他们之后，就带着六个团队和相当多的炮兵从格勒诺布尔直奔里昂。沿途各处都有农民代表团来见他。七千人的队伍和三十门大炮走在前面。拿破仑和其余的部队在格勒诺布尔再停留了一天才走，散发了很多命令和指示。他又觉得自己是法国真正的主宰了。现在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与王室军队作战了，但是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地坚信，他不必费一枪一弹，并且法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王室军队，从来就没有过，而只有他的军队，拿破仑的军队，皇帝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幸在外国人的白旗下过了十一个月。

一大群、一大群的农民（据目击者计算有三四千人）跟在拿破仑和他的军队的后面，他们沿路向他聚拢，伴送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并且在每一个新的地点都换成了新的人群，一群农民似乎把他交给了另外一群农民，送给他军需用品，给予各种援助。人群中的人员在更换，但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连那么自信的拿破仑也没有预料到类似的情况。他已经毫不怀疑，几天以后他就会在巴黎了。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呢？上了锁的城市的大门吗？在格勒诺布尔，保王党人在逃出城前试图把大门锁上。“我只用我的烟盒就敲开了这些门”。——拿破仑这样谈起这件事情。他甚至夸大自己的势力，说他用不着拿烟盒去敲，“只要他一走近，大门就敞开了”。拿破仑作为凯旋者，在严整的团队的开路和伴随下直奔里昂，沿途发布命令，派遣急使，接收情报，任命新的指挥官和大臣。

三

3 月 5 日晚上，国王路易十八得到刚刚(从当时的信号电报)传来的难以置信的消息:拿破仑登陆了。这时巴黎还什么也不知道,国王命令首先把电报藏起来。只是在 3 月 7 日才准许在报纸上刊登登陆的消息。产生的印象是震撼人心的。起先，谁也不懂拿破仑想出什么妙计来做到这两件事:第一,他是怎样冲破两支看守厄尔巴岛的舰队,而平安地走完了地中海的这段路程的;第二,他赤手空拳,或者只有少数随行人员，为什么在登陆的时候不马上把他抓起来。政府最初完全相信,消灭这不愉快的事件是不会拖延时日的:强盗拿破仑显然是发疯了,因为不发疯的人是永远也不会作出这样的行动的。

但是,巴黎警察当局很快就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革命者、雅各宾党人、无神论者、大革命的一切追随者,这些要登记的人,都十分欢迎正在发生的事件，欢迎那位在自己初登仕途的时候就扑灭革命并且长期捕杀革命信徒的专制者的归来。当时巴黎还不知道拿破仑带回来的新的政治纲领,不知道他在格勒诺布尔的演说,不知道他所应允的“自由”。

但是,在巴黎最初就可以看到惊慌失措的情绪,特别是在有钱的资产阶级当中。首先是怕新的战争和商业遭到新的破坏。自由立宪主义者认为,拿破仑可能获得的胜利，将是军事独裁制度的再现,是他们希望波旁王朝制定的参加国家管理的形式的结束。

谁处于极度的惊惶状态呢？——保王党人,特别是 1814 年和波旁家族一起从国外回来的贵族。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并且怀着无法掩饰的恐惧心情准备被杀死。科西嘉的吃人者将怎样对待他们呢？在这些日子里，当甘公爵的血影一直浮现在波旁王族及其宫廷的眼前。

但是国王暂时仍然不相信危险的严重性。不断有新的消息传来，说拿破仑已经越过重山向格勒诺布尔前进。人们还不知道拉米尔发生的事情，但是军队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十分清楚。元帅们和将军们暂时还是坚定的，军官们也许也不会跑到皇帝那边去，但是巴黎警备队的士兵甚至不掩盖自己的欢喜。

决定派一个人与拿破仑相对抗，这个人是皇帝以下在军队中也许是最受欢迎的，这个人是内伊元帅。看来，他是完全真心诚意地与波旁王族站在一起的，1814 年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热心地劝说拿破仑必须退位。从另一方面说来，拿破仑自己也给他元帅的麾标，后来又给他大公的头衔和公爵的头衔，而在兵士看来，对他更加光荣的，是皇帝给他“勇士中最勇敢的人”的称号。如果这样的人同意担任指挥，也许士兵会跟随他去反对拿破仑。

国王召见了内伊。内伊坚决反对拿破仑的举动，他认为那除了给法国带来灾祸以外什么也得不到。他是热情的勇士，易怒的军人，他在国王和整个波旁宫廷对他卑躬屈膝地阿谀奉承的影响下，向一切士兵保证说：“我要叫他成为俘虏，把他关在铁笼里带回来。”但是，在内伊元帅出动之前，传来了新的、令波旁王族感到可怕的消息：军队都不战而倒到皇帝那边去了，一省接一省、一城接一城都丝毫不加抵抗地投在他的脚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预料不到的。

无论如何必须坚守里昂，这是从财富、人口、政治意义上说来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个大城市。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出发到那里去了，他是波旁家族中最被人仇视的，他怀着天真的希望，想以效忠波旁王朝的情感来鼓动里昂工人。麦克唐纳元帅也到了这里，波旁家族也对他抱着希望，正如对内伊抱着希望一样。麦克唐纳截断了桥梁，还匆忙地做了一些防卫工作，并且打算检阅军队，向士兵们介绍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

当这个盛大的仪式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将军来

见麦克唐纳，对他说最好快些把君主的兄弟送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麦克唐纳检阅了三个警卫团队，并且在阵前发表演说。他谈到拿破仑一旦得胜就会爆发同欧洲的新战争，他建议大家欢迎君主派来的阿图瓦伯爵，高呼“国王万岁”，以此表白他们对波旁王室的忠诚。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死一般的沉寂。

阿图瓦伯爵十分惊慌地从检阅中跑走，并且飞快地离开了里昂。麦克唐纳自己留下来领导防务工作。兵士们气馁地、不卖劲地工作着。一位工兵走到元帅面前含有责备意思地对他说：“最好你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君主拿破仑皇帝那里去吧。”元帅什么也没有回答。

“皇帝万岁！打倒贵族！”——进入里昂近郊拉·基俄吉尔的农民这样高呼着，告诉全城皇帝先锋队的临近。

确实，拿破仑的骠骑兵和甲骑兵已经进入城市。麦克唐纳仍然想打仗，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去迎战。但是当他的团队（走在前面的是龙骑兵）刚一见到甲骑兵，“皇帝万岁！”的口号就直接传到他的耳里。转瞬之间，元帅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就和拿破仑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了。他为了不当自己士兵的俘虏，骑马逃出城去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半小时，拿破仑和随行人员进入里昂，和其他城市一样，这个城市也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被他垂手而得。这是3月10日他在儒安港登陆后九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3月11日）拿破仑检阅了里昂师的行列，里昂师原是王室政府特别派来增援的，以便抵抗回来的皇帝。“所有的桥梁、堤岸、街道都挤满了人，男人、老头儿、妇女和孩子”，——拿破仑的随行人员弗勒里·德·夏布隆叙述说。人们涌向随行人员所骑的马匹，“以便看看他，听听他讲话，更近地看看他，摸摸他的衣服。笼罩着最疯狂的气氛”。不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皇帝万岁！”的呼声在四周接连几小时地震响着。不管拿破仑的自信心多强，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这种空前的凯旋也是他预料不到的。

拿破仑在接见里昂城市当局时又说了他在格勒诺布尔、以及在那以前和以后多次说过的话：他要给法国国内自由和国外和平。他的到来是为了保护和巩固大革命的原则，他懂得时代改变了，从今以后，他只要一个法国就满足了，不再想到侵略。他在里昂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解散贵族院和众议院，也就是按照波旁王朝制定的宪法进行活动的机关，他废除波旁王朝发出的对司法机关人员的任命，而任命新的法官。他让大多数地方长官留任原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地方长官，1814 年波旁王族不可能也不打算撤换他们。

他在里昂已经正式恢复自己的统治，把波旁王朝赶下国王的宝座，取消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他领导将近一万五千人从里昂向前推进，走上了通向巴黎的道路。“我的雄鹰要从一个钟楼飞往另一个钟楼，栖息在圣母院大教堂”，——他这样说，重复着他登陆后不久在告士兵书中所表露的思想。

拿破仑象以前一样沒有遇到抵抗，他凯旋进入马孔，进入里昂与马孔之间以及马孔与索恩河上的夏龙之间的乡镇。但是，在取得夏龙之前，一定要和内伊元帅进行决定性的遭遇战。拿破仑深知内伊是怎样一个人，他爱他的心而鄙视他的头脑。他看见过内伊作战，记得在博罗迪诺会战那一天内伊在谢苗诺夫钝角堡的情况，永远不会忘记内伊指挥从俄国撤退的大军的后卫时所做的事情。当他从马孔出发并且据报内伊元帅及其军队在隆·勒·松涅布防、截断了道路的时候，拿破仑已经不怕打仗了。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万五千名士兵算不上什么，但是他不希望流血，对于他说来，重要的是不牺牲一个人而掌管全国，因为他不能想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有利的政治上的论据了。

3 月 12 日内伊元帅到了隆·勒·松涅。他有四个团队，他还在等待支援。那时，他相信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他认为 1814 年皇帝

退位是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拿破仑退位后，皇帝本人曾决定让元帅们在波旁王朝下继续服役。现在，拿破仑破坏了与列强签订的条约，离开了厄尔巴岛，希望重新登上皇位，而这必然引起与欧洲的战争。内伊真心诚意地认为，他和皇帝进行斗争是正确的。他知道，完全信任他的国王路易十八现在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但是当他这位为士兵们所喜爱的人企图和士兵谈话的时候，他们都闷闷不乐地沉默不语。他召见军官和士兵，并且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到，他曾不惜牺牲自己，一生为皇帝服务，但是他声明说，现在恢复帝国会给法国带来无穷的灾难，首先是同全欧洲作战，因为欧洲无论如何是不会与拿破仑妥协的。他补充说，他现在就要让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不想打仗的人离开队伍，和留下的人一道前进。军官和士兵对他的回答是沉默。他生气了，惴惴不安，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

3 月 13 日夜晚，元帅被人从睡梦中唤醒，告诉他一个消息，应该从夏龙开来支援他的炮兵部队哗变了，并且和它的警卫部队（骑兵连）一齐跑到拿破仑那边去了。后来，在黎明时和早晨，又不断传来新的消息：许多城市把保王党政权赶跑而投向皇帝了，皇帝在向隆·勒·松涅前进。当内伊正处于使他的灵魂动荡不安的激烈动摇中的时候，当他的士兵都愁眉不展、显然不想同他说话、也不想回答他，军官也避开他的目光的时候，他收到了拿破仑派遣的一个骑马的掷弹兵带到他的营地来的一张纸条：“我将象在莫斯科近郊之战后的第二天那样接见你。拿破仑”——纸条上这样写着。

内伊元帅的动摇结束了。他命令连指挥官马上让所有的团队整队集合。他走到队伍前，从剑鞘里拔出剑来，大声喊叫道：“士兵们！波旁王朝的事业永远失败了。法国自己选择的合法的朝代正升上皇位。以后应该由皇帝，我们的君主来统治这个美丽的国家。”“皇帝万岁！内伊元帅万岁！”的呼喊声掩盖了这几句话。若干保王党的军官

马上躲藏起来了。内伊并不去阻止他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马上折断自己的剑，并且痛苦地责备内伊。内伊回答说:“那么照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我能用自己的双手制止大海的怒涛？”

十分有趣的是:内伊元帅在突然转到拿破仑一边后，立刻开始执行皇帝关于立即调动驻扎在隆·勒·松涅的部队的十分准确的（象往常一样)的命令。拿破仑是事先发出这个命令的，那时他还不知道内伊转到他这方面来，但是他确信内伊是不会拿起武器来反对他的。

在巴黎，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得知拿破仑进入里昂并继续向北方推进和内伊带着军队转到他那一方面去这两个消息的。

逃跑呀！这是王室宫廷的第一个想法。头也不回地逃开死亡的危险，逃开维森的堑壕，当甘公爵的尸体正在那里腐烂。心灵的混乱是难以想象的。国王路易十八最初不愿意逃跑，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且会失去王位。那么当时怎么办呢？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一本正经地讨论起这样一种战略计划来：国王坐着马车带领所有的大臣、所有的家族、高级僧侣出城去，大家都停在关卡之前等待前往首都的篡位者。篡位者看见这位为自己权利感到自豪的、勇敢地以自己的身躯挡住通向首都的大门的白发苍苍的嫡系的国王，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就会转身回去。那些在平常无事的情况下并不善于出主意的人，这次在惊慌失措之中却想出了各式各样毫无意义的办法。

政府的、以及与统治集团接近的巴黎报纸从过于自信转为完全泄气和掩盖不住的恐惧。这些报纸在这些日子里的行为有一点是很典型的，那就是随着拿破仑由南至北的进攻，加在他身上的绰号也就逐渐改变了。第一个消息是:“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第二个消息是:“吃人魔王向格腊斯前进”。第三个消息:“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第四个消息:“波拿巴占领里昂”。第五个消息:“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第六个消息:“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

黎”。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几天之内登在一些同一的报纸上，出于同一个编辑部之手的。

还剩下一个微弱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很快也就暗淡下去了。巴黎的人们都知道，拿破仑并没有采取任何保安措施，例如，在庄严地进入里昂的时候，他走在随行人员和军队的前面，他骑的马在从四面八方把他包围起来向他欢呼的无数人民群众中间一步一步地前进。用匕首的一击来拯救波旁王朝是不费什么事的。据目击者说，在巴黎“秘密使者混入人群，想把匕首交到新的雅克·克列曼(1589年刺死国王亨利三世的人)的手里”。并且公开答应给未来的刺客大笔报酬，同时还借口说，这种行为是十分合法的，不会受到审判，因为维也纳会议宣布拿破仑是人类的敌人，并且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在余下的短短的日子里，来不及找到雅克·克列曼。

在3月19日夜晚，拿破仑带着自己的前锋进入枫丹白露。国王和全家已在3月19日夜晚十一点钟逃出巴黎，向比利时边界逃去。

在第二天，1815年3月20日晚上九点钟，拿破仑在随从人员和骑兵的前呼后拥下进入巴黎。

无数的人群在杜伊勒里宫和周围等候他。

还在离王宫广场很远的地方，就传来了簇拥着拿破仑的马车及其周围侍从马队的无数群众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每分钟都在加强，最后变成接连不断的、震耳欲聋的、欢乐的狂涛，当叫喊声传到宫前广场的时候，在宫旁等候的另外的巨大的人群就冲上去迎接。马车和随行人员被无数群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不能往前走了。骑马的近卫军企图打开道路，但毫无结果。“人们在叫喊，哭泣，直接向马扑去，向马车扑去，什么也不想听”。——在皇帝马车附近的骑兵后来这样说。据目击者说，人群象发了疯似的冲向皇帝，他们把随从人员挤走，把马车打开，在经久不息的叫喊声中把皇帝抬进宫去，沿着宫里最大的楼梯上楼，抬进第二层楼的房间。

过去，在他获得巨大的胜利之后，在最光辉的进军之后，在获得最巨大、最丰硕的成果之后，巴黎也从来没有象 1815 年 3 月 20 日夜晚这样迎接过他。后来，一位年老的保王党人说，这是眞正的偶象崇拜。

刚刚十分费力地把人群劝离皇宫之后，拿破仑就到自己旧日的办公室来了（在此之前二十四小时，国王路易十八就是从这里逃跑的），他立即处理来自各方面的事情。

难以相信的事情实现了。赤手空拳的人不费一枪一弹，不经过最小的斗爭，在十九天之內从地中海岸到了巴黎，赶走了波旁王朝，再度来统治法国。

但是他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和第一次统治时期一样，他的统治再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而被他的突然出现所震惊的欧洲，这一次一定会竭尽一切来阻止他集合自己的力量。

四

拿破仑郑重其事地约许说，从自己新的统治时期开始，他要给法国带来自由与和平。他公开地、大声地宣布，并且在格勒诺布尔、里昂、巴黎多次反复地说过，他在自己第一次统治的时候沒有给法国带来自由与和平。热爱自由和热爱和平的拿破仑，在法国和欧洲人的耳朵听来，就好象是听人说“冷冰冰的火焰”或者“炽热的冰”一样。

拿破仑具有巨大的、迅速的、明显的权衡轻重的才能，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经过任何斗爭，赤手空拳地在几天之內就重新夺回了法国的皇位，那末，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一下子被他约许带给他的臣民的自由的范围与和平的希望所迷惑了。外部的和平、波旁王朝暫时还沒有破坏，也不打算破坏。因此，大家抛弃他们是有另外的原因的。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农民、即

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作了许诺。

“忘我的人们把我带到巴黎。军官和士兵做了一切。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人民和军队。”——据跟随拿破仑的弗勒里·德·夏布隆说，1815 年 3 月 20 日，拿破仑在回到杜伊勒里宫后的第一个晚上曾经好几次这样重复说过。

“农民高呼：皇帝万岁！打倒贵族！打倒僧侣！他们跟随着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当他们不能继续前进的时候，就由另外的人代替他们来护送我，就是这样，一直把我送到巴黎。普罗旺斯人之后是多芬人，多芬人之后是里昂人，里昂人之后是布尔贡人，他们都成了我的护送人员，而给我准备了所有这些朋友的眞正的谋划者是波旁王族自己”，——拿破仑住进杜伊勒里宫后的头几天就是这样谈到自己的进军的。

农民，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容易满足的：对于他们说来，拿破仑是彻底废除封建主义和保证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的象征。诚然，农民还希望不再有战争，不再抽丁抓兵，当皇帝谈到自己未来的和平政策的时候，他们也就洗耳恭听了。但是关于和平的问题无论如何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拿破仑懂得，在经过十一个月的波旁王朝的君主立宪制和报刊享有某些自由之后，城市资产阶级希望从他那里得到那怕是最起码的一点自由；他必须尽快地把他在向巴黎前进并且装扮成一个革命将军时所提出的政纲加以阐明。他在格勒诺布尔时说：“我来是为了使法国摆脱那些流亡者。”他在里昂时说：“让那些想奴役法国人的僧侣和贵族当心点吧。我要把他们吊死在路灯上。”

他收到了很多老雅各宾党人的祝词，他们是在他第一次统治时期避开了追捕而逃到外省活下来的；他们现在祝贺他，把他看成是反对波旁王朝、僧侣、贵族、神父的革命积极分子的代表。在图卢兹，全城整日都挂上拿破仑皇帝的半身像，唱着马赛曲，高呼“用长矛刺死

贵族!”达乌元帅是拿破仑所喜爱的人，拿破仑一回来以后马上就任命他为国防大臣，省里都请求达乌元帅要皇帝实行 1793 年的恐怖。而拿破仑自己也很懂得这种情绪。还在 3 月 20 日晚上，当他刚被人们抬到宫里的时候，他就对莫莱伯爵说：“我到处都发现一致的对僧侣和贵族的仇恨，并且象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样强烈。”

但是，正如 1812 年他在克里姆林宫时害怕俄国的农民革命成为同盟者一样，1815 年他在杜伊勒里宫时又害怕来自农民革命运动和革命恐怖的帮助。他当时既不要“普加乔夫”的帮助，现在也不要“马拉”的帮助，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在革命时代取得胜利的那个阶级，即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才是拿破仑感到亲切并了解其愿望的唯一阶级，拿破仑是这个阶级的主要代表者及其所取得的胜利的巩固者。他正是希望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支柱，准备为了这个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正如在 1812 年他觉得敌人亚历山大比俄国农民群众对自己更加接近，在 1815 年他甚至不希望让革命来帮助他与敌人进行斗争。“我不希望成为农民革命运动的国王。”——拿破仑对这时的资产阶级的愿望的典型表达者邦稚曼·贡斯当说道。皇帝在自己重新登极以后不久就召他进宫，正是为了垂询有关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改革的问题，这种改革将会满足资产阶级，证明拿破仑皇帝的新出现的自由思想，同时还能遏制正在抬头的雅各宾党人。

指出下面这点是很有意义的：拿破仑当时和以后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时只有革命的高涨才能帮助他，而完全不是温和的自由主义的立宪的文饰：“我的防御系统是不值一谈的，因为我所掌握的手段同面临的危险相比，相差太悬殊了。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使我能够从革命得到它所创造的一切手段。必须激起一切激情，以便利用激情的眩惑。不这样，我就不能拯救法国。”——他在回忆 1815 年的时候说道。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乔米尼将军完全同意皇帝的这种说法。拿破仑甚至拒绝造成 1793 年的情况，拒绝造成他自己也

承认的革命的强大力量，却命令去寻找躲藏起来的自由主义者、理论家和政论家邦稚曼·贡斯当，把他带到宫里去。邦稚曼·贡斯当之所以躲藏起来，是因为在拿破仑进入巴黎的前一天，他还在报上说皇帝的回来是社会的灾难，而拿破仑本人则被他称为尼祿(古罗马的暴君。——译者注)。

邦稚曼·贡斯当到“尼祿”这里来不是毫无恐惧的，但是他却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不仅不被枪毙，并且让他立刻为法兰西帝国制定宪法。

4月6日，皇帝召见贡斯当，而4月23日宪法就制定好了。宪法被加上很奇怪的绰号：“帝国宪法的补充法案”。拿破仑希望以此确立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和第二个统治时期之间的继承关系。邦稚曼·贡斯当只是把国王路易十八在1814年颁布的宪章即宪法拿来稍加修改，使它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的色彩。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选举财产限制额大大降低了，但是仍然要富人才能当代表。出版自由得到较多的保证。预先送审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犯罪此后只能由法院加以惩罚。除了选举出来的议院(包括300人)外，还建立了另外一个议院——高等议院，这个议院的议员由皇帝任命，并且是世袭的。法律应该由两院通过，由皇帝批准。

拿破仑采纳了这个草案，并且于4月23日公布了新宪法。拿破仑并不十分反对邦稚曼·贡斯当的自由主义的创造。他只希望在战争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推迟选举和推迟召开议会，如果战争胜利了，他将怎样对待议员、报刊和邦稚曼·贡斯当本人，那是很明显的。这个宪法暂时应该起安慰人心的作用。但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不太相信他的自由主义，极力请求皇帝尽快召开议会。拿破仑在作了若干反对以后，同意在5月25日并指定在“五月广场”，宣布皇帝的新宪法付诸全民投票的结果，那时将分发国民卫队的旗帜，并且举行议会会议。

全民投票的结果，是一百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五十票赞成新宪法，四千八百票反对。分发旗帜的仪式(事实上不是在5月26日而是在6月1日举行的)是庄严而激动人心的；6月1日新选举的议会(同以前一样，叫做立法院)开会了。

人民代表一共开了一个半星期的会，拿破仑已经不满意他们而有些愤怒了。他绝对不能容忍对自己权力的任何限制，甚至不能容忍任何独立行动的迹象。议会选举朗热内为主席，他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过去是吉伦特派，拿破仑不十分赏识他。在根本还没有任何反对派的时候——朗热内肯定地是倾向于拿破仑而不倾向于波旁王朝的，——皇帝却已经生气了，他在接受立法院的最恭顺、最尊敬的祝辞的时候说道：“我们不要仿效拜占庭的例子，拜占庭受到野蛮人各方面的压迫，成为后代耻笑的对象，当破城槌已经打到城门上的时候，还在进行抽象的讨论。”他是在暗示欧洲同盟，这个同盟的军队已经从四面八方开往法国的边境。

6月11日，他接受了人民代表的祝贺，而在第二天，6月12日，他就到军队去了，他要去进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欧洲的大厮杀。

拿破仑去军队时十分懂得，他留在后方的人是很不可靠的，问题与其说是在6月11日召开的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在于他从厄尔巴岛回来后立即又任命为警察总监的那个人。约瑟夫·富歇在拿破仑即将进入巴黎的时候耍了一次手腕，他引起波旁王族对他的愤怒，使他失宠，这个巧妙的手法使他在拿破仑刚一进入巴黎的时候就得到总监的位置。富歇能够玩弄一切阴谋，做出各种卑鄙无耻和叛卖的事情，这一点拿破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第一，旺代不大平静，而富歇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旺代人的叛乱，他能够而别人却不能够和旺代人进行斗争，第二，皇帝希望富歇与波旁王族发生争吵。与在第一次统治时期一样，拿破仑利用富歇在警务方面和挑拨离间方面的才能，同时又建立特别的、完全秘密的对富歇的监视。拿

破仑任命弗勒里·德·夏布隆为监视富歇的人，这个人就是秘密到厄尔巴岛去见皇帝的人。弗勒里·德·夏布隆有一次揭穿了富歇与梅特涅之间的某些秘密的阴谋。确实，富歇避开了危险，但是拿破仑仍然对他谈了下面的话(这还是5月的事情)：“你是叛徒，富歇！我会下命令把你吊起来！”富歇长期在拿破仑手下服役，他已经多少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他低头鞠躬，弯背哈腰地回答说：“我不同意陛下的这个意见。”

但是，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能够战胜同盟国家，那末议会会服从，富歇会忠诚，不起坏的作用。如果不能战胜的话，那末，谁来埋葬帝国，是自由主义的议员或者不忠实的内阁大臣，这不都一样吗？

拿破仑信赖达乌，留他当巴黎总督和国防大臣，也信任老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卡尔诺，这个人起先无论如何不愿为扼杀了共和国的专制君主服务，而现在，1815年，向拿破仑毛遂自荐，认为波旁王族是罪恶的渊薮。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近郊的工人(1815年他们比1814年春季还饿得厉害)是不会在他的后方起义的，正如他们在1814年，或者更早一些，在1813年没有起义一样，——其原因与卡尔诺现在主动为他服务和雅各宾党人欢呼他在儒安港登陆的原因相同。他懂得，现在工人、卡尔诺和外省的雅各宾党人不是把他看成一个保护自己皇位不受另一个僭望王位者的侵犯的皇帝，而是看做革命后的法国的军队的领袖，他保护领土不受干涉者和要恢复旧制度的波旁王族的侵犯。并且，在全世界，无论是在朋友或敌人的眼中，这个军事领袖都是军事上的不可企及的大师和巨匠，是在那时以前存在过的一切伟大统帅中最有天才的统帅，是军事战略和策略的能手。法国和站在法国面前的欧洲都屏息静待着。

五

拿破仑一生中最后的这场战争始终是有激烈争论的题目，并且不仅在科学著作中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关于把拿破仑似乎已经垂手可得的胜利夺走了的很多不幸的偶然因素，几乎成了所有的著作谈论的对象。

根据对事件的科学的、现实主义的分析，这个偶然因素的问题只不过具有军事技术方面的意义。甚至不加探究，不加批判，不作任何反对而完全同意这种论点：如果没有那些偶然因素，拿破仑就会赢得滑铁卢之战，那末整个这场战争的主要结果始终将是帝国的灭亡，因为欧洲刚刚才开始施展自己的一切力量，而拿破仑的力量和军事后备却已经山穷水尽了。

1815 年 6 月 10 日，拿破仑控制的军队是十九万八千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是在旺代一地，为了防备万一，就留下了六万五千人)。为了进行即将到来的战争，皇帝手中直接控制了大约十二万八千人，在近卫军中有三百四十四门大炮，还有五个军团、骑兵后备队。此外，还有特别的军队(国民近卫军等)二十万人，其中半数还没有军服，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武器。如果战争拖延的话，那么，他利用国防大臣达乌的组织工作，尽最大努力还可以聚集大约二十三、四万人。在拿破仑获胜的情况下战争怎能不拖长呢？因为英国人、普鲁士人、奥国人、俄国人已经一下子投入了大约七十万人，在夏末的时候还能投入三十万人，秋季的时候还有补充力量。他们估计共可投入一百万以上的士兵。

同盟国家坚定不移地决定要消灭拿破仑。在最初的惊慌和泄气之后，一切派有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大国政府，都特别努力。拿破仑想同任何一个国家举行单独谈判的企图都被拒绝了，拿破仑被宣

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是“人类的敌人”。

只须记起这一点就够了，甚至把二等强国抛开不算，在滑铁卢之战以后立刻进入法国的军队有：奥军二十三万人，俄军二十五万人，普鲁士军队三十一万人，英国军队十万人。这些军队是在一得到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消息后很快就开始集结的。

除了对侵略者和征服者的仇恨，除了对可怕的统帅和永远的胜利者的恐惧之外，亚历山大、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威廉、梅特涅、卡斯尔雷爵士（他们正是在这时对自己国家的工人的情绪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潮流深感不安），所有这些欧洲的反动的上层统治者这一次还对卷土重来的拿破仑的新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存有戒心。马拉用来包缠自己头部的红头巾，对于欧洲统治者说来，比拿破仑的金色的王冠还要可怕。1815 年他们认为拿破仑正是要使“马拉复活”来进行总的斗争。拿破仑不但不打算这样做，而且最怕这样做。但是，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彼得堡都觉得他会这样做。而这更增加了他们对这位征服者的不可调和的敌意。

拿破仑到达军队的时候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英国的间谍惊诧不已，向英国军队的首领威灵顿报告说，军队中对拿破仑的崇拜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其他探听法国情绪的外国间谍所提供的材料与这些证据是相符合的。无论是威灵顿或者是他的间谍们都没有看见士兵情绪中还有另一种特征，那是以前拿破仑军队中所没有的——这就是士兵们对将军和元帅的怀疑和不信任。士兵们还记得，元帅们在 1814 年叛卖了皇帝。他们盲目地信任拿破仑，希望他对待“叛变者”也象当时国民公会对待可疑的将军一样，把穿着饰有金银绦边的将军服的叛变者送上断头台！但是拿破仑并不这样做，元帅们和将军们仍任原职，他并不打算在后方和前线实行革命恐怖，虽然他自己曾经脱口而出，说这会使他的力量增加一倍。

皇帝的到来鼓舞了士兵：他们相信，将军们和元帅们处在严密的

监视下，是可以不怕他们的突然叛变的，士兵们不是对他们全体而是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怀疑的。

在拿破仑面前的是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在所有同盟者当中他们最先出现在战场上。奥国人也急忙赶往莱茵河。还在拿破仑重新登上皇位的初期，那个 1814 年坐上王位的、被维也纳会议暂时默认其国王称号的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刚一知道皇帝登陆，就突然（这是1815年 3 月的事情）转到皇帝那边，向奥国人宣战，但是，他在拿破仑本人开始反对同盟国之前就被击溃了。因此，到了现在，6 月中旬，拿破仑甚至已不可能指望这种能够牵制一部分奥国军队的部分的佯攻。但是奥国人还离得很远。首先应该把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击退。威灵顿带着英国军队驻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布吕歇尔带着普鲁士军队分布在桑布尔河与马斯河，在沙尔列鲁与列日之间。

6 月 14 日，拿破仑侵入比利时而开始了战斗。他迅速向威灵顿与布吕歇尔之间的地方推进，并且扑向布吕歇尔。法国人占领了沙尔列鲁，并且把战争带过桑布尔河。但是拿破仑在右翼的活动稍微慢了一些：按信仰说来是保王主义者的、早被士兵怀疑的布尔蒙将军跑到普鲁士军队那边去了。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士兵们就更加怀疑自己的领导了。在布吕歇尔看来，这种事件是一种有利的征兆，虽然他拒绝接纳背叛了拿破仑的布尔蒙将军，甚至命令转告叛变者，说认为他是“狗屎一样的废物”（布吕歇尔说得还要厉害些）。拿破仑在得到关于布尔蒙这个旺代人和保王主义者叛变的报告时说道：“白的永远是白的。”

拿破仑命令内伊元帅在 6 月 15 日占领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的名叫卡特勒布拉的村庄，以便牵制英军，但是内伊行动迟缓，这件事做迟了，6 月 16 日发生了拿破仑与布吕歇尔在林尼的大战。拿破仑获得胜利；布吕歇尔损失了两万多人，拿破仑损失了将近一万一千人。但是拿破仑不满意这一胜利，因为如果不是内伊的错误，毫无

必要地耽搁了第一军团，让它白白地在卡特勒布拉与林尼之间徘徊的话，他就会在里尼一战消灭全部普鲁士军队。布吕歇尔被击败、被赶跑了(不知朝那个方向跑走了)，但是沒有被消灭。

17 日这一天，拿破仑让自己的军队休息。军事评论家责备他，说他白白地损失了宝贵的一天，从而使被击败的布吕歇尔有可能整顿自己的军队。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拿破仑从全军中抽出三万六千人来让格鲁希元帅统率，命令他继续追击布吕歇尔。拿破仑的一部分骑兵追击前一天企图在卡特勒布拉牵制法军的英国人，但是夏天的倾盆大雨冲毁了道路，使追击停止了。拿破仑自己带领主力与內伊会合在一起向北方推进，直趋布鲁塞尔。威灵顿和全部英国军队占领的阵地离布鲁塞尔二十二公里，叫蒙·圣·尙高地，在滑铁卢村的南面。滑铁卢北面的苏瓦尼森林切断了他退往布鲁塞尔的道路。

威灵顿在这个高地上修筑了工事。他的想法是：在这个非常强大的阵地上等待拿破仑，并且无论如何坚持到布吕歇尔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得到增援，能够来支援他为止。

间谍一个跟着一个地向英军大本营报告说，拿破仑不顾大雨冲坏了道路，正毫不停留地直接向蒙·圣·尙高地前进。如果能够坚持到布吕歇尔的到来——这就是胜利，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英国军队的覆灭。从 6 月 17 日中午起，就是这样对威灵顿提出问题的。当时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诺告诉他，布吕歇尔一恢复元气就会赶来支援他。

6 月 17 日傍晚，拿破仑带领自己的军队向高地前进，远远地在雾中看见了英国军队。

六

6 月 18 日清晨拿破仑与威灵顿作战时，拿破仑大约有七万二千

人，威灵顿有七万人。双方都在等待援兵，并且都有坚决的理由等待他们：拿破仑在等待格鲁希元帅，他的人员不会多于三万三千人；英国人在等待布吕歇尔，他在林尼一战失败后，还有将近八万人，但是能够作战的只有四、五万人。

夜晚刚刚过去，拿破仑就准备就绪了，但是他不能够在拂晓的时候开始进攻，因为下过雨的泥土很松软，骑兵很难奔驰。清晨皇帝巡视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对于人们对他的接待感到十分高兴：这是极其少有的群众的热情的迸发，这种热情是奥斯特里茨战役以来从未见过的。这次检阅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后一次对军队的检阅，它给拿破仑和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拿破仑的大本营起先是设在杜·卡育农庄。早晨十一点半钟，拿破仑认为土地已经相当干燥了，到这时他才命令开始战斗。用八十四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攻击英国军队的左翼，并且在内伊的指挥下开始进攻。同时，法军对英军右翼的乌古蒙城堡采取火力较弱的佯攻，在这里，进攻遭到了最有力的回击，碰到的是巩固的阵地。

对英国军队左翼的进攻继续着。你死我活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突然拿破仑看见圣·兰别尔东北方很远的地方有不太明显的运动着的军队的轮廓。他最初以为这是格鲁希，因为他在夜晚，后来又在早晨几次命令他赶快开赴战场。但这不是格鲁希，而是布吕歇尔。布吕歇尔逃出了格鲁希的追击，并且经过很巧妙的转移骗过了法国元帅，而现在赶来支援威灵顿。拿破仑知道真实情况以后仍然没有困惑不安；他相信格鲁希会在布吕歇尔之后跟踵而至，那时这两支军队都会投入战斗，那末，虽然布吕歇尔给威灵顿带来的援兵比格鲁希给皇帝带来的援兵多一些，但是力量仍然是相当势均力敌的。如果在布吕歇尔与格鲁希到来之前，他能给英国军队毁灭性的打击的话，那么格鲁希到来以后，战斗将完全获胜。

拿破仑派遣一部分骑兵去攻打布吕歇尔，命令内伊元帅继续攻

击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不断遭到猛烈打击的英国军队的左翼和中心。在这里，德·艾尔隆军团的四个师排成密集的战斗队形展开进攻。在整个这条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战斗。英国人用炮轰击这个巨大的马队，并且数次转入反攻。法国师团一个接一个地投入战斗，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苏格兰的骑兵杀入这些师团，杀死了一部分人。拿破仑看见了这场格斗和师团的失败，他亲自骑马跑到别尔·阿良斯农庄附近的高地去，派遣米约将军的几千名甲骑兵到那里去，苏格兰人在损失了整整一团人之后被击退了。

这次进攻打乱了几乎整个德·艾尔隆军团。英国军队的左翼沒有被摧毁。于是拿破仑改变自己的计划，把主要的打击转到英国军队的中路和右翼。在三点半钟的时候，拉·黑·圣特农庄被德·艾尔隆军团的左翼的师团占领了。但是这个军团沒有力量扩展自己的战果。于是拿破仑把米约和勒费弗尔—德努埃特的四十个骑兵连交给內伊，让他去完成打击乌古蒙城堡和拉·黑·圣特之间的英国军队右翼的任务。最后，乌古蒙城堡被占领了，但是英国人仍然坚持作战，牺牲成百上千的人而不退出自己的主要阵地。

在这次著名的进攻中，法国骑兵死在英国步兵和炮兵的炮火之下。但是这并沒有使剩下的人感到惶惑不安。有一个时候，威灵顿认为一切都完了，——并且不仅是这样想，而且在他的司令部里也这样说过。英国的统帅在回答关于英国军队不可能守住某些据点的报告时所说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大家都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已经沒有援军了。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布呂歇尔的到来"。——威灵顿这样回答自己的将军们的告急报告，把自己最后的后备队投入战斗。

但是拿破仑并不等待步兵后备队。他又把克勒曼的三十七个骑兵连投入战斗。黄昏到来了。最后，拿破仑把自己的近卫队用来攻击英军，并且亲自带领去进攻。正在这时，在法军的右翼传出了呼

喊声和射击的轰响声：布吕歇尔带领三万人赶到了战场。但是近卫队的进攻仍然继续着，因为拿破仑相信格鲁希会跟随布吕歇尔而到来；但是很快就传布开来一种惊慌混乱的状态：普鲁士的骑兵冲向在双方炮火之间的法国近卫军，而布吕歇尔本人则带着其余的部队进攻别尔·阿良斯农庄，在此以前，拿破仑和自己的近卫队就是从这里进攻的。布吕歇尔希望用这种调遣来截断拿破仑的退路。已经是夜晚八点钟了，但是天还相当亮，于是整天都处于法国人不断的致命进攻下的威灵顿转入总攻。而格鲁希还没有来。到了最后一分钟拿破仑仍在白白地等待他。

一切都完了。列成方阵的近卫军进行着拚命的抵抗，穿过敌人密集的队伍慢慢地撤退。拿破仑在保卫他的近卫军掷弹兵营中间步行着。老近卫军的殊死的抵抗阻挡住了胜利者。"勇敢的法国人，投降吧！"——英国上校霍尔基特走近四面八方被包围的方阵大声叫喊，这个方阵是由康布罗纳将军指挥的，但是近卫军并未放松抵抗，他们宁死也不愿投降。康布罗纳用轻蔑的辱骂来回答英国人的投降建议。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普朗倘努瓦（那里是后备队——洛博军团在作战），法国军队都在抵抗，但是由于遭到普鲁士新生力量的进攻，他们终于朝不同的方向四散逃命了，直到第二天，才有一部分人集合成有组织的队伍。普鲁士军队整夜追击敌人，追了很远的一程路。

七

战场上躺着两万五千名死去的和受伤的法国人，两万二千名死去的和受伤的英国人及其同盟者。法国军队遭到了失败，损失了几乎全部炮队，几十万奥国生力军正逼近法国边境，还有几十万俄国军队不久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拿破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这一点他在离开结束他的血腥的生涯的滑铁卢战场之后很快就意识到

了。格鲁希叛变了吗？他的迟到毁灭了法国军队。或者他只是偶然地犯了过错，迷失了道路？內伊在骑兵进攻英国人的时候的表现是象一个英雄(梯也尔的意见)还是象一个疯子(马德兰的意见)？值得等待半天吗？或者是应该在拂晓的时候开始战斗，以便在布呂歇尔到来之前消灭英国军队？——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成千个与滑铁卢之战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百多年来吸引了历史学家，吸引了（非常强烈地)这个战役发生时的当代人。但是必须立刻指出，这些问题最初却很少引起拿破仑自己的注意。从滑铁卢到巴黎，一路上他表面是安静的，沉思的，但是他的面部却不象莱比锡战役之后那样阴沉，虽然现在事实上他已经失去所有一切了，永不复返地失去所有一切了。

滑铁卢之战后一个星期，他对这次战役的深奥的意义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列强不是和我作战，而是和革命作战。他们始终把我看成革命的代表者，把我看成是革命的人。”

他的这个评价，与欧洲具有自由思想的所有最近几代人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而他与他们在所有其他问题的看法上却离得那末远。只要记起一件事就够了：一幅描写威灵顿与布呂歇尔夜晚在滑铁卢战场上会见并且彼此祝贺的图画总是那样激动着赫尔岑。赫尔岑写道：“拿破仑惹得其他民族疯狂地进行回击，这些人是在为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自己的主子而战。这一次军事专制制度被封建制度战胜了……我不能无动于衷地走过那幅描写威灵顿和布呂歇尔在滑铁卢获胜而相会时的图画。每次我都看它很久，而每次我的心中都感到冷冰冰的而且十分可怕”。威灵顿与布呂歇尔“彼此愉快地祝贺。他们怎能不高兴呢？他们刚刚才使历史的车轮从大路陷入泥潭中去，掉进这种泥潭以后，半世纪之久都不能拔出……问题在于拂晓……欧洲这时还在睡梦中，它不知道它的命运已经改变了”。同时，赫尔岑责备拿破仑，他的任性和对欧洲各民族利益和尊严的鄙视“刺激”他们到了疯狂的地步；拿破仑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始终闭口不谈，这

一方面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是，曾经被他多次消灭了的封建专制贵族在滑铁卢一战中在一定程度上报了仇，革命后的法国和老卫队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一起后退了，根据皇帝的话来看，这些他是十分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滑铁卢之战以后，他在谈到自己的整个宏伟的史诗，在谈到这个刚刚到来的史诗的结尾时，已经立刻改变了语气，他把这些似乎是当作遥远的过去的事，而不是作为中心的登场人物来谈的。

他立刻发生了急剧的改变。他在滑铁卢之战后回到巴黎，并不为自己的皇位而战，而是放弃自己的一切阵地。这并不是由于他的非凡的能力已经消失了，而是由于：他看来不仅理解到，而且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他已经做了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无论是好是坏)，他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在此之前十五个月，当他已经拿起笔来要在枫丹白露签署自己第一个退位的诏书时，他突然昂起了头，对自己的元帅们说：“也许，我们可以进攻他们？我们会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那时他认为自己的角色还未扮演完毕。甚至三个月前，在 1815 年 3 月，他做了世界历史上任何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当时他还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

现在，一切都立刻并且永远地熄灭了。在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一次也没有经历过 1814 年 4 月 11 日那种绝望的情绪，当时他曾服毒自杀。但是他失去了对活动的一切兴趣和口味，他只是等待着未来的事件将对他做些什么，他已经决定根本不参加未来事件的准备工作。

6 月 21 日他到了巴黎，召见了大臣们。卡尔诺建议要求议会宣布拿破仑专政。达鸟建议干脆宣布议会休会，并且解散议会。拿破仑拒绝这样做。这时议会仍然开会了，并且根据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拉法叶特的建议，议会宣布自己是不能被解散的。

后来拿破仑说，只要他说一句话，人民群众就会取消整个议会，经历了这些日子的很多议会议员证实了他的话。但是情况仍然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把“马拉”与拉法叶特对立起来，把 1793 年与想复活 1789 年的自由主义者对立起来，把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将法国从君主制欧洲拯救出来的平民大众与资产阶级对立起来，无论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或以后，拿破仑都不希望这样做。

6 月 21 日、22 日、23 日，十分奇特的消息不断从工人区传来：在那里聚集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群，他们大声疾呼，坚决反对皇帝退位，要求与日益逼近的敌人的进攻作军事斗争。

在 6 月 21 日整个白天和几乎整个夜晚，以及 6 月 22 日整天，在圣·安杜安和圣·马赛区，在汤普尔住宅区的街道上，游行队伍高呼：“皇帝万岁！打倒叛变者！拥护皇帝或者死亡！ 不需要退位！ 要皇帝和国防！ 打倒议会！”但是拿破仑已经不想斗争，也不想统治了。

在巴黎，受惊的金融家、商会会员、银行家在举行会议，交易所的惊慌情绪是难以描写的。拿破仑可以清楚地看见，资产阶级抛弃了他，他们不需要他，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他在自己整个统治时期所依赖的那个阶级叛卖了他，这样，他就最后拒绝了继续战斗。

6 月 22 日他第二次退位，让位给自己的小儿子（这位小儿子从 1814 年春天起就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到外祖父弗兰茨皇帝那里去了）。他的继续了一百天的第二次统治时期结束了。这一次他不能希望列强会同意为了他的小儿子的利益而牺牲波旁王族。

当时一大堆人聚集在叶利赛宫的周围，这里是拿破仑从军队中回来后住的地方。聚集的人高呼：“不需要退位！ 皇帝万岁！”事情发展到使首都中央各区的资产阶级感到十分不安，预料会爆发革命。连清醒的交易所里的人也觉得似乎会发生革命，而且是会宣布拿破仑是独裁者的那种革命，因而大惊失色。刚一传出皇帝退位的消息，国家的地租就马上急剧上升：资产阶级对于以后英国、普鲁士、奥国

和俄国军队的入城，远比对于打算进行抵抗的首都近郊工人似乎开始要干预政治更能容忍。22日夜晚，人群在知道拿破仑到马尔梅松去了，并且坚决要退位之后，才慢慢散开了。

某些工人的这种拥护皇帝的心情部分地也可由下列情况来解释：夏天的时候，除了定居的工人以外，巴黎还有几万名来自各省的建筑房屋和铺砌道路的建筑工人：石匠、做粗工的木匠、做细工的木匠，装配匠、油漆匠、修屋顶的工人、木器工人、掘土工人等等。他们由农村来到首都做零工，在夏天建筑季节里做工。他们比定居在巴黎的工人与农村更有联系。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有双倍的仇恨，因为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而他们认为拿破仑是摆脱波旁王朝的可靠的保证。这些群众不希望平息，不希望容忍皇帝的退位。他们在街上把一些衣着华丽的、被他们怀疑为保王党、贵族的人打得半死，因为他们拒绝和群众一齐喊：“不需要退位！”这些人群不断地一批接一批地涌上街头。“人民，那既出钱又打仗的人民，从来没有象这儿天那样表现出对皇帝的依恋”。——这是亲眼看见退位前和6月23、24、25日退位后巴黎所发生的事情的人写的，当时有几千人还不愿意容忍既成的事实。

6月28日退位的皇帝离开了马尔梅松。他向大西洋岸前进。他已经决定坐上一只停泊在罗什福尔港的巡洋舰到美洲去。根据海军大臣的命令，已经预备了两只巡洋舰供皇帝这次旅行用。当7月3日早晨8点钟拿破仑到达罗什福尔的时候，巡洋舰已经准备停当了，但是却不能出海，因为英国的舰队严密地封锁了港口。拿破仑开始等待。显然，他自己也拖延了一下行期。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的一代甚至作了假设，认为“皇帝的荣誉之中只缺少以身殉国”，认为如果在人类的记忆中没有留下这位被钉在悬崖上的新的普罗美修士的形象，拿破仑的传说就不会这么完满和这样伟大，认为拿破仑是有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史诗有另外的结尾。后来他从未对这

些日子里他的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人向他建议，不要坐巡洋舰，而是秘密地坐上一只小船。他不希望那样做。罗什福尔城的人知道皇帝到来了，每天都有几千人接连几小时聚集在皇帝的窗子下面，高呼“皇帝万岁！”最后，7 月 8 日，他登上了自己的两艘巡洋舰中的一艘，并且开出海去。巡洋舰在罗什福尔城的稍偏西北的一个叫做埃克斯的大岛边停下来了，但是要继续前进已不可能，因为英国的舰队封锁了通往大洋的一切出口……

拿破仑上了岸。人们马上就认出了他。水兵们、士兵们、渔夫们，所有四郊的居民都跑到巡洋舰这里来。守卫该岛的部队的士兵要求皇帝去检阅他们。拿破仑检阅了他们，使他们狂欢不已。他也去观看了从前根据他的命令在岛上修筑的工事。

当他回到巡洋舰上的时候，巴黎给巡洋舰发来了命令，只有当邻近海面没有英国舰队的时候才能出海。但是英国人作好了战斗准备，巡逻在海港的出口……

拿破仑立刻作出决定。在皇帝身边的，有罗维戈(萨瓦里)公爵、蒙托隆将军、贝尔特朗元帅和拉斯卡斯，以及十分效忠拿破仑的大军的军官们。皇帝派遣萨瓦里和拉斯卡斯去同在四周巡航的英国舰队谈判，是否可以让拿破仑乘坐的去美洲的法国巡洋舰通过？是否收到了有关这方面的命令？梅特兰船长在“别列洛风”号船上接见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有礼貌的、但是坚决的拒绝。梅特兰说：“有什么保证可以说，拿破仑皇帝现在到美洲去，而不会重新回来，又使英国和整个欧洲遭受新的流血牺牲和物质损失呢？”萨瓦里对这一点回答说，1814 年第一次退位和现在第二次退位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他是完全自愿地退位的，虽然在滑铁卢之战以后他还能当皇帝和继续作战；皇帝坚决永远退隐去过私人的生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为什么皇帝不去英国，不把英国当做自己藏身之所呢？”——梅特兰反驳说。但是，从以后的谈话中，拿破仑的使者并未得到任何诺

言，甚至沒有得到主要的话：英国会不会把拿破仑当做俘虏。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巡洋舰的时候，当两只法国船上的水兵和军官们知道皇帝可能落入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全体人员大哗。另一只巡洋舰的舰长波内对蒙托隆将军说：“我刚刚同我的军官们和全体船员商量过。因此，我是以我自己和全体人员的名义说话的。”在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巡洋舰“美杜莎”号在夜晚去攻击“别列洛风”号，和它开战。这将占去和牵制英国人两小时；当然，“美杜莎”号在这两小时以后会毁灭，但是在这两小时之内另外一只载着皇帝的巡洋舰“沙阿列”号可以冲入大洋，因为其他的英国舰队离“别列洛风”号很远，而那些离得近的船只太小，不可能截住巡洋舰“沙阿列”号。“美杜莎”号的水兵和军官们都表示了充分的牺牲精神，以便拯救皇帝。

拿破仑知道这个建议后对蒙托隆说，他不同意作这样的牺牲；他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为了拯救个别的人而牺牲法国巡洋舰及舰上全体人员是绝对不行的。拿破仑离开巡洋舰“沙阿列”号，到了埃克斯岛。在那里，几个年青的军官打算用一只小船把皇帝偷偷送走。

但是拿破仑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拉斯卡斯又到梅特兰船长那里去，并且对他说，拿破仑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英国。梅特兰肯定地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对皇帝是会作出有礼貌的、应有的接待的。

1815 年 7 月 15 日，拿破仑坐上一只横帆二桅船“雅什特列布”号，这只船要把他带到“别列洛风”号上去。他身上穿的是他始终喜爱的近卫轻骑兵的制服，头戴三角帽。“雅什特列布”号上的水兵排成阵式，船长向皇帝报告。水兵们高呼：“皇帝万岁！”“雅什特列布”号接近了“别列洛风”号。梅特兰船长在梯子的下端迎接皇帝，向他低头鞠躬。拿破仑登上船，看见了列队在他面前的英国军舰的全体人员，梅特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部下。

拿破仑立刻走进梅特兰为他准备的船上最好的房间里去了。

英国在其存在的全部历史上最强大、最顽固、最可怕的敌人，已经在它的手中了。

第十七章　圣赫勒拿岛

(1815—1821 年)

一

远在 16 世纪初叶，在葡萄牙人继瓦斯科·达·伽马之后往大西洋南部的最初几次航行中，有一次发现了位置在南纬十五度半的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岛。这个小岛是在 1501 年 5 月 21 日发现的，这一天正好是天主教会纪念圣赫勒拿的日子，该岛因而取名为圣赫勒拿。这个小岛有一段时间（在 17 世纪）属于荷兰，1673 年最后被英国人夺去。英国西印度公司当时就在这里为往来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船舶建立了停泊处。

英国政府一听到拿破仑在“别列洛风”船上的消息，就决定把拿破仑流放到这里。这个小岛离最近的海岸（非洲海岸）大约两千公里，乘坐当时的帆船从英国到这个小岛大约要两个半月至三个月。圣赫勒拿岛的地理位置对英国内阁的决定的影响最大。在“百日”之后，拿破仑比自己在史诗中的最后一幕以前更加可怕。一旦拿破仑可能在法国重新出现，就会重新使帝国复活，并且引起新的全欧洲的战争。

由于圣赫勒拿岛在大洋中的位置和远离陆地，这就保证了拿破仑不可能返回法国。

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法国爱国主义的历史著作后来在谈到这个小岛时，说那是英国人特别选择的地方，以便尽快地消灭自己的俘虏。这是不对的。圣赫勒拿岛的气候非常宜于健康。在最热的天气，岛上的每日平均温度约为摄氏二十四度，而在最冷的月份，则将近摄氏

十八度半，而全年平均温度为二十一度。现在岛上的大树相当少了，但是一百年以前岛上有很多大树。饮用的水非常可口和宜于健康，岛上的降雨量非常多，草木茂盛，密茂的灌木丛里栖居着野禽。全岛面积为 122 平方公里，黑绿的、几乎是陡直的崖石似乎是从大洋底升起来的。

当拿破仑听到要把他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提出了抗议，说人们没有权利把他当俘虏。他从“别列洛风”转移到巡洋舰“诺森伯伦”号上，这只巡洋舰经过两个半月的航行，于 1815 年 10 月 15日把被俘的皇帝带到岛上，他注定要在这里结束他的余生。

只有很少的随从陪伴拿破仑到流放地来，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了很多要求到岛上来照顾皇帝的人。陪伴他的有：贝尔特朗元帅夫妇，蒙托隆伯爵将军夫妇，古尔戈将军，拉斯卡斯和自己的儿子。还有皇帝的仆人马尔尚以及一些仆人（科西嘉岛人撒其林等）。起先，拿破仑住在岛上隆乌德区的一所不很舒适的住宅里，后来搬到一所比较宽阔的房子里。

1816 年 4 月以前，岛上的首长是海军上将科伯恩，从 1816 年 4 月至拿破仑逝世止，岛上的总督是赫德森·洛。洛是一位愚笨的、知识有限的老兵，他怕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怕自己的俘虏。洛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拿破仑又逃跑。但是根据给总督的命令，拿破仑却享有自由，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骑马蹓躂，自己决定接见或不接见任何人。拿破仑一开始就非常讨厌赫德森·洛。他几乎根本不接见总督，对于请他吃午饭的邀请也拒不作答，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写的是拿破仑将军（英国于 1803 年起和拿破仑作战，当时他还不是皇帝）。

在岛上的还有法国、俄国、奥国等六国的代表。拿破仑有时接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旅行家，他们都是到印度或非洲（或从印度和非洲到欧洲）去路经圣赫勒拿岛的。

在离开隆乌德很远的一个唯一的小城里，驻扎有一队保卫该岛

的士兵。有趣的是：岛上卫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对拿破仑这个英国的死敌不仅显得尊重，而且有时还表露出伤感的情绪。士兵们向他献花，请求拿破仑的随从人员发善心让他们偷偷地去看看拿破仑。甚至在过了许多年以后，军官们在谈起这位俘虏(正是他使他们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生活了几年)时，也流露出同情心。

这终于引起了住在岛上监视拿破仑的大国的委员们的注意。亚历山大一世的代表巴尔马因伯爵说："最奇怪的是，这个失去了皇位、被卫兵看守着的人，这个俘虏，竟能够影响一切与他接近的人……法国人看见他时浑身发抖，认为自己为他服务是十分幸福的……英国人只是带着景仰的心情去接近他。甚至那些看守他的人，也热烈希望他看自己一眼，力求他说出片言只语来。谁也不敢和他并列。"

跟随拿破仑来到圣赫勒拿、并和他一起住在隆乌德的他的小朝廷仍然吵架、钩心斗角，好象他们还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似的。拉斯卡斯、古尔戈、蒙托隆、贝尔特朗都赞美拿破仑，说他是他们的上帝，彼此之间互相嫉妒。古尔戈将军甚至有一次还要和蒙托隆举行决斗，只是由于皇帝的愤怒的申斥才使口角终止。三年以后，拿破仑甚至利用各种借口把古尔戈打发到欧洲去了，因为古尔戈的赞美和令人难受的性格使他厌烦极了。他也失去了拉斯卡斯，拉斯卡斯是 1818 年被赫德森·洛从岛上驱逐出去的，拉斯卡斯记下了和拿破仑的谈话，其中很多只是拿破仑对他口述的，在一切有关圣赫勒拿岛的回忆录中，这些记载是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文献。当拉斯卡斯必须离开的时候，拿破仑身边已经再也没有这样合适的和这样有教养的秘书了，因此，关于皇帝最后几年的生活我们知道得很少。

二

拿破仑产生了一种忧郁怅惘的心情，这是他和他的小朝廷从未

感受过的，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了。这不是由于赫德森·洛的惹人烦恼的、琐碎的挑剔（这些挑剔并不能怎么侮辱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根本就不让总督到他那里去）造成的，不是岛上的气候（宜于健康的和温和的）造成的，也不是物质生活条件（这些条件一点也不比总督的差）造成的。看来，他主要是被闲散折磨了。他大量地读书，骑马，外出，对拉斯卡斯口述。但是，他一生养成了每天不倦地工作十五小时、有时甚至十八小时的习惯，现在要他来过这种生活，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他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他竭力与周围的人谈话，显得很活跃，看来，有时也因此而摆脱了自己的忧愁。他坚毅地忍受着自己所处的地位。

当他还在“诺森伯伦”号上作长期的海上航行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拉斯卡斯口述自己的回忆。他在岛上也继续这样做，直到拉斯卡斯离岛为止。他和拉斯卡斯的谈话，和蒙托隆的谈话，和古尔戈的谈话，他口述的并经他看过的《海角来信》，根据他的委托（但是他没有签字），后来都由拉斯卡斯付印了，——这些材料所谈到的事实并不具有客观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告诉人们拿破仑希望后代怎样来看待这些事实。

从一切和拿破仑的谈话的记载中，从一切多少可以信任的回忆中（更确切些说，就是从拉斯卡斯、蒙托隆和古尔戈的回忆中，因为安通马尔基和奥马拉不应该得到任何信任），可以看到许多所谓“拿破仑神话”的历史资料，但是用来评价拿破仑本人和他统治的历史的有价值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很少。“拿破仑神话”后来在历史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在雨果和海涅、哥德和采德利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巴尔扎克和培朗热、密茨凯维奇和托维扬斯基以及很多诗人、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家以前就编写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想象，顽强地转向于并且长久地固定于这位伟人的身上，黑格

尔认为这位伟人在耶拿之战以后成为“宇宙精神”的化身，人类历史的推进者。神话在圣赫勒拿岛就已经开始编写了。

但是在我的这本书中只谈拿破仑，根本不谈“拿破仑神话”的历史。

因此，皇帝住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的材料提供得很少。“上帝”说的话是绝对无误的，而信徒就记录下来。赞美、热爱、宗教般的膜拜，——然而能够有助于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不是这些感情。拿破仑和周围的人的谈话当然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后代和历史。他当时是否十分坚定地相信，他的朝代注定还要统治法国，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和周围的人谈话时，似乎就是指的这件未来的事实。有一次他直接说出他的儿子还会当皇帝的想法。

他对于他进行的战争、其他著名将领的军事艺术、以及一般军事问题的极其丰富的意见（和口述材料）当然是令人特别感兴趣的。在每一个字里面，都能使人感觉到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大师、行家和兴趣广泛的人。有一次他说道：“战争是奇怪的艺术；我曾在 60 次战役中作战，我要告诉你，在所有这些战役中，我沒有学到一点我在第一次战役中所不知道的东西。”在将领当中他十分推崇秋林、孔代。毫无疑问，拿破仑认为自己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虽然他从未明确地这样说过。他以特别骄傲的口吻谈到奥斯特里茨、博罗迪诺和瓦格拉姆的战役，以及自己的第一次战斗（在意大利的战斗，1796 年至 1797 年）和临末以前的一次战斗（1814 年）。他认为在瓦格拉姆近郊消灭奥国军队是自己最好的战略上的成就之一。拿破仑认为，如果秋林或孔代在瓦格拉姆，他们也会马上看到哪里是要害阵地，就象拿破仑所看到的一样，“而恺撒和汉尼巴就不会看出来”。——他这样加了一句。他肯定说：“如果秋林在我的军旅中帮助我的话，我就会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拿破仑认为，只有每个军官都知道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的军队，才是最优秀的军队。

有一次，他对自己没有在博罗迪诺或者在克里姆林宫阵亡表示遗憾。有时，他谈到这一点时，不是指博罗迪诺而是指德累斯顿，更喜欢指滑铁卢；他骄傲地回忆起“百日政变”，并且谈到在儒安港口登陆时和滑铁卢之役以后对他表现出来的“人民的热爱”。

他不停地惋惜他放弃了他征服的埃及，并在撤除对阿克尔的包围后，于 1799 年从叙利亚回国。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的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他重复说（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战略是和他完全一致的）。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从那里赶跑。他经常不断地谈到滑铁卢，并且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完全不能预见到的偶然性，如果他还有从前的，在各次战争中死去的元帅贝西埃、拉纳，如果他有缪拉，那末，战争的结局就会改观。他回忆起来感到特别沉重的是，他的这场最后的战斗正是被英国人赢了。

他现在承认，入侵西班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西班牙脓疮”），而 1812 年进攻俄国是第二个错误，而且是最致命的错误，虽然他谦逊地（对自己）谈到引起他进攻莫斯科的“误会”。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拿破仑认为，当他于 1812 年到达德累斯顿，知道瑞典王储不打算帮助他进攻俄国、而土耳其苏丹已和俄国缔结和约的时候，他就应该放弃进攻。进入莫斯科以后，他应该马上退出，赶上库图佐夫，消灭俄国军队。“这场与俄国进行的致命的战争，我是由于误会才投入这场战争的，这可怕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吞食了整个军队……随后，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他继续说：他这个皇帝还能够这样长久地进行抵抗，并且在这场反对全世界的战争中，最后胜利不止一次地倾向于他这方面，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在提尔西特，他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想法：把普鲁士从地面上消

灭，使之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正如他现在所承认的，他也想在 1809 年把奥国消灭掉，但是他在艾斯林战斗中的失败阻止了他，所以奥国在瓦格拉姆一役虽然损失惨重，但仍然继续保留了下来。

他不止一次回想起处决当甘公爵的事，但他对此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后悔，而是带着这种精神说，如果他重新开始的话，他还会这样做的。有趣的是：他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全欧洲的可怕的流血厮杀中处于中心地位，并且正如他自己所说，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他在回忆这场厮杀时，一点也没有把它想成是悲惨的、沉重的、哪怕是一时一刻使人的心情感到忧郁的事情。确实，他力图进行侵略，但是这是他的嗜好；他“太爱战争”。

小姑娘培西·巴尔科姆是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个英国包工头的女儿，拿破仑很喜欢她，想教她学法文，让她到他那里去和他谈天。当她已经和拿破仑搞熟以后，她和另一个小姑娘雷治有一次问他，他真的吃人吗（她们还在英国的时候就听说了），于是他带笑地告诉她们，他真的吃人，而且总是以人佐餐，……小姑娘雷治显然过于从字面上来理解成人的话，引得拿破仑大笑不已；但是从转意上来理解的这种话，早在他认识小姑娘巴尔科姆和她的朋友之前就听说过了，从来没有引起他什么反应，除了鄙视地耸耸肩以外。

在与约瑟芬离婚以后，在拉纳元帅在艾斯林死去以后，在迪罗克在格里茨死去以后，世界上只还有一个人是拿破仑一生中所爱的：这就是他的小儿子，这位小儿子从 1814 年起就和自己的母亲玛丽亚·路易莎一起住在他的外祖父奥国皇帝弗兰茨那里。还在 1816 年，当拿破仑刚来岛上的时候就确信他的儿子将要当皇帝，因为法国从今以后只能依靠“群众”，也就是说：或者是共和国，或者是深得人心的“人民的”君主制。而深得人心的朝代只能是人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朝代，即拿破仑的朝代。

由于他的表面的、不彻底的行动，使他不可能在 1815 年领导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波旁王朝、贵族、僧侣的运动，而他在圣赫勒拿岛时仍然怀着这样的心情赞扬自己当时的行为。

这里的不彻底性是表面的，是从不能准确地了解事物而产生的、拿破仑的君主制不是“人民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而他替自己儿子所设想的国家，同样是不以普通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为依靠的，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依靠的。“人们有什么可感谢我的呢？我上台时他们是贫困的，离开时他们也是贫困的！”——这句话是滑铁卢战役之后有一次他脱口说出的，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包围了宫廷，要求拿破仑留在皇位上。

拿破仑在巴黎时和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时都对蒙托隆伯爵重复说过，如果他希望利用他在 1815 年登陆时所遇见的革命的仇恨心来反对贵族和僧侣的话，那末他就会带着“两百万农民”进入巴黎；但是他并不想率领“贱民”，因为“这种想法会激怒（用他的说法）”他。

显然，他仍然抱着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种情绪。但是，突然，——在他死前不久，在经过报纸和口信从欧洲传到圣赫勒拿岛上的关于德国革命骚动、学生闹风潮、德国解放思潮等等消息的强烈影响下，——皇帝急剧地转变了自己的阵线，并且向蒙托隆说了（这已经是1819 年的事情）一些与自己以前的见解针锋相对的话。“我应该把自己的帝国建立在雅各宾党人的支持上。”因为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是一座火山，借助于这座火山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普鲁士。而一旦革命在普鲁士取得胜利，他认为，整个普鲁士就在他的权力之下，整个欧洲也会落到他的手中（«我的雅各宾主义的武器和力量»）。确实，当他谈到未来的或可能的革命时，他的思想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主义”，也未预料到社会革命。有时他已经感到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是他的同盟者，但他却白白地把这个同盟者推开了。

三

他和蒙托隆最后一次长谈（关于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是在 1819 年 3 月 10 日进行的，这是他和随从人员最后几次谈话中的一次。

这时，关于皇帝的消息已经越来越稀少、沉寂、暗淡、时断时续了。

拉斯卡斯已经不在，被赫德森·洛从岛上驱逐出去了，古尔戈也已不在，他是皇帝叫他走的。不久以后，爱尔兰医生奥马拉也很快走了，他还当过间谍，向总督报告隆鸟德的情况。在留下的人当中，有安通马尔基医生，他是拿破仑家人从欧洲派来的，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医生（还是一个说谎的回忆录作者），拿破仑最后甚至不见他。贝尔特朗、蒙托隆、几个仆人，——这就是那些在这最后几年中比别人都更多地见到拿破仑的人。

从 1819 年起，他的病就越来越多了。1820 年病情加剧，而在 1821 年初，被拿破仑允许来为自己治病的英国医生阿诺特发现病情相当严重，但是在每次臥病之后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间隔期，这时他就出来散步。1820 年倦怠的现象已越来越明显。他往往说了半句话就不再说下去，而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开始沉默不语了。这时，在 1820 年年底之前，他的关于自己的统治的口述记录和回忆（这是向两位可靠的人叙述的，1818 年之前是向拉斯卡斯和蒙托隆伯爵叙述的，1818 年至 1820 年是对蒙托隆叙述的），由拉斯卡斯记录下来的有两厚本（最近出版的），由蒙托隆记录下来的有八卷（1847 年版），——这还不包括蒙托隆专门论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两卷本回忆录。

从 1820 年年底起，他已经很少驾车出游。他早就不骑马了。

1821 年 3 月，可怕的内部的疼痛复发，而且发作的次数逐渐加

多。看来，拿破仑早已猜到这是癌，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症，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才活四十岁就因癌症而死去了。

应该顺便指出，最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在法国和德国的医学杂志上好几次提出了一种意见，似乎拿破仑的最后的病症根本不是癌，而是一种特别的热带病，当他年青时进攻埃及和叙利亚的时候就已经染上这种病，后来他进入热带这个病就发展了。

4 月 5 日阿诺特医生通知拿破仑的随从人员贝尔特朗元帅和蒙托隆伯爵说，病人的情况十分严重。当疼痛稍稍减轻的时候，拿破仑力图鼓起周围的人的勇气。他对自己的病取笑说："癌是从内部来的滑铁卢。"

4 月 13 日他命令蒙托隆抄下他口述的遗嘱，4 月 15 日他亲自抄写这个遗嘱，并在上面签字。遗嘱上面包含了现在刻在巴黎荣誉军人院大理石板上的那些字句(从 1840 年起，装着拿破仑尸体的棺材就放在这个教堂里)："我希望能够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我如此热爱的法国人民中间。"在这个遗嘱中，他称马尔蒙、奥热罗、塔列朗和拉法叶特是叛徒，他们曾经两次帮助法国的敌人获得胜利：奥热罗被称为叛徒显然是由于他在 1814 年 4 月同拿破仑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拉法叶特是由于 1815 年 6 月在议会中反对过他。这两个严厉的判决后来甚至没有被皇帝的最热心的信徒所批准，但是对于马尔蒙和塔列朗的这种鉴定是通过了。遗嘱中的其他各点大多是有关分给各人的金钱的数目：给贝尔特朗五十万，给仆人马尔尚四十万，给在岛上服侍他的其他仆人每人十万，以及给留在法国的拉斯卡斯和很多他知道忠实于他的将军和大臣的数目等等。他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共计两亿金法郎，他在遗嘱中说，一半分给在他的旗帜之下战斗过的"军官和士兵"，另一半分给 1814 年和 1815 年遭受侵犯的法国各地。遗嘱中也有地方谈到英国人和赫德森·洛："我被英国的寡头政治和雇佣兵杀死得过早。英国人民不要迟延为我报仇"。他在

遗嘱中叫儿子永远也不要反对法国，并且记住座右铭："一切为了法国人民"。

他十分安静，先是口述遗嘱，然后自己再抄写。三天以后，他对蒙托隆口述一封信，要蒙托隆在他死后，用这封信把发生的事情通知总督，并且要求英国人把所有的随从人员和仆人从圣赫勒拿岛送回欧洲。

4月21日晚上四点钟，他突然对蒙托隆口述改组法国国民近卫军的方案，以便在保卫领土不受敌人侵犯时能够最合理地使用它。

5月2日阿诺特医生、肖尔特医生和米歇尔斯医生告诉随从人员说，死亡已经十分临近了。苦痛大大加剧了，以致5月5日傍晚，拿破仑在半昏迷状态中从床上跳下来，用很大的力量痉挛地压在蒙托隆的身上，他们两个人都跌到地上了。人们把拿破仑抬起来，他再也不能恢复知觉了，接连几小时都躺着不动，睁开眼睛，沒有呻吟。他以前在最疼痛的时候也几乎不呻吟，而只是辗转反复。在拿破仑的房间里，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和仆人，有的在床边，有的在门边。拿破仑动了动嘴唇，但是几乎什么也听不清；这天大洋上有最猛烈的暴风雨，把大树连根拔起，刮走了岛上的一些房屋，震动了整个隆乌德庄园。

岛上的总督赫德森·洛和英国卫队的军官一得知拿破仑濒于死亡状态，就连忙赶去，留在这所房屋的其他房间里。离床很近的人听见他的最后的话是："法兰西……军队……先锋……"。

1821年5月5日下午六点钟，黄昏之前，拿破仑与世长辞了。

哭泣着的仆人马尔尚把他所保存的、拿破仑在1800年6月14日马伦哥一战中所穿的大氅盖在拿破仑的身上。然后，总督和军官们走了进来，向死者低头致哀。然后贝尔特朗和蒙托隆让列强的委员们进来，他们现在是到岛上后几年来第一次走进皇帝的房子，因为皇帝不接见他们。

四天以后，棺材就从隆乌德运出。在送葬行列里，除了随从人员和仆人以外，还有卫队全体人员，全体水兵和海军军官，以总督为首的文官，以及几乎全岛的居民。当棺材下放到墓穴的时候，礼炮轰鸣：英国人给死去的皇帝致最后的军人的敬礼。

结　束　语

一

一个叫做“波拿巴主义”的历史现象与拿破仑一世联系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十分注意这一现象，他们的言论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相互补充的。他们曾多次谈到波拿巴主义，这指的是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时代，并正确地认为第一位法国皇帝是这个政治体系的创立人。拿破仑一世力图建立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不仅与雅各宾党人进行斗争，并且(特别是在自己的统治初期)与企图让半封建的君主制的“旧制度”复辟的保王党人进行斗争，而拿破仑三世建立的帝国，则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别的战斗武器。

为了在本题内谈谈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波拿巴主义，就必须弄清楚，拿破仑一世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而且现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都说拿破仑是完成革命的人。

这当然是不对的。他确实从革命取得了和利用了革命为法国大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提供的一切，并且镇压了革命的风暴。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革命的“完成者”，而完全有权利必须说他是革命的镇压者。革命以拿破仑的专政宣告结束，这首先标志着大资产阶级分子对手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对薄有财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胜利，对 1789 —1794 年即热月九日之前起了十分伟大的革命作用的平民自发势力的胜利。而私有者农民完全支持拿破仑的专政，因为它使他们的利益免遭封建主复辟企图的损害。

拿破仑枪杀雅各宾党人，他是一位专制的君主，他把法国周围的

共和国变成了王国，把这些王国分送给自己的兄弟、妹夫和元帅，——这种不容争辩的历史形象与革命的完成者的称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只有虚假地把拿破仑理想化才会否认这一点。消灭民主制，建立无限的个人权力，而所有这些行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保卫有产阶级的利益，建立对全欧洲的统治，——这就是拿破仑一世的活动中的东西，只有想继续和加强“拿破仑神话”而不顾历史眞实，才会否认这一点。“拿破仑神话”在过去已经带来了那么多可怕的恶果，这正是因为这个神话是依靠觉悟不高的、动摇不定的群众来维持的。归根到底，从 19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这个神话，总是为社会和政治的反动势力服务的。

不承认拿破仑的巨大的多方面的才能，不承认这位历史巨人的异常广阔的活动，当然是荒谬的。

本书读者在本书中会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征服对于封建社会的欧洲的影响等非常积极的评价。有兴趣的读者如果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会发现更多的这样的评价。他们完全无所偏袒地不仅指出拿破仑客观上对人类历史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指出拿破仑作为镇压法国政治自由的萌芽的反动的波拿巴主义的创立人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第二帝国时代，但是他们当然并不需要这种残酷的试验，就会清楚地了解，波拿巴主义作为对内政策对外政策的体系，在 19 世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只可能是反动的，它只有依靠无限制的暴力、不断地欺骗人民群众，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军事冒险，才能够维持统治。

二

在对外政策方面，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指使的侵略的、帝国

主义的意图，推动拿破仑去进攻欧洲，但是腐朽的半封建的欧洲社会不能够对一开始活动就成为伟大的统帅的拿破仑的最初的袭击成功地进行抵抗。同时，对被侵略各国的征服，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正如拿破仑政策对英国经济的打击，加强和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

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在摧毁农奴制欧洲的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理论和实践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这场革命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而拿破仑正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机会。不是拿破仑而是革命，使大规模的运动，分散的队形与紧密的纵队相结合的策略，大部队作战，士兵的觉悟，新的征兵制原则等成为可能和必要；但是，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天才地指出，这一切都可以利用，可以达到什么目的。恩格斯深刻地研究过他的进军，指出说，是拿破仑第一个教会大家了解、思考、有意识地接受这一切变化。在军事方面，他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要比他在其他一切方面的活动远为伟大。

恩格斯认为，拿破仑不仅大大超过自己的前人，而且大大超过企图在这种十分困难的艺术中向他学习、摹仿他的现代的将军："……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①

恩格斯认为拿破仑使军事系统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承认它有两个"枢纽"，那就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58页。

恩格斯认为，一般说来，拿破仑甚至在遭到失败的进军中也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在完全防御性的战局中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是拿破仑的两个卓越的战局——1814 年战局和 1815 年战局，虽然前者以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而告终，后者以滑铁卢的失败和巴黎的陷落而结束。在这两个著名的战局中，这位完全为了保卫遭到敌人侵犯的国家而战的统帅，在一切地点一有机会就向敌人进行攻击；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地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① 1814 年和 1815 年的两次进军，拿破仑都失败了，其原因完全不在于计划和拿破仑对计划的执行，而主要是在于联合起来的欧洲在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和“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连年战争因而力量消耗殆尽的国家，已不可能单独抵抗整个武装起来的世界对它的进攻。”② 恩格斯谈到奥斯特里茨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被公正地认为是拿破仑的最大的胜利之一，是他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的最有力的明证；因为，虽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联军的错误，但是，他所具有的发现联军的失算的洞察力(coup d'oeil)，耐心地等待失算的最终造成，予以毁灭性打击的果断精神和闪电般迅速地造成大灾难，——所有这一切远远超过任何夸奖而且值得任何赞扬。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战略上的奇迹，只要战争还存在，这次战役就不会被忘记。”③

拿破仑说过：“欧洲有很多优秀的将军，他们希望一下子就看到很多东西，而我只看一个东西：兵员（敌人的），并且力图消灭他们。”拿破仑在利用胜利，在继续追击以粉碎敌人方面也是难以仿效的。普鲁士的军事历史学家约克·冯·瓦尔滕堡伯爵写过一部著名的论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 11 卷，第 2 册第 565 页（据俄文版第二版第 14 卷说明，《奥斯特里茨》一文非恩格斯所写，故未收入。——译者）。

拿破仑统帅的两卷著作，他把拿破仑在 1805 年 12 月 3 日(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的第二天)给苏尔特元帅的命令，叫做“在短短的几句话中包含了全部追击战的科学，这种科学是由最有权威的人叙述的”。拿破仑善于在自己手中掌握大量兵力，并且使他们不仅在战斗准备时期而且在战场上迂回运动，要他们突然构成谁也无法事先预见的新的队形。在这些方面他在当时是无法超越的巨匠。

无论是写了专门著作论述拿破仑，或者只是顺便谈到他的历史学家和战略家，都承认拿破仑利用和考虑了法国革命在军事方面所创造的新的、从未有过的机会；他天才地利用了这分遗产，成为革命后进行战争的方法的最大理论家。大量群众进行的战争；有大批后备军的战争，这些后备军只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才能提供出来；有效地利用后方的大量物资和人力的战争，——所有这一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都充分地显示出来。他所领导的大军的密集的群众，“在一定的时间，在需要的地点”(这是他的话)比敌人强大。

拿破仑熟悉地图，并且比别人都善于利用地图，在这方面他超过了自己的参谋长和地图专家贝尔蒂埃元帅，也超过了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一切统帅。同时，地图从来也不曾束缚他，当他离开地图走上战场，发表演说激励士气，发布命令，管理大批密集的部队的时候，他也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命令，他给元帅们写的信，他的个别的言论直到现在都是有关堡垒、炮队、后勤、侧翼运动、迂回、各式各样的军事项目等等问题的基本教材。

确实，也许除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之外，从来没有一位著名的统帅象拿破仑那样长久地处于如此有利的情况中：他不仅一身二任，既是权力无限的君主，又是总司令，而且统治着一大批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凯撒最先曾经长期地作为一个统帅而战斗，管理国家的议院让他去占领新的省份，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战斗，追逐敌党的军队。但他从未作为罗马帝国的全权统治者统帅罗

马帝国的全部军队从事战争。汉尼巴是这样一位统帅，他依赖的是商业共和国的吝啬的、钩心斗角的议院。秋林和孔代则受到法国宫廷的反复无常的摆布。苏沃洛夫起先听命于不同情他的叶卡德琳娜，后来则受制于半疯的保罗和奥国的内廷军事顾问。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确实是权力无限的君主，但是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是贫穷的小国，人力和物资都很缺乏。

至于拿破仑，只有他最初的功勋和征服（土伦、意大利、埃及、叙利亚进军）才是在政府的管辖下取得的，但他当时已经不服从政府了。而从 1799 年起，他自己成为法国和所有一切直接或间接服从他的国家的权力无限的统治者了。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是大陆上的先进国家：法国本国、荷兰、德意志的莱茵区。雾月 18 日之后，拿破仑当了整整十五年的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而象尤利·恺撒，在渡过卢比孔河之后，只当了五年权力无限的统治者，其中头两年完全是在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的内讧之中度过的。

无论是物质力量、金钱、时间和机会，拿破仑都比他的在军事艺术方面的任何一位前辈得到更多，便于施展他的军事天才。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天才比他的前辈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强大得多。

拿破仑以独特的表达方式，把一位好的统帅的各种品质的综合，比成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底和高始终是相等的：在这里他所说的底是指性格、勇敢、英勇精神、果断，他所说的高是指智慧，智力上的素质。如果性格比智慧强，那末统帅就会迷恋战斗而比需要的走得更远。相反的，如果智慧比性格强，那他就缺少勇气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如果一支军队要避免遭到失败，完全的一长制在军队中是绝对必须的：“一个蹩脚的总司令胜过两个优秀的总司令”。而他自己，如果不算 1793 年围攻和占领土伦的话，从来没有在他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中，有哪个同僚与他权力相等，更不用说权力超过

他了。

我们现在只来谈谈几件事情。

拿破仑打倒了对于白刃战的崇拜。在苏沃洛夫以后，白刃战被大家都接受了，虽然苏沃洛夫本人根本沒有否定炮队的意义。“现在战斗决定于炮火，而不是决定于白刃战”，——皇帝在论战场工事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继续应用法国革命军队的战术，在自己进行的最初几次战爭中，他先派出由射击手组成的流动的“散兵线”，他们在大炮的支援下准备了主攻，为攻击的纵队扫清了道路。他自己敏锐地注视着并且严格地提示自己的元帅们和意大利副王欧仁·博阿尔內，只教会士兵射击是不够的，必须教会士兵射击得很准确。但是，拿破仑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过于长久地让步兵射击手得不到炮队的支持；如果敌军的炮队轰击这些步兵射击手，那末他们最后会很容易泄气，而遭到毁灭。他认为派来炮队以后，应该尽量发射猛烈炮火，因为只有密集的炮火才能有比较严重的意义。在拿破仑进行的战爭中，炮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时简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例如在弗里德兰，支援维克托军团的塞纳尔蒙的四十门大炮，还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最猛烈地轰击了俄军部队，迫使俄军从弗里德兰城和阿勒河溃退，遭到毁灭性的损失。

应该指出，从 1807 年起，拿破仑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运用新的战术和新的战规，他应用十分巨大的、因而是十分容易被攻破的队形，这是他的前半生军事活动中沒有应用过的；当他的革命时期的军队的老兵和在埃及、马伦哥、奥斯特里茨作过战的老兵的队伍沒有大量减员之前，他沒有这样使作战的士兵大量密集过。

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拿破仑不重视敌军的堡垒，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他只是要求并且教导自己的元帅们和将军们相信，决定战爭的不是攻占敌方的堡垒，而是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和野战军。但是在这里，他当然也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并且善于估计到情况的独

特特点。

当 1805 年他看出占领乌尔姆就可消灭奥军的主力的时候，他正是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主要打击用来围攻这个堡垒。

他认为堡垒具有次要的意义，这一点和他的另一个特点即对主动权的看法是有逻辑联系的。“开始进军以前要深思熟虑，但是一旦开始以后，那就无论如何要使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807 年 2 月 8 日可怕的艾劳之战结束后，拿破仑的军队和俄军一样，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某些团队只剩下一营人，而有些团队连一营人也不到。拿破仑在晚上走进自己的帐篷，给自己的朋友迪罗克写了一封短简，其中以隐约的暗示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当冬日昏暗的拂晓到来的时候，却发现本尼格森不但后退了，而且大大后退了。也就是说，主动权掌握在拿破仑手里。也就是说，昨天取得了胜利。皇帝立即把艾劳之战称为自己的胜利，虽然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俄军还远未被粉碎。本尼格森缺少坚毅不拔的顽强精神，他先胆怯地后退了，沒有把拿破仑的主动权夺过来，虽然在战场上每三个俄军尸首的旁边，就有两个甚至三个法军的尸首。

在总的指挥战爭，选择战斗地点和时间方面，在战斗之前的最初的战术活动中和在战爭开始的时候，主动权都应该掌握在总司令的手里。但是，拿破仑在战斗之前给元帅们发布十分明确的命令（命令的明确一直为专家所称颂）的时候，他从不用一些琐碎的、非常详尽的指示去约束他们，而这一点正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旧派的总司令，无论是奥地利的、普鲁士的、英国的、（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俄国的总司令所十分喜欢作的。

他命令元帅们力图在某个地区完成某种任务，并且指出，为了某个总的战略目标，这一点必须实现，至于元帅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这就留给他自己去考虑了。但是，在战爭中，拿破仑仍然是军队的中心和首脑。元帅们在实现自己的任务时始终与皇帝保持联系，向他

报告战斗的进程，请他增援，使他了解不断变化的形势。

拿破仑本人在奥斯特里茨之战过了差不多五个月以后，批评了库图佐夫关于这次战斗写给亚历山大的报告。拿破仑写道，整个庞大的法国军队都由皇帝统领着，并且准备执行他的任何一个命令，就象一营人被自己的营长统领着一样。

当代人和后代人最难了解的是，拿破仑既然不压制自己的元帅和主要的将军的个人主动性，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领导地位呢。但是，他们的这种局部的、所谓执行性的主动性是完全服从于总的、最高的权力和皇帝的控制一切的主动性的，并且教导他们在拿破仑离得较远的地方，在过于危险的情况下，不要自作主张。他们之中，完全独立的大的统帅并不多，只有达乌、马塞纳才是，奥热罗可以部分地算在内。其余的大多是优秀的、有才干的执行者，而他们作为执行者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拿破仑带着悲哀的心情承认了这一点，他叹道："我不能同时在各处呀！"

当 1814 年他在通往巴黎的要冲地方进行战斗时，他不仅缺少三十万精选的士兵(因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从 1808 年起已经战死了，一部分人也将葬身于西班牙，一部分还继续在占领德国的某些城市和意大利的某些地方)，他不仅缺少法国军队，也缺少长期以来在不断的西班牙战争中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马塞纳，缺少这时被围困在汉堡的达乌，缺少未从那不勒斯前来的缪拉。他把自己优秀的士兵和久经锻炼的助手分布到自己辽阔的帝国的各处，而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不在他的身边。不仅是这一点，但也是这一点，成为 1814 年和 1815 年的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当他们大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当大军没有在毫无希望的漫长的时期中被分为两部分，并且其中一部分在遥远的西班牙作战和覆灭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欧洲的不可摧毁的专制的主宰。

对执行者的绝妙的挑选，特别表现在一种新的纵深包抄的行动

的实践上，若米尼在研究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成为这种实践的理论家。拿破仑指出，包围敌军只在下列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第一，深入敌人后方，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线；第二，这种包围行动会引起一场进行包围的队伍参加的战斗。

拿破仑时代的另一位理论家冯·比洛夫认为，只要威胁交通线就够了。但是若米尼根据拿破仑的军事上的创造，坚持认为，在进行成功的、适宜的包围之后，必须以战斗来结束。拿破仑认为，在包围时，包围者如果不赶快进攻，就有遭到敌人反包围和攻击的危险。在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拿破仑的元帅们在实行包围的时候，有时达到理想的准确程度和速度，并且几乎总是十分成功的。

在敌人的主力固守在堡垒或者加强了的军营中的时候，拿破仑就实行包围，如果敌人拒绝投降，就进行猛攻。并且，如果实行了猛攻，那末一旦获得胜利，拿破仑就残酷无情。1806 年布吕歇尔企图在卢卑克的街道上进行抵抗，在法军得胜后，按照十分古老的传统，城市被抢劫一空，很多居民被杀死。在拿破仑进行的各次战争中，这种残酷无情的例子是有不少的。1799 年 7 月，装备齐全的土耳其军队(一万二千人)在埃及登陆，固守在阿布基尔堡垒中，并有三千人赶去增援，拿破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可怕的障碍：他对埃及的彻底征服受到很大的威胁。土耳其人很快就修筑起坚固的堡垒；用围攻的办法是决不能攻占的，因为英国人可以从海上支援土耳其人。拿破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实行正面攻击，直接发动猛攻。1799 年 7 月 25 日深夜两点钟，他下达了命令，拉纳和缪拉带着队伍首先冲入堡垒，主力接踵而至。整个土耳其军队被冲散和就地消灭了。在冲击之后过了两天，在记忆犹新的时候，拿破仑说道："这场战斗，是我见到的进行得最好的一次战斗，全部登陆的敌军沒有一个得救。"但是正面攻击不但使敌军受到很大损失，也使法军付出高昂的代价，拿破仑只是在沒有别的办法的时候才实行正面攻击。

拿破仑对于个人的勇敢、机智、个人的特殊的作战艺术评价甚高，但他不相信分散的慓悍的骑兵（如近卫骑兵或者哥萨克之类）能够抵抗住纪律严明的欧洲军队的大规模的密集的士兵，虽然他也说，在少数人发生冲突时，这种单个的很强悍的骑兵会有力量得多，而确实也是有力量得多。归根到底，是大批士兵决定一切，拿破仑不断地重复这个真理。统帅的艺术在于：第一，善于获得、武装和迅速训练很多营，建立大批军队；第二，在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时，部队全部在需要的地点；第三，开始战斗的时候，要善于不吝惜这些营，如果这是为了赢得战斗所需要的话；第四，在集合这些士兵之后，决不取消或推迟战斗，而是一有获胜机会，就寻求最快的决定性的结束；第五，这一点是最困难的，就是在敌军阵地中寻找必须给以决定性打击的据点。拿破仑说，在战争中，幸运的作用、机会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真正伟大的成就毕竟取决于统帅个人的素质，取决于头脑的工作，知识，讲求方法的行动的能力，施展计谋的才能，创造力和机警。拿破仑自己说过："突然向我揭开秘密，叫我在别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说什么或做什么的，不是天才，而是推论和思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恺撒、汉尼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们得到幸运的机会。不是的，幸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的人物，善于控制幸运。拿破仑在死前不久就是这样说的。

他的军事天才表现在善于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尽管会犯个别的错误和有疲惫的现象。研究拿破仑历史的战略家和策略家都一致承认，总的说来，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在 1813 年至 1814 年丝毫也不比他一生中最好的年代有所降低。甚至在 1815 年，当他的力量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当政治状况处于绝望地步的时候，当他自己长期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所拟定的各个击破敌军的战略计划，与 1796 年他在第一次意大利进军中拟定的计划，同样表现出很大的才能。实现这个计划的光辉的开端（布吕歇尔在林尼的失败），和事情

的继续(滑铁卢的战斗,当时只是由于布吕歇尔的偶然的及时赶到才把威灵顿从不可避免的、可怕的毁灭中拯救出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拿破仑直到现在仍然是眞正的军事艺术的巨匠。

但是,已经失去了另外一种东西,根据拿破仑自己的意见,这种东西对于统帅说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甚至比天才还重要——这就是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意识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破仑对拉斯卡斯谈到滑铁卢之战的时候说:"我已经沒有从前的自信心了。"

他的错误,首先是政治性的错误,使他失去了自信心。征服全世界的巨大的、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任务使拿破仑有害地违背了自己的战略规则。

拿征服的技术来说吧:拿破仑怎么可能在对早已征服的无比庞大的全欧帝国实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又去占领俄国的一些地区并使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保持畅通呢?在这种情况下,从哪里去取得必要的力量进行以后的战斗,去征服俄国呢?怎样执行自订的规则:永远做到在必要的时间,在必要的地点,比敌人强大?怎样想法做到,在马德里附近的战斗中,在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的各次战斗中,都成为胜利者呢?

拿破仑在自己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力图不违背自己基本的原则:稳稳地保持住自己的交通线。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莫斯科进军中,还在撤退之前很久,他的一切物资都大大减少了。1812 年 6 月在涅曼河时他有四十二万人,他带着这些人越过了国境,开始深入俄国腹地,后来他只带领三十六万三千人,其余的人要防守进军路线北面和南面的两翼。在威特斯克,拿破仑已经不是带领三十六万三千人,而是二十二万九千人了;到斯摩棱斯克时,只有十八万五千人。在斯摩棱斯克战斗之后,在那里留下一部分守卫部队,他从斯摩棱斯克到格查斯克时只带领十五万六千人了;到博罗迪诺战场只带领十三万五千人;同他一起进入莫斯科的是九万五千人。不仅敌人的炮

火、疾病、天气造成死亡，就是漫长的交通线，也毁灭了大军。此外，尚有二十二万人拿破仑没有带到涅曼河，而是把他们分散到自己广阔的全欧帝国各个地方，这一部分人根本就谈不到了，正如还有在西班牙战斗的二十多万人也无从谈及一样。

拿破仑对拉斯卡斯说，但是也有这种时候，必须破釜沉舟，调动一切力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并且取得对敌人的毁灭性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必须冒着交通线暂时被削弱的危险。“在 1805 年的战斗中，当我在摩拉维亚中部作战时，普鲁士准备向我进攻，而退往德意志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在奥斯特里茨取得了胜利。1806 年……我看见，奥地利准备进攻我的交通线，而西班牙打算越过比利牛斯山侵入法国。但是我在耶拿取得了胜利。”1809 年的战争的情况更危险，“但是我在瓦格拉姆取得了胜利”。拿破仑说，每次战争都应该是“讲求方法的”，也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获胜的机会。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进军只是自发的、混乱的运动的传统说法。他对蒙托隆伯爵说：“这些征服性的战争是进行得很正确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行动是与他们的力量和资财相适应的，因此取得了胜利。”顺便说一句，后来的东方历史学家完全肯定了拿破仑这一关于蒙古人的征服的意见。

拿破仑曾在不同的情况下多次说过，全部军事艺术在于：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地方，集中比敌人在此时此地更大的兵力。当督政府的成员戈伊埃谈到 1796 年至 1797 年的战争时，曾对拿破仑说：“你经常只有少量的兵力，却击溃了强大的敌人”，——拿破仑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力图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敌军分散的力量，把它们各个击破，因此，在每一具体的进攻中，他比敌人强大，虽然敌军的总数比拿破仑士兵总数要多。

他非常关心自己军队的“士气”。拿破仑坚决同意还在革命时期就实行的军队废除体罚的做法，并且在和英国人谈话时，总是表示不

了解他们为什么不鄙弃在军队中使用笞刑。“受了侮辱的人会做出什么行为来呢？一个在伙伴们的面前受了体罚的人怎么能对荣誉有所感觉呢？我不用皮鞭而用荣誉来进行管理……在战斗之后，我召集士兵和军官，询问他们谁是最杰出的”。他对杰出者当中有文化的人就赏给官阶，而对其中的文盲则命令加紧(“一天五个钟头”)学习文化，然后赏给他们下级军官衔，以后是军官衔。对于犯了严重过失的人，他毫不留情地枪毙，但是一般说来，他更喜欢奖励而不喜欢惩罚。奖励的办法包括金钱、官阶、奖章和通报表扬，他在进行奖励方面是非常慷慨的。“难道你认为能够迫使人们去作战，用议论去影响他们吗？——1801 年(花月 14 日)他在国务院会议讨论设置荣誉军团勋章时大叫道——它们(这些议论)只对书房里的学者适用。士兵是为了荣誉、功勋和奖赏而作战的。共和国的军队之所以完成了伟大的事业，是由于这些军队是由农民的子弟组成的，而不是由募集来的雇佣兵组成的，这些军队中没有贵族的军官，而是新的军官，他们有荣誉感。”

因此，拿破仑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非常成功地从革命所创造的材料中为自己准备了最有效的、强大的武器，这个武器掌握在巧妙的五匠手中，一定会表现出军事史上空前的成就。

他认为在自己身上具有一种主要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最重要的、最不能代替的，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坚决的精神，非凡的勇敢，这种勇敢不在于在危急的时刻手持大旗冲向阿尔科拉桥去占领它，或者在艾劳的城市墓地附近，在俄军的炮火之下接连几小时屹然挺立，而是在于完全担负起作出决定的最可怕的、最沉重的责任。赢得战斗的，并不是拟定作战计划或者找出必要的出路的人，而是负起执行这个计划的责任的人。

所有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权威，都认为他在下列三方面是同样伟大的：他是战术家，即有赢得战斗的艺术；他是战略家，即有赢得战争

的艺术；他是外交家，即有把自己的意志完全强加于被击溃的敌人的艺术，不仅彻底摧毁敌人的士气及其抵抗能力，而且迫使敌人在条约中写下胜利者所希望的东西。在他身上，所有这三种才能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的整体。当决战已经取得胜利，就必须派缪拉带领骑兵去追击和彻底消灭逃跑的敌军。而当缪拉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以后，就必须使战斗的胜利变成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必须在“绿色的桌子”旁边继续和结束对敌军的追击——也就是外交上的谈判和要求。

拿破仑通常总是在战争开始时力图尽快地用闪电般的进攻，用一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把敌人打倒，迫使敌人求和。

这一点使克劳塞维茨有理由认为拿破仑的作战方法是历史上崭新的现象，是使战争接近“自己绝对完善的境地”。克劳塞维茨写道：“……从拿破仑时代起，先是在一方，后来在另一方① 战争又成为全民的事情。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些说，战争大大地接近了自己真正的性质，接近了自己绝对完善的境地。进行战争的毅力，由于下列原因而大大加强了：资财的增加，可能取得胜利的广阔的前景，智慧的强烈的迸发。摧毁敌人成为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有当敌人被打倒而变得软弱无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谈判。”② 对于拿破仑整个作战方法的这一深刻的评价，是克劳塞维茨在研究“战争的政治目的和紧张程度”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然而这个评价应该加以补充：拿破仑本人把战争分为两种（进攻战和防御战），他没有划分出二者的明显的界限，而是认为这取决于由政治状况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种或那种具体的战争的性质。拿破仑在评述 1816 年出版的罗尼亚将军的著作时写道：“任何进攻战都是侵入敌国的战争，任

① 也就是说，起先是指为反对干涉者而斗争的年代中的法国人，后来是指抵抗拿破仑的各国人民。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国家军事出版社 1935 年版，第 545 页。

何出色的战争都是讲求方法的战争。防御战并不排斥进攻，正如进攻战不排斥防御一样，虽然进攻战的目的是越过国境，侵入敌国。”

拿破仑在简短地叙述了一些伟大的统帅的进军情况之后，认为“要对所谓军事艺术体系谈出任何一点意见都是多余的”。但是，和所有伟大的统帅一样，他当然力图击溃和消灭敌人。

克劳塞维茨的上述意见是片面的：例如，若米尼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意见。顺便说一句，应该指出下面这一点：恩格斯承认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有很大的价值，而他在研究拿破仑时却更重视若米尼的意见。例如，恩格斯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里（1853 年 4 月 12 日）曾写道：“若米尼到底是写这方面（拿破仑的各次进军。——作者注）历史的最好的著作家，而天生的天才克劳塞维茨，虽然写了一些优秀的东西，但是并不完全适合我的口味。”①

二

拿破仑对于他所仇恨的“雅各宾党人”是残酷无情的，这些雅各宾党人希望把革命的成果也给与贫民大众享受。

保卫私有财产，任何私有财产，其中也包括小农的财产（这种小农的财产在革命时期大大增加了），——这是拿破仑国内政策的主要基础之一，虽然，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拿破仑力图使个别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从属于自己帝国的利益。“非私有主”——例如，巴黎的工人，里昂的工人，亚眠和鲁昂的工人——是使他感到不安的因素，但他是相当聪明的，并不认为巡逻队、步哨、宪兵队和富歇建立的、从效力和灵巧性来说都合乎理想的间谍组织是防备工人的唯一东西。他企图抵抗失业的浪潮，这种浪潮在 1811 年把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583 页。

千名饥饿的工人赶到街头。这也是他实行大陆封锁的理由，以及对一切被征服国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垄断的理由，他的目的是为法国寻求销售市场，为法国工业取得廉价的原料。

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根据是：希望法国的工业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与此密不可分的就是，力图把英国赶出欧洲的一切市场。

但是，在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方面，拿破仑不仅完全保持了甚至禁止工人罢工的任何迹象的勒霞不列法的剥削的法律，把这个法律引进自己的系统化的立法中，而且在压迫和剥削工人方面还进了一步，实行了“工人手册”制度。

为什么工人们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也没有起来反对皇帝呢？为什么在 1816、1817、1818、1819、1820、1821 这些年间，在波旁王朝已经复辟的情况下，巴黎和外省的工人竟高呼“皇帝万岁！”这种“反叛性的口号”，以致波旁王朝的法官一再把他们长期关进监牢里去呢？

我力图在自己的书中对这一点作出回答。我的解释如下：工人们本能地了解到，皇帝所实行的革命后的资产阶级制度，无论如何总比跟在联军后面的大型货车带给他们的腐败的、贵族封建主的旧制度对他们有利。

定居在圣·安杜安郊区、圣·马赛尔郊区、汤普尔区、姆弗塔尔区的首都工人群众，还没有忘记英雄的革命的日子。但是，在“百日”的时候，甚至最忠实于革命传统的人也认为拿破仑是为害较小的，认为封建制度的复辟是最大的祸害。

如果说，在法国反对旧制度复辟危机的斗争中，拿破仑是新的、工业的、经济上进步的时代的代表，那么他在摧毁欧洲封建制度的根基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言论中，都强调了拿破仑所作的进步

的推动的意义。“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① 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德国的农民，无论是不满意咖啡、糖和烟草涨价的德国的城市居民，他们都不了解拿破仑，虽然大陆封锁是他们本国工业创始的原因……“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②

“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③

我们在反对巴枯宁的文章（1849 年 2 月 14 日）中读到：“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正是在谈到双方都是平庸地进行的 1853 年至 1855 年的东方战争的情况下），拿破仑的坚决性比这些庸碌之辈的行动更“人道”。

他们在谈到塞瓦斯托波尔之围时写道：“实在说，大拿破仑这个采用大胆、坚决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国家伟人’比较起来，堪称人道主义的模范……”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36 — 63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3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3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258 页。

恩格斯没有降低拿破仑的侵略对于欧洲的革命的作用，同时也没有闭目不看这一情况：拿破仑本人终于因“天意”而开始变成君主了。“……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作者)；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① 恩格斯认为，拿破仑也开始拜倒在“正统主义的原则”面前，这一点终于毁灭了他。

拿破仑摧毁了大陆上的所有的君主制，这是巨大的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最终耗尽了他的力量，因为站在经济落后于拿破仑法国的欧洲这一边的，有经济上远远超过拿破仑法国的英国，并且，英国舰队控制着海洋，所以英国在战略上也不会遭到拿破仑的直接打击。

拿破仑立刻就看出，这个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他希望在东方，从埃及和叙利亚战胜这个敌人；他打算从布伦军营出发，在伦敦战胜这个敌人。当这两个企图都无法实现的时候，他想把英国货赶走，但不是用大量价廉物美的法国货来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用刺刀、步枪、士兵和关税来把英国货赶出整个欧洲大陆。为了使英国破产，只摧毁它的工业是不够的，必须破坏它的商业，海上贸易，并且把英国殖民地的作用化为乌有。拿破仑也这样做了，禁止输入糖、棉花、靛蓝、印度尼西亚茶叶、咖啡、香料。要完成大陆封锁，从逻辑上说来，就要求整个欧洲和俄国绝对服从拿破仑的意志，也就是服从世界帝国的意志。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以后就明显地要造成世界帝国，用“西方皇帝”的名称来掩饰(相当明显地)自己的企图。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这些企图越来越明显了。在这条路上他不能不遭到毁灭，而且的确毁灭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38页。

四

有人想把拿破仑说成是无罪的、仁慈的天才，说他降生到世界上来只是为了替人类做些好事，有人想把二十年接连不断的流血战争解释为只是必须进行“自卫”，有人想给与拿破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坏事涂脂抹粉(法国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这样做)，所有这些企图与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拿破仑本人从来不因对这些罪恶勾当的回忆而感到不安。看来，他一直真心诚意地把自己与法国等同起来，而这就成了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的现成理由；法国的幸福，法国的伟大，法国的安全——这就是在他心目中替他的行为辩护的东西。

上面我已经说过，他所说的法国实际上是指人民中的哪一个阶级，他指的是大资产阶级，部分地也指私有的农民。

但是，从道德(或“道德化”)方面过渡到智力方面，就可以理解罗兹伯利伯爵的话了，他说，“拿破仑无限地推进了在他出现之前被认为是人类的智慧和精力的极限的东西。”另外一位英国人霍伦德·罗斯教授，他决不是同情拿破仑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对拿破仑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也认为拿破仑是“站在不朽的人们的前列”，因为拿破仑具有空前巨大的、多种多样的才能，在世界历史上据有显著的地位。“拿破仑能够在一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①

在拿破仑身上沒有那种狂热的残酷心，但是却有一种对于只被他当做手段和工具的人的极其冷漠的态度。当他认为残酷、奸诈和背信弃义的欺骗行为已经成为必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了。他的冷静的头脑对他暗示说，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如果可能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

话，不使用残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总是比使用残酷手段更有利一些。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地方(只是在这种地方)，他总是根据这条规则行动的。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后、特别是在瓦格拉姆战斗后，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目标常常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但他力图实现这些目的，他的头脑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找出意想不到的手段，不倦地注视着各种主要的和次要的东西，但是又不陷在次要的东西里面。他与俗话讲的相反，能够一下子既看见森林又看见树木，甚至看见树木上的树叶。

权力与荣誉——这就是他个人的主要的激情，同时权力甚至超过荣誉。深谋远虑，敏锐的严格要求，始终预先就有怀疑和发怒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破仑所固有的习性。他周围的人对他的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由于他长期受到崇拜，所以他习惯于这种崇拜并把它看成是一种理应如此的、十分平常的东西。但是，他主要是从可以得到实际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评价这种崇拜的。他坚信不移的信条是：不是爱，而是恐惧和私利，才是可以影响人们的主要杠杆。只是对于自己的士兵，有时他才例外对待。有一次，在他统治欧洲的年代中，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人们将会怎样对待他逝世的消息，宫廷中的阿谀奉承者大谈其未来的深深的悲哀，皇帝却嘲笑地打断他们的话，说欧洲会松一口气，发出“唉！”的叹息声。

至于他的士兵对他的崇拜，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虽然他自己对他们的爱远不及他们对他的爱，但他始终是信任他们的。

他并不怕死。在他逝世后擦洗他的尸体时，发现他身上有几处伤痕，这以前根本没有人知道（除了 1793 年在土伦冲击时受的刺刀伤和 1809 年在莱根堡作战时脚上受的枪伤）。显然，他当时把这些伤瞒过别人，以便不扰乱正在作战的士兵，只是由身边人员把伤口包扎好了，命令他们不准声张出去。他深信自己死后将享有永垂不朽的光荣。他认为，自己的惊人的生活主要是由于一些极其特别的、千

年一遇的条件促成的。有一次他在圣赫勒拿岛对拉斯卡斯说："我的一生是怎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啊！"

他的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当代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长期咆哮的、空前猛烈的台风突然停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拿破仑之前就把当时欧洲世界的许多旧的、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政治羁绊削弱了，把很多法律的、国家法权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摧毁了（上层建筑因惯性而继续存在），把很多有着古老而华丽的外貌的大厦毁坏了。在欧洲爆发的、后来接连好多年在欧洲上空呼啸着的台风（拿破仑就是台风的中心），又把很多这样的建筑一扫而光。当然，没有拿破仑，它们也会倒塌的，但是拿破仑加快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毁灭。他是掌握了杀人艺术的大师和专家，这种杀人艺术使他比较容易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在拿破仑之后，西欧的贵族封建制度的残余还能生存一定的时间，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已是强弩之末。从这个意义上说来，1830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都大大推进了清除历史垃圾的工作。在俄国，这方面工作的最初的一大步（消灭农奴制）只是在1861年才完成，并且是在十分不愿意的情况下完成的，大多数贵族明目张胆地要取消因情况所迫而作的让步，这一点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想减少让步的程度却完全做到了。

但是，同时应该承认，拿破仑本人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帮助了封建的欧洲与他作斗争和战胜他。这位从前的法国革命政府的将军的形象越是被法国皇帝的形象所掩盖，以及法国皇帝的形象越是被世界君主的形象所掩盖，那么拿破仑在使各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方面就越不坚决（1807—1812年在波兰，他使农民获得解放，但不把土地分给他们，实际上这使他们仍然受到奴役；1812年在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与此同时，拿破仑也就越加坚决地要使各国人民和政府服从自己个人的专横，因而使得欧洲一有机会就越加坚决地起来进行反对世界压迫者的斗争。

1813 年至 1814 年，不仅封建贵族阶级的残余认为摆脱拿破仑的压迫是自己的出路。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现在也渴望抛掉拿破仑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因为那妨碍了他们的发展。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很清楚地懂得并且深深地感觉到，拿破仑是在有计划地、无情地剥夺这些国家，只是为了使法国资产阶级得到利益。确实，当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起义推翻了拿破仑的枷锁之后，直接享受这一胜利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但是，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相对说来是软弱的，在政治上是沒有组织的。

因此，在 1813、1814、1815 这三年，反对拿破仑的，还有欧洲社会中曾经为“第一执政公民”而欢欣鼓舞的那个阶级。在雾月 18 日事变与帝国宣布成立之间的一段时期中，很多人曾认为“第一执政公民”是革命解放思想的体现者。

他对被征服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这一点他到最后也不想了解，而且根本也不可能了解。在巴黎的中心，在巨大的旺多姆圆柱的顶上，树立着戴着桂冠的皇帝的铜象（这是用他缴获的大炮铸造的），皇帝一手拿着王笏，一手拿着金球，这仿佛使人想到，皇帝在生前是多么顽固地坚持着疯狂的想法，要把欧洲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亚洲也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掌握得十分牢靠，就象铜象上的皇帝握着象征世界君主国的那个金球一样。但是世界帝国崩溃了，拿破仑的事业中能够长久存在的，只是那些还在他进行统治之前就由决定性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所决定和准备的东西。而在人类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他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是与阿提拉、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相似的，而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则是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尤利·恺撒相似的。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这个形象所独具的特点和它的惊人的复杂个性也就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

研究拿破仑的历史著作眞是浩如烟海。

对于想继续研究拿破仑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读者说来，在已有的书目中，可以推荐基尔赫森的最新的、最完备的著作«拿破仑一世»，在这部书中，列举了几千册书籍的名称(更不用说论文了)。

在拿破仑逝世后的最初几十年，关于拿破仑的著作，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带有爱国主义的赞美的性质。这些著作，是在出现反对拿破仑的大量小册子、毁谤、伪造的言论等等之后的针锋相对的产物，因为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最初几年，那些仇恨“僭位者”的保王党人写了大批攻击拿破仑的小册子。与这些小册子相抗衡，后来出版了一些回忆录，如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多卷著作，夏普加尔的回忆，拉斯卡斯的著作等等，在出版这些回忆性质的作品的同时，系统地研究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历史的最初尝试的成果也问世了。

在这些早期的研究拿破仑的著作中，阿道尔夫·梯也尔所写的著名的二十卷«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引起了很大注意，并且确实提供了大量巧妙地整理过的材料。到现在为止，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非常详细地、如实地描述拿破仑进行的各次战斗)还沒有失去意义。但是该书是以明显的“爱国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在拿破仑获胜的一切战爭中，拿破仑都是正确的。梯也尔被称为“胜利的历史学家”。他只是在拿破仑遭到失败的战爭上才(着重地、然而是委婉地)责备拿破仑。总的说来，这本书是用兴奋欢乐的笔调写成的。这只是一本政治外交和军事史。梯也尔不懂经济，甚至沒有想过：了解历史需要懂得经济。他的著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人们爭相阅读，卓越的

才华有助于此。

瓦尔特·司各特的多卷本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是早期论述拿破仑的大部头著作之一，全书从表面看也是文才横溢的。这位著名的小说家是为最广大读者写这部书的。全书充满敌视拿破仑、热爱英国的调子，论据相当薄弱而且肤浅。一般说来，这部书虽然有很多卷，但是除了读起来很有趣味以外，没有多大价值。这本书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获得很大成功，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在19世纪中叶，“拿破仑神话”是如此牢固地掌握了法国的历史编纂学，以致瓦尔特·司各特的书在法国被视为亵渎圣物的著作。

瓦尔特·司各特似乎希望以自己的著作来回答拜伦，拜伦在逝世前两年即1822年，赞颂过拿破仑的胜利，说他“并非生来就是帝王，却带领帝王们跟随在自己的车后”。保守派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不能原谅拿破仑对封建社会的这种打击。

顺便说一句，瓦尔特·司各特的这本书引起了黑格尔的有趣的评论。

1806年10月13日，耶拿之战的前夕，但那时该城已被拿破仑占领，黑格尔写信给尼特加墨尔说：“我看见皇帝，这个世界的主脑(diese Weltseele)走过该城去进行侦察”。

著名的哲学家后来已经不是这样谈论拿破仑了，而是认为他是“神的惩罚”，但是瓦尔特·司各特的书中对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那些虔信宗教的庸俗议论触怒了他。瓦尔特·司各特写道，“上天”派遣革命和拿破仑来惩罚法国和欧洲的罪孽。黑格尔反对这一点，他说，如果公正的上天这样安排的话，那就是说，革命本身是正义的，必要的，而完全不是犯罪的。他在结束对瓦尔特·司各特的评论时说：“肤浅的头脑！”(Seichter Kopf！)①

① 罗森克兰兹：《黑格尔生平》，1844年柏林版，附录，文献第559页。

同时，文献不断增加。经常出现很多新的关于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回忆录。法国政府出版了三十二巨册（四开本，拿破仑口述的书信、命令和指令。接着又出了补编。关于拿破仑的各次进军，单个的战役，立法、外交、行政方面的专论，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增多了。

浪漫主义派在历史编纂学中形成了特殊的流派，这一派认为“英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领导作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十分强烈地、十分有害地反映在论述拿破仑的著作中。如果说有谁实际上能够使“英雄”派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兴趣的话，那自然首先是拿破仑。

在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中，对这种完全不科学的对待问题的态度最先提出严重抗议的，是夏拉斯上校关于 1815 年战役的著作，这本书于 1858 年第二帝国时期在布鲁塞尔出版。夏拉斯是流亡国外的法国人，拿破仑主义的敌人。1869 年马克思关于夏拉斯曾经写道：“他向对拿破仑的崇拜发动进攻”。法国历史学家艾德加·基内与“拿破仑神话”进行斗争，他力图证明，“大帝国”的思想是与法国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来自意大利，它藏在意大利的所有大活动家的思想深处。皮耶尔·朗弗雷的五卷本的著作，从 1867 年开始出版，共印刷十一版，该书是以敌视拿破仑的笔调写成的。它不仅是对拿破仑历史著作中的“英雄”派的抗议，而且也是对官方那种令人窒息的崇拜拿破仑传统的作法进行斗争的表现。这部书的写作和头几卷的出版，都是在第二帝国时代。朗弗雷仇恨两个拿破仑：即仇恨伯父（他写了这位伯父的历史），也仇恨侄儿（他自己就是在这位侄儿的统治下生活和进行活动的）。在朗弗雷看来，拿破仑一世是个自私的专制君主，人民的压迫者，自由的摧残者，使人类流尽鲜血的暴君。朗弗雷具有实际上是正确的愿望，即反对有关拿破仑历史著作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狂热的夸张，但最终陷入了他的对手所犯的同样的

错误:他极力夸大拿破仑的历史的(似乎是决定一切的)作用,不过在他看来,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作用。

但是结果一样,在方法论上,他也和他的无数的"英雄"学派的对手一样,陷入了幼稚和不科学的夸大的地步。

在第二帝国结束以后,在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历史著作的领域中开始了新的学派。一方面,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当时还存在着拿破仑帝国复辟的危险,一些具有共和主义情绪的历史学家继续进行反对关于拿破仑神话的斗争。容格的著作就是这种斗争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当时问世的伊波利特·丹纳《现代法国的起源》的第五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大学的历史教师)。他是研究法国革命的反动历史学家,在害怕和仇视 1871 年公社的直接印象下,他十分歪曲地描述了第一次革命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他认为拿破仑是 14、15、16、世纪的意大利佣兵队长的世袭者和继承人,以战争为生,为战争而生。他一点也没有谴责拿破仑扼杀革命和消灭共和国的行为。

阿尔贝·索雷尔的八卷著作《欧洲和法国革命》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开始出版,而在 20 世纪头十年全部写完,其中最后四本是专门谈论拿破仑的。索雷尔是在 1870 年至 1871 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写这部书的,而他的爱国的热诚所提出来的论点,直到现在仍然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史料研究中占统治地位:法国没有攻击任何人,只是进行自卫,捍卫本国的"自然疆界"即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从外表看来才是进攻的战争,事实上则是防卫的战争。他施展了很多文学上的才华,研究方面的发现,巧妙的律师的诡辩和外交上的狡猾行为(他学的是外交,职业也是外交工作),来证明自己尚未说完的和不可信的论点的正确性。但是索雷尔的著作顺便弄清了拿破仑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有意义的现象,从叙述事实的意义上说来,它可能是十分有益处的。该书谈论拿破仑时的口吻是十

分热情的、兴奋的。

阿尔图尔·列维在 1894 年写了一本稀奇古怪的书，专门谈论拿破仑的个人特点《拿破仑内传》，这在重新造成“拿破仑神话”和虚伪的对皇帝的崇拜方面，又迈了一大步。据他说来，皇帝集中了全部完美的道德品质，如果死者确实有一个缺点的话，那就是对于人们有着过多的善良和无限的宽宏大量。这位似乎是人类的温和的朋友，温柔的好人，温顺的、热爱和平的博爱家的道德上的美丽，在这位兴奋的传记作者的厚达 650 页的书中似乎还说不完……阿尔图尔·列维的漫画似的、荒谬的夸张和所有荒诞的谎言，丝毫不妨碍这本书及其无稽之谈在有学问的、学问较少的和没有学问的读者当中获得极大的成功。

腓特烈·马宋在 19 世纪九十年代和 20 世纪头十年当中出版了很多卷书（一部分比阿尔图尔·列维的书先出版，大部分是在他的书出版之后出版的，并且他受了列维的成功的鼓舞）谈论拿破仑，他的加冕、他的家庭、他的军队、他的宫廷等。这种详尽的、档案似的、也是以颂扬语气写成的研究作品，阐述了不少纯粹的实际问题，但是要从马宋那里得到一种总的看法，即使是不正确的、片面的但是概括性的理论观点，那是不可能的。

阿尔培·汪达尔是索雷尔的最有才华的继承者和追随者，比马宋要郑重得多。在 1890 年至 1897 年，当法俄在外交上非常接近的时候，他陆续出版了他的三卷研究著作《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其中谈到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法俄战争和法俄联盟的历史。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索雷尔的观点：在对俄战争中，拿破仑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正如他在任何一次战争中没有罪责一样。而且总的说来，拿破仑会在什么事情上有过错呢？看来，阿尔培·汪达尔是不大清楚这一点的。无论如何，在 1902 年（即完成第一部著作后过了五年）出版的他的第二部两大卷著作《拿破仑的飞黄腾达》中，他以他素有的生花妙笔（在文

字方面，他不仅超过索雷尔，而且超过泰恩）描述了雾月 18 日政变的历史，他认为，拿破仑建立独裁制度是没有过错的，而且一般说来，他在发动政变之前或之后的所有作为，都是无可指责的。全书充满了十分兴奋的语调，这种语调甚至一些老的历史学家如梯也尔也未曾有过。但是书中巧妙地引用了有关督政府的垮台以及垮台前垂死挣扎的大量的生动的事实，使本书值得一读。这部两大卷的著作（第一卷 540 页，第二卷 600 页）在问世之后的最初十年中共出版了十八版。

1914 年至 1918 年的大战和战后时期对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关于拿破仑的史料研究中好战的沙文主义的精神大大增强了。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大大小小的、专门性的和通俗的论述拿破仑战争和拿破仑活动的著作。还可以举出德里奥的很多著作［他是专门研究拿破仑历史的杂志《拿破仑研究杂志》的编辑］。在德里奥的这些长篇的专论中，对于以前的材料的某些事实作了大量修正和补充。德里奥的最后几本著作，充满了最反动的沙文主义的精神。

一般说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极力扩张对论述拿破仑的内政活动及其一般历史意义的著作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说来，下列各书是值得注意的（我只举出最新的著作，同时只举一些具有某种独立的实际意义的著作）：路易·马德兰的两卷本《拿破仑》（1934 年出版），或他所著的 1933 年出版的两大本《执政府和帝国》，或班维尔的著作。沃布里的 1935 年出版的两卷本的专门著作《圣赫勒拿岛》，对于拿破仑的最后几年的历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艾杜阿尔·德里奥的 1930 年出版的三卷本新著《拿破仑大帝》，对他的很多篇专论作了总结，这本书中的极其丰富的事实材料超过了班维尔和马德兰的书。从 1936 年起，路易·马德兰的十二卷的著作《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开始问世。作者的笔调

是敬仰的、歌颂的。

1934 年年底，著名研究家米尼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出版，早在 1928 年米尼的关于雾月 18 日的著作就已为自己赢得了声名。他的这部新著（1934 年出版）叫做«对拿破仑的拥护和反对»。米尼首先简短地把拿破仑的敌人可能和已经说过的关于拿破仑的话加以叙述，然后又叙述拿破仑对法国的功绩。总的结论是完全有利于拿破仑的。米尼的著作的出现，是现代的拿破仑史料研究中的一般的辩护派的典型现象。勒费弗尔在 1932 年出版的丛书«民族和文明»(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要客观得多和科学得多。

以上就是一百年来法国的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中的主要派别。我只指出了若干本特别著名的和产生过影响的一般论述拿破仑的著作。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开一个书目，再指出论述拿破仑的生平活动的个别方面的若干专论。

至于谈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著作，整个说来，它们是跟着法国走的。我们想指出富尼埃和在 1934 年完成九大卷研究著作的基尔赫森。基尔赫森是瑞士的学者，他事先就编好了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关于拿破仑的优秀的书目。当然，这两本传记性的书的篇幅是难以比较的：基尔赫森在自己九大卷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每一卷书几乎都有富尼埃的任何一本书的两倍厚。这两部用德语写成的研究著作（其中第二部是以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材料为根据的）的特点，是平静的叙述和以科学的态度和口吻来对待材料。英国人对拿破仑历史中的个别问题写出了大量的研究著作；一般说来，最成功的是霍伦德·罗斯的著作，即(由剑桥大学出版的，专谈拿破仑的历史的巨著«剑桥近代史»第九卷。)这是对整个时代的最完整的一般分析。苏联读者在拉威斯和兰波的«十九世纪历史»一书的头两卷中可以找到对拿破仑时代的中肯的一般分析（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38 年版）。

直到最近，对整个拿破仑时代的经济史的研究还十分不够，尽管国家档案馆中保存了大量未公布的关于第一帝国的经济史的材料。除了巴乌尔·达尔息太特的和我的关于法国和欧洲的大陆封锁以及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经济生活的著作，罗洛夫的关于拿破仑的殖民政策的著作，圣图扬的关于同样内容的最新著作，瑞典学者格克息尔的关于大陆封锁的著作(格克息尔声明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的论著中的材料为根据的)，除了还有极少数的个别的研究著作外，在拿破仑帝国的经济史方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有系统的研究。

根据米兰和其他地方的档案局所保存的未公布过的文献，我写了有关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经济的书《意大利的大陆封锁》，该书于 1928 年在巴黎出版。

1936 年年底出版了路易·维拉的著作《革命与帝国》的第二卷(副标题为《拿破仑》)。这是一本有益的书目述评的手册，指出了关于拿破仑历史的科学研究中的一般概况。但是维拉并不十分了解拿破仑所征服的国家的历史。作者对拿破仑历史的叙述是十分简略、肤浅的，很象是教科书。维拉书中的书目十分丰富。

对拿破仑历史的严格的科学研究，必然会去修正对于拿破仑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的一系列固定的、流行的、但丝毫不因此就显得正确的观点，并且首先应该对尚未公布的有关帝国经济的档案材料加紧进行研究。

弗兰兹·梅林的著作《普鲁士历史》，第一卷，从中世纪到耶拿战役，第二卷，从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到帝国的建立，是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概论(只是谈到普鲁士)，该书最近的、完全的版本是 1930 年出版的。第一卷的第 292 页至第 380 页和第二卷的第 1 页至第 218 页都是谈论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历史。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来，这些地方写得十分吸引人。这部著作是论战性的，它坚决反击了爱国主义的臆造和普鲁士沙文主义的和霍亨索伦君主制的

历史编纂学的观点。和恩格斯一样，梅林也认为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对该国说来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

梅林的著作实际上是目前不太多的关于拿破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

还可以指出舒尔兹的著作（他的《血与铁》一书中谈论拿破仑的地方），劳芬别尔格的著作（《法国占领下的汉堡的情况》）。我在我的著作《拿破仑时代的德法商业关系》（1914 年柏林版）中，根据尚未公布的、上列各书的作者还不知道的文献，叙述了拿破仑时代的汉堡以及德国的一般经济状况。

欧美日益注意苏联历史学家对拿破仑活动的分析，间接的证明就是：第一，我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译成了很多外国文字；第二，本书在英、美、法、瑞典、挪威、意大利和波兰的出版所引起的反响和评论。